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项目

“江村→江镇”课题组

承领单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吴江市委员会

总 顾 问：费孝通

顾　　问：于孟达　周玉龙　惠海鸣

课题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飞　朱云云　沈永明

杜　挺　杨晓容　陈志强

俞　前　徐文初　倪　明

钱一舟　屠福其　浦德琪

课题负责人：钱一舟

江村→江镇

——庙港发展的脚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吴江市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

江苏省吴江市政协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23号

国营吴江市震泽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　邮编：215231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00千字

1996年9月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034-0783-2/F·0019　定价：22.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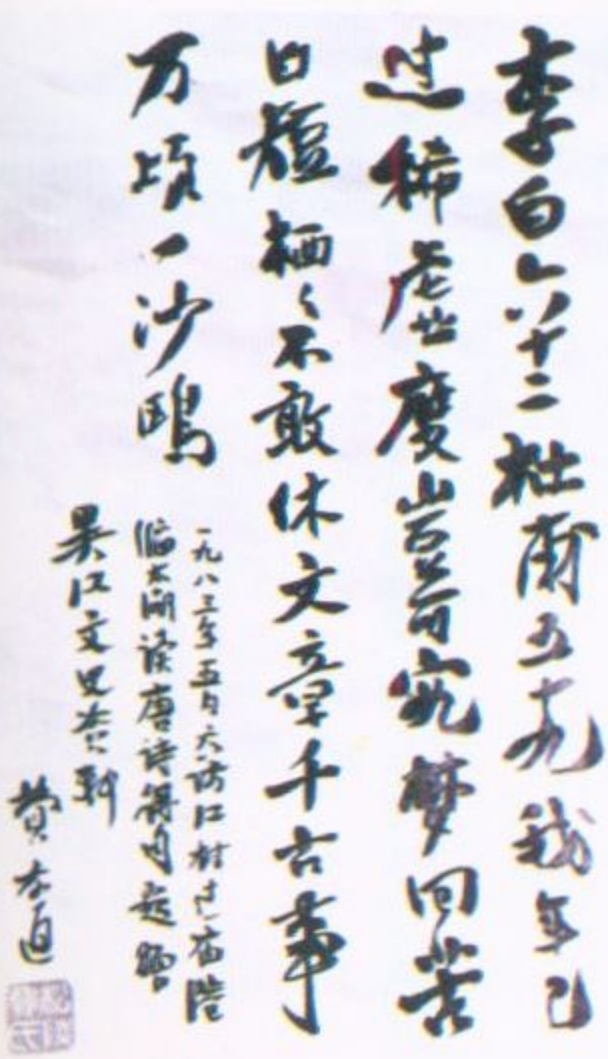
向“江村调查”六十周年献礼!



1、1957 年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座谈

2、费孝通诗赠吴江县政协文史委

3、1982 年 10 月，费孝通与姐姐费达生（右）、夫人孟吟（左）在江村农家牵磨





1
2
3





4

5

6

4、30 年代的开弦弓合作丝厂

5、江苏金蜂集团公司外景

6、1982 年 10 月，吴江县委书记蔡福泉在县二招与费孝通教授探讨“草根工业”（乡村工业）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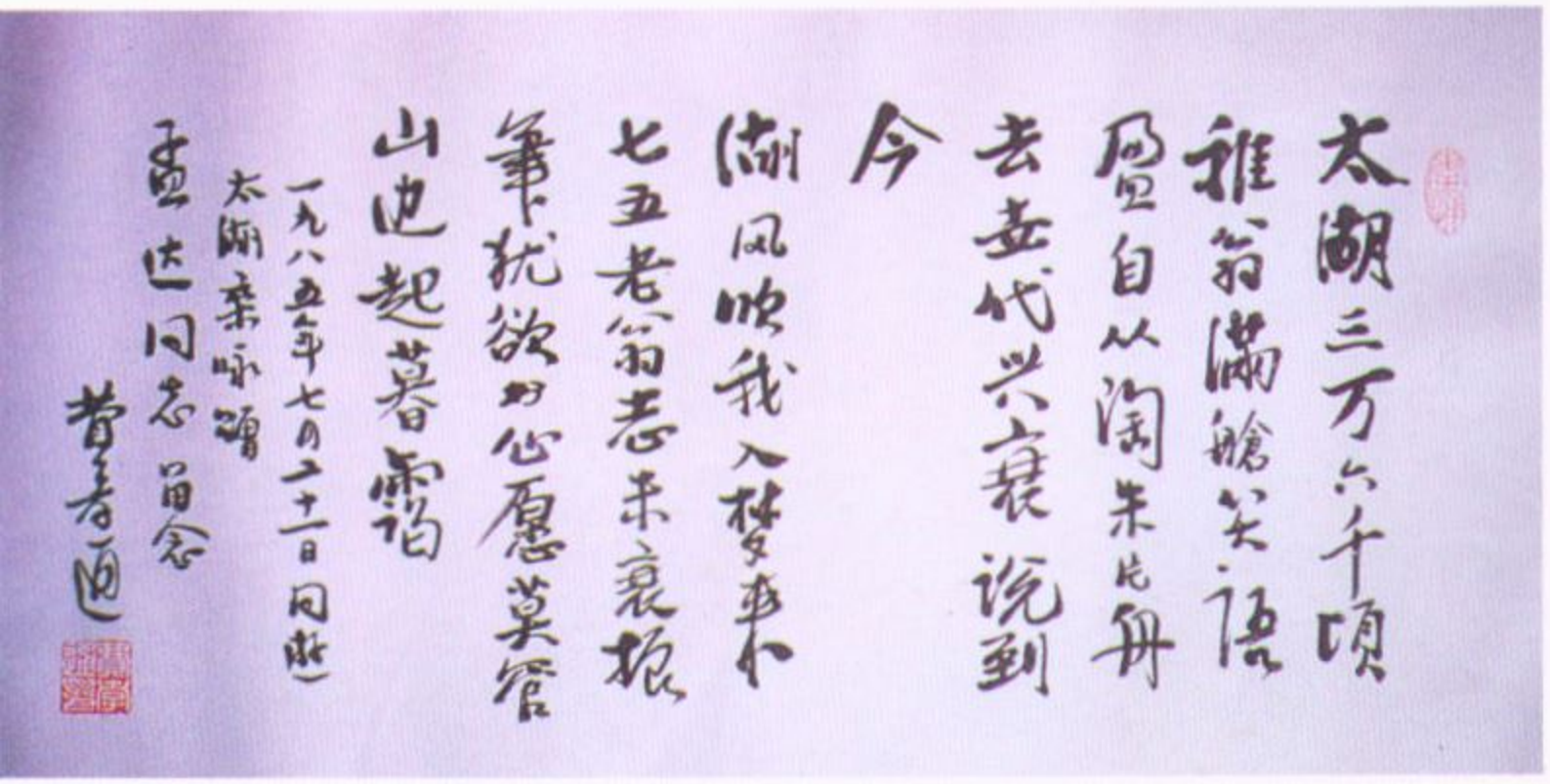
9

7、1981 年 9 月，美国人类社会学家南希·冈萨列斯访问江村

8、1987 年 9 月，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二访江村。右二为代表团团长鹤见和子，右三为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



9、费孝通“游太湖”诗手迹





10

11

12

10、1991 年 5 月，费孝通走访老房东周文昌家



11、1991 年 11 月，吴江县委书记张卫国向费孝通汇报吴江两个文明建设情况



12、1993 年“吴江市江村研究中心”建立。图为费孝通与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右二）、市长张钰良（左二）、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江村研究所副主任潘乃谷（右一）、江村研究中心主任惠海鸣（左一）合影



13、1994 年 6 月，中国永鼎集团公司总经理顾云奎向费孝通介绍电缆生产情况



14、1994 年 10 月，费孝通在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视察经营部

15、庙港街景



	13
14	
	15



16 17 18



16、1995 年 5 月，费孝通在松陵饭店与苏州市委书记杨晓棠（左一）、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敏生（左二）、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右一）、政协主席徐静柏（右二）亲切交谈



17、1996 年 4 月，费孝通在吴江八都镇参观中国华鑫集团公司“神州第一甲鱼场”

18、1996 年 4 月，费孝通在吴江宾馆接见“江村—江镇”课题组成员。前排左一为课题组顾问于孟达

目　录

“江村→江镇”课题鉴定意见(代序) …… (1)

总　论

上　篇　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 钱一舟(1)
下　篇　庙港社会发展总报告 …… 钱一舟(29)

分　论

引　子　庙港文明的历史演进 …… 杨晓容(85)
第一编　经济基础
（一）　农业 …… 叶　飞(96)
（二）　工业 …… 倪　明(134)
（三）　商业 …… 陈志强(156)
第二编　社会环境
（四）　城建 …… 朱云云(173)
（五）　文化 …… 徐文初(190)
（六）　卫生 …… 浦德琪等(208)
第三编　社会生活
（七）　婚姻 …… 沈群红(223)
（八）　生活 …… 沈群红等(246)
第四编　社会机制
（九）　组织 …… 沈永明等(267)

（十） 法治 …… 杜 挺(283)
第五编 社会传承
（十一） 人才 …… 俞 前(314)
（十二） 教育 …… 钱一舟(333)

附 录
1.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 …… 陈志强、庄树强(376)
2.海外学者江村访问记事 …… 庙港镇机关档案室(396)
3.江村 1992 年印象记…… 惠海鸣(402)

后 记 …… (419)

“江村→江镇”
课题鉴定意见
（代序）

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这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得到许多感受，现把评审意见综合如下：

一、这项研究，作为费孝通先生从“江村经济”开始以来一系列研究的后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选题价值不言而喻。费老的上述巨著闻名中外，特别是持续半个多世纪，不断提出独创性的观点，在社会学界属于经典。现在，费老年事已高，亟待薪传。费老家乡的中青年社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敢于肩此重任，“犊不怕虎”，精神可嘉，首先应予肯定和鼓励。这在“江村调查”60 周年之际推出，更是及时献上的一份厚礼。

二、这项研究报告，明显地以《江村经济》为范本，基础好，方向明。当年，费老描述的“江村”是我国近代受工业影响的农村典型，为世界了解旧中国开了一个“窗口”。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农村工业化有力地推动着城镇化的发展，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这项追踪研究，时间上从解放前延伸到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空间上从“江村”（开弦弓）扩大到“江镇”（庙港），勾画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线索，顺理成章，可以认为是对费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全面发挥，体现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趋向，把“窗口”开得更大一

些，为国内外人士了解新中国塑造了活的模型。

三、这项研究的内容广阔，资料丰富，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既有总论，又有分论；既有历史，又有现状；既有经济，又有社会；既有事件，又有人物；既有描绘，又有论述；既照顾全面，又突出重点。纵横交错，动静结合，融成一体，蔚为大观。特别是在经济基础上分为社会环境、社会生活、社会机制和社会传承，别成一格，颇含新意。集中为两大特点：一是引用较多的历史文献，为现实分析奠定了比较的依据，也挖掘了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并增添了文彩；二是引用了大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系统地揭示了该地区的生动面貌，也透露了未来前景的轨迹。

四、这项研究在方法上，本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力图沿袭费老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继承和弘扬费老的优秀学术传统，较熟练地运用了诸如参与观察法、采访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档案法、综合评估法等，使理论与实际、广度与深度、一般与个案相结合，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避免了社会研究中往往出现的简单化和武断化，从而提高了整个研究成果的质量，给读者以说服力和可信度。

五、通过对“江村——江镇”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动力因子、发展规律和存在问题，符合费老一直关注农村发展的“动力与问题”，并在不少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和设计，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应用性。虽然，庙港在超前发展的苏南地区和吴江市并不居领先位置，但是或许更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地区尤其是乡镇输送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我国当前正在从全面实现小康准备迈步走向现代化，这项研究曾经列出副标题“苏南农村现代化之路研究”，也是恰当的和名副其实、学而有用的。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认为，这项研究是成功的，有较厚的理论功底和相当创见，达到了原来立项时确定的目标，具备了总结

结项的要求。当然，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分头执笔，虽经统稿，仍旧存在各篇之间不尽平衡、若干概括还待推敲、文风用语不够一致。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够持续下去，定期拿出更新、更好的成果；并且坚信，费老开创的此一社会研究事业定会有不绝的后来人！

评审委员会：沈立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吴　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朱通华　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
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宋林飞　南京大学教授
童　星　南京大学教授

1996 年 *3* 月 *20* 日

我们有幸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抹之不去的深爱以及那份厚重的责任感……

总　论

上　篇

“处处倚蚕泊，家家下渔筌”这是描绘江村中世纪的一卷风情画，在经历了千年历史的风吹雨蚀，这幅风情画又有何改观？江村又该向何处去？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思索并行动的难题，我们试着走向这个难题。

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

1.课题研究的主旨

诚如我们的前辈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开首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1]。作为“江村经济”的研究后续，我们必须完全遵循这一宗旨，以通过对江村乃至江镇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所映现的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仅是经济方面，还有政治方面、农民生活方式方面、心理方面、农村各阶层的变化），既要揭示它社会变迁的动因和问题，又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使人们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维时空交汇的图象中明晰地看到中国农村演变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所在，并促使社会更为理性地朝向合理方向发展。

2.课题研究的缘起

我们所以要承接这一研究任务是基于对以下几方面原因的考虑:

其一，在于"江村"作为世界对中国农村的关注点这一特殊性的需要。

"江村"自费老的《江村经济》后不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了，而是作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已被赋予民族标志，是中国农村对外的一个形象表征。最初《江村经济》是作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在伦敦大学的博士演讲坛上宣讲，被人认为是世界窥视中国农村的一道罅缝；随后它便更为直接地被冠以"中国农民的生活"广为流传于世，并成为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的必读书目，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范本。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葛迪斯（W.R.Geddes）就是由《江村经济》而对中国农村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中的一个，他在1956年访华期间，特意来到了江村作调查，写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深重的影响。1981年正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此书在国际上流传的广度和它对人们心灵所起的深刻影响力，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赫胥黎奖章；而他的《三访江村》则又一次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农村近50年来的变化。

今天，江村已为世界各国社会学工作者所向往的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地，也是许多文化人士来中国旅游观光的目的地。作为这块"窗口"之地的儿女们，我们有责任建设好它，而建设"江村"则首要的是要了解江村，只有通过对它全方位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才有真正现实意义的实质行动推进。因为"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2]。

其二，在于"江村"、"江镇"既显示了其自身作为中国农村窗

口的特殊意义，又显示了其作为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样本之普遍意义。

作为社会人类学研究样本的选择，费老当时在《江村经济》中说明了三个原因：一是“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二是“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场地”；三是“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间有着特殊的关系”。除此以外，我们还以为如果说《江村经济》是一块反映二战时期日本人侵中国前夕江南农村历史的“断层岩”标本，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并无任何特殊的“优遇”可以逃离中国历史的风风雨雨，而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相同步，在历史的观照下，依然映现着江南地区农村不同“历史断层”中沉积的印痕，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

这里不仅存有史前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留下来的史迹，还有周代荆蛮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交汇的印记，有战国时期吴越相争相融的历史遗痕，有各个朝代走过来的履印，还有外国入侵者践踏过的残血，有农民起义翻卷过的旗风，有土匪湖盗抢掠过的狼烟……这些可以告诉我们江村变迁的历史根因。

解放后它同样经历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制，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费孝通先生在《重访江村》中提到的 1957 年时粮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它会反映中国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特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朝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应该怎么办？江村所隶属的乡已用自己的实践解答了这个中国难题：建立小城镇，以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系的传动带，缩小城乡差别，并促使广大农民走上了小康生活的道路。其间发生

的种种事件将可以为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鉴（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社会问题）。

当然，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其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样本，它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先进发达地区的中国农村，但它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在吴江乃至苏南地区仍属中下游水平。而像庙港一样的小城镇在全国可谓星罗棋布，到 1993 年底为止，我国约有 6 万个小城镇，其中建制镇有 15027 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有 42500 个。

因此，作为中国农村的缩影，它能给人看到的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将来。

其三，在于江村研究发展的需要及其研究者自身发展的需要。

自《江村经济》后，费孝通先生依旧披风沐雨，昼夜兼行，笔耕不辍。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调查和感受，续写了《江村经济》的新篇章:《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故里行》、《吴江行》等宏篇已记录了江村 50 多年来历史变化的每一个踪印。

然而，江村依然还在不断地前行，历史还在延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村的研究目标也在不断深化。“江村”不仅需要大批能为之驱策的斗士，而且还需要一批能持刀作解剖的明智医生，像费孝通先生那样，继续不断地孜孜不倦地追踪它、研究它、完善它。而在这项工作中，有幸的是费孝通先生在我们的前面不仅以身作则，为我们社会学研究做了范楷；更有他 50 多年来辛勤不懈的工作为我们这些后学累积了许多珍贵史料，为我们后面的工作作了极好的铺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已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3)，个中将有许多新课题可以为后来者毕生去追求。

而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同乡后侪，由我们承接他的后续研究，

将会有许多天时、地理、人文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熟悉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认知触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根部去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着一种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爱和责任。我们为拥有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前辈而骄傲，同样我们还为拥有“江村”而感奋激动不已。前面的丰碑已经矗立，我们只希望做这丰碑下的一株株小草，以围护这座丰碑，并为以后新的丰碑的矗起做奠基；眼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项工作，使我们自身不断地从感性提升到理性，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提高，从而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两相统一。我们自己则通过这一工作，真正成长为富有理智、富有热忱、富有创造力的现代新型社会工作者，以实现地域方位和人格方位的双重现代化。

当然初生牛犊未免少忧惧，面对着课题所呈现的种种“难”，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后果是什么，只是凭借着一股热情一味地向前。而正是这种无畏的勇气或许是我们触碰到“小城镇问题的塔尖”之机遇；即使是失败，我们也能为后来者提示一个岔路口，为自己则烛亮一个工作的盲点。

二

由于“江村→江镇”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江村”、“江镇”、“现代化”这样几个重要概念进行讨论并界定。

1.江村

这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在撰写《江村经济》时给江苏吴江太湖边的一个叫开弦弓的小村庄所起的社会学学名。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把费孝通先生当时对村庄和江村的定义抄摘如下：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

区内，与其它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第5页）

“我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座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第7页）

“占有土地共十一圩”“该村土地总面积为3，065亩”（第12页）“这个地区是复合冲积平原，由长期以来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只有少数孤立的山丘，大部分地区是平川。乡下土地平坦，但是无数的坟墩和村子周围的树林遮住了视线。这里，无论是乡村或城市的居住区都比北方地区人口密集。但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第7页）

“长江平原……虽然受夏季季节的影响……也经受大陆旋风的巨大威力。”（第7页）

“由于纬度偏南，夏季呈亚热带气候，气温经常至升38℃（100° F）……。整个地区平均降雨量约为1，200毫米（45英寸）……。春、夏季多雨，6月份的雨最多。自10月至来年2月，气候为干燥，天空晴朗，气温宜人，这时候，是一年中最爽快的季节。”（第7页）

“冬天的气温，难得一连数日都在零下，在较冷的夜间才结薄冰，很少下雪……。”“……冬季平均最低气温为-7℃（19°

F)”（第 7 页）

“长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长季节持续 300 天。”（第 7 页）

“这个地区之所以在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交通上的有利位置。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这里的铁路系统也很发达……一条从上海经苏州至南京；另一条由上海经嘉兴至杭州。……1936 年，苏州与嘉兴之间又增加了一条新路线。”（第 8 页）

这些规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开弦弓村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区划单位，也不是单纯的地域意义上的称呼，而是一个社会综合体，是一个社区。而社区指的是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实体。这个作为社会实体的社区通常包含以下要素:

（1）以一定生产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人群;

（2）人群赖以从事社会活动的、有一定界限的地域;

（3）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

（4）一整套相互配合的、适应各社区生活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

（5）“基本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连的社区成员对所属社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4)。

作为村庄还相对于城镇的含义是:“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村落是村民的生活处所和生产活动基地，一般没有服

务职能，或只在中心村落有日常生活需要的低级服务。"(5)

当然费孝通先生在具体的分析研究中，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江村不完全仅指开弦弓，因为"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6)又说"身处村庄的调查中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7)其"实地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但他当然应该把对这些势力本身的进一步留给其他学科完成。调查者应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尽力约束自己去跟踪那些可以从村庄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影响。"(8)

由于我们的目标已经扩展，我们对"江村"概念也作了一些调整。显然，今天的"江村"已不完全等同于"开弦弓"了，而是在"江镇"的统辖下的一系列如开弦弓那样的小村庄，具体有21个行政村，他们是：勇星、金明、更楼港、曙光、轮穗、合群、庙港、七一、富强、五联、罗港、富联、月字圩、太平桥、民字浜、欢喜桥、张家港、行义港、西草田、渔业村和开弦弓。其研究的时代背景也从《江村经济》时间的两端延伸出去，既要研究江村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不同切片，又要研究其变迁的规律所在及其发展趋势。

当然，在具体分析研究中，我们所选村的样本仍然是以开弦弓为主，以和《江村经济》等江村研究相衔接。

2.江镇

这是我们在本课题研究时顺沿"江村"而给开弦弓所隶属的镇——庙港所定的学名。其区域范围包括：庙港城镇区及其周围21个行政村（在前已述），方圆53.3平方公里。东起太浦河之首，与横扇镇交界处有29孔太浦河节制闸一座；西至丁家港，与七都镇相连；南临18里长漾；北倚太湖，堤岸长8.5公里，与吴县洞庭山隔湖相望。其作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镇区，在太

湖堤内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其职能。境内纵向公路南接318国道，环太湖公路贯穿其东西：距上海130公里，浙江嘉兴59公里，湖州45公里；周边主要小城镇有震泽、南浔、盛泽、平望、松陵等。其地理条件是：镇内河网密布，有40多条港并列排开，与太湖相通，并指通内河，连接京杭大运河。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

同样，江镇也不仅仅是地域或者行政区划上的一个概念，而是被赋予社会意义的一个社会综合体，是在江村基础上发展的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社区。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已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村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而到了工业社会其社会运作的基本细胞应该是小城镇。作为研究，我们不应忽视这个问题。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也不惟庙港为唯一意义上的江镇，而是指代这个地区新生的小城镇；也不把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社会单位来研究，而把它放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去讨论。因为庙港的运作在今天来说，它在更大程度上与周边的大城市和紧邻的小城镇、乡村发生联系，而且已逐渐地从国内走向国际，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脉博一道跳动。其中特别是与震泽镇、盛泽镇、苏州市、上海市联系比较密切，与香港、美国等也有联系，我们也要研究这种影响力。当然我们的研究也限于对这种影响力的研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看到庙港作为村落、集市、村镇、乡镇、城镇不同阶段的情况，以区分这些不同建制的村或者镇作为现代化载体的不同功能，又不惟其功能研究，而重要的是研究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具象和问题，从而揭示村向镇发展的规律所在，及其今后发展方向。其中集市、村镇、集镇、乡镇、城镇在这里也要作一定的概念上的区分：

集市："农村或小城市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9]。其特点是随集起而聚，随集散而去，无固定规模设施，也无固定的居民

区。

村镇：是相对于自然村落，人口相对集中并铺有主要生活用品购买，“农民生活中食用的如油、盐、酱、醋等一次性消费品”和农副产品交换的地方。其“商业部门一般不到10个，销售范围大多在1公里以内”[10]。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但这些设施比较简单，规模很小，主要维持居住区内农户及附近农户的日常生活。

集镇：指的是人们按照一定时间约定集中到指定村镇进行农副产品的集散和其他商品贸易的地方，除村镇固有的基础设施，其余也随集起而聚，随集散而去。镇内有一定的非农人口居住，一般为10～30户。[11]

乡镇：中国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其行政上对其下辖地域上的广大乡村和村镇具有管理职能。其规模设施高于集镇，聚居人口不到2000人，从事非农人口不足50%，其“商业门市部在10～50个之间，销售范围在3公里左右”[12]。

城镇：又叫小城镇。其行政级别与乡镇相同，是乡或者县属镇政府机构所在地，是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规模设施高于乡镇又低于城市，聚居人口超过2000人，且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占50%以上。[13]“镇内同类商品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市部销售，花色品种与数量比乡镇多，选择余地增加，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50到100个之间，销售范围在5公里上下”[14]，它是城乡联系和交流的纽带。

我们所说的“江镇”即属于小城镇，并且是一个新兴的小城镇。研究小城镇，这个课题是由费孝通先生导引的。

“从伦敦回国（接受赫胥黎奖章后归来——著者按），我又回到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15]“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层

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活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农村社区农民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16]就这样，这个课题从“六·五”计划便开始了，并且费孝通先生认为:“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17]，其意义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18]在这同时，费孝通先生身体力行，带领一批人历经十多年而不舍。《小城镇大问题》、《行行重行行》、《论小城镇及其他》、《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等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亲躬之作。而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不仅开创了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道路，而且为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方面解开了一个扣子和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从发展小城镇做起。”“小城镇的发展是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个大问题”[19]。而《小城镇经济管理》、《乡镇社会工程师》、《乡镇综合管理概论》、《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等则是在费孝通先生带动下的研究小城镇的大批成果中的几枚。

面对已经取得的大批研究成果，费孝通先生还是希望通过对小城镇作具体的解剖研究，“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既没有对某一小城镇作出全面深入的解剖，也没有越出吴江县的范围。”“这就好比是在显微镜下找到一个细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顾及其他类似的细胞。”[20]虽然这话讲在课题开展的第一年里，但至今，人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突破仍是不大。我们试图通过对庙港的历史、现在及其将来作出多段的切面剖析，通过这种动态进程的剖

析，以完成“窥中见豹”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心愿。

3.现代化

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且迄今为止尚在争论不定的概念。

现代化作为一项具体的工作研究，开始于 1960 年，当时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学者聚集在日本箱根讨论日本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获得现代化的成果，由此而引发了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讨论。其中美国学者赫尔利赖肖尔首次用了这一概念构建了一个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历史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几条作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标准，如城市化、服务化、个性多样化、大众传播网、各国间的相互作用等。这场讨论迅速地得到扩展和推动，而形成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并呈方兴未艾的趋势。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一般被比较广泛认同的有这样几种:

C.E.布莱克定义:“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21)。

G.罗兹曼等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22)。

S.P.亨廷顿则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23)。

M.纳什则指义为:“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它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现代化’是使社会、文化和个人各自获得经过检验的知识，并把它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一种过程”(24)。

当然现代化的现实起源要大大早于其研究，它几乎是伴随历史过程而产生的。其源点大多数人认为在西欧。它“肇源于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理性化’过

程中，贯穿于科技工业革命的‘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环境的力量，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推动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的‘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神权、专制）的奴役性质，由‘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人的独立性’，从而使人类在通向自由的途程中迈出了划时代的一大步”[25]。

其实应该说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最普遍的时代主题，是任何国家也不可违避的历史必然。就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同时，遥远的东方，也在悄悄生长着一个工业革命的萌芽或者说现代化的萌芽。

二千年的丝绸之路交通，刺激着其源头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并推动着小城镇的形成。周德华在《吴江丝绸志》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吴江已有织染工匠六百十一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吴江游历，目睹吴江出产大量生丝，见到许多商人与手工艺人”“明代官营丝织业有发展，专为官府朝廷织造，如弘治年间吴江县衙门已有籍名在官之丝织匠役 77 户，而服役于苏州府织染局的轮班丝织工匠多达 267 户”，“明中后期新兴的丝绸业市如震泽、盛泽、黄家溪、新杭等相继崛起”[26]，特别是盛泽已形成了“日出万匹”的壮观。这说明，这一块土地上已有一部分农民从“农工相辅”分离成专一的织染专业户，或者说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继之又出现了走出家门出卖手艺的专业艺人，而这可以称得上是最早意义上的“工人”，而其丝织品的质和量不仅吸引了许多商人的云集，同时还催生了小城镇的形成，成为蚕丝商品转换的网络体系。明末诗人周灿有诗可证之:“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逐利民如鹜，多金贾自尊，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晨昏。”[27]我们在盛泽永安桥的建桥碑文上也看到这样的记载:“四方商贾，辐云集，日中交易，肩相摩，踵相接”，乾隆《吴江县志》则载:“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

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其热闹与郡闾门埒”。当然，在这个封建专制的社会里，这块土地自然成为官府朝廷搜刮民脂民膏的基地。正是这种沉重的封建统治制度桎梏禁锢了护卫萌芽并和这种萌芽相协调的经济体制的成长，而致使萌芽最终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枪声中衰弱萎顿，洋货、鸦片等随之倾销中国市场。

而洋货、鸦片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一方面扼杀了民族自身的现代化基因，一另一方面则也催醒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化的反应。魏源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作出最早反应的一个，“中体西用”就是源于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原理，并启开了中国现代化思潮之端绪，进而生发了一场现代化思想运动和民族工业运动。当然这种呼声和尝试在列强的重压下还是微弱的，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崛起，其呼声终会成为一种巨潮，其思想启蒙也一定会真正地发醒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变法运动致力于中国的富强与国人的至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寻求一条富强和平相统一的“驾欧美而上之”的中国道路；五·四运动则是一种现代化思想大启蒙运动，从而规定了“科学”和“民主”为中国现代化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目标。

就在这些运动的背景下，江南，更为狭窄一点就说吴江，一些杰出的新思想者以自己的全部热能转化为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的现代化思想运动。以国民党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为首的“南社”社员及其周边人士以创办“新”字号地方报刊开展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在吴江城乡造成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另一批以郑辟疆先生及其学生费达生等为首的有志之士则高举着“科学为大众”的旗帜投身于科学救国的行列中。就在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后，中国乡村丝业开始衰退的当儿，他们在苏南的无锡、常州、吴县、江阴等地进行蚕丝业的改革，并以庙港开弦弓为实验基地，引进、宣讲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以

工厂代替破产了的家庭手工业，带领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这些行动反映了早期我国农村工业化，甚至可以说是反映了现代化运动的特质。

然而战乱等因素，中国农村工业的步履刚刚迈起就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所冲垮。直到 1949 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了新的生机。1953 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把贫穷的农业国家，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而在那时，强调国家一盘棋，农村主要以农业为主，而农业又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村中的副业、乡村工业被抑制了下来。1958 年大炼钢铁的时候，乡村里的农具加工业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紧接着是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农村里的加工业、工业未能如星火一般点起并燎原；而城市（镇）的工业则有了较大的发展。就在现代化在中国初露势头的时候，十年"文革"以极端的形式对现代化排斥、否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在城市混乱的当儿，乡村工业却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机和环境，尤其是大批知识青年插队、干部下乡给乡村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力量，乡村工业再次萌芽破土，并为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推动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和精神，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阐述了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

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达到小康水平。面对现代化目标的现实距离，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主张我国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应该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四大再次肯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期、中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在这良好的机遇和环境中，苏南农村首先获益，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发展态势，同时启动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同步增长。

确实，中国在现代化这个课题上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探索。首先触碰到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这一二元价值取舍及其交合的问题，触碰到现代化发展的生长机制问题；触碰到现代化发展的速度、现代化的层级、现代化发展对人的影响问题。不管怎样，现代化发展之路的选择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必然选择。其基本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部署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而费孝通先生所作的《江村经济》便是开弦弓村在这“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并带来“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28]之后开设工厂进行蚕丝业改革实验过程中的种种变化，以其“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这实质说明费孝通先生已经在撞击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之宏旨，而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上升到理性阶段。“那时我住在合作社的工厂里，看到农民在机器上缫丝，就想到这不是现代工业进入农村么”，“我从开弦弓村实地调查

中，明确地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29)。而且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可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30),“我十年来马不停蹄的东西穿梭，也就是要追踪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我认为也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31)。

今天我们所要回答的是按照国家现代化目标，江村乃至江镇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现代化水平发展达到怎样一个层位，其基本的做法和问题又是什么，它是如何碰撞到上述几个现代化的难题的，又该如何向下一个目标进军。

在此基础上我们觉得有必要确定一下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从上述人们不同角度的界定和探索中我们初步可以看出，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组成: 1、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变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2、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即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较高程度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和商品流通、服务设施的增长的历史过程; 3、现代化的方式是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迈入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技术先进的生活方式过程; 4、现代化的手段是通过科技革命，使科技进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社会整体发展; 5、现代化的途径是促使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 6、现代化的内容范畴是，不仅着眼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法律制度、文化思想、社会生活、人的心理等领域中，使知识增长、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生活优裕、心理适应，是一个全方位整体协同的变迁; 7、现代化的特点是强烈的开放性和时效性，它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制度结构，以容纳新的因素的生长和

发展；它是一种信息媒体，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实现多方位的合作和交流，以取得更高的成就；8、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在于人类对自身所生活的环境（自然和社会）进行最大限度的合理控制和扩大。

三

由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本课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中寻求江村（江镇）社会变迁的实质，这是一种中介研究，同时它还属于社会人类学范畴中的社区研究。

这种中介性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的研究中已给我们做了方法上的典范，而他在云南的"禄村农田"既是《江村经济》的续篇，又是《江村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一）课题研究的方法

1.参与观察法

费孝通先生把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其通常的做法是调查者一人或者多个人深入到一个社区单位中（农村或工厂），与被调查者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在这个全过程中，调查者按照课题的事先假设，步步深入，逐步搜集材料。在材料汇集整理后，再经过反复探讨，并与相类地区进行比较，以便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更加可靠而圆满的结论，从而再引出课题的正式假设，以作具体的研究。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

（1）强调课题的目标后行。它要求课题的真正假设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实际，而不是研究者的想当然；并且这个假设必须同时具备问题的普遍意义，而不是一种个别的或然的问题，在反复论证课题的可行性基础上再进行课题的具体研究。

（2）强调研究者的亲身经验。把研究者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它可以防范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流于走马看花的掠影，或者防范被调查者面对调查的矫揉造作的表演，以使课题研究能真正地切入问题的核心，累积观察的资料，以便对问题作全程的观察分析。

（3）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这里指的是人）的情感融洽。由于研究者需要置身于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并与这个场景中的人一道共同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一方面便于调查者具体的采访，从而使研究者发现这个场景里事件发生的事实真相，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可以纠正研究者自身观察的偏向，以在他人的补充下作出全面的综合定论。

这种方法的意义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曾通过自己的经历作出过具体的解说：

当我在奥马拉卡那·特罗布里恩岛定居下来以后，我即开始参与了村庄的生活，调查有重大意义的或祀典性的事件，倾听流言，关心人们的日常动态。我了解村社的每日生活程序，就如同本地人一样。……当我清晨散步穿过村庄时，各家各户的生活细节均在我眼前展开，漱洗、烹饪、早餐。我可以看见人们如何安排当天的工作，如何执行这种安排，一群群男女如何协作进行某项建设。日常的琐碎事件：争吵、戏谑、家庭趣事，有时是不引入注目的，有时是戏剧性的，但无一例外均是有意义的。这一切就在我周围形成了一种生活气氛，一种与当地人一模一样的气氛。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有过失礼行为，但由于与我建立了感情的当地人们都毫不迟疑地向我指出。我必须学习适当的行为举止，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甚至具有了与当地人们同样的衡量是非的标准。有了这种基础，再加上我已乐与当地土人为伴，并分享他们的娱乐，于是我开始感觉到我已真正接触到了土著人民，而这无

疑是一次成功的田野调查的必要前提。(32)

当然这种参与观察法也是有局限的。虽然作为江村（江镇）社区中土生土长的人，我们可以避免不同文化背景对所发生的事件误会；但正是我们完全生活于这个社区中，容易"不识庐山真面目"而迷失在众多的具象中。所幸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还有许多种，可以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走出"山谷"，进行"横""侧"等不同角度的观察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其中还有以下这样几种。

2.采访法

它能提供大量有血有肉的资料，并能深入到调查对象的思想感情深处以及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采访还能够用以核实参与观察所获得的资料，了解有关这一社区的一般情况以及有关人们信仰和行为的特殊情况。

采访按照调查者事先给不给被调查者安排好问题而分正式采访和非正式采访。前者指的是在一定的计划下，调查者事先拟好问题给被调查者作答，被采访者处在被动地位。而后者是被调查者在完全主动的地位，随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发展而与调查者谈话。前者目的指向性强，且便于统计，但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对应答问题未作深刻的理解而显示其答案的缺乏深度和广度；后者则相反。

正式采访还可以根据"人——人"或"人——纸——人"不同交流形式分为二种方式。前者的"人——人"交流称为谈话法。这种方式的谈话，双方容易密切感情，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调查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或增多或减少或改换谈话的内容和主题。"人——纸——人"的交流是一种间接的交流，我们通常称它为问卷法。这种方法一般是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事先拟题于纸上，同时向许多人作调查。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调查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的缺

点，且为调查研究提供统计学研究的便利。但是这种调查首先必须建立在被调查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看懂问卷纸上的题目（至少能听懂理解）且对所调查的内容具备心理认同感，而非敷衍搪塞。而问卷自身也需要客观公正，不作暗示。

3.历史档案法

历史档案法则也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它可以通过一定史料的检索帮助人们认识所调查的区域发展根因和事情发展确实的情况，其资料可以是历史史料，可以是经验材料，可以是事实证据、地方志、民间传说、谚语、文学作品、人物传记、摄影相片、电影、录像、文物、图表等等，凡一切记录有关被调查对象的事实材料，皆可作为史料档案为我们研究所用。

4.实验法

则主要用于社区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推测上。它指的是小范围的在一定假设前提下的试验活动，用以论证大范围活动的可行性。

它通常是根据一定研究的设想和一定的实施方案，在特定条件下，有组织地进行，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鉴别各种措施的实效，找出未来发展的实据和规律，从而为未来规划提出可行依据。这种方法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社会学研究中。在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中，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便开始，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而终于成为一种重要的农村社会研究方法。我们在对江村（镇）未来的规划中也将采用此法。

5.比较法

在我们这个课题的具体研究中，主要用的是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纵向比较是通过对江村（镇）的一些年段的切面，然后作前后相比较，看其变迁的程度；而横向比较则把江村（镇）的研究视野扩展到相同类型的村镇、不同类型的村镇、不同区域的村镇，进而进行国际比较，其特点在相同的时限内把江村

（镇）放到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去考察，从而表明江村（镇）变迁的真正原因及其程度等问题。

6.综合评估法

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相对概念，没有一个确定的具体指标体系，而我们的研究如果离开了一定的数量的分析，很难说明江村（镇）发展的实际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衡量江村（镇）的指标体系，其主要方法是参照上述定义的讨论、国际惯用法、几位在国内外深有影响的专家看法、江村（镇）的实际情况，以及人的发展需要，建立我们指标类项，共28项，6大类，并为之加权，用以比照江村（镇）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状态。

庙港社会进步评价标体系*

类项

一、社会结构

1.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

2.非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

3.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

二、人口素质

4.人口自然增长率

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建立指标体系主要参考：

（1）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1989年我国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管理世界》1990.6.

（2）朱庆芳：《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2000年的发展目标》，《农业经济研究》1991.10.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40年发展成就的国际比较》，《管理世界》1990.3.

（4）朱庆芳：《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居世界多少位》，《人民日报》1990.7.9.

6.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比重

7.每千人拥有医生数

8.人均预期寿命

三、经济效益

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乡镇企业资金利税率

11.人均外贸收购额

12.粮食亩产量

13.劳均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

四、生活质量

14.人均日摄取热量

15.农民人均纯收入

16.人均住房面积

17.人均储蓄余额

18.每百户拥有广播等音响设备数

19.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

20.每百人订阅报刊份额率

五、社会保障和秩序

22.享受社会保障人数覆盖面

23.五保户集体供养率

24.每万人口刑事案立案率

25.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伤率

六.社会环境

27.人均耕地面积

27.工业废水达标率

28.废气处理率

其方法是:

A.选定类项并为之作权重评定和年度选定，主要采用专家

咨询和经验相结合的办法，各权重大抵在2～4分之间，年度选定在1935～1995之间，其中每十年为一个选样点，以力求反映庙港社会发展的进程。

B.确定标准分采用10等分，各年度中最低分数值为0分，最高值为10分，平均分值为5～6分之间再按比例定出两边各组分数，指标按逆方向评分。

C.将各年度的实际数值按评分标准对号入座，求出各指标得分。

D.以各指标得分乘权数求出最终得分。

E.其中第4、6、24、25项为逆指标。

而在评定现代化发展的几个层级时，主要参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40年发展成就的国际比较·各类国家生活质量比较》[33]所提供的资料:

	人均GNP($)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婴儿死亡率(‰)	人口增长率%	平均每一医生负担人口	人均日摄热量(千卡)	中学生入学率%
世界平均水平	3400			1.8	3930	2655	50
高收入国家	17020	76	10	0.7	470	3375	92
中收入国家	1840	65	56	2.2	2390	2855	54
低收入国家	320	61	76	2.0	5410	2384	35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所选用的三个指标，并参照其他几位专家的评价指标，对温饱及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定位评判:

1.温饱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　300$

成人识字率　50%

平均预期寿命　61岁

2.小康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　　800$

成人识字率　　80%

人均预期寿命　　72 岁

3.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　　3000$

成人识字率　　95%

人均预期寿命　　74 岁

具体就贫困线的划分根据北京经贸大学吴寒光论《我国小康生活水平的测量与标准》所划；小康水平的评价，主要参照江苏农村小康进程评价表；现代化水平的评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克尔斯的 10 项指标为基准，来进行比较和评估。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也不惟数字而数字，“我们不迷信数字。每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并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我们加以解释的。”[34]而把数字放到具体的时空中去显示其意义，尤其是要根据江村（镇）的具体实情去分析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使我们的分析结论尽可能地靠近事实真相；并为以后的发展找到逻辑依据和起点。因为指标体系不仅能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特质，它还通过比较反映了一定社会发展的速度及其位置、警戒情况。从而引导人们调整工作策略，促使社会走向整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除此以外，我们还运用演绎法、分析法、图表法等来研究，这里不再一一作具体说明。

（二）课题研究的原则

1.整体协同原则

它意味着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应该把它放在社会的整体中去考察，既考虑到本要素的自在发展，又要考虑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这是研究的角度方面要求；而作为研究者，由于我们是各课题组协同工作，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以集集体之

智慧，实行集体攻关，这是研究工作的方法要求。

2.相对比较原则

这也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征。即我们研究一种陌生的文化现象时，应该从该社会发展的内部逻辑去理解它，而不是从考察者本身价值逻辑去衡量它。如现代化的国际比较，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概念没有定论，其各国的国情又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真正意义，也不是相同的，我们不能惟这些数字和现象，来简单地否认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3.客观求实原则

这是社会学研究者的最基本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明确指出:“看来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现实，也很难超越现实，所能要求于科学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实于现实，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以主观愿望来歪曲现实。我也相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35)。

具体，我们采用总分结合的办法，总论重在宏观把握，以理清庙港社会发展的线索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而各分论则尽量详尽地描绘各要素的自在发展中的具体情况，以呈示各个要素的内在发展变迁情况。

总之，我们的一切方法原则在于使自己站在更为客观的位置上，以便清晰地看到江村（镇）的客观真象和规律，以作出客观的结论，从而有效地为江村（镇）的更好发展而服务，并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一个范例。

（吴江市教育局　钱一舟）

注:

(1)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 页，以下所引该

书资料，版本同此。

(2)《江村经济》第3页。

(3)《江村经济》"著者前言"第33页。

(4)《社会科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301页。

(5)《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第766页。

(6)《江村经济》第6页。

(7)《江村经济》第6页。

(8)《江村经济》第6页。

(9)《现代汉语词典》。

(10)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以下所引该书资料，版本同此。

(11) 参照《行行重行行"第19页。

(12)《行行重行行》第35页。

(13)(参: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81、550页有关词条。

(14)《行行重行行》第35页。

(15)《江村经济》著者前言 第3页。

(16)《行行重行行》第9页。

(17) 同(16)第3页。

(18) 同(16)第8页。

(19) 韩明谟:《社会学的重建、探索和突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0)《行行重行行》第4页。

(21)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22)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3)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24) 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5) 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6)《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7、28页。

(27)《鲈乡吟萃》。

(28)《江村经济》第12页。

(29)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0)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31)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

(32) 转引自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4页。

(33)《管理世界》，1990 年第 3 期。
(34)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商务印书馆，1946 年版。
(35)《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庙港社会发展总报告

四

经过三年的广泛调查和研究，我们所得的一些实证资料表明：庙港在这半个多世纪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正在逐步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由渐至速不断积聚能量，向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告别，建立小城镇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一）庙港社会发展速度

其社会综合发展指数每十年上一个台阶，具体见我们自建的社会发展指标类项测量表（表 1）：

说明：其中 1935 年、1945 年由于当时资料留存不足，年代又远去太久，加之换算单位的不断更动，虽然我们有意按照计划做了一些实证调查，但有些已难得到较为确切的实据。故我们不能把它们罗在其列，而只能作为参考；有些则主要依据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及其相关史志、庙港知情人的推算。而平均预期寿命核算则主要参照吴江及苏南的抽样调查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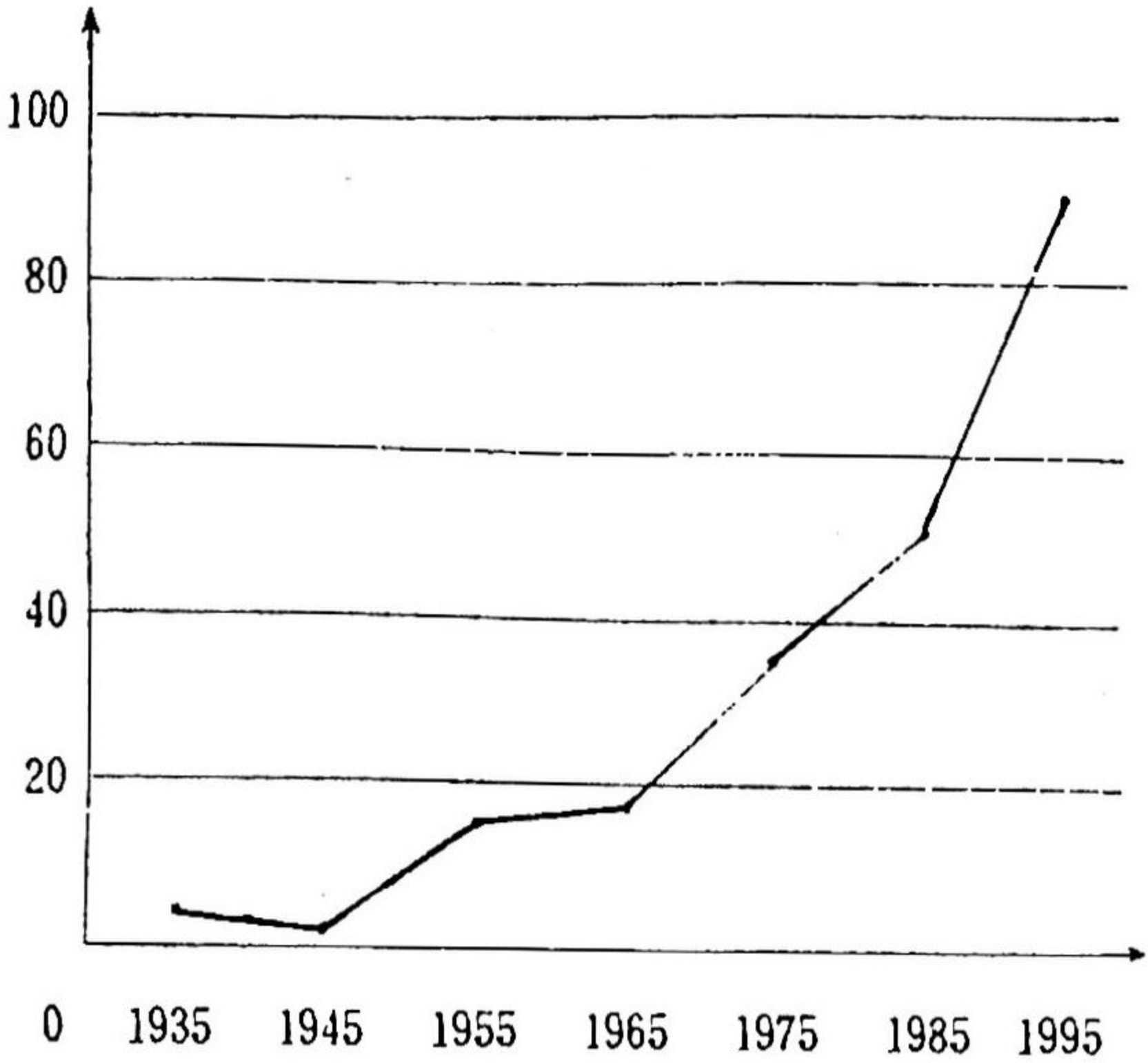
而如果我们要观测其社会发展的速度，则根据上表所列指标可描绘成这样一条变速曲线（表 2）：

（二）庙港社会发展特点

从这一曲线轨迹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庙港社会的发展兼具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受历史沧桑变迁的影响，几个低谷平缓期、

表 1：　庙港社会发展进程评估

序号	类　项	权重	单位	年段指标 1935	1945	1955	1965	1975	1985	1995	各年段标准分 1935	1945	1955	1965	1975	1985	1995
一	社会结构	16															
1.	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比	6	%	16.4	4.0	16.8	18	30	41.7	70.1	1.12	0	1.12	1.26	2.34	3.42	6
2.	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	6	%	4.3	0.4	1.5	3.4	20	45	87	0.29	0	0.78	0.21	1.36	3.15	6
3.	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	4	%	0.4	—	1.0	10	16	44	79.2	0.02	0	0.05	0.50	0.81	3.27	4
二	人口素质	24															
4.	人口自然增长率	6	%	−0.1	−0.1	0.11	3.0	1.5	−0.17	0.54	0	0	5.63	0	4.14	6	5.688
5.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4	%	0.5	0.8	0.8	2.7	8.3	10.1	17.3	0	0.01	0.01	0.05	0.18	0.23	4
6.	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比重	4	%	94	86	60	50	40.6	37.5	31	0	0.52	2.16	2.76	3.4	3.6	4
7.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	4	个			0.2	0.3	0.34	0.44	0.83	0	0	0.96	1.44	1.64	2.12	4
8.	平均预期寿命	6	岁	55	54	61	65	79	72.1	74.5	0.54	0	2.52	3.34	4.44	5.33	6
三	经济效益	22															
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6	元	120	100	130	140	150	1200	11900	0.01	0	0.02	0.02	0.02	0.56	6
10.	人均外贸收购额	6	元	20	0	0	0	100	205	17700	0.016	0	0	0	0.03	0.06	6
11.	粮食亩产量	5	斤	350	350	690	1003	1209	1342	1278	0	0	1.72	3.3	4.33	5	4.68
12.	蚕茧产量	5	担	3700	3700	4314	2454	5585	12761	17822	0.405	0.12	0.61	0	1.02	3.36	5
四	生活质量	24															
13.	农民人均纯收入	4	元	52.5	52	82	112	116	730	4153	0	0	0.01	0.06	0.06	0.66	4
14.	人均住房面积	4	M^2	12	12	14	15	16	26	42	0	0	0.67	0.80	0.94	1.85	4
15.	人均贮蓄余额	4	元	—	—	0.7	1.1	5.5	101	1332	0	0	0.00	0.003	0.02	0.304	4
16.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	2	台	—	—	0.1	0.15	0.4	1	6.1	0	0	0.032	0.05	0.132	0.328	4
17.	每百户拥有广播等音响数	2	只	—	—	0.1	1.5	100	100	100	0	0	0.002	0.030	2	2	2
18.	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	2	台	—	—	—	—	1	15	96	0	0	0	0	0.02	0.31	2
19.	每百人订阅报刊份额率	3	份	0.001	0.001	0.2	0.2	4	5	10	0	0	0.06	0.06	1.2	1.5	3
五	社会保障和秩序	14															
20.	享受社会保障人数覆盖面	4	%	—	—	15	30	55	85	100	0	0	0	0.70	1.88	3.30	4
21.	五保户集体供养率	4	%	—	—	78	100	100	100	100	0	0	0	3.12	4	4	4
22.	每万人口刑事案立案数	2	件	—	—	2	2	2	3	3	2	2	0.67	0.67	0.67	0	0
		100									4.399	2.643	17	18.37	34.63	49.35	90.377



（表 2: 庙港社会 60 年发展变化曲线）

快速增长期都说明了这一点: 1935 年至 1945 年间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及其国内战争，其增长速度为负数-1.76%; 而 1945 年至 1955 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期，中国人民在解放后迅速地疗治战争创伤，恢复家园，庙港社会也进入了发展启动期，其增长速度为 14.36%; 1955 年至 1965 年则进入了第二个增长期，其增长速度为 1.37%; 1965 年至 1975 年值"文革"期，由于当时农村相对稳定，庙港社会又一次进入了新的发展期，其增长速度为 16.26%; 1975 年至 1985 年这十年是拨乱反正期，1978 年进一步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认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之根本，发展是硬道理，而致人庙港社会第四个增长发展期，增长率为 14.72%; 而 1985 年至 1995 年则在第四个增长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加速发展，其增长速度为 41.03%，其发展呈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1.各项指标互为基点，呈正相关的发展趋势

这主要反映在社会结构比例的调整与经济效益的增量关系

上，其社会结构每提高一个分值，经济效益就有相应的提高；经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经济的好转，直接反映在群众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上；尤其是其农业的发展，而孕发其乡村工业；而乡村工业的发展又使农业得到了稳固和加强，并实现了反哺效应：以工建农，以工养农，以工促农，以工建商；经济效益与人口素质也发生了很大的相关，教育、卫生、文化各项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人口的文化程度得到迅速上扬，每万人口的刑事案立案数和每万人口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没有明显增加。

2.发展方向由内发而转化为内核和外缘相结合

庙港的发展得蒙于天时地利人和，历史上在中国属于富足发达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同时它又处在吴文化发祥中心，人文追溯渊源流长，这是庙港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核。虽然作为乡村，它具有一定的内封闭性；但庙港由于富足的农副产品需要外销，而形成其长途贩运传统，他们的腌菜、百合等在长江三角洲具有很高的声誉；而蚕丝、太湖银鱼则是名扬海内外。正是这种对外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和频度的不断增强而促使庙港人较早地跳出自己的视野来看世界，用看世界的眼光来看庙港，并把这种思维方式沉积在自己的个性品格中。开弦弓蚕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就是这种内外结合的典范，其他的一些乡村（镇）企业也是借助于这种方式而发展起来并成为庙港产业的支柱。

3.发展速度由缓至快，正驶入高速发展时期

我们看到庙港60年的社会变迁正在走过缓慢滞重发展期后，由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带来社会全面高速度发展，是不断地积聚能量，抓实基础，稳中求进，齐心协力握住机遇而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效。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时代的机缘性，是全体庙港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这我们可以从无数实例中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创业史；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今天农村的这场深刻的革命，也就不可能

有今日农村之繁荣。

4.发展层位由表层向内层渗透，进入真正的社会转型期

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比例调整都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些外观特征，只有真正深入到人的自身现代化，才有真正的社会现代化。庙港党政一班人早就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积极从自身做起，把自身从农民干部、农民知识分子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社会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他们作了五个破、五个立：破小农经济的"小胜即满"、"小富即安"观念，建"争创一流"的进取意识和效率意识；破"官本位"的"谋职"不"谋事"的现象，建"重素质、建功绩、争奉献"的公仆意识；破狭隘的个人宗族观念，建开放的现代新型人际交往意识；破封建迷信意识，建科教兴镇意识；破贪图个人享受意识，建集体共同致富意识。务实求进，由此而带动全体庙港人自觉走向自身现代化的途程。

（三）庙港社会现代化进程水平

庙港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国际通用的三大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0 年出版的《人文发展报告》所用指标）来衡量，我们看到其健康发展的指数要先于经济指数接近发达国家，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于 50 年代达 60 岁，于 70 年代已达 70 岁，1991 年达 74 岁；其在 1982 年前庙港人的经济生活基本处在 275$ 的下线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于 1983 年已达 1103 元（按汇率 1.5∶1 比价，超 300$），1993 年达 4991 元，（按汇率 2.8∶1 比价折超 800$），1995 年已达 11900 元（按汇率 8.5∶1 折 1400$）。其成人识字率于 1968 年已达 50%，目前为 61%。其小康进程和达标情况详见表 3:

1992 年综合达标率为 95.88%，苏州、无锡、常州分别为 95.58，94.15，93.35[1]；1994 年综合得分为 97.07 分，而江苏农村平均为 87.69 分[2]。

序号	指标	单位	小康标准	权数	目标到达年份	1992年水平	1994年水平
1.	人均收入	元/人	≥1200	30	1990年	1554	3072
2.	基尼系数	—	0.3~0.4	5	1985年	0.06	0.02
3.	恩格尔系数	%	<50	6	1985年	40	45
4.	蛋白质摄入量	克/日/人	≥75	9	1985年	80	82
5.	衣着消费支出	元/人	≥70	3	1980年	250	300
6.	电视机普及率	台/百户	≥70	6	1990年	80	85
7.	钢木结构住房比重	%	≥80	7	1958年	100	100
8.	服务消费支出比重	%	≥10	6	1994年	12	15
9.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岁	≥70	4	1979年	74.1	74.5
10.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年	≥8	5		3.0	3.3
11.	已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	≥85	3	1992年	85	90
12.	安全卫生水普及率	%	≥90	3	1995年	60	90
13.	用电户比重	%	≥95	3	1985年	100	100
14.	已通电话行政村	%	≥70	2	1958年	100	100
15.	享受社会五保户比重	%	≥90	4	1955年	100	100
16.	万人刑事案件立案件	件	<20	4	(一直未超过)	3	1

(表3: 庙港社会小康进程和小康达标进程表)

以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的10项指标看1995年庙港现代化的实现情况，我们可以看表4:

序号	指标	单位	标准	1995年小平	达标率%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	3000以上	1400	46.7
2.	农业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	12~15之间	12	100
3.	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	45以上	19	42.2
4.	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	70以上	70	100
5.	识字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	80以上	61	76.3
6.	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	%	10以上	10	100
7.	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	50以上	19	38
8.	平均预期寿命	岁	70以上	75	100
9.	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	人	1000以下	1200	75.2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	%	10以下	0.017	100

(表4: 庙港现代化实现情况)

其中第2、4、6、8、10项已经达到和超过一定的水平，第1、3、5、7、9项尚有较大的距离。综合达线为77.84%。

（四）庙港社会发展的标志

而作为乡村在走向城镇（城市）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明显的标志:

1.社会结构正处在从纯农业社会向产业配比合理优化的社会转型中。

1923年冬，郑辟疆先生及其追随者费达生等在庙港开弦弓一带进行了土丝改良运动，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在庙港的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支工人队伍。虽然这家企业于抗战期间被毁，但农村工业的萌芽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1968年当年的蚕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重又复萌，庙港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以缫丝厂等一批草根工业，有了一种崭新意义的农民工人，即"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双栖人，他们一方面参与庙港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则不放弃农田生产，在工休和工闲、农忙期间从事于农业劳动。到1992年，其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之百分比为23.55：56.78：19.66，其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之百分比为39.90：50.42：9.68，其工业劳动者及其所产出的经济效益都超过了50%。"双栖人"在这社会进程中则更多地变为单纯意义的工人。

2.人口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虽然庙港少要孩子的习俗早已有之，但这并不表明当时的庙港人已具备了对人口自然控制的理性认识。只是面对地少人多现状的一种无奈选择，致使一些家庭采用了非人道的溺婴手段，这与现今的以科学为手段自觉执行"计划生育"的意识行为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好转，庙港人口自然增长率又迅速上扬的趋势；直到六十年代末，"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人

口问题不仅是个家庭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全球问题，而把少生优生优育自觉地落实在行动中。1992 年育龄夫妇志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占 63.23%，育龄妇女有节育措施的占 94.3%。1993 年人口出生率为 9.27‰，死亡率为 9.1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17‰，计划生育率为 99.64‰。在健康意识行为方面，早期的庙港人把疾病看成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惩罚，轻医药重神道；直到解放后，医学科学的昌明，特别是对血吸虫病治疗和防治工作的开展及其村级合作医疗站的建立，人们才有了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据载，解放前庙港有个骆驼村，当时只有 40 户人家，因血吸虫病死绝的有 24 户，到解放时仅剩 16 户，全村只有 2 个劳动力。随着对血吸虫病的治疗和防治工作的开展，到 1985 年已经治愈的血吸虫病人为 2977 人，治愈率为 99.93%。在今天，人们不仅注重对疾病的及时诊治，而且还注重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到健康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还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注重了科学的养生之道。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口的高文盲半文盲率一直是阻滞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子，解放以来，通过多次的扫盲工作，及其义务教育的大力推进，1990 年的劳动力的非文盲率已达 96.49%，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4.1%，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 7.42%（自修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自费大学、职业大学不计在内）。

3.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集体经济是庙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庙港每年要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为 200～600 万公斤，提供的蚕茧和水产也要成千上万担。以 1995 年为例，蚕茧为 17822 担，水产为 38300 担。1992 年产品的销售收入为 1.8278 亿元，盈利企业利润额为 5189 万元，实现利税 1070 万元，年人均税金 118 元，粮食亩产量为 920 斤，人均外贸收购额为 12714 万元。1995 年产品的销售收入

为7.38亿元，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2670万元，人均税金1163元。粮食亩产1278斤，劳均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411元，人均外贸收购额17700元。这几年平均每年投入城镇建设费400万元，投资了800万元建成3500KV变电所一座，新建1000平方米邮电大楼一座，程控电话机和容量达2000门．新建农贸市场1000平方米，5000吨级自来水厂一期工程已经竣工，闭路电视设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此外，各项服务设施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健全和提高。目前，庙港在金融方面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的办事处；社会保障方面有保险所、养老院、医院、幼儿园等；文化设施方面有广播电视站、影剧院、文化站、中心小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水利交通方面有交通管理所、邮电支局、电力管理站、自来水厂；粮食城建方面有粮管所、房管所、建筑公司等；在农林牧副方面有农业公司、水产公司、食品公司、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商业公司、农机管理站、茧站、牧兽医站、渔业实业公司等；商业服务方面有供销合作社、集体商业公司等。网络齐全、通达。

4.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这可以从人们的服饰来看，过去人们只求能吃饱穿暖，到今天人们不仅具有追赶时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还注重以自己的个性特色来装扮自己。人们满足于这种自在的生活方式，其主要依据可以看1992年的人均储蓄，其余额为678.72元。居民住房情况有了5次变化，1965年开始旧屋翻新为青砖黑瓦的水泥钢木结构，1981年开始由平房改为楼房，1990年开始又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了卫生设施，并注重了内部的装饰和外部的结构美观，由平展式的房屋结构改为团结型的套房，人均住房面积也从1975年的15平方米到1995年的40多平方米。广播音响电视覆盖率为100%，邮电局每日发送的报刊份额1992年为546份次，1995年为792份次，自行车在1975年时尚属稀有之物，现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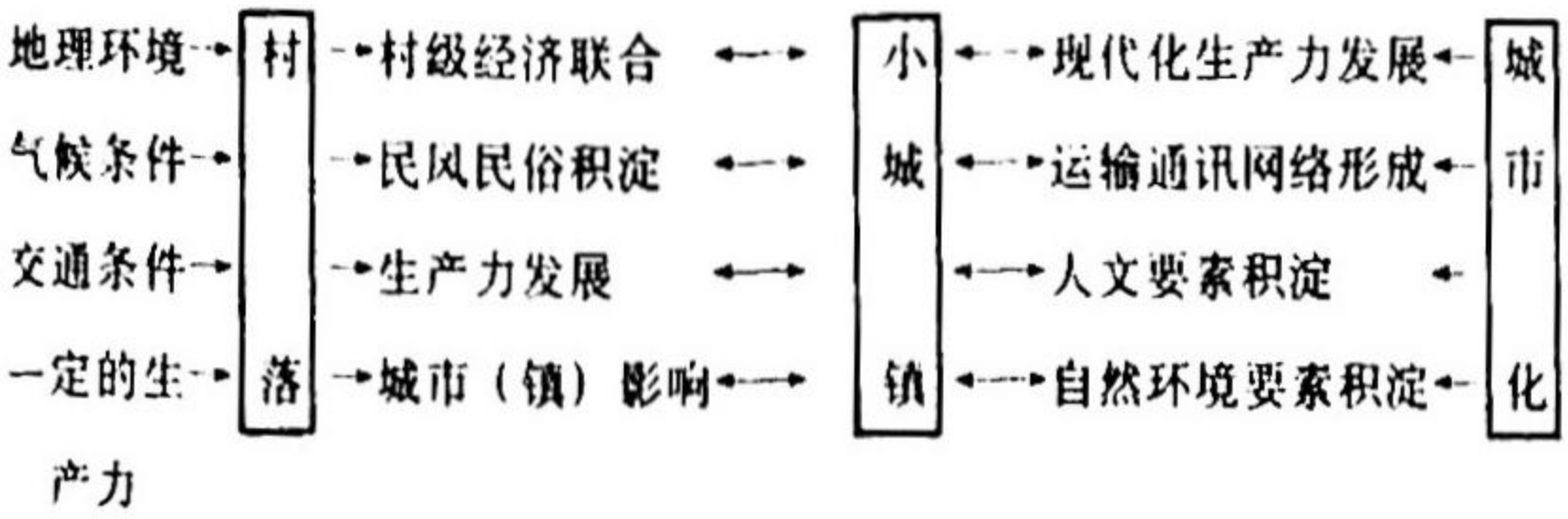
了每家每户必备的交通工具，摩托车也在悄悄进入千家万户，全镇约有500辆摩托车，私人拥有的汽车有40辆左右、机动车70多辆。

5.社会运行机制正常，社会保障覆盖全面。

经济上升了，社会问题也急剧增多，这是一些先进国家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在庙港却没有出现此种状况。其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历史人文因素，这里的居民素来平和通达，不喜争斗，更不屑于小人的斗屑之为，历来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率低。还有的是其社会组织制度的有效保证：一方面其法律机制运行正常，一些诸如婚姻法、财产法、刑事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已化为庙港人的行为规范，一些乡规民俗（约）也在不断地化育着人们的精神风貌，构成了庙港人的基本行为框架；另一方面，其社会保障覆盖涉及全面，既有养老保障，还发展了贫困、失业、重大事故、残疾等一系列的社会救济福利事业，以缩减贫富的差距，有效地保障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其享受社会保障人数覆盖面达100%，五保户集体供养率100%；敬老院于1986年成立。1992年养老的人数23人，救济贫困户为49户，接收救济的人数有157人，用于社会福利救济金为2050元；交通火灾事故15起，每万人口事故发生率为5.12起；刑事案件立案数为9件，每万人口为3.06件；治安案件发生数为13件，每万人口为4.43件。社会整合机制良好。

五

庙港作为一些村落的联合体到今天具有前面所述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向前推进的速率，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进及其文明的积淀，并在其周边城市群（城镇群）的影响下而生发变化成的。其发展的载体、要素及其走向如下图：



第一层级变化：村→镇

庙港的发展首先占有了村落自然发展的三大优势：一是地形优势。境内地势平坦，沃野连畴，水网密织，有利于人类的生息繁衍。二是气候优势。这里处在北温带，又濒临万顷太湖，受环太湖小气候影响，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宜于各类植物的生长。属于全国著名的渔米之乡。三是方位优势。这里河港交叉，既利于农田的水利灌溉，又可指通外境各地。这在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早期农业时代占有了极为优厚的地理条件，既可满足赖以生存的农民的基本需要，又利于村落间、村镇间、城乡间的物品、信息、人力的交换。由此而不断推动着庙港当地的生产发展，并为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和规范染上了自己的独特的色彩，进而促进村的整体发展，从而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和质量。

以开弦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是这样运作的：

（一）1949 年前的村级社会结构形态

这一时期的村级社会情况我们主要选择以 1936 年为代表。

1.生产状况

靠天靠地作农事是当时中国农村生产状况的基本写照。当时的农民基本劳作每日以日出作工，日落而息；每年则依据农历节气安排不同的工作，这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第九、十章中已有详述。其生产方面以家庭为单位，一般男性主外，女性主内。每到一个节气，成年男人或从事于农田劳动，如开沟挖渠、整田、锄草、施肥、搁河泥，种植稻、麦、油菜、桑及其各类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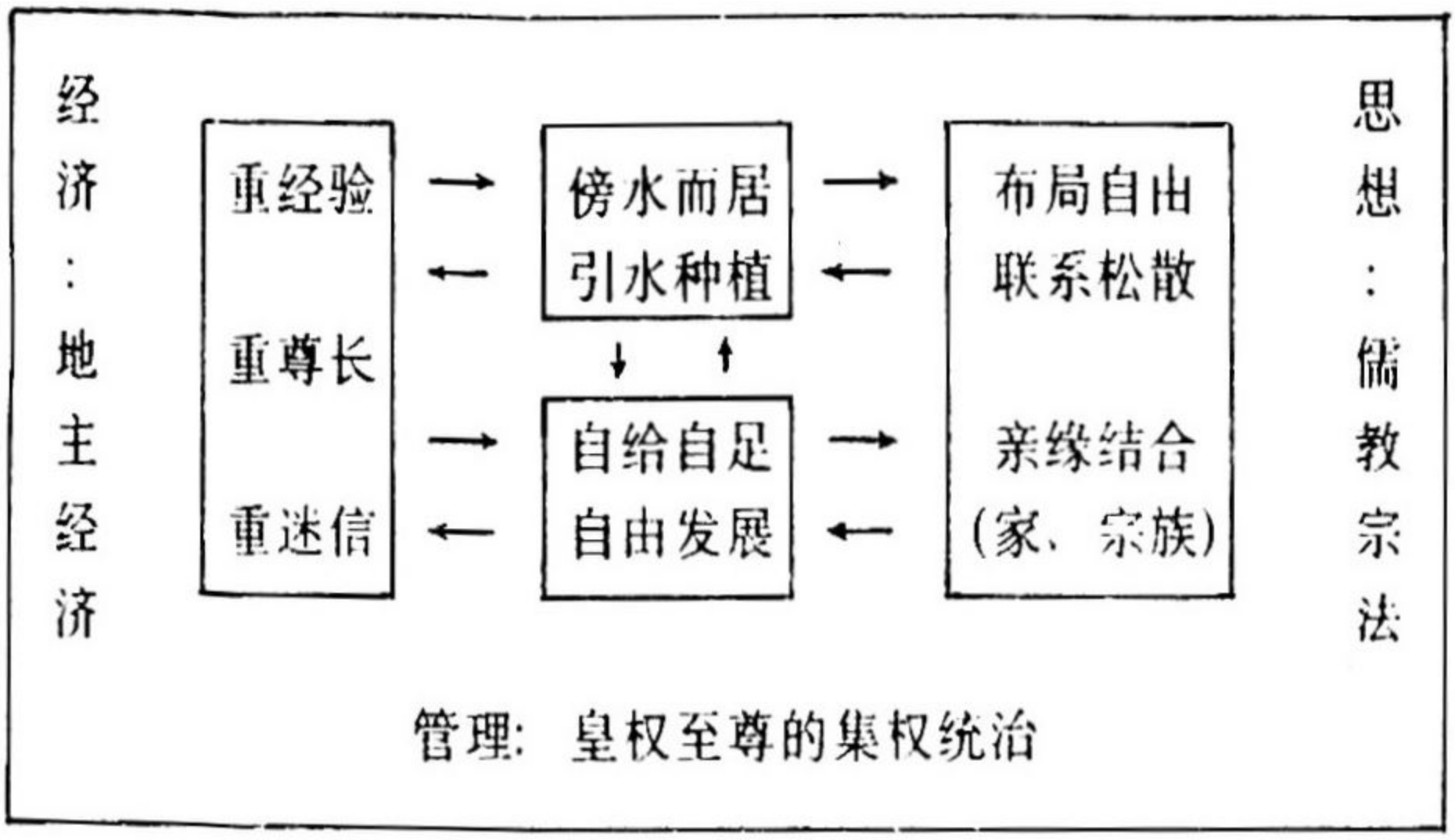
菜，如青菜、萝卜、大头菜、百合等；或者进行农副产品的加工，如编竹器、腌菜等；或者摇船出去摘贩运。成年女性则主要在家里主持家务劳动、养育下一代；还有饲蚕、喂猪、养羊、缫丝、织布等。但一些孤儿寡母家庭，缺少男劳动，其女主人不仅要持家，还要兼起男人的活。其劳作的主要工具有牛、风车、水车，还有犁、铧、锹、锄、耙、耜、镰刀、铁锹、钩子等。隔、筛、桶（盛粉桶、盛粪桶、盛水桶、谷桶，麦桶）。渔民的劳作工具主要有船及其一些辅捞用具，如网、篙、笼、叉等。

2.经济能力

1936 年开弦弓可耕地为 2800 亩，人口 1458 人，其收成（为便于对照均折合米收成来计算）水稻 668400 斤，春花作物 5070 斤，蚕丝 250920 斤，返运收入 46500 斤，渔业 36000 斤，养殖业为 15750 斤，丝厂 5280 斤，总收入为 120192 斤。其产业结构一、二、三产各占的百分比为 95.69%、0.44%、3.87%。他们虽然已拥有了工业，但在当时的村级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微弱的，而作为往返于城乡间、村镇间、村村间的返运业已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说明这时的农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全封闭的乡村。

3.社会运行

如果说按照上述经济能力情况看其理论分配，开弦弓人均所得应该有 824 斤。如果按人均实际消费 350 斤／年的话，尚有 474 斤余粮可作为其生活的其他开支，按当时的物价可抵城市（镇）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准；然而当时的土地制度及其政治制度的束缚，开弦弓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几近在贫困线上，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是这样惊呼的："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3]。其社会运行状况见图 1：



（图1：1949年前庙港村级社会运行图）

其社会制度即以皇权至尊的中央集权统治，农民处在统治机构的最低层，该统治制度保证地主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致使农民的生活一直不能走出困境。开弦弓人所拥有的土地占总数的1/3，人均0.64亩，若以每亩地产米242.29斤的话，人均每人每年得粮仅155.06斤，即使加上其他方面收入也不足350斤（实为341斤）。这就迫使农民向地主租赁土地等，这样开弦乡人的人均田赋利息就得多支出149斤，实际收入为675斤。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则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在庙港历史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的自然灾害，几乎每隔50年就有一次，对庙港进行灭绝性的破坏。

此外，还与村民们的联系方式有关。据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对中国湖州（庙港在近代其经济、文化等与湖州联系比较紧密，同属蚕桑区）和日本上州社会结构相比照，认为"上州参加再缫生产的农民与村级社会关系极为密切，很少背离它。这样促进了合作组织，而合作组织又成为引进新技术的社会后盾。相反，湖州从事再缫的农民和村坊的关系相当松散，在其进入市镇进行生丝交易时仅仅是个体的角色。"又说，"湖州农民直接到市镇上去是为

了改善交易环境，相反上州农民则在他们自己的村里寻求改进其交易环境。由于制度和做法上的相应差异，上州制成的再缫丝虽然仍旧是手工生产，然质量均一，结果在美国市场上逐渐取代湖州的再缫丝。这说明在生丝出口上，日本是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4)

家，是当时村级社会运作的基本细胞，其承担着经济、宗教礼法、社会规范、政令执行、生育教育等诸项功能。一个家往往有多代（三代以上）人共同生活组成，以辈份和年龄为长，只有在最高一代去世后，其第二代兄弟间才可分灶立户，成为两个以上的新家庭。家族中以男性为重，一切以男主人说了算。妇女地位低下，这在庙港这样一个妇女在生产、家庭中起有重大作用的农村，按照其角色分工，她们主要承担了蚕桑、缫丝、养殖、纺织等工作及其持家、生育职责，其创造的可见价值为家庭总收入的20%左右。然而，在那时的社会制度下，妇女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连婚姻都只能靠媒妁之言而不能由自己作主，可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妇女结婚后，需到男家去落户，成为其夫家的"屋里人"。更无所谓参政议政，享有经济、政治、生活诸方面自主的权利。农民基本处在低营养低卫生条件无任何保障的社会秩序下。

这里还需进一步指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政治上冲垮了皇权至尊的集权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地主利益，但是农民头上的重压不仅没有减轻，相反是更加沉重了。农民每年要多交的赋税就田赋一项，抗战后的1937年是抗战前1929年的2.6倍，地方杂捐为5.7倍，还有的是殖民地国家商品的倾销等。侵略者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和掠夺，其所造成的损伤是无法估量的。期间我们看到了民众不断起来进行反抗的烽火，而最终推翻了整个社会制度。

而这一社会制度之所以能维系几千年，乃是其几千年来儒教宗法思想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扎根、因延。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儒教宗法思想起了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它在观念上确认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人们把一切的不平等看成是命运的安排，从而维系了整个社会的延续。正是这样严格的等级社会，束缚了生产力的上升，经济凋弊，整个社会发展速度缓慢。

（二）1949 年的后村级社会结构形态

这一时期的村级社会情况我们主要选择 1956 年、1982 年为代表。

1.生产状况

这一时期的农村生产状况逐渐摆脱对自然的全部依赖，甚至在"人定胜天"的思想领导下，走向了对自然的最大索取。其农民在生产小队（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集体劳作。由于强调了"以粮为纲"，蚕桑等副业一度几乎被全部砍光。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方面的生产工具大多延用过去的工具。此外，还逐渐添加了拖拉机、脱粒机、排风机、水泵等。运输方面的手摇船逐渐改为机动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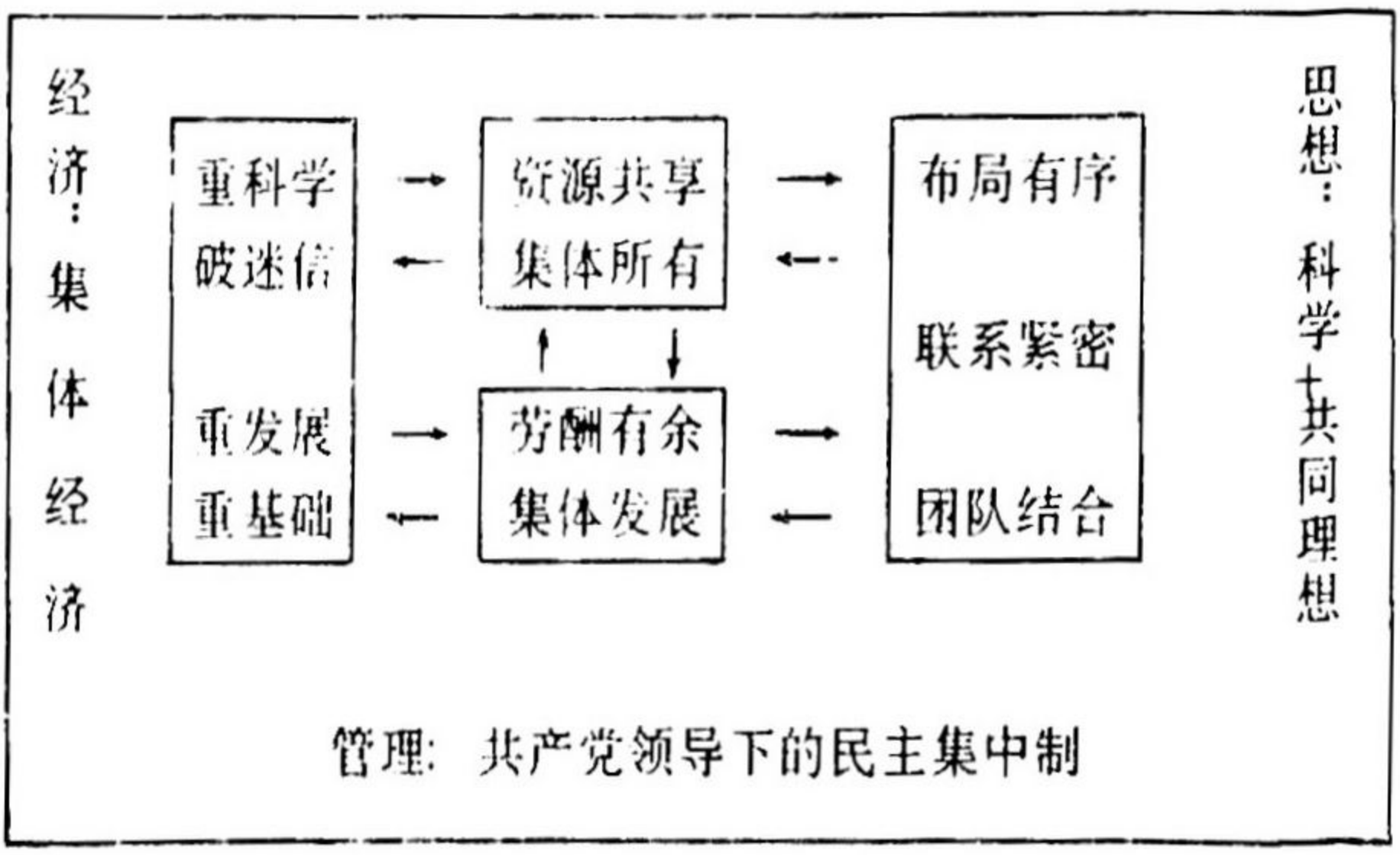
2.经济能力

1956 年开弦弓可耕地为 4293568 亩，其基本收入如下：农业 260217.15 元，养蚕 33791.04 元，运输 1613.36 元，渔业 18584.99 元，养殖业 1817.17 元，种菱 1345.04 元，谷 4715.77 元，烘工 3360.9 元，其他杂项 5735.49 元，合计 331180.91 元，减去各项成本实际收入计 236451.03 元，折米 1764559.7 斤（斤 / 0.134 元）。其一、二、三产业之百分比各占 98.50%、1.02%、0.49%，与 1936 年相比工业收入有些微增长，而返运则有所降低，而这一时期主要强调的是粮食的生产，商贸方面则主要有城镇商业部门统管。1982 年工业产值为 325

万元，其占产业百分比为60.40%，农副业为39.60%（包括运输业）。

3.社会运行

按照理论分配，1956年开弦弓当时有人口2359人，人均收入应为100.23元（折米747.99斤），而实际人均收入为114.99元，折米858斤，这主要还有各个家庭送到社里的肥料返还，自留地的桑叶、养殖的猪羊兔等的收入一道计在内，比1936年的收入多183斤。而如果以1982年看其人均收入，则为334元，折米为2492.53斤，是1936年的3.69倍（集体公积金不计在内）。这主要是社会制度有了本质上的改变，而其村庄的社会运行也作了新的调整。见图2：



（图2：1949年后庙港村级社会运行图）

这一变化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使土地所有权作了彻底的改变而带来的。农民无须再向地主交纳田赋利息，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建立集体经济的同时，农民通过了土地改革运动、三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官僚主义）运

动、社会主义运动等，在思想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破除迷信，建立崇尚科学的信念。庙港众多的宇庙或被拆除或被作为公共设施而另作他用。（2）破除等级观念，建立平等民主的信念。集体的事，集体讨论决定，而非长官意志。（3）破个人主义意识，建集体公众意识。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其组织管理体制于 1949～1958 年完成了：家庭（家族）经济联合体—互助组（几个家庭的联合）—初级社（十多户到二十多户的联合）—高级社（一个村的经济联合体）—人民公社（乡级政治经济的联合体）。

互助组一般是有 5 个家庭组成，根据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实行“以工换工”（以大体相等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死工活计”（根据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定出基本工分），每天完工后进行评议，既看基本工分又看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记分到人。

初级社内部实行土地评级入股，大型农具、耕牛等财产折价入社，生产统一经营，成本按股投资。劳动计酬按件定分、定质定量、按劳得分。分配实行土地、劳力分红，土地占 40%，劳力为 55%，同时提留 5%为公积金。

高级社规模一般在 100～400 户之间，1956 年上半年大庙港区联合三社为全吴江的样板社，下半年底全面推开，农户原有的土地均归集体所有，大型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折价入社，逐年偿还。社内采用包工到组的办法，实行按劳分配和奖惩制度。1956 年每户纯收入为 417 元，比 1955 年增加 33.07%。

1957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来的乡于 1958 年 9 月改为人民公社。这意味着在生产上，劳力统一调动，搞大兵团作战。这种劳动组合在大规模兴修水利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不按合理负担政策搞平均摊派等。实行公社核算后，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后重新调整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

生产大队除了按照规定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和向公社交纳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其余收入由大队分配，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结合的分配制度。其利在缩小贫富差距，但这种缩小不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其结果只能演变为穷共产主义，群众生活水平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进行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对分离。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土地承包普遍实行“三田制”，即口粮田（约人均 0.4～0.5 亩）、饲料田（每头肉猪 0.1 亩，母猪 0.2 亩）和责任田（按劳力划分），产品分配实行大包干，即农户完成国家粮油定购任务和完成规定交纳的国家税金和集体“两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自主支配剩余产品，自主安排家庭经济收益。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但相对于一些大中型城市，庙港与许多农村一样，还是处在相对稳定的状况中，并在这社会动荡时期，抓住机遇发展工业。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它以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为契机，通过强化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互补、以乡村工业为新的生长点，于 1982 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翻番。1984 年实现了第二次翻番，1995 年已实现第五个翻番。

就经济和社会管理来说，实现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的职能转变，即通过寻找和培养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机制，向“小政府大社会”发展。人民公社又恢复为乡人民政府，共产党的支部建在村级，其村的组织体系为：

第一级　村民委员会（党支部）

下设妇女、共青团支部、治安保卫、合作医疗站、学校等条线；

第二级　各村民小组（党小组）

下设妇女、治安保卫小组。

村民们的生产关系也从以亲属为核心代际纵向直属联系转为以社队组为核心平行横向合作关系；产业结构也从纯农经济转变为农工相辅、农副工结合体；并且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改变，及其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集体事业有了不断的发展，村级公共设施（村村联合公共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合作医疗站、标准化学校、道路、自来水设备、配电设施、水利设施有了巨大的改观，或者从无到有，这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更为重要的这一切是农民在自己当家作主的基础进行的，是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并经过村民委员会集体讨论而作出决策实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大家庭，裂变为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合同自己的未婚子女住在一起，妇女地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升：在经济上与男性一样实行同工同酬；在政治上具有民主选举权、表决权，妇女参政率为15%左右；在生活上由于女性之优势又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真正当家人。当然苏南女性的温婉贤淑勤劳之特性，决定了苏南女性一般不独断专行，她们中的大多数在家庭生活的大事上还是相当尊重自己丈夫的意见，与丈夫共商家庭大计。

居民的房舍结构比较开放，人际交往的范围比较狭小，频度又高，往往某家刚刚发生的一件极细小的事，瞬即被村里的人当作劳作休闲、茶后饭余的谈话资料，且加以评判。一些习惯规范方面的事如有违反，即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人们对人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强的刻板性，看人先看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成员不好，该孩子也往往不是好孩子；那么即使其有所变化，也很难让人改变看法。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小就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要保持其一致性。这种村级社区所固有的心理场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起有一定的固化作用。当然其负面影响是对新事物出现的排斥性也相对增强，而且对人才交流也有较大的影响。

第二层级变化：城镇化→城市化

作为农村现代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建立，庙港的发展不同于其周边以“日中为市”或以交通为枢纽、以文化旅游资源为特色自然发育的七大古镇，也不同于以专业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小城镇。它以种植、养殖和加工业联动发展为启动源，以农业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为基本方式，以小城镇的商业网络为外观特征，以政府的政策行为为导向，由纯农业经济为主的自然村落状况逐步走向产业结构合理配比人口趋中的小城镇道路，并于1992年正式被批准为撤乡建镇。

（一）城镇（市）化水平

撤乡建镇意味着庙港社会发展由量的积聚转向质的飞跃，其由过去的以农业为主体的村落散布、集市众多的状况转化为以工业为主体产业、镇区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的新生小城镇。其工业化率（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率）为68.99%，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14.09%。人口密度为548.86人／平方公里。其镇区面积为1.6平方公里，镇区聚居人口为4136人，其中非农人口（户籍管理意义上的非农）为2823人，占镇区居住人口的68.25%。设有零售商业饮食服务机构113个，其中零售业为96个，饮食业为13个，服务业为4个；商业从业人员为377人，商品销售半径为7～8公里，建有工业小区1个，专业市场2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042.22万元，其中居民消费零售额人均为556.48元（农副产品消费零售额不计在内）。镇区道路总长度为12公里。

小城镇作为庙港社会发展的第二层级，虽历时仅三年，但这三年确实使庙港社会发生大变化的三年。完成了综合运输网络体系的构建，信息桥体系开始构建，现代化生产力的机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跨越。农副工总产值三年翻两番：1993年

比 1992 年增 80.8%，1994 年比 1992 年增长 163.9%，1995 年比 1992 年增长 238%。农业总产值 2500 万元，比 1992 年增长 117.4%。多种经营收入每年以 39%的速度增长，1993 年为 10035 万元，1994 年为 14516 万元，1995 年虽然蚕桑方面由于市场和气候方面的原因有所影响，但特种水产、蔬菜、禽畜的养殖和种植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产值超 1.5 亿元。经济效益增量 1993 年为 5929 万元，1994 年为 6019 万元，1995 年为 7000 万元，平均年递增 26%。外向型经济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外贸供货出口额 1995 年比 1992 年增加 254%。镇村工业企业总资产比 1992 年增长了 250%，其中固定资产原值，三年净增 9870 万元，年递增 3300 万元和 46%。资产负债率为 48%。全镇职工平均工资达 4100 元，农民人均收入为 3500 元，分别比 1992 年增长 71.5%和 125.2%。而作为城乡的联系纽带，它加速了乡村社区的城镇化的进程，使庙港得以以工业小区为依托，以专业市场为网络，以不断强化的基础设施、商贸大街和住宅新区为框架的小城镇建定，成为事实上的城乡联结、内外互动、产业聚集、文化扩散、观念转换、生活方式变革的基地。

当年费孝通先生所调查的开弦弓为代表的村庄，那种依靠航船把货物运送到乡村只买卖一些油盐酱醋的日子现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即使远离镇区的农民到镇上去上班或购物都如同脚边之路一般，以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单程到镇区不超过半小时，而摩托车和来往于各道路间兼具赢利性质的电动车、机动车等只需 10～15 分钟均可抵达目的地。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人流大多是在工厂上下班的工人，他们从东到西，从南往北，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以开弦弓为例，目前这个村所有的劳动力为 1550 人，其中务农数不足 27%（包括从事于副业生产），其余的人都到各个企事业单位任职了，或从事于商贸工作。

随着小城镇的形成，庙港的农村城市化水平也越来越高。根据陈丹利等在《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监测体系的构造及战略选择》[5]所制订的《农村城市化进程监测指标体系》，我们进行了对照，其农村城市化水平见表5:

操作指标	单位	指标要求	权数100	1992年 指标	1992年 得分	1995年 指标	1995年 得分
A.非农业人口比重	%	75	25	3.8	0.8	4.0	0.8
非农业产值比重	%	90	10	78	8.7	88	9.8
B.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元	8000	10	3655	13.4	12069	10
农村第三产业比重	%	50	6	10	1.2	19	2.3
每万人口拥有商业网点	个	250	5	82	1.6	119	2.4
贫困人口比重	%	2	6	0.6	6	0.3	6
每万人口拥有电话机	部	651	5	142	1.1	662	5.1
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	人	551	4	1724	−4.5	1200	−0.7
每百人拥有报刊	份	10	4	8	3.2	10	4
C.农村劳动力受教育限一年	年	12	8	2.5	1.7	3.1	2.1
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累积比重	%	70	8	50	5.7	65	7.4
人均乡镇企业收入	元	2000	9	2390	9	4300	9

（表5: 庙港农村城市化进程状况）

1992年得分为48.2，1995年得分为59.4；而按照陈丹利等测算，1992年广西农村城市化的程度为25.41，全国为38.07，广东、湖北、四川三省分别为54.45，38.87和29.38，这表明庙港于1992年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湖北、四川平均水平，仅次于广东水平；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则迅速上升，是1992年水平的135%。其中这里统计的非农业人口为户籍意义上的数据，而实际庙港的非农业人口已经分别为50%和70%；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也不把每个村里的拥有医生资格证书的赤脚医生（农民保健医生）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要素

计算在内的话，1992 年的实际得分为 57.2 分，1995 年为 78 分。这说明庙港农村城市化的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城乡差别的缩小以及新型的城乡关系已经建立，人们的劳动对象与方式已逐步摆脱以生命为主要动力能源，走向分工明确并以机器等代替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指标要求的 383%，农村居民的贫困差异不大，人均乡镇企业收入达到了 4300 元，为指标要求的 215%。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已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而在这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工业化及商业精神纳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培养了他们的效率感和组织秩序，打破了农业社会的乡土观念，促使乡村居民的行为价值取向的变更，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居民。

我们走进乡村居民的家中，所能见到的在农业时代的柴草大灶、浴盆和马桶已经销迹或弃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爽洁的卫生间，内有抽水马桶、浴缸、洗手池，并配有热水器等装备，甚至一些人家有两三套的卫生设备；屋居的内部原先多为裸墙（石灰刷墙已属高档）、裸地（地面未经重大整理装饰）。现在墙上刷上墙粉漆的已属基本，而多用高级墙纸、墙布、护墙板等并加以艺术处理；地面的土砖时代已经过时，其最基本的为水泥，而马赛克、地砖（钢筋瓷砖）、大理石、花岗石等，已不属希罕之物；甚而家居内还辟有小影院、小舞场、小健身房等；住房外观也不是以往我们所常见到的竹篱茅舍，也不是几乎是划一的、排列整齐的粉墙黛瓦，而讲究设计的独特性、使用的独特性，色彩也趋多样；自来水覆盖率达 100%，用汽（罐装液化汽）率 70%，系列化装饰品是人们的日常用品，人们也不再以太阳的高低和季节的更换来安排工作、生活。几乎人人有手表、家家有时钟，一些乡镇和企业干部还有自己的效率手册、配有 BP 机和移动电话，把自己每天的主要工作纳入计划并以分钟为计算单位，做事讲究信用，能按照自己的职责任务及其个性特点去完成

工作.

（二）社会发展特点

立足城镇，发挥乡村综合优势，促使社会结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走乡村社会城市化道路，并促使整个社会全面转型，发挥现代化生产优势，提高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水平。

（三）组织管理网络

1.纵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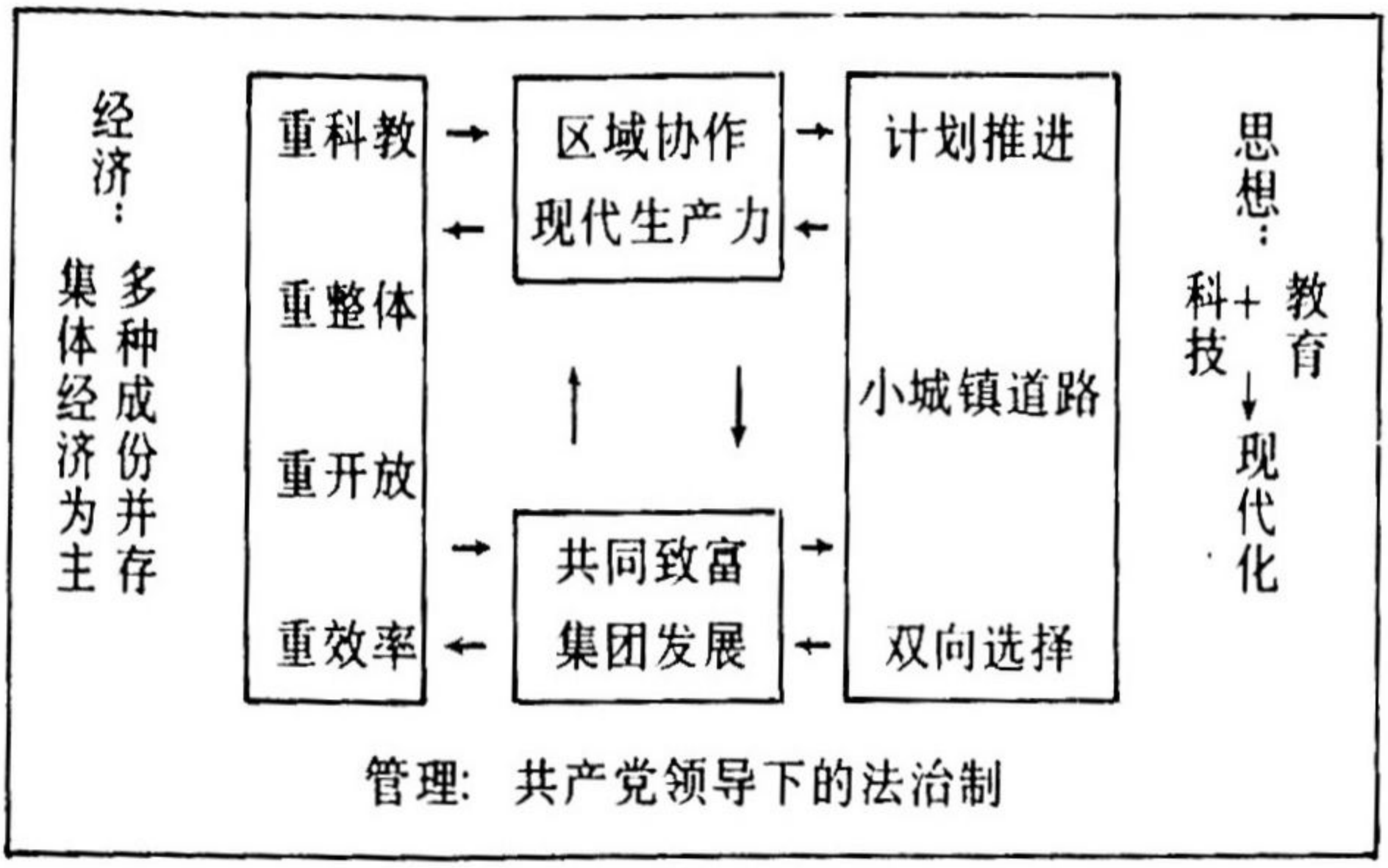
镇一级职能机构包括党委、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三套班子，权力参政机构有人民代表大会、市政治协商委员会下属小组。镇受上一级地方行政领导。

村与镇的关系是：在行政管理上是下级与上级的从属关系，村的发展必须受镇的统一规划，服从镇的整体发展大局，服从镇的具体管理。在经济上是基础和依托的关系。没有村级经济基础的支撑，也不可能有镇的大幅度经济效益的增量；而城镇的整体发展则为村级经济创造良好的文化、心理、精神等环境，有利于村的更好发展。在社会结构上，是网和纲的关系。在区域建设上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精神导向上是辐射面和核心的关系。

2.横向结构

村与村的联系有：（1）社会公共设施的联系，如办学校、建道路、设敬老院等；（2）经济的联系，如共同投资联合发展乡村企业，还有的是物产、资源提供的分工和合作；（3）社会保障的联系，如联合保安、综合治理等；（4）行政管理联系，如建立村与村之间的各项社会指标进程的竞争机制等。镇与市、周边城市（镇）的关系是竞争和合作互通的关系。无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自足独立自在体，这也包括村与镇的发展。庙港的发展也离不开周边小城镇及其城市群的发展，它们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互通的关系，并与这些城市（镇）共同发展。

3.社会运行图式（见图3）：



（图3：庙港镇社会运行图）

该图式表明：在经济发展上采用的是兼容并蓄的策略，在壮大集体企业的同时，注重发展三资企业、独资企业、个体企业；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注重区域协作，注重规模经营，注重采纳现代化生产力，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在思想上进一步确立科教兴镇，以走向社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措施。在管理上强化行政责任制，以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但这种制度并不等同于张扬个人长官意志，而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下，以强调权、责、利的统一，并逐渐地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

城市、城镇、村的联系和影响

这应该首先把它放诸于吴江这一区域环境中去考察。历史上吴江以运河为界，以东地区田多地少，农业以种植水稻、油菜为主；以西地区地多田少，农业除了种植水稻、油菜外，主要是还有植桑并间以种植大量的蔬菜。在早期时代，运河以东的各城

镇、集市可以大量地看到运河以西的农民（东部地区人称西部地区人为“西横头人”）在这一带卖萝卜、百合、大头菜，还有熏青豆、蚕丝绵等。而吴江的一些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如松陵、盛泽、震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这些大镇，主要承起了周边乡村（包括浙江、昆山、吴县边界的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这些城镇自唐宋以来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大量从北方南迁过来的官宦之家，他们依旧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把这些小城镇作为自己的生活、心理的家园，一当任职期满，再返归故里过着优闲的归隐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这一带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优厚，由农副业的发展而促进了商贸发展及其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城镇与乡村的交流。

但是，早期的农村由于是以亲族为结合体对外交往和合作的需要尚不迫切，他们对外（城、镇）的联系主要是产品的外销及其一些基本的日常用品的返销，由此而带来一定的信息和资金的交流，但这种交流的量也是微弱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单位，在经济、政治、心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运行能力。

村与村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亲缘方面的关系上，是节日礼仪方面的联系。只有在集体经济发展了以后村与村的关系才开始走向密切，尤其是乡村企业的发展，村与村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才有了合作的需要并进入了真正的合作。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庙港也曾出现过一些小集镇，如陆港、更楼港、大庙港等，但这些小集镇终于没有如周边的盛泽、震泽、松陵等发育成为巨镇的原因，乃是庙港位于太湖边沿，其聚合和辐射强度不及处于交通中心地区的集镇；兼之，诸多的水患、战事、匪乱因素而错失了其城镇向心趋势的机遇。在这时间差中，周边的震泽、南浔、平望、盛泽、松陵等小城镇，苏州、无锡、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对其发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增强了该地农村对它们的向心力，而延缓这些集镇自然发展和扩大

化的趋势。解放以后，由于大庙港建立了乡政府（公社革命委员），像陆港、更楼港等农村集市、集镇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对而言其乡（公社）所在的集镇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扩展，并成为庙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而削弱了它们的自然生长的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显示了庙港农村对外交流需要的必要性，周边的这些城市和小城镇对庙港的发展影响又日益显示其威力。以开弦弓蚕丝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出庙港与周边城市（镇）所发生的联系：一方面，它为其他城市（镇）丝绸工业的生产提供了原料，并在此基础上创出了自己的名牌生丝——辑里丝，名扬海内外；而这个扬名即是在上海、苏州、盛泽等地的市场上实现的。另一方面，城市（镇）的技术、商营信息、资金等进一步返回乡村而促使其质量的不断提高。其中，我们看到当地蚕丝在国际市场明显不能与日本蚕丝竞争的当儿，郑辟疆、费达生等有识之士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资金等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乡村企业，并且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也是不断以其周边城市为依靠，并以之作为事业伸展的支点，通过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对外发生联系。而这一切均是以村为独立单位对外交往的，而到了缫丝厂及其他乡村工业重新复萌的时候，村级联合就更有了合作的需要性显示了其必要性，只有集结多个村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才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后来金蜂集团就是多个村联合发展的产物。目前金蜂集团的发展壮大完全是与国际丝绸市场的呼吸息息相通。而五联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他们利用本地的“雪里红”腌菜之特性搞市场大流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销售点。轮穗的木材市场则是两头在外的产物，成为苏南一带享有较大声誉的木材集散地。多种经营、种植等方面开始走向规模化、基地化、商品化，各乡村企业开始形成以骨干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并对

外交流。1995 年庙港拥有三资企业 29 家，外贸供货出口额超过 4 亿元，三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197.39 万美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庙港农村的社会发展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体，而是受着区域经济乃至国际经济大背景影响下的一个社会细胞。它在自身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并与周边的一些社会细胞发生着物、人、资金、信息等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又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当然这种对外交往的理性觉醒真正开始于解放后乡村工业大办的时候，他们学会了从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为了达到工作目标，不惜“千山万水跋涉，千言万语宣传，千方百计推销，千辛万苦工作”，从原料到技术、装备、人才，无一例外地是经过艰难争取而得来的。他们正是满怀了集体事业发展壮大的理想抱负，背负着父老乡亲的殷勤嘱托，在失败中不断增强自身的耐折力，在失败中学会了经营技术，在不断成功中进一步增强自信力，积累成功经验，以促使工业文明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材。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促使了社会的两个文明（物质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

六

走过历史，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庙港在城镇（市）化道路上发展的一些因子问题，我们以为：庙港建镇虽仅三年，但这三年的跨越绝非是一个蹴即的过程，而是积聚了庙港社会几千年发展的综合实力的跨越，它是在以下几个效应的集合下所发生的社会文明的升华。

1.区位效应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庙港拥有丰够的物产使经济基础稳定

的基本条件，自不必待言。而主要的是其处在一个区位发展极为有利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在农业经济时代并不突出，而在区域经济大合作的年代，庙港置于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之间，与这三市的公路距离均在 100～200 公里之内，中有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等中型城市，其公路距离均在 100 公里以内。此外周边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群，各镇的平均直线距离为 10 公里左右。

1992 年时，它和城市联营的企业有 8 个，接受城市联营投资 910 万元，接收产品扩散企业 5 个，有订货关系的企业 15 个，供销合同履约金额为 2.1 亿元，城市包销产品金额为 9621 万元，在城市建筑项目数有 6 个，承包城市项目投资 800 万元。与城镇间联营企业数有 4 个，接受联营投资金额为 480 万元，有协作关系企业数 16 个，公路货运发送量为 14036 吨，水路货运发送量为 22365 吨。庙港就处在这样一个与城市（镇）相互作用力极强的城市（镇）群中。

不只庙港农村、小城镇与周边的城市发生着关系，其各城市间也在发生着互为作用并处在相互作用的强磁场中，其区域内的各城市间的作用力如表 6[6]：

	1. 上 海	2. 苏 州	3. 无 锡	4. 常 州	5. 杭 州	6. 嘉 兴
1.上海	0	580.77	338.22	138.56	215.70	206.64
2.苏州	580.77	0	180.76	33.89	5.86	3.37
3.无锡	338.22	180.76	0	180.59	5.69	2.88
4.常州	138.76	33.89	188.59	0	3.15	1.46
5.杭州	215.70	5.86	5.96	3.15	0	34.71
6.嘉兴	206.42	3.37	2.88	1.46	24.71	0

它主要反映在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生产协作关系、城市规模大小和国民经济总产值等因素的密切关系。庙港就处在这样一个城市（镇）开放的互为条件互为制约的经济社会大协作大循环

的区位中，这有利于各地找到自身的个性发展优势，而成为这个城市群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这既是庙港社会发展的第一条件，同时也是庙港社会发展新模式构架的基础。

2.人文效应

虽然我们从人口的总体素质情况中看到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等实据，但这块小小的5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人才成团簇现，俊彦代出。就本世纪以来的不完全统计，出现的学界领袖级人物有5人，教授级有20多人，在粗放型经济时代中自然形成了人才结构塔而启动庙港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它所处的环境及其所隶属的苏州、吴江更是人才辈出，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按历代杰出专家学者的籍贯统计排序，吴江不仅处于全国县级市的前列，也可以与各大城市比排[7]：

苏州102人　杭州84人　北京58人　常州57人
宁波　55人　福州54人　上海46人　绍兴45人
无锡　38人　湖州35人　西安34人　南京34人
洛阳　28人　常熟25人　吴江25人　嘉兴23人

这里主要积淀着吴文化的精气，浸润哺育并影响着庙港人的成长。其人格发展很大程度受着吴文化中的太湖文化影响，在日益成熟的太湖文化的哺育下建立太湖人的人格横座标：正人格要素，勇敢、开放、勤劳、进取、宽宏、踏实、乐观、刚强；亚人格要素，宿命、陋莽、惰懒、浑世。而历史文化宗教儒学等的步履在这块土地上走过，促使庙港人的人格作纵向发展。其基本要素有：

（1）历史的积淀。A.中原文明的渗透。庙港属古吴之地，为荆蛮人，其基本属太湖原始人性格：蛮勇。周代泰伯、仲雍来到吴地后，带来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和宋都南迁、明初建都，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至吴地，再度促使中原文明与吴地文明进行交融，吴人性格要素也有了很大的改变。B.

吴越战争的影响。据历史学家考证，庙港属吴越战争的交战地，战时这里有许多人成为两国交战的兵士，战后又有一些将士留于此地，这再一次改变了庙港人的个性结构，由战争又滋长了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热爱生活的情感，并奠定了他们坚毅勇敢、乐观豁达的个性品格。C.新中国的成立，给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以全新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团结进取、破除迷信、努力拼搏是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积淀在人的身上的精神风貌。

(2) 宗、儒教文化的化育。南北朝时这里已是宇庙成林，这种不属一教、派别众多的状况，客观上对这里的民风民气的淳化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这种多元的文化影响也对庙港人的开放性格起有积极作用，而儒教宗法思想则构成了庙港农村社会生活的制度框架，并不断地涵化为他们的精神思想，以促使庙港人的人格要素朝向正向发展，当然宿命论则是其负面效应的强化。

(3) 风流名士的影响。虽然庙港处于人文荟萃的苏浙间，但过去由于这里相对于太湖内地尚属荒僻多水患地区，封建士大夫一般不以之为居家安业的好处所；即使是庙港人一当有所发迹，常常在周边的南浔、震泽等城镇（市）重新觅房置地。只有如陆龟蒙等风流隐士闲云野鹤般陶醉在这湖光山色间，流连忘返，居久不离。这种生活的哲学及其他们留下的大量美文佳作，给庙港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4) 各级各类人才事业的开创。在庙港的社会进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有像郑辟疆、费达生、费孝通等杰出人士为庙港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如孙本忠、孙守廉等家乡儒子，他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及其智慧、爱心，为家乡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自己也在这奉献的过程中进一步成长为杰出人才。还有如杨志超、庞启剑等外来知识分子在这块土地上的成才

发展；从城市、城镇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张克裘、姜仁杰等则把自己的青春融化这在片土地上。凡此种种，各级各类的人才所组成的各种人才链，为庙港的发展作出了具大的贡献，从而进一步激发庙港人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爱和责任感。

（5）工业化和商业化精神的渗透。如果说庙港农民在其生活职业践行的过程中和几千年来儒教宗法礼教所积淀形成的特性为勤劳刻苦、温良恭俭让、中庸和爱、自爱自足、信义忠厚、坚毅朴实、细致柔软、尊崇事实、向往美好的理想生活；那么在近代和现代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历程中尤其是与周边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都市文明交融中，便在他们原有的个性特征中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特质，即是注重效率和秩序、注重开放和交流、追求一流、崇尚科学、积极进取、热情自信、勇于负责的品性。从而使我们看到庙港文化得以一步一步地淳化，庙港人的人格品位得以不断地提升的景象。

3.决策先导效应

庙港发展在近年内出现了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势态是与其决策先导因素具有很大的相关。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获得国际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后，继续追踪开弦弓——江村的发展，并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后，指出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效的载体是建立小城镇，以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难症。自 1981 年以来费孝通先生没有间断对庙港社会发展的观测和指导，庙港社会的发展许多是得益于费孝通先生的具体指导，如小城镇的建立、科教先导等。

而费孝通先生近 60 年的持续追踪研究也引来了国内外许多社会工作者对它的考察和深化研究，促使庙港的社会工作者作出更多的理性选择。如他们在发展经济中，作出了突出经济中心，注重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决策。该决策包含了：

（1）在农业生产方面，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始

终把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千方百计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强化科技兴农，发展高产、优产、高效农业；要进一步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切实帮助农户解决难以克服的困难；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做好抵御历史上最高水位的准备。

（2）多种经营方面，要力争三个方面的突破：基地建设上求突破，形成一批种植、养殖基地；开发新产品的突破，把开发一批特、优、新产品作为发展多种经营的新的生长点，并在开发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推广工作；深度加工上求突破，突出抓好加工、销售，努力形成种、养、加、销一条龙，促进生产，提高效益。

（3）工业生产方面，其总要求是：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提高素质，增加效益，加快发展，再上水平。其中有"名牌战略"（以创名牌为主攻目标，加大力度，增强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骨干战略"（发展规模经济，加快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集约化经营的进程）、"四向战略"（外向找合资、横向搞联合、纵向多争取、内向抓管理）。

（4）三产方面，实行"发扬、光大、鼓励"六字方针，即继续发展供销、商业和生活服务等传统项目；光大太湖风景区旅游资源，为营造太湖风景区旅游点作准备；鼓励广大农民从事经商、搞活流通，以逐步建立起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服务体系。

其保证措施是：确认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确认集体经济的优势，并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采取这样几项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各种承包形式都要以资金保值为核心，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经营承包者的责、权、利；同时，强化审计力度，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二是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实行"抓一块、转一块、放一块"的改革思路。三是在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个

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四是不断完善激励机制，以有利于形成全镇上下通力协作、奋发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

此外，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对沿海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具有扶持、引导、推进作用。如“优先开发沿海经济”、“积极发展苏南”、“改革开放”、“开发浦东”等，具体又对乡镇企业实行免税等政策倾斜，使庙港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而跨上了新的台阶。

正是有了这些正确的决策措施，才有庙港社会今天的规模化发展状况。

4.科教启动效应

我们翻开庙港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庙港的发展得力于科学和教育的双轮启动。20 年代初，纽约丝公所的陶蒂博士在考察了庙港一带的蚕桑业发展状况后曾著文说，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蚕桑业的振兴，而致使“以制丝发明最早，古代丝业最发达之国，至于今日，丝业衰退，相形见绌，竟至屈伏日本欧洲之下，此何以故，则以人民保守旧法，未知科学之研究，机械之利用。”[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郑辟疆、费达生等率先走上了乡村科技革命之路，并以科技宣传和教育为先行手段，而进行蚕种改良、蚕丝改革。

后来的庙港发展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以科技改革为经济发展之先导，以发展教育为基础开展工作。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以 1992 年为例，投资总额为 2000 多万元。其中 1314 万元用于工业技改投资，技改经费中的 20%用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现有工业技术装备 30%左右达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有 20%左右达到目前国际水平。其中 201 万元用于教育事业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 35.26%。其中用于农业的技术装备和添置为 25 万元，而形成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引进了 30 多名技术人才，参加庙港各项各业的建设。教育事业有了很

大的发展，劳动力文盲率大大下降，终身教育体系得以构成。科技组织覆盖庙港的各个行业，就 1991～1993 年的三年中，已有 10 个项目获吴江市级优秀成果奖，8 个项目获苏州市优秀成果奖，4 个项目获省级优秀成果奖，1 个项目获国家优秀成果奖。其中突出的是由庞启剑等领衔的 1985 年获得的江苏省科技进步奖的“提高蚕茧出丝率的研究”项目，当时投入了 23 万元经费，经过三年的实验研究其所产出的效益为产值 94.40 万元，税金 4.15 万元，创汇 30 万美金。金蜂集团以 2 万元重新起家，其发展的关结点即意识到当年郑费等在开弦弓的做法之正确，所以他们在经济十分困难的状况下，不惜以大量资金投入技术改造项目，并成立了企业学校，聘请专家做顾问，促使企业各项工作上规模上等级，成为该行业的第一个国家级的企业集团。

5.团队合作效应

我们所说的团队合作并不等同于简单的 1+1 的集合，也并非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简单盲从，而是一批人围绕着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在民主的基础上，以集体事业为重，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奋力拼搏，甚至甘愿以牺牲个人的小利来换取集体的大利，以实现 1+1＞2 的新势能。

喜交朋友是庙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良好传统，小学生的“结友茶”，成年人的“开茶馆”都是他们乐交朋友的表征，而储教宗法制度千年历史的化育及其庙港人的性格特征形成了团队合作的心理基础。解放后，在当地党政的领导下，庙港人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向心力和凝聚力，可谓众志成城。尤其是几次水利建设，太湖堤的修筑、太浦河的开拓、农田水利建设等，党政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并以良好的公仆形象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即使在近年来庙港社会发展已有一定的成绩，党政一班人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始终牢记自己应该是群众言行的表率，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工作。“年年增位，实现经济飞跃；

项项争先，实现全面发展”，是近年来庙港党政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工作方针，如果没有化为全镇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也就不可能成为今日之庙港精神。而正是这种强力的向心作用力，使庙港政令通达、规模效应不断取得良好成绩。其突出的事例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太湖地区连续三年遇到百年未遇的洪水袭击，在这重要关头，正是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身先士卒，自甘吃亏，在特殊情况下作出了以牺牲庙港的一部分利益来确保大集体（区域）安全及其利益的决策措施，群众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他们以“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群众，繁荣一方经济，创建一方文明，确保一方平安”的精神，把共同富裕置于个人享乐之上，为庙港的共同富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种团队向心的作用力既是集体事业发展的正向效应，也是集体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必要基础。

6.现代管理制度的效应

我们以为管理也是生产力的一种要素。解放前，庙港农村社会主要在皇权的统治下，广大农民处在这一管理体系的最低层级，劳动者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利，生产力低下。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取得了民主的权利，在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上作了探索和发展。在政治上，实现了从人治社会转为法治社会，以组织为载体，形成了既有序又有个人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经济上，由农家独立运行的经济制度，到组队结社运行，又走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大户承包责任制和企业的集体负责、集体承包责任、科学管理、质量管理、素质要素全程管理、股份合作制、责任有限制等，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心智才能，提高产出率；在文化教育上，注重对个人的全方位引导教育、培养，终生教育体系的构建，社区、单位、家庭文化圈的构建。并逐渐走向培养能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着眼点的新型人才。其中集体化的组织

制度，是促使人们从民盲走向民主意识的觉醒的有效途径，促使人们走上自我管理的坦途，走上生活自由政治民主的坦途。

所有这些效应得以集合并积聚，而促使社会文明不断地实现递增升华：

精神文明 n→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n+1→物质文明…

↑　　↓　　↑

物质 n→精神 n　　物质 n+1→精神 n+1

同时，我们也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看到一些亟待解决的或者说目前尚难解决的问题：

1.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问题

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高居固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劳动力中的人均教育年限相对不高却是现实必须加快改变的大问题，尤其是在学儿童的流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应该把它作为庙港社会发展的首位问题来看。只有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有庙港社会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后劲，因为庙港社会发展已从粗放型走出，向集约型推进。而目前庙港人的文化比例还未形成一个以初中以上学历的文化梯队，这是集约化生产中的关键瓶颈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则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滞后。

2.人们的生活方式问题

经济好转了，人们口袋中的钱多了，休闲的时间也多了，干什么？娱乐固然是人的一种良好休闲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在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没有建立终生学习的信念及其制度、具体的规划措施，那必将成为整个时代的落伍者，庙港社会发展的优势之一也将失落。因而必须建立终生学习的观念，要劝导人们在娱乐中应当适当充进一定的学习时间，以提高自身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要劝勉人们不搞铺张浪费，少宴食不酗酒不赌博，合理营养，科学安排生活。

3.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理论上一二三产的结构应是：一产为基础，二产为主干，三产为主体，其产值配比为1：2：3。目前庙港三产发展落后于这个理论指标，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发展应有自其在发展的规律，不是人随意制订的；而如果庙港在充分挖掘自身优势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小城镇建设，这个问题是可以改观的。但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放诸于长江三角洲这个区域整体发展的层位之上去考虑，而非盲目的建市场、设摊位、进人员。

4.产业项目选择问题

由于分级承包责任制，尤其我们强调了村级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促使一些村在发展过程中盲目上项目而简缩了其科学论证程序，求有求小，以船小好掉头之论开展工作，而较少注重整个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及其自身发展的可能，在一时的轰动效应下即走向下坡路。这种盲目的竞争意识不仅给村级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国家综合资源的极大浪费。

5.劳动力转移问题

户口是中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不属于庙港政府的个别行为。但是在庙港农村小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上有许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变其职能，这是工作中的一项难题。他们尝试了"土地工"（征用土地后解决农民的出路）的方式及其农民进城交纳一定的城建基础费等方法，转移农村的劳动力。由于转型中缺乏一定的竞争考核机制，农民进了企事业如同捧到了铁饭碗，在一种补偿心理的作用下，而缺乏应有的进取性。而且，一方面，农民在转变其职能过程中缺乏应有的专业技能而各企事业的纳容程度也有限，这实际上会造成企事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村中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大多是老弱病残者或文盲，而新一代中懂得农事、热爱农业生产、知晓农业科技的人又甚少。这就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热爱农业、掌握农业科技的现代新型农民，

以导引农业走向自身的现代化。

6.小城镇布局问题

作为城镇它应该有产业、人口、建筑物高密度三个要素的聚集，而这三个要素聚集的先决条件又首先得具备便利的交通位置和用地区位优势。就庙港而言，现有镇区为解放后乡镇府所在地，是现今庙港镇的政治、文化、商贸中心。就目前问题是继续导引农村向现有小城镇发展？还是移地重建，抑或控制现有小城镇，重点转向各个村庄的现代化发展？虽然目前交通工具的发达，从镇区出发抵达各个村庄已不成为问题，而正是其沿太湖风景优势，如果用之大力发展各种产业经济、建筑物高密度聚集，那么其太湖风景区的旅游资源将丧失殆尽。这是现今社会现代化中的一个难题。

7.政府职能问题

在乡村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乡镇干部以小学生的姿态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经济建设的海洋中学习游泳技术，从而使许多乡镇干部不仅成为党和政府政策的优秀宣传者、执行者、决策者，而且还真正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并搀扶了一大批乡村企业的成长。但随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起飞，政府是继续统管企业还是由其企业独立自由发展？一方面企业走向集约化途程中需要政企分开，以区分其职责权限，并有利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能发挥和自身的廉政建设；而企业则需要一大批真正成熟的经营、决策者，如果还是由我们的政府官员统管企业，那必将使企业经营家难以脱颖而出，而阻滞其成长。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完全放手企业的独立自主发展，其往往又会造成许多管理方面的不善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其宏观调控功能也会相对减弱。这在小城镇刚刚起步、各项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小城镇需要重新布局的情形下，如何使各企业继续保持对政府的最大的向心力同时能独立运行发展，又是目前小城镇发展的一大

难题。

8.公款礼尚往来问题

勤政廉政历来是党和国家关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个被放到极为重要位置上的问题，党和国家一贯大力提倡勤政廉政，并多次开展了这方面的思想运动。然而苏南的乡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曾采用了血缘、地缘、情缘等攻关战术，其中有些辅以公款吃喝公款请客送礼来实现目的，屡禁不止。固然中华民族有好客的传统，过年过节的礼尚往来是亲缘型情感凝结的一种形式通道。但如果歪曲历史传统简单地把这种人情主义替代为权钱交换的庸俗人际关系，那么，这种庸俗的人际关系联络必然是社会走向法治进程中的一种重大障碍。而且，不只于此，作为企业单位，每年所用于请客送礼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无疑其还是一个重大的负荷。由于开了这种风气之先，及致一些企业的干部在工作中私欲膨胀，大肆挥霍公款，并通过权钱交易搞非法活动，损公利己，成为新一代的暴发户。从而致使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极端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玩世不恭的观念在蔓延；诚实、正直、廉洁则日益减少，金钱的作用被无限夸大，社会的公正和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并让人误以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之心，而是利己心、弱肉强食的竞争和对财富的贪欲，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简单的事实。

七

面对众多的实证材料，我们自然引出庙港在今天和明天该向何处去，又该如何走的问题。

(一) 庙港社会发展的机遇和环境

事实上，庙港的问题在今天绝不仅仅是一个庙港的单纯的个

案问题，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其自身发展及其可能性；在今天我们更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意义。在农村城镇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中，庙港曾经在夹缝中求生存，赢得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机遇；在今天离开21世纪时钟的敲响已处在一个倒计时的时间阈限内，上海为长江三角洲发展的龙头、国际大都市的格局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内城市群体系已经架定，世界科技发明日新月异，太平洋经济时代将要来临的时候，庙港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在这场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既与整个区域建设相配套相协调，又葆有自己的个性特色，而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而且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当前地球已被人们看成是宇宙空间的一个村落，这并不仅是指出了一个单纯意义的宇宙时代已将来到的事实；而更为着重指出的是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各国间的交往距离相对在缩短，其信息的流通也极为迅速便利，进行跨国交流和合作已不再属于遥远的梦想，由此而带来各国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打破了国家的疆域、政体界限，进入全方位的全程性的合作和竞争时代。其合作和竞争的领域十分宽广，既有产品作为商品这一终端形式进入市场的竞争，更有资金、设备、资源、信息、人才的合作和竞争，并建立了跨国集团和公司，以进入新的经济时代。而这种经济特点突出的问题显示了生态资源愈加珍贵的趋势，目前这种状态已初露端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们，正在开始走向逆城市化的途程，以回归文化、回归历史、回归自然、回归生命为主题的寻根热已经开始升温。为使人类既得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利，又实现人的自身的复归，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寻求一条"科学、技术、社会"相互联结驾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之上的道路，以实现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因而庙港的发展问题还应放眼于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以寻找自己生长和发展的新支点。

（二）庙港社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可能遇到的难题

目前，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一轮（即2000年目标）规划已经拟定，其五项基本指标如下：

（一）经济总量

国民生产总值达8亿元，年递增19%左右，其中一产1亿元，二产3.9亿元，三产3.1亿元，人均26290元；财政总收入2630万元。

（二）经济素质

1.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9%左右；2.科技含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达到60%；多种经营、规模化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70%以上；农业新技术、新农艺应用超过90%；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

3.全镇工业利税7010万元，年递增17%；

4.工业投入年均7000万元，到本世纪末达到5亿元，其中引进先进设备装备和技术改造设备占工业总量的50%；

5.培育规模企业集团6个，其中镇级4个，村级2个；

6.出口商品供货额15万元；三资企业出口2000美元，合同利用外资累计1亿美元。

（三）城镇建设

镇级公路达到二级公路水平，村村通上柏油公路；电话普及率达20部/百人；镇区建筑物严格按规划设计要求建设。

（四）人民生活水平

1.年均人口出生率控制在9.8‰以内，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9.6%以上；

2.职工平均年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年递增20%和15%，达到11350元和7106元；

3.城镇居民实现90%以上住户拥有套房住宅；农户卫生设施配套率达90%以上。

（五）社会事业

（1）建设现代化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相配套达苏州市级以上标准，其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普及率各为100%，高中段教育普及率为90%；

（2）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建立具有一定规模水平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中心；

（3）人人享受初级卫生保健，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100%，全镇每1000人拥有2名医生，人均预期寿命达76岁。

面对这一目标选择，该如何举步？无疑，过去所走的路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用原来的运行模式走未来的路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由于有些问题在今天看来还是微乎其微的，但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其问题的负面效应带来的实践后果必然会产生这样几个矛盾冲突或者叫做二律背反，并在未来的时空背景下促使社会发展走向下落：

1.乡村社会自我保护与乡村企业规模发展的二律背反

由于我们在行政管理中强调村级管理职能，注重其社会的独立运行，而促使其首先以经济为着眼点以大办企业来开道。就开弦弓这样一个具有2000多人口、实有劳动力为500多人的村庄，其下属企业有4个，还有学校、市场、医疗服务站等单位。在这样的村庄里，由于资金问题，办的多是粗放性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小而全低水平重复的企业，而这种小而全的经营管理一般很难经得起市场的风波，更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与各跨国公司竞争。并且这种过小的企业发展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及其环境的污染。据资料表明，因技术的落后，设备的简陋、陈旧，对原料耗费要多耗100%，而所产生的效应又比实际低100%。所以在船小好掉头的粗放型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后，乡村社会的自我保护必然阻滞其企业朝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2.乡村企业发展的分散化与城镇建设规模化的二律背反

以小城镇发展为载体的发展模式优势在于其集合效应，然而过度分散的企业发展易使小城镇的建设缺少一个核心点，以使人力、物力、地力、文化、公共设施、智力等资源无法进行整体统合，退还于"封建割据"时代：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无法跟上二产的发展，乡村的非农化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3.乡村社会的城市化与人的素质发展的二律背反

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然而由于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镇，其文化教育设施也不能得以充分发挥效用；同时，我们以为一定的人口集居并不是为了单纯意义上的工业化的集约生产、商营展开，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集居加强人际交往的密度和频度，并在这种人际互动中加快人的现代化进程。庙港乡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一方面如果让这种散居状况延续下去，其将造成儿童在低文化的谷底进行人际交往，其必然会造成儿童各项心理素质发展的滞缓，而带来整个社会发展的滞缓。另一方面，则乡村社会的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才（包括普通劳动者）不仅是能粗识文字，而是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技术、富有远见卓识的各方面人才。而现实庙港所能满足这方面需要的能力尚有很大的距离，它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

4.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优势下滑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二律背反

前几年，全国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处在一种滞重的状态下，一些青壮年人提前下岗，企业濒临或者已经倒闭，其状态的出现固然是其企业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不甚协调有关，但最为主要的是这些企业内部面临着人员结构的老化、技术装备更新换代、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如退休工人的工资、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上交利税）超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长期沉积下来并在这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颉亢，在一时

不能得以改观的状态下而使许多企业由此而一蹶不振。庙港的企业大多属于新生代企业，其企业内部成员平均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而更重要的是新兴企业握有设备先进优势，产品开发的先进优势，国家的财税政策倾斜优势等，使企业在轻装的情况下前进，而取得高速度的发展的势态。但是，这种势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历经阵痛后重新崛起而以新生的姿态重新加入市场竞争，还有三资企业、独资企业、个体企业的迅速成熟加入竞争行列，随着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不再倾斜，随着企业自身发展中问题的增加，这种高速增长的优势将会下落。而小城镇的发展，需要企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社会发展对企业的期望值不减的情况下，企业也将会遇到难以跨越的重围，并导致企业发展的萎顿。

5.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和经济发展的失控性的二律背反

我们的地方建设需要一定的计划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模式发展，然而粗放型经济本身的"泡沫性"带来的短期行为，只追求近时近段的效益，而不顾未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必要性，这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会发生矛盾，而最重要的是其还是难以真正支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企业科技含量不足，内部管理尚缺少有效的法律机制监督和保护，企业没有在经营权和法律责任双重网络下建构，发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使政府管理部门处在责任和权益交叉中无法真正行使其管理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的过度发展还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消去庙港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所占有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优越的优势。

6.高科技的应用、集约化生产的启动与本地所具有的资源之间的二律背反

庙港的地表资源之丰富应该属于这块土地之骄傲；然而，随着人口的压力，这种优势正在逐渐消去。就目前而言，这里人均耕地面积仅0.82亩，这里每年迁出的人口不足50人，而每年所

接纳的外地民工却是迁出人口的几十倍，仅1994年就接纳外地民工1832人，1995年为1718人，其中16%左右从事于建筑等劳务，80%为从事于企业工作，5%左右为商营工作。看来人口的内迁随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这在本来地少人多的地方已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较大的矛盾，而高科技的应用不仅不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反而会大量减轻劳动强度剩余更多的劳动力。而此时，庙港却在进行大量的人口负载，这必将造成一个劳动力大于需求的矛盾，并将会愈加突出。至于地下资源历来是庙港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它只能依靠外来，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高技术的引进所造成的生产扩大，生产的扩大必然带来能源需求的增加。所以，未来庙港的能源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人力资源则是庙港走向集约化生产的一个隐含的大问题。集约化生产依靠的是技术的更新、装备的现代化而进行，庙港人口文化素质本来就不高，加之近年来接纳的职工大多为低文化层次，一当高技术的采纳并应用，职工的文化水准将会产生很大的不适应，并且集约化的生产将极大地节约劳动力，到时这些低文化的人将何去何从又是一个难于解决的大问题。

（三）庙港社会发展的现实起点

当然困难和危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问题是面对这些将会碰到的困境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路径。我们以为庙港在实现这些新目标中优势是显著的，这些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其基本的根据如下：

按照庙港目前社会发展水平，庙港已处在苏、锡、常先进行列，也处在全国先进行列，与世界各国发展情况比较，它也已站在中等国家以上水平线上。以1990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七条指标看，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靠近世界中等国家水平，其健康方面的状况如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条件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人

们的生活质量、中学生入学率、婴儿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均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的速度，庙港自订的这些目标是很快能够实现的。不仅如此，它应该还是可以在2000年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现实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

首先它占有了未来发展的第一优势：区位优势。根据西方发展的经验，一般城市及由城市内圈向外直线距离为100公里的区域都属于都市的有效内层圈，其车程一般为1小时左右。随着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庙港通往长江三角洲各大中小城市的车程大多在1~2小时内，它处在各城市的强引力圈内，可以进一步增强和拓宽庙港与各城市间的合作交流的渠道和频度，并进行广泛意义的深层合作，成为该区域走向国际，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首位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见图4、5、6），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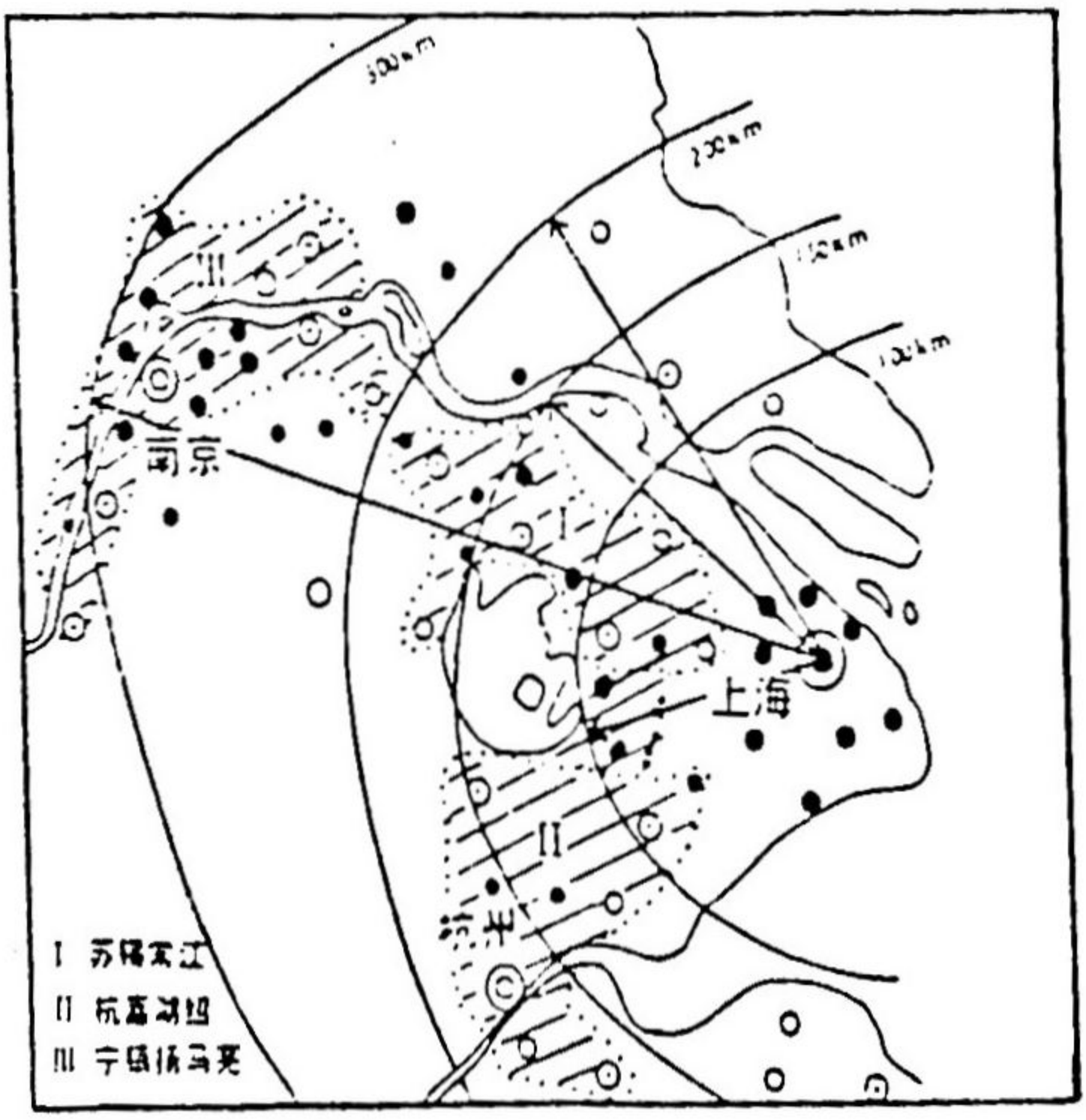


图4 沪宁杭地区城市群区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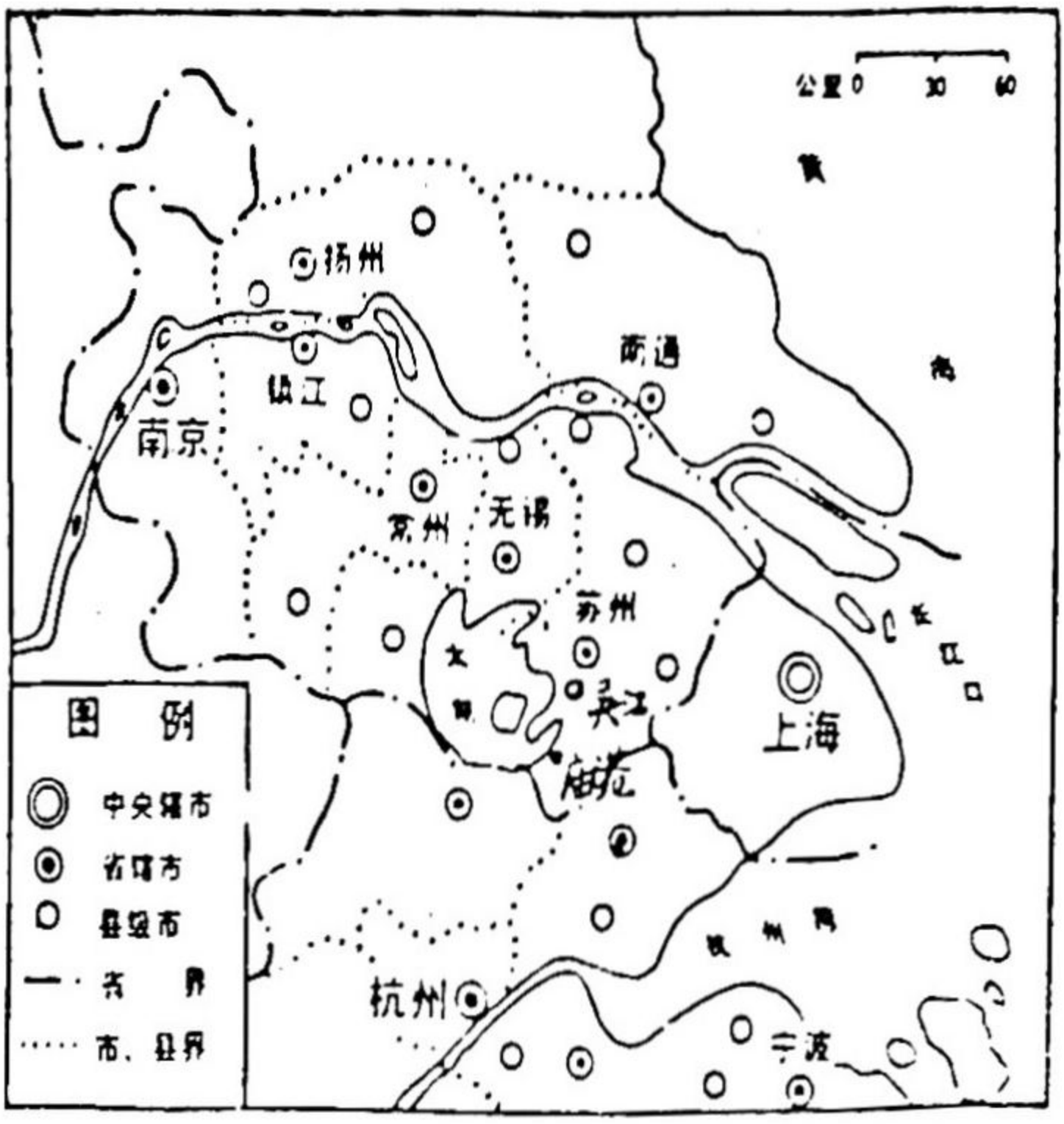


图5 沪宁杭区域城市群范围及枢纽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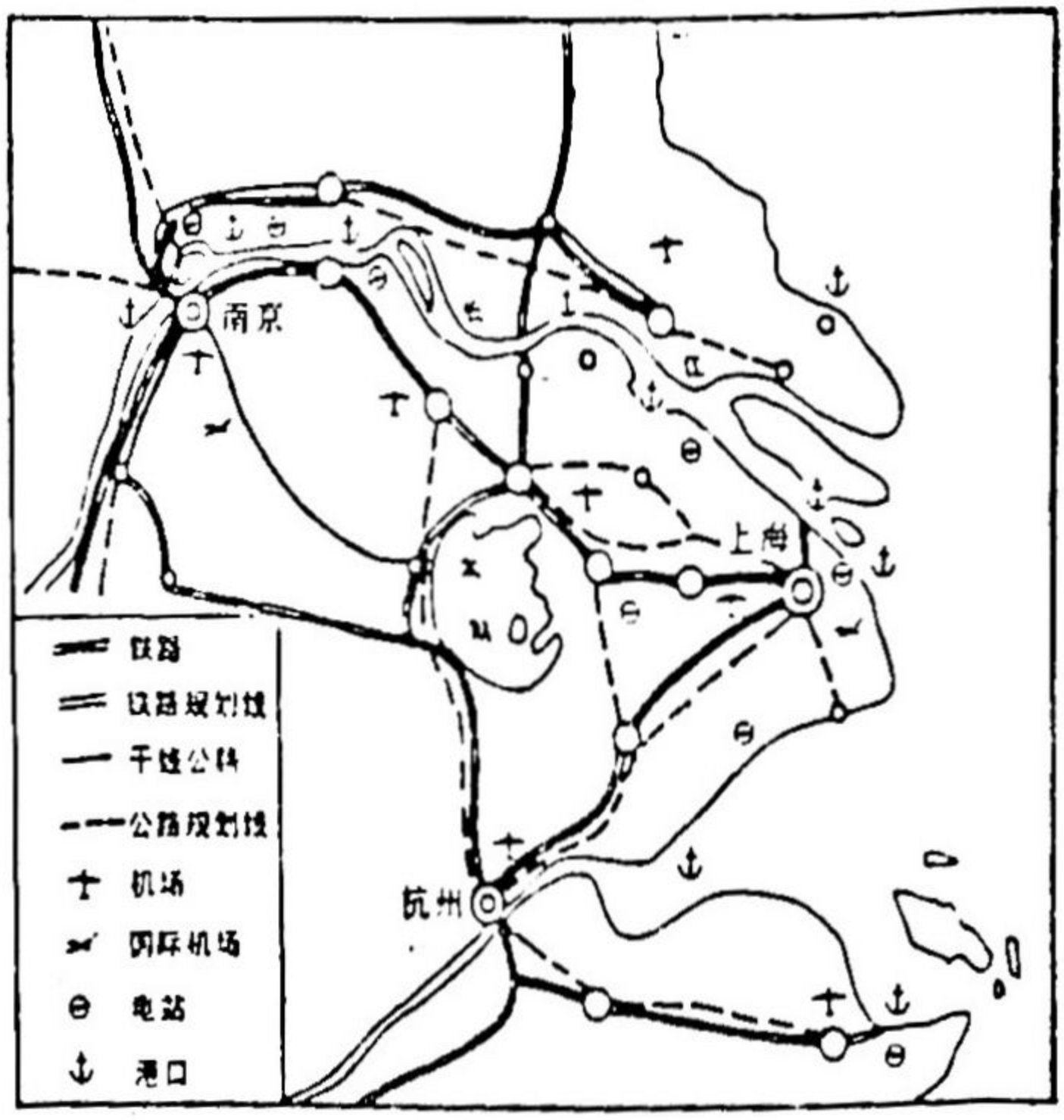


图6 沪宁杭地区基础设施布局图

(注：国际机场均为规划，2000年拟建成)

将可以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和提供各种生物资源的基地。如果庙港所隶属的吴江市各城镇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庙港将成为这座长江三角洲升起的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的一部分，而庙港土地将可以更好地发展绿色资源，真正成为无污染的绿色环保区。

其次是人文优势。面对当前人们寻根回归心理的需要，作为吴文化的发祥中心，它还保留了许多吴文化的历史遗迹，如属史前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南蠡泽湖遗址及袁家埭遗址，如吴越战争遗迹，如在庙港土地上存在过的各种禅林宇庙，如庙港历代积存下来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等等；同时它又是因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而使庙港成为世界瞩目的观测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地，是吸引众多有志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人士的聚集点，并成为一种新的人文景观，也将使处在长江三角洲吴地文化的人们乃至更大范围的人们对吴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而成为人们的精神宿归地。同时它也是生长在庙港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内核。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历年以来所积淀的人格精神，符合现代人的精神特质，这将是庙港未来发展的基础内核。

再次是生态自然优势。庙港拥有太湖湖滨风景资源，其境内本身又是河港交织、湖荡棋布，拥有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资源。近年来，虽然工业和商业高速度发展，但庙港人已经注意到了环境保护对于自身和整个人类的价值，其环境的基本指标是：水质级数达国家三级标准，噪音值为44分贝，空气净化值为95。工业废水治理达标率为85%，废气处理率为97%。这在长江三角洲来说是一快难得的净地（工业废水达标率上海为66.1%，苏州为71.82%，无锡为83.83%，常州为67.94%；废气处理率上海为85.8%，苏州为74.26%，无锡为55.58%，常州为67.67%）。应该说，这里还是21世纪人们所梦想的良好的休养生息的居所。它不仅可以使人获得美丽的大自然环境的披泽和陶

治，而且还可以在这良好的生态环境所组成的有机生物链中，得到与自然相融合的机会。事实上未来的长江三角洲将有可能成为城市成片的城市带，将负载巨大的人口压力，到那时绿色的生命区将作为这片土地上最有吸引力最可珍贵的稀有物，而庙港如果能在那时捧出自己所精心保护的这片绿色资源奉献给人们，将是这一区域上人们的最大功臣。

其四是经济的积累优势。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首先依赖的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管理体制、制度、技术、装备为支撑点。这多年来，庙港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走上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并在具体的工作中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这可以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其全镇的农、副、工总产值已达 12 亿元，镇村工业企业总资产已经达到了 3.22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原值达 14600 万元，集体所有权益达到 1674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吴江市各镇最低点。工业生产各项经济指标综合水平位居全市中上水平。第三产业已呈示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发展的好势头。商业、运输、劳务、服务、旅游业迅速发展。木材、粮食、蔬菜、水产等已形成大流通的市场经济格局。这些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其五是劳动力资源优势。按照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情况看（见表 4），庙港目前的人力资源属于最优状态。其人口于 1995 年为基准，15～55 岁的人口占 67.84%；且这一年龄段的男女比例适当，文化程度也已基本扫除文盲，大多人口具有初中学历文化，高中、中专、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也集中在这一年龄段中，这就意味着庙港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应接不断扩大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

年龄段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90 岁以上	19	1	18

85~89 岁	102	29	73
80~84 岁	307	97	210
75~79 岁	471	203	268
70~74 岁	848	359	489
65~69 岁	1152	562	591
60~64 岁	1362	723	639
55~59 岁	1580	857	723
50~55 岁	1529	902	627
45~49 岁	1560	865	695
40~44 岁	2309	1185	1124
35~39 岁	3021	1460	1561
30~34 岁	2321	1172	1149
25~29 岁	2369	1159	1210
20~24 岁	2897	1350	1547
15~19 岁	2299	1165	1134
10~14 岁	1817	870	947
5~9 岁	1511	823	688
0~4 岁	1515	702	813

表 7: 庙港人口年龄状况表（根据 1990 年资料统计）

（四）庙港社会发展的重点策略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庙港的发展重点策略可以是:

第一，加快人才工程建设，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由于庙港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1995 年平均尚仅 3.7 年，劳动力中的各种文化程度比为初中 30%，高中 3.6%，大专以上占 0.3%，这远不能成为庙港社会有效地从粗放型经济转为集约型经济的基础，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也相对偏高。随着现代化小城镇建设的需要，人才问题将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有必要把人才问题放到首要位置上去考虑。一是要创建好人才发展环境，要

使外面的人才和自己培养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就应该积极为他们创造好物质和精神环境，以有利于他们在献身于庙港现代化事业中自身也得到较好的发展。二是要构建好人才基础工程——终生教育体系网，全镇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向10年迈进，新增劳动力要确保受教育年限12年以上，每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10人以上，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8%左右，要形成终生学习制度，每个公民每年有一周以上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和要求，以促使庙港社会真正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人口非农化。

调整产业结构，并不是简单地把人口从土地上推向小城镇和城市，而是要稳定一产，加固二产，大力发展三产。稳定一产，是要发扬庙港的传统产业优势，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基础产业，也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大后方：各种生活能源的基地。这就要选准好从业人员，要培养一批年青的富有科学意识拥有一定的科学常识和能力、热爱家乡、热爱本专业的新型农民，其工作的载体为农业服务公司、副业公司等下设的各种服务站，以真正有效地解放农田上的劳动力；加固二产，即是要引导各村镇企业从粗放型经济中走出，加大科技含量，加大现代管理制度改革的力度，使其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力发展三产，即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搞好商业服务和旅游工程的启动，使三产成为未来庙港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

第三，做好小城镇的调整布局设计，使之成为长江三角洲中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

庙港小城镇的设计必须做好科学论证工作，其一，必须把它放诸于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环境中去考察；其二，必须把它放诸于整个吴江区域发展的环境中去考察，充分阐扬其个性特色，并成为区域环境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步伐的

加快，随着长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的推进，根据城市引力作用的推算，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吴江区域内，将在平望、盛泽、黎里、梅堰、芦墟一带形成一个新的以文化、交通、经济为中心的新城区，若干年后随着户籍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庙港人口也将会大面积向那里迁移。这一方面来自于这个新兴城镇带的引力，另一方面是庙港自身所纳容的农业人口的有限；所以庙港的企业发展应该加强其项目的选择，项目应该集中于一些与生态环境相连的绿色产业，并以低劳动力密集的特点发展企业，以迎接这一社会的新转型。在近期，则要加大城镇对各乡村的综合统管力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各村落进行迁移导引，并做好各条线发展的基础设施工作，尤其要控制好建房用地和位置，以为庙港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加强科学论证，重点做好庙港旅游业的设计工作。

无疑，环太湖风景区的开发将是未来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点重点开发的项目，问题是环太湖风景区是一个比较宽大的区域范围，庙港不能搞人所共有的景观设计，而应通过对自身历史人文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进行统合考虑，充分挖掘自身的个性特色，而使之成为环太湖风景区富有强烈个性风格的旅游点。我们以为，庙港的旅游开发，按照"历史、文化、自然、生命"相交融的优势，构建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性的，使旅游者多重角色得以合一的统一体：融观光、休憩、生活、学习、工作、精神回归为一体。其景点内没有围墙和疆界，以湖、荡、河、港为自然网线，以绿色植被为广泛的游览项目，以各种村舍家园式的房舍为单位，让旅游者来到这里即进入"江村人"角色，边学习江村人的生活作息，边感受江村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并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具体的项目可以有如：（1）蚕桑丝练活动（学习种桑、养蚕、缫丝等知识和技能）；（2）江村采风活动（民俗风情的调查和角色扮演）；（3）渔歌唱晚活动（垂钓、渔歌对唱、

渔火烧烤等)；(4) 禅林参拜活动（合各种节日礼仪参与活动)；(5) 古吴文化寻踪活动（合考古式寻访)；(6) 天然泳场。所以，在庙港的发展中必须做好这一绿色资源的保护，而非以大量的农田去接纳大量人口迁移为负载，以免大片绿色资源被"水泥怪物"所践踏。而且，粮食问题在未来中国依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一些战略设置中不能忽视这一因素；同时，绿色资源的享受也将是21世纪人们的最高享受。

总之，庙港的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是控制好人口的增长，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环境，努力消除贫富差异，提高教育水平，发展科技和文化，提倡文明道德和适度消费。而庙港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四大战略措施，我们以为这些战略措施是实现庙港未来发展图景的有效保证，也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阶段目标实现措施，符合庙港社会的实情。具体如下：

一、稳定一产、提高二产、突破三产。

第一产业。1.要以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2.加大农业投入，强化科技进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切实加强领导，以农业公司为主体培育好粮油丰产方基地建设；以多服公司为主体培育好水产基地和禽畜基地建设；4.强化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以农业公司为主体，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实行一体化服务。

第二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改造提高现有产业，提高丝绸、化工、轻工、建材、食品等五大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产品开发水平，年平均投入不少于5000万元，促进全镇工业上水平、上档次；加强对个体工业的领导，大力发展有潜力和前途的集体工业，要鼓励上规模、上水平，培养一批市场经济人才，形成新的增长点，逐步发展壮大为股份制企业。

第三产业。要作出新的突破口，大力发展。1.充分利用沿湖

地理优势和自然风光，借助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的影响，开发有关休闲、观光的旅游项目，将太湖旅游度假区发展规划推向市场。2.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引导建立市场，鼓励农民参与商品流通。3.要以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发展服务业。

二、加快城镇建设，推动一镇二区建设。

集中围绕镇区，搞好同步配套建设。在基础设施上路、电、水、绿化等设施全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以卫生、绿化为基础标准搞好环境卫生和镇容镇貌，包括镇区厂容厂貌，改善投资环境，创建文明、整洁、卫生、美观的生活环境。引进一批高新技术项目，改造一批现有企业，使工业开发区形成规模、成为外商投资办企业的热点。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企业体制改革。

争取在本世纪末，将骨干企业、重点村级企业组建成八大集团型企业，建立有限责任公司。以现有的丝绸、化工、轻工、建材、食品等五大主体产业为龙头，培育规模企业集团6~8个，以骨干企业、支柱产业、拳头产品为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科技含量，加强对外开放力度、加快经济国际化步伐。从体制上，干部职级、报酬方面与其他企业拉开档次。推进股份合作制，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同时，进一步完善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堵塞漏洞，提高效益。对家庭工业实行鼓励、引导、纳轨管理，提倡公平竞争，加大农民群众享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份额。逐步制订三大改革的目标和措施，确保改革扎实而有序地进行。

四、坚持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继续实施好"项项争先"的目标，协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努力提高全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一靠广大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和模范带头作

用，二靠用思想教育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通过"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的主题教育，坚持真抓实干，艰苦创业，使广大干部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领头羊"，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加快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建设，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普及高中段的教育。社会教育方面要开展好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精神文明教育等，要突出抓典型事迹和反面教材，应弘扬正气，狠刹歪风，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最后，我们要说，庙港在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只是一颗微粒而已，它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磁场中受到了许多方面的吸引、辐射、震荡的影响，而在未来它依然会受到这方方面面的影响力的影响。但是走过理性之后的庙港，一定会使这颗微粒闪射其特有的璀璨的光芒，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一件瑰宝。我们也相信中国众多的农村乃至小城镇定会成为人类文明的骄傲，"总有一天能看到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统一体，矫健地踏进全球一体的大社会"(9)。

（吴江市教育局　钱一舟）

注：

(1) 参阅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人民日报出版 1994 年版

(2) 江苏省统计局提供。

(3) 《江村经济》第 200 页。

(4)《技术转变和地区适应》，周德华译，《丝绸》1993 年第 1 期。

(5)《改革与战略》1995 年第 2 期。

(6) 资料来源：中国科大出版社《中国的城市群》，第 36 页

(7) 统计共 3100 人，属 500 个市县，转引自：《吴地文化一万年》第 293 页

(8)《论中国丝业之改良》。

(9) 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分　论

庙港文明的历史演进

历史是一根链条，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在这里粗线条地描述庙港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为的是探寻庙港社会发展的逻辑依据。

历史沿革　庙港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为太湖东南岸的新兴工业小城镇。庙港从夏朝起即属古扬州之域，延至商、西周、春秋时，吴国国力强大，建都苏州，属吴国。

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庙港属楚国。公元前262年又属春申君封地。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属秦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郡县，庙港属会稽郡吴县。从此以后，庙港一直隶属吴县至唐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江置县，庙港遂隶属吴江县，清雍正四年（1726年）在今吴江偏西之地置震泽县，庙港又属震泽县，民国元年（1912年），吴江震泽县合并，仍称吴江县，庙港复属吴江县至今不变。

庙港历史上曾为江南一带兵家重地。吴越争霸开始，庙港就成两国古战场，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与吴王阖闾，在嘉兴南50里展开激战，战火波及黎里、平望，阖闾负伤而死，史称"携李之战"，庙港受战争影响。其后吴越又展开"夫椒之战"，夫椒即今吴县东山、西山岛，东西山与庙港隔湖相望，相距仅10里，这是一场吴越间的水战，庙港成为吴越争战的主战场。公元前478年，越国伐吴国于笠泽（笠泽即太湖），这又是一场水战，庙港仍为主战场。前475年，越国伐吴国，攻吴国都城，前473年，越国与吴国展开决战，越军以水陆两路攻破吴国首都，

吴王夫差被困于姑苏山而自刎。庙港之地先属吴国，再属越国，所处地带为湖滨滩地，成为通往东西山的必经之地，首当其冲成为吴越争霸的古战场之一，至今庙港民字浜村还有一个自然村名吴越战。明初张士诚在庙港安营扎寨，筹集粮草，张士诚曾修筑太湖沿岸至湖州的湖塘，以运粮草，今仍可辨湖塘遗迹。明末清初，江南反清复明的起义队伍颇多，吴江境内就有吴日生起义，而以赤脚张三领导的"白头军"起义，坚持斗争18年之久，这些反清复明起义，都曾在庙港境内活动。清朝咸丰年间，1861年太平军进入吴江、震泽两县，一直到1863年太平军退出震泽县，庙港也深受影响。

庙港内部的区划大致沿革如下。建县以前属震泽乡，宋朝起称五都至清，共有四村：赵泽村、石塔村、丘泽村、荒浦村，领有约200圩，一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推行区域自治，命名今庙港镇为五都镇。民国初，吴江县设十八市乡，庙港之地设五都乡，共辖3都21图。民国18年8月，调整区划，县以下设区、乡镇，将吴溇（今七都镇）、五都、横扇三乡并为十区，辖3镇30乡，始设庙港镇，另在今庙港境内设张家浜乡、西草田乡、张盛乡、大咸乡、富罗乡、葵溪乡、大明乡、张廖乡、廖西乡、西五乡、南庄乡共11乡（开弦弓乡属五区）。民国18年始称庙港镇，仅指今镇区一带。民国23年8月，吴江县由十区撤并为八区，第十区的吴溇、五都、横扇分别并入第五、第八区，庙港之地隶属第八区，内设庙港镇、张盛乡、大咸乡、葵溪乡、富罗乡、大明乡、张廖乡、廖西乡、西五乡、开弦弓乡共一镇九乡。民国35年，庙港仍隶属震泽区，庙港镇改设大庙乡，大庙乡公所驻此，另设开弦弓乡、大盛乡、富葵乡、张廖乡，共五乡。民国36年，全县裁撤区公所，设六个区署，大庙乡、开弦弓乡、大盛乡、富葵乡、张廖乡，隶属震泽区署。民国37年，震泽区设一镇七乡，庙港之地设大庙乡、开弦弓乡。

1949年4月吴江解放，今庙港之地设有大庙乡、开弦弓乡，大儒乡（部分），属震泽区管辖。1950年1月，今庙港之地设盛港乡、陆港乡、罗港乡、庙港乡、开弦弓乡、大儒乡（部分），仍隶属震泽区。同年2月，成立大庙区，地域范围即今庙港和横扇、七都镇的部分，下辖1镇12乡，今庙港之地设有庙港乡、罗港乡、马港乡、盛港乡、陆港乡、大儒乡（部分），原开弦弓乡划归震泽区。1956年3月，大庙区并入震泽区，庙港之地有罗港乡、开弦弓乡、庙港乡、大儒乡（部分）。1957年10月，全县撤区并乡，庙港范围为四至中，东、北、西都是古五都的界域，惟南部的开弦弓、月字圩、民字浜、张家浜、太平桥、欢喜桥六村，原一直隶属震泽镇开弦弓乡，1957年全县撤区并乡，上述六村并入庙港。1958年9月，撤销大儒乡，大儒乡东部的合群、轮穗、更楼港、曙光4村并入庙港乡。同月，在庙港乡基础上成立庙港乡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下辖21个大队。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成立庙港公社生产办公室，行使公社部分权力和职能，至1968年3月，成立庙港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管委会，实行党政合一体制，仍设21个大队。其时，兴起大队改名热，太平桥改为红旗，月字圩改为雄心，开弦弓改为立新、红卫，欢喜桥改为前进，民字浜改为红心，张家浜改为胜利，行义港改为东方红、西草田改为庆祝，渔业改为团结。1981年6月，经庙港公社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撤销公社革委会，恢复公社管委会，同年11月，在“文革”中改名的大队，全部恢复原名。1982年4月，原荷花湾大队并入开弦弓大队。1983年7月，经乡七届二次人代会讨论通过，撤销庙港公社，恢复乡政府，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小队改为村民小组，全乡共有21个村民委员会。1992年12月8日，庙港乡撤乡建镇，成立庙港镇人民政府，下辖21个村民委员会，勇星、金明、更楼港、曙光、轮穗、合群、庙港、七一、富

强、五联、罗港、富联、月字圩、太平桥、开弦弓、民字浜、欢喜桥、张家浜、行义港、西草田、渔业，共220个村民小组。

文化源流 这主要以一些考古资料来说明之。庙港镇以东6公里处（今吴江市梅堰镇龙南村），曾经过二次发掘，在4万平方米面积内，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早期的村落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700年，称为龙南遗址。在已发掘的800平方米内，发现了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古河道，河道内有捕鱼用的网坠、石鱼标，古河道两岸分布着房址、水井、灰坑、窖穴、道路、祭祀坑和墓葬遗迹。河岸边则有河码头及堤坝。共发掘11座房址，为半地穴式和浅地穴式，房前有台阶式门道，房内垫有苇草、蒲草、草木灰的睡坑。还发掘了墓葬15座，墓穴内骨架完整，还有石玉、陶器陪葬物。遗址中还出土了丰富的谷种和植物品种，有籼稻、粳稻、酸枣、河菱、芝麻、甜瓜、葫芦，展示了这一带先民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生产图景，这是太湖流域首次发现的原始村落。

庙港境内也收集到大批历史遗物，尤其在70年代，曾多次收集到新石器时代遗物。

名　称	收集时间地点	年代特征
1.陶釜	1976年秋，太平桥村西鱼池	马家浜文化晚期 夹砂陶、陶胎较粗
2.三足陶盉	1977年3月，太平桥村西鱼池	新石器时代晚期 夹砂陶、陶胎较粗
3.骨质鱼标	1977年8月，太平桥村大鱼池	新石器时代晚期 夹砂陶、陶胎较粗
4.黑皮陶贯耳壶	1977年8月，太平桥村湾林池	良渚文化晚期 良渚文化典型器物
5.石斧	1978年7月，庙港镇西北入太湖4公里处鱼网捞起	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典型器物

（前4件遗物均在太平桥村收集到，可以推测此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由于技术等因素，太平桥村遗址尚没有全部发掘。）

此外，1955年，松陵镇出土纺轮一件，在相距庙港不远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也发现了4700年前的丝带、丝线及绸

片。1959 年 3 月，梅堰龙北村还出土了纺轮、骨针、陶罐多件，其中黑陶罐上刻有丝绫及蚕形图案。

通过对庙港境内及周边各种历史遗址的考古收集到的资料简介，我们可以粗线条勾勒出庙港先民在公元前 4700 年至公元前 2200 年间的生产生活图景。

渔猎　早期庙港先民以渔猎为生，捕捉水生动物中的鱼、蚌、鳖、蛇、蚬、螺蛳等和陆生动物为食。庙港太平桥出土的骨鱼标，类似今天的鱼枪，用于捕鱼。还采集许多野生植物，如河菱、酸枣、葫芦等。

农业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占主导地位，此时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火耕水耨"，并开始定居，懂得使用石犁等石制工具从事农作，水稻种植中有了一定的株行距，已能进行简单的中耕、施肥和人工灌溉，在庙港出土的石斧就是当时生产的工具。种植品种有籼、粳稻，一般每年种一熟。

种桑养蚕　当时已有原始桑林，林中生长野蚕，先民们用野蚕茧壳制绵抽丝，蚕蛹作为食品。成为后代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先声。春秋时期，吴楚两国曾因争桑而致战争。汉时以农桑为本，唐时吴江之绸为吴绫，《姑苏志》称"吴江为盛"。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庙港一带，其诗作有"桑拓含疏烟，处处倚桑箔"。南宋时，向北方输纳大量币帛，农户为交纳繁重的赋税，只好尽力从事蚕织。宋朝南迁以后，全国丝绸中心移到江南，距庙港仅 10 余公里的震泽也成为镇，并至明中后期成为新兴的丝专业镇，庙港所产之丝被称为湖丝。明初，就有"湖丝遍天下"之说。

饲养家畜　根据龙南、龙北村、蠡泽湖遗址发掘，出土的猪、狗、水牛等家畜动物骨骼和整具被埋葬的猪遗骨，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庙港先民已初步掌握了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既提供了畜力，又提供了肉食。

风俗、图腾崇拜　根据《吴越春秋》、《论语》、《史记》等古籍记载，古三吴之地先民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中原地区相比），为了生产和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风俗习惯，较突出的有龙鸟图腾崇拜。江南水乡，水为先民们带来了农耕用水和丰富的水产品、水生植物，还为先民们提供了舟楫之利，但水多带来了灾患，先民们既离不开水，又诅咒水。如龙南遗址中，村落傍河而居，河两岸筑有堤岸，他们认为频繁的水灾是水中动物作祟所致，水中凶猛的动物如蛇，加上世代口传的已经灭绝的恐龙形象，就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先民们不仅崇拜水中的龙蛇，还崇拜天上的鸟，水网地区是鸟类生活的天堂，在庙港附近的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鸟类遗骨，如雁、鸭、鹰、鹤等，至于鸟形图案的制品更多，先民们羡慕鸟类自由自在的翱翔，希望自己也能更加自由，对鸟的崇拜自然而生了。

在装束修饰上有断发文身，断发就是额前为短发，秃顶椎髻盘于脑后，不带冠。断发在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短发、椎髻在水中劳动时，可以减少泅水时的阻力，避免水草缠绕，以保生命安全。文身也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文身图案多是龙蛇之形，以示自己是水龙王的子孙，也可以免除灾害，保佑生命安全。雕题黑齿。雕题是以丹青在额上绘刻花纹，它与文身不同。雕题不刺破皮肤，只以颜色进行绘画。黑齿是用草将牙齿染成黑色或者将门齿拔除，形成黑洞，这些在太湖流域的其他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这是古代庙港人的审美观念。

自然资源　庙港之地原系太湖南滩沼泽洼地，与湖水连成一片，晋吴兴太守殷康开顿塘，唐苏州刺史于顿修堤岸，太湖南岸逐渐形成，庙港淤成陆地，同时留下密如蛛网的通湖河道。历史上有吴江 18 港，震泽 72 港通太湖（江苏省境内通湖河流称港，浙江省称溇），震泽 72 港北起今太浦河，西南至浙江省的胡溇，其中庙港境内占绝大多数，据未刊行的《江苏省通志稿》第七卷

记载，在民国时期，五都境内共有5条主要河道通湖：即大明港、庄港、大庙港、陆家港、丁家港。当杭州湖州上游山洪下泄，水由72港流入太湖，而当太湖水位高或刮西北风时，湖水则由72港下泄苏嘉平原。由于地势西高东低，今庙港镇区以东之港汊泄湖水者占多数，镇区以西之港输入湖者居多，这些溇港对调节太湖水位具有重要作用，而对湖岸边的庙港却不时造成水灾威胁。清朝以前溇港未见建闸记载，只是"凿石为堰、筑土为坝"遇北风时，则堵塞缺口，防止湖水入侵，遇暴雨则开坝排涝，开坝堵坝多有不便，且往往事与愿违。清乾隆以后，开始在沿湖石桥侧建闸槽，太湖水位高时，插木板于槽内挡湖水。民国时期大庙港桥水闸即是此类型，该闸后被侵华日军炸毁。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庙港太湖沿线诸港先建防洪闸，继建套闸，做到防洪航运两兼顾，现在庙港（太湖大堤沿线）有防洪闸2座：陆家港、丁家港；套闸4座：时家港、汤家港、大明港、大庙港。

庙港镇兴修水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兴建太湖大堤及配套的防洪闸和套闸，修建闸门前已叙述。太湖大堤历史上没有统一修筑，只是沿湖地区各圩各自修筑低堤，往往不能抗御洪涝灾害，到1983年以前，庙港境内的沿太湖岸，初具太湖大堤雏形。是年秋，作为太湖流域的配套工程，西太湖大堤全面动工修筑，庙港境内太湖大堤长7.5公里，堤坝高程7米，内外坡均为1∶2.5，堤顶宽7米标准施工，大堤沿线通湖诸港均建闸门以备节流。二是联圩建设。庙港镇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圩小岸低，防洪能力差。据记载，明朝弘治年间，五都之地有鱼鳞圩200余个，到民国时，五都乡仍有小圩60余个，解放后开始了联圩建设，经过修圩联圩，现庙港镇仅有4个联圩：东联圩8.53平方公里，南联圩10.58平方公里，西联圩11.95平方公里，另有月字圩1.33平方公里（因四面环水，独成一圩），抗涝能力可达到雨量150毫米/日以上。外有太湖大堤，内有联圩，基本保证了

庙港镇可抵御1954年、1991年的特大洪涝灾害。

庙港的自然灾害以水灾为主，其次为风灾，旱、虫、地震等较少见。历史上水灾频繁，致灾原因一是太湖溢，二是受台风影响，一旦过境台风进入太湖，风急浪高，湖水势必汹涌进入圩区，淹没农田，平均每年有1.5次台风影响庙港，时间多在8月份。历史上，吴江境内有记载的洪涝灾害有280余次，通常每5年发生水灾一次，均不同程度影响庙港。解放后经过兴修水利，修筑太湖堤，搞联圩建设，建好排洪闸、渠，装备排涝动力，使庙港的抗洪排涝能力明显增强。

农业　庙港地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等，对发展农业十分有利。在庙港四周如吴县、桐乡出土过我国最早的稻谷籽，可知稻为庙港一带最早的作物。西晋末年，北方人口南迁，唐代，吴江塘路修筑，顿塘河岸重新修筑，逐渐形成太湖的东岸和南岸，水稻耕作开始向精耕细作发展，当时，耕作技术已有耕田、碎垡等工序。告别了原始的"火耕水耨"。此时，庙港等江南地区仍是一年一熟种籼稻为主。吴江建县以后，吴越王钱镠在国内大兴水利，如兴修圩田，推广精耕细作经验，庙港水稻生产有长足发展，到北宋出现了二熟制，即春麦夏稻，当时的农田管理技术已有烤田、耘田、施肥、除草、灌水等，苏南成为全国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流传开来。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在江南地区出现麦稻二熟向麦稻稻三熟制的发展，开始出现双季稻，但一直到20世纪初，庙港地区仍以麦稻二熟为主，麦以小麦为主，稻以晚粳稻为主。

综上所述，庙港地区的自然环境优劣参半，既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水生动植物，宜于耕作的冲积平原。又水患频繁，还时时受到水中和从林中的野兽袭击，从而逐渐养成庙港先民们冷静、机敏、富于冒险进取的性格，奠定了庙港人性格中最基本的因素。

文明进程的界划　庙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历史悠久，经过千余年的文明演进，太湖之滨的四个渔民小村随着生产的变革和发展，历经了几个重要的文明时期。即原始渔猎文明，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准工业文明，当代工业文明，从而使庙港从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

1.原始渔猎文明　(B.C4700 年～B.C2200 年)

庙港之地，原为长江与东海相连接的半咸水沼泽滩，随着太湖的形成而逐渐淤成陆地，成为太湖滩地，地势低洼，河道纵横。解放后，先后在庙港镇东 6 公里的袁家埭、龙南村，及镇南 6公里的蠡泽遗址进行了文物发掘，并在庙港境内调查征集到一些文物，这些文物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公元前 4700 年到公元前 2200 年，庙港就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从马家浜文化[1]到崧泽文化[2]到良渚文化[3]物质和精神文明，完成了庙港先民从原始洪荒年代向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进程。这是庙港先民由野蛮向文明，由洪荒向原始渔猎文明跨出的历史性一步。这一步虽然漫长，长达 2500 年，但却是决定性的一步，开始了庙港人追寻文明进步的征途。

2.古代农业文明 (B.C2200 年～A.D1922 年)

从公元前 2200 年起，中华文明逐步走向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古代农业文明，在此后的四千年中，历史文明的脚步匆匆加速，古代农业文明经历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社会形态也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庙港虽系弹丸之地，同样经历了上述文明进程，从原始渔猎文明的荆蛮之地，进化为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的鱼米之乡富饶之地，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脆弱的自然经济不敌西方凭借船坚炮利为后盾的洋货冲击，农村经济急剧凋弊。到本世纪初，庙港的农村经济衰败日甚，近代工业文明近在眼前，又仿佛是雾中看花，时隐时现。

3.现代准工业文明（1923 年～1978 年）

1923 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等到庙港镇开弦弓村一带宣传土丝改良。1924 年费达生组织开弦弓村 21 户农户新法养蚕，并进行缫丝，取得较好成绩，现代工业文明的火种传进了庙港镇，在此后的 75 年中，庙港人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追求。1929 年，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立，缫制并运销生丝，同时开始了机械缫丝，引进日本产铁木结构缫丝机。开弦弓生丝合作社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兴办的第一个农村丝厂，它推进了庙港乃至吴江县的工业进程，起开先河之作用。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从大庙区到庙港公社，庙港一直以农业为主，工业处于附属甚至被压制的地位，直到 1978 年底，全公社只有农机、缫丝、粮饲加工 12 个社办企业，还有 29 个大队办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年总产值 290 万元，在庙港的经济总量中，工业比重尚不足 50%，因此，1978 年前的庙港文明，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现代准工业文明。

4.当代工业文明（1979 年～　）

从 1979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政策，很快贯彻到庙港，庙港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追求工业文明，乡村工业开始起步并迅速发展，工业文明的思想成为影响庙港人行为的主流。到 1985 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 4594 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61.90%，有乡办企业 15 个，村办企业 62 个。以 1992 年 12 月 8 日庙港撤乡建镇为标志，庙港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工业文明的进程，在此后的每一年中，庙港镇的经济，尤其是工业，每年都向前跨一大步，开始了工业文明进程。

（吴江报社　杨晓容）

注:

(1) 马家浜文化. 位于嘉兴市郊南湖乡天带桥村. 1959 年发现并发掘. 年代在距公元前 4750 年到前 3700 年. 并以马家浜命名. 发掘出大量兽骨. 以水牛和鹿为最多. 反映出马家浜居民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 采集和捕捞为辅. 造物以夹砂陶为主. 器型以牛鼻式横耳器为特征. 这是目前已发现的太湖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2) 崧泽文化. 崧泽位于上海市青浦县赵巷乡. 1958 年发现. 经过二次发掘. 年代在公元前 3910 年到公元前 3230 年. 并以崧泽命名. 曾出土大量石制工具和玉器饰品. 生活用具为陶器. 还有水稻和家猪牙床. 证明水稻种植已有一定规模. 养猪业占相当地位. 渔猎经济逐渐退为次要.

(3) 良渚文化. 良渚位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 1936 年开始发掘. 年代在公元前 3300 年到 2250 年. 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的土著文化. 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 石钺. 石磋. 石镰. 石犁. 人们过着以种植水稻为主. 渔猎为辅. 且兼植桑麻. 养蚕的定居生活. 生活器具有造形规整. 表面光亮的黑色陶器. 如贯耳壶. 夹砂陶鼎等.

农　业

我们这里所说的农业是大农业，即包括农、林、牧、副、渔、蚕、桑诸业。我们研究农业的发展，既可以看到大自然所给予这块土地的优遇，也可看到时代、历史、社会制度等使这一经济发生变化的痕迹，从而观测到庙港社会变化的一些规律性的轨迹。

一

早期的农业　庙港及其周边地区之所以在历史上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主要缘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河荡密布，河港纵横，地势自东向西微倾。1994 年，全镇有 20 个农业村，210 个生产组，耕地 21738 亩，水面 6200 亩，桑园 8969 亩。境内为低田圩区，田面高程 3.2—3.5 米（吴淞口水位），全镇自然土壤为黄棕土。种植水稻高产的有夜潮小粉土、青紫土、乌泥泥土；一般的有低位白土；低产的有高位白土。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和湿润和传统种养习惯，庙港种植业历来以粮油生产为主，间作以桑居多，也有少量瓜类、蔬菜。据史料载，南宋前以一年一熟中籼稻为主；南宋后，随着北方人的南迁，人口增加和食用之需，逐渐开发小麦种植。至清初，形成稻麦（油）两熟的耕作制。民国时期，稻麦（油）两熟制面积逐渐增多，但仍以一熟为主。解放后，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国计民生的变化，更适宜于种植稻、麦、桑、果、菜、养殖水产、畜禽，是全国著名的粮桑渔牧生产基地。

“饥饿是中国问题的结症。”即使像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解放前农民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其生活仍处于贫困的深渊。

据土改工作组对开弦弓村的 50 户调查：1948 年，住城和本村的地主占有土地 297.9 亩，而农民自有土地仅 173 亩，只占 37%。其中 46 户农民有 30 户耕种地主的租田，有 17 户“吃生米”，即借高利贷，有 23 户靠典当度日，有 9 户的男子和妇女外出做长工和佣人。从该村所在的吴江县来看，据档案资料统计，人口占 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 40%的土地，缺田少地的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把大约一半的收成作地租交给地主。

地租形式主要有大租田、小租田两种，同时存在分租田和转租田等，一般均为实物（租米）地租。大租田，土地分为田底（收租权）和田面（永佃权）。地主拥有田底权，田面权归佃户。这种“业底佃面”的大租田，占租田总量的大多数。租额一般每亩 4 斗米左右，最高达 7 斗米。小租田，田底田面均属地主所有，佃户没田面权，年初向地主租种，秋后向地主交租，租额很重，实物地租量一般“田之所入，地主、耕者各得其半”，即地租率约为出产物的 50%。转租田，佃富农掌握一定数量的田面权，并以小租田形式转租。分租田，地主将土地租给佃户后，同投资，分享利。一般种子、肥料主佃各半，秋收时留下种子再分成。除此之外，地主还用买青苗和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每逢青黄不接，一些贫下中农等米下锅，或遇荒年灾月、天灾人祸及婚丧嫁娶等，把未成熟的稻苗廉价卖给地主，称为“卖青苗”。地主放债，以米为主，年息为借 1 石还 1 石 3 斗至 2 石 3 斗。

在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压迫下，自抗日到解放战争的 10 余年间，吴江震泽区不过 3 万人，竟有 1857 个农民因无力交租被关进监狱，其中 45 人被迫害而死；农民被迫卖田 3223 亩，卖房 229 间，还卖羊、卖船、卖衣、卖家具。这种悲惨状况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告结束。

二

土地改革运动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它是亿万农民深受压榨、陷于贫困的根源。1950 年秋收之后，在县土改试点的基础上，大庙区由点到面开展土地改革。在整个土改过程中，始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苏南行署《关于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为依据，认真遵照党中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总路线，以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为土地改革的主要的直接的任务，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教育，开展反封建斗争，使庙港土地改革运动于 1951 年初顺利结束。全庙港区被没收征收的土地户有 215 户、土地 19857 亩，还没收多余房屋 257 间、随房家具 320 件、牲畜 35 头、农具 107 件、粮食 6.5 吨。开弦弓村有 94%的农户分到土地，政府颁发《土地证》，实行耕者有其田。

这次土地改革，开弦弓村农民摧毁了官僚、土匪、恶霸、地主四位一体的基层反动势力，确定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真正实现了农民当家作主。这一胜利，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许多农家挂起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像，两旁张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以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

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开弦弓村粮食产量明显增长：土改前的 1949 年，三麦单产 27.5 公斤，水稻单产 165 公斤，常年亩产粮食为 194 公斤；而土改后的 1952 年，三麦单产 36.2 公斤，水稻单产 244 公斤，常年亩产达 280.2 公斤。到 1953 年，常年亩产又增加到 315.2 公斤。同时，全镇的粮食总产从 1949 年的 520 万公斤上升到 1953 年的 1072 万公斤。这些粮食除了销售，农民的口粮也逐年上升。1949 年，人均毛粮 244 公斤，1953 年为

350公斤。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为以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土地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农业生产。在种子上，水稻、三麦、油菜三个主要农作物品种，经过更新换代，提高了种子纯度，增加了作物产量。如水稻生产，建国初期，农民自选自留种，个别农户甚至用"一穗传"的方法选育，造成产量低下。为了夺高产，必须从头抓起。县政府以农场为基地，进行良种试验、示范、繁育、推广工作。1953年，繁育推广了水稻良种"矮脚大稻头"、"牛毛黄"等品种。由于土种变良种，籼稻改粳稻，亩产从1949年的171公斤上升到241公斤，总产从523.8万公斤上升到738.2万公斤。

当然，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例如，开弦弓村由于土地分散，在50年代初人均2亩耕地，以家庭平均4.5人计算，每户只有10亩，耕地规模太小；所处的太湖流域又是水网沼泽地带，每年汛期常遭水灾，单家独户无法与大洪大涝抗争；有些农户劳力、农具都过剩，有些农户则两缺，各家劳力、农具的不均造成了土地利用率的高低。由此可见，土地由家庭单干变为合作经营势在必行。

农业合作化时期　建国前，大庙区历来有农忙时的"伴工"做法，这为发展"以工换工"的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打好了基础。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但在生活上、生产上还存在一些困难，主要缺少粮钱、耕牛、农船、水车等大中型农具，降低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1950年遭严重春荒，靠人民政府发放救济粮。这就形成了农民亟需生活、生产中互助合作的心理基础。

1951年，庙港开展"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活动，农民在自发进行伴工互助的基础上，在县典型单位的引导下，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所有的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迅速过渡到

常年固定互助组。不久，为着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掀起了农业爱国增产竞赛热潮。开弦弓村在1952年建立互助组，就获得粮食丰收，水稻亩产250公斤，比1949年增长66%。

1953年，大庙区仿效把农忙时成立、农闲时分散的季节性互助组，改为有各户劳力合作劳动、以出勤日评工记分、年终结算、余缺找补的常年互助组，每组为6～10户。常年互助组根据"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实行"以工换工"和"死工活记"："以工换工"是以等量劳动，进行交换；"死工活记"是以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定出基本工分，再按劳动日工效评议，记分到人。

常年互助组一成立，各项农活就做得早、做得快、做得好，充分体现农业生产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还有利于推广地方良种大稻头、芦花白、牛毛黄、石芦种、洋稻等品种，使农业生产达到适时种管收，多施家什肥和泥肥，连年亩产粮食320公斤以上，比1949年多产一半，明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日后走向集体化、推广农机化创造了条件。

但是，互助合作化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互助组领导不力，管理不善，纷纷散伙垮台。事后经过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了。

确实，互助组以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组员之间也出现分配得益多少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应运而生了。

1954年，继开弦弓村在吴江县内第三个、大庙区里第一个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全区许多基础较好的常年互助组，逐步升为初级社。合作社内部实行土地评级入股，大型农具、耕牛等财产折价入社，生产统一经营，成本按股投资；劳动计酬实行按件定分、定质定量、按劳得分；分配实行先提留5%的公积金，

再土劳分红，即土地占 40%，劳力占 55%。当初级社刚办成，社外农民就眼红该社合理投劳、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好处，认识到互助组、单干户的缺陷。于是，初级社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周围农民。到这年 6 月底，共建初级社 13 个，入社农户 117 个。

入夏后，遭到建国以来第一次大水灾。据县瓜泾口水文站观测，5~8 月共降雨 974.6 毫米，8 月 25 日瓜泾港水位达到 4.6 米，比 1931 年洪水位高 0.6 米。大庙区圩田大部分被淹，房屋倒塌，有 12 户居民被迫搬家。

汛情出现后，这些初级社和互助组，由于领导带头干，社员齐动手，补种水稻和南瓜等经济作物，实事求是地修订生产计划，贯彻各项增产措施，在大灾年份非但没减产，反而有了增产。

经过这次抗灾斗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了出来。接着，大庙区涌现出像光荣乡邱应宝等一批由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社。这些社生产搞得好，社员情绪高，影响比较大。县委县政府根据他们的意愿，对够条件的同意批准建立合作社。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开弦弓村继建立家庭间相互换工的互助组后，1954 年又自发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户的土地"兼并"起来经营，提高了土地的产出。1955 年，开弦弓村合作社亩产小麦 50 公斤、稻谷 304 公斤；而单干户只有亩产小麦 29 公斤、稻谷 250 公斤。合作社每个劳动日分得 1.32 元，有 86%的入社农户比上年增加 50%。此后，合作社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逐年上升。

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可喜一面，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外，只能自给自足地生产。例如，开弦弓村所属的震泽区是传统的蚕桑基地，由于农业社重种植粮食，轻栽桑养蚕，致使 1957 年比 1956 年养蚕减少 3500 张种，当年蚕农收入比 1956 年锐减大约 70 万元。许多农

业社还停止如贩运海蜇、竹木和种菜等传统副业项目，而以往这些副业收入一般均占农户年收入的 20～30%。可见，农民的饥饿问题解决了，但是生活上富不起来。此外，建社的进展较快，不少具体工作跟不上。比如一些合作社骨干力量较弱，缺乏办社经验；缺少资金，影响生产；还征购"过头粮"，未能及时返销等，引起一些农民不满，甚至要求退社。针对这些冒进现象，大庙区通过春耕生产、夏熟预支、秋季生产对初级社进行三次整顿，进而改善经营管理，健全财务制度，清理不纯分子，增强贫下中农的团结，不但巩固了老的合作社，而且掀起了新的合作化高潮。

1956 年 1 月，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全县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下分 6 个大队、233 个生产队的大庙区联合三社，就是当时县办的三个样板社之一。在样板社的示范带动下，开弦弓村的初级社都合并升格为高级社，大庙区全部建成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数 98%以上，高级社成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形式。至此，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集体化。高级社一般在 100～400 户之间，农户原有的土地均归集体所有，大型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折价入社，逐年偿还。社内采用包工到组的办法，实行按劳分配，有奖有罚。1956 年，平均每户纯收入 417 元，比高级社前的 1955 年增长三成多；稻谷分配，从过去受灾吃救济粮到人均分得 425 公斤。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同时，大庙区农民掀起了农业生产运动的热潮。县建立种子经营机构，乡着手良种繁育，1956 年开始种植双季稻。早稻品种主要有芒早沙粳，占早稻面积的 78%；后季稻品种以晚粳为主。在"搞好生产迎办社"的号召下，农民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既快又好地完成秋收秋种任务，还在农田水利建设、积造自然肥料、改革耕作制度、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都取得新成绩。

继土地改革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村中又一次大规模的有成效的变革运动。大庙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康庄大道，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民公社时期 1958 年 9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吴江县委《大办人民公社规划》，有 20 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结合的庙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度实行公社核算，后改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生产大队除按照规定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和向公社交纳公积金、公益金外，采用工资制与供给制结合的制度，分配其余收入。其中供给部分是根据各个生产大队的基本条件，实行伙食供给制；并办起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理发组、洗衣组、农中、农科站、文化馆、广播站和医院等。农民实现吃饭、就医、理发等"几个不要钱"为主的基本生活供给制。开弦弓村是在1958 年 11 月开办公共食堂的。"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就是那个年代里的真实写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相继急躁冒进，农村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之接踵而来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水平大跌，农民生活降到温饱线以下，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如 1961 年，庙港镇粮食产量仅 755.3 万公斤，社员人均 123 公斤原粮，也就是每人每天约吃 0.3 公斤口粮；粮食总产比 1958 年减 73 万公斤，降 6.4%；社员人均口粮比 1958 年减 63 公斤，降 21.3%；蚕茧生产比 1958 年的 621 担减少 30%。社员生活方面，有 20%的生产队有帐无粮；春荒断粮户接近二成。为维持生计，有些群众不得不变卖衣物家具，拆屋卖瓦，甚至逃荒出去讨饭。据统计，庙港总人口 1958 年为 22571 人，1961 年为 21315 人，净减 6%，而当时外流觅食的人

远远超过这一净减数。

1962 年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吸取冒进的教训，庙港人民公社很快停办公共食堂，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度，把集体所有的基本单位，也就是集体经营的单位，再细分为有 20～40 户的生产队。开弦弓村纠错后迅速恢复生产，发展农业，通过平整土地，开通沟渠，推广机排机灌，基本上消灭了人力踏水车的传统做法。这年，虽遭 14 号特大台风暴雨的袭击，但因增强了抗灾能力，仍获得好收成。社员称这一年为"生活由苦而甜的转折点"，"我们从此以后每天吃三顿干饭"。

经过几年调整，农村经济由于集体经营有方，转现复兴景象。如水稻生产，品种高杆改矮杆，催芽育秧土法变新法，全镇亩产回升到 381.7 公斤，总产回升到 996.6 万公斤。已积累栽种双季稻经验的开弦弓村，从 1964 年起广泛开展以高产良种农垦 58 号为带头的优良品种的繁育工作，使粮食产量以年均 10%以上的幅度迅速增长；到 1966 年，水稻平均亩产已达 494 公斤，社员人均收入也从 1961 年的 80 元上升到 1966 年的 118 元，吃粮水平则稳定在 300 公斤上下。

从解放后到 60 年代这段时间里，水利工程建设较快。解放初，庙港镇共有 111 只分散小圩，灌溉完全靠人力踏水车，碰上旱涝灾害根本无法抗御，基本上靠天种田，粮食生产十年九不收。解放后，水利建设才见成效：一是联圩建设。联圩俗称包围，即把若干个小圩并成一个大圩。1954 年大水后，大庙区在复堤中，推广本县南厍乡联圩的经验，把小圩联成大圩，疏通内河河道，以利集中水车或抽水机排涝。60 年代，又把 28000 亩水田及 111 只小圩实行联圩大包围，并成三大联圩和二小联圩，即南联圩、东联圩、西联圩、月字圩、行义港联圩，使原来 345 公里防洪线一下子缩短为后来的 73 公里，大大减轻了外围防洪

压力。二是从 1959 年起，陆续建造 10 多座排涝站、40 多座灌溉机房，解决人力车水问题。三是建造永久性护岸工程。从 1966 年开始，庙港逐年建起护岸工程 124 公里、套闸 18 座、防洪闸 9 座，确保旱来灌得上、涝来排得出，有利于实现农业高产稳产。四是最突出的兴建江南第一大闸——太浦河节制闸。该闸位于太浦河西端距太湖口 1.6 公里处，是太浦河的主要配套建筑物。由苏州专员公署水利局设计，全长 145.6 米，29 孔，每孔净宽 4 米，总孔宽 116 米，底板面高程 0.5 米，胸墙底高程 5.3 米，闸孔净高 4.8 米，胸墙顶高程 7.2 米，设计泄洪量 580 立方米/秒。该闸由省水利厅工程局第四工程队施工。1958 年 12 月开挖闸塘，1959 年 3 月开始浇筑底板，至 8 月底水闸工程全面竣工，一共挖填土方 37.5 余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 1.1 万余立方米，砌石 0.9 万余立方米，总造价 190 万元（包括建桥头堡、管理所房屋 417 平方米）。由于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为庙港乃至全县的农副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作物布局的不断调整，庙港耕作制度从历来一年一熟逐步走向合理配套。

1949 年至 1955 年为稻麦两熟阶段。全镇秋熟作物为单季稻，夏熟作物为三麦、油菜、绿肥，年均复种指数高达 140%，但夏熟作物面积比重小，仅占粮田面积的 38%（其中三麦占 18%，油菜占 16%，绿肥占 4%），平均年产粮食 888.1 万公斤、油菜籽 8.3 万公斤。

1956 年至 1969 年为稻麦两熟向三熟制演变阶段。全镇从原来播种稻麦两熟开始变为试种绿肥—稻—稻三熟，双季稻年均种植面积 7018.6 亩，占粮田面积的 26.5%，同时扩大种植三麦、绿肥面积。年均复种指数 177.4%，平均年产粮食 1108.5 万公斤、油菜籽 17.9 万公斤。

1965 年，全镇建立电力灌溉，部分生产队脱粒使用电动

机；次年，各村通电，解决了农民夜间照明及生活用电。由此，以初级电气化促进了粮食生产，开弦弓村1960～1966年，年均递增8.3%。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庙港人民公社对管理工作主要进行调整核算单位，确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营管理体制，以此稳步发展经济。这是公社各项事业发展较好的一个时期。

60年代初，庙港村村队队推广沤制草塘泥等有机肥料，放养"三水一绿"（即水花生、水浮萍、水浮芦、绿萍），增施少量化肥，年均亩产粮食上升到394.7公斤，比50年代后期增产近一倍。到了中期，全国各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苏州市、盛泽和震泽镇一批批知识青年也来到庙港插队落户，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改变乡村面貌。

从1964年起，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庙港也不例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大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成为替他们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学大寨的内容逐渐走样变形，大寨对全国农村的示范导向作用也走向歧路，给人民公社事业起了负面作用。

"文化大革命"造成长达十年的全国动乱。在动乱中，农村"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把长途运销、自留地经营、五匠外出做工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阻抑了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使农民经济收入几乎只靠死种"六棵头"。

1970年至1979年正是三熟制为主阶段。庙港镇年均复种指数达235.1%，其中绿肥——稻——稻、麦——稻——稻、油菜——稻——稻等三熟制面积占粮田面积的83.6%，年均栽种后季稻2.2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的81.6%，其中1977年为最，百分之百种上双季稻三熟制，而且双季稻早、中、晚熟良种配套，单季稻中籼晚粳良种并存，亩产545公斤，总产1411.6万公斤，同时，播种的三麦面积由前阶段的39.3%扩大为41.2%，油菜面积也

由12.4%扩大为14.9%，年均生产粮食1609.3万公斤、油菜籽38.9万公斤。自1966年起，开弦弓村粮食亩产岁岁超过千斤，到1975年高达800多公斤，跨过了“双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庙港广大干群以极大的热情恢复发展农副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各项管理工作也开始全面恢复、改进。经过一年狠抓劳动力、财务、劳动、农机具、集体粮食与养猪等六大管理，开弦弓村到整个镇初步改变了经营管理混乱的状态，巩固了集体经济，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早在粉碎“四人帮”前，通过贯彻中央“四自一辅”种子工作方针，县乡村建立并健全了三级农作物良种繁育体系。庙港以农科站为阵地，辟出450亩良种繁育基地，把所繁的良种供给条件较好的村队，并备有余缺调剂和防灾用种。

从1977年起，庙港开始试种杂交水稻，连续四年制种近100亩，收回种子6000余公斤，种植杂交水稻5000余亩，最多的1979年全镇共种杂交水稻7900亩。还实行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改进水稻栽插密度与方式。建国初，水稻栽插主要采用横宽竖大的“六棵三靠”稀栽方式（大约亩插1.6万穴）；60年代初，单季稻栽插推广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的小株方形密植（5×5寸）方式，亩插2.4万穴；到70年代，随着施肥水平的不断提高，水稻栽插推广宽狭行条栽方式，以保证在亩栽一定苗数的基础上，增大通风透光空间，增强防病抗倒能力，促进了科学种田。

1978年，该镇继续深化“六大管理”，根据“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全面开展对劳力、资金、物资、粮食等四项清理，对非生产人员、非生产用工、非生产性开支、建设等四项压缩，大办农业，搞好定额管理，集体养猪实行“五定一奖”，有了一套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和奖赔制。

1979年，庙港从镇到村反复学习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有关省委县委文件，坚持实行“五权”（生产队遵守国家纪律，接受国家计划调节前提下有权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改变领导作风，不搞平调，按劳分配，进一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由于管理的加强，责任制的实施，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整个社队经济加快发展了。1980 年，庙港农副业收入达 10566 万元，比 1977 年增 857.6 万元，增 43.1%。

但在政社合一、大集体统一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的改革，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调动毕竟有限。到 1983 年 6 月，遵循上级指示精神，庙港恢复了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建制。至此，历时 25 年的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 50 年代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在 70 年代里，庙港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先后开挖贯穿全境东西的两条中心河，平整 400 亩土地；修复 5 只联圩的防洪圩岸，村村实现排灌分开；逐年兴造太湖沿港的水利工程；加深拓宽太浦河西段，多次修缮节制闸。总之，大包围水利工程告成，绝大多数田间工程达到省颁布的吨粮田标准，外围圩堤都能达到抗御 1954 年这一历史最高洪水位，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同时，达到稻田方格化、桑地园林化、渠路系统化，促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村经济得到相应的增长。但长期以来，因为没有足够尊重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这一客观规律，经济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劳动管理制度也不完全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所以农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

发挥出来，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1978 年春，庙港合群村率先实行分组联产责任制，年终结算，经济收入显著增加，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来，干部群众的思想更加解放，出现了较猛的包工、包产到组的发展势头。但也有部分干部一时想不通，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后经反复宣传耐心教育，才变阻力为动力。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所用权相对分离，以合同形式规定发包与承包双方的责、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土地不准买卖、抛荒、挖废和擅自变形。土地承包按“三田制”划分到户，即人分口粮田、猪分饲料田、劳分责任田。当联产承包后，产品分配实行大包干，农户先完成国家粮油定购任务和应缴纳的农业税，再交给集体公积金（后改为建农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等“两金一费”，然后自主支配剩余产品，自主安排家庭经济收益。正如群众所说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

农民在承包经营土地上的收入，除了按规定上交给国家和集体外，其余归个人所得。这就克服了公社制所引起的种种遏制生产力的弊病，使农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2 年，开弦弓村落实责任制后，划分口粮田，人均 0.4 亩；划分责任田，劳均 1 亩，农民的积极性很高，连续几年粮食亩产一直稳定在 800 公斤。这与责任制以前相比，增产又增收。如庙港合群村 10 队郎荣泉，1983 年开始承包 3.8 亩桑田，当年产茧 227 公斤，第二年产茧 285 公斤，第三年猛增到 408 公斤，加上桑田夹种蔬菜等，收入 3400 多元。还在栽桑养蚕之余承包 3.3 亩水稻田，饲养 4 只羊、2 头猪、30 多只兔子，连在村办厂做工的儿子也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养蚕喂兔搞副业，去掉各种开销，全年净收入 5000 多元。那时，有位记者登门采访时笑着夸奖，“你们人勤手

巧，收入才这样好!"郎荣泉高兴地答道:"千好万好，党的富民政策最好!"

在推行联产承包过程中，因过去三熟制面积过大，季节与劳力太紧，农业劳力逐步向非耕地转移等情况，从80年代初起，庙港三熟制面积年均调减2000余亩，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80.2%降低到1990年的7.5%，以扩种夏熟作物，扩种单季稻，并改部分麦（菜）--稻--稻为麦--瓜--稻三熟制，年均复种指数约230%。1980-1990年，夏熟粮油面积比例由70年代所占的55.8%扩大到75%（其中油菜在70年代所占的14.9%扩大到26.7%），平均年产粮食1716.4万公斤、油菜籽92.7万公斤。同时，简化熟制，简化品种，推广各季当家品种：双季早稻以中代早，适当搭配晚熟品种；单、后季稻更换新的晚粳良种。全镇虽然在土地面积因经济建设需要而合理调减、双季稻面积也逐年调减下，水稻亩产和总产仍分别达到528.8公斤和1163.4万公斤。

整个80年代，庙港大力推广、普及麦菜免（少）耕栽培技术。在建国初，当地以栽种小麦为主，元麦仅种隙地，大麦几乎不种，三麦面积很少且亩产仅几十斤。但少数农民曾种过"懒麦"（即稻板麦）。只因那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认为"懒麦，懒麦，是懒人种的麦"，不但不搞科研，反而给予讥笑、讽刺。到70年代后期进行小面积试验；80年代由点到面进行推广：1980年，29个生产队种植免耕麦1305亩，占三麦总面积的11%；1981年，91个生产队种4100亩，占41.4%；1982年，171个生产队种7700亩，占70.7%；1983年，扩种到9150亩，占92.5%；1984年，高达100%。从1981-1983年实验对比来看，免耕麦比传统耕翻麦平均每亩增产15.7%。免耕油菜也从1976年开始试种，以后逐年增加：1983年种1310亩，占油菜总面积的25%；1984年种4760亩，占81.2%；到1986年，稻板油菜

种植面积高达 100%。

从 80 年代起，庙港还实行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氮、磷、钾合理运筹，对早稻和后季稻采用“一基一追”前重施肥法，群众称为“一轰头”；粳糯稻推行“平促”施肥法；免耕麦采用“两头促，中间控”的 V 字型施肥法，坚持施用有机肥料，结合增磷补钾，使“三麦三麦不过三百”的三麦亩产奇迹般地超过了 500 公斤。

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得每个农家都明白自己承包的土地需要多少劳动量，剩余的劳力就要自觉出去打工挣钱。这使农村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开弦弓村的人均收入从 1980 年的 130 元较快增加到 1981 年的 237 元，1982 年的 334 元，1983 年的 450 元，1984 年的 570 元，1985 年的 712 元。连续五年以每年 100 多元的速度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进厂务工拿工资。1985 年，开弦弓村有 639 个劳动力在乡村企业做工，约占总数的 45%，他们全年的工资加奖金达 48.24 万元，相当于全村每人收入 202 元。

诚然，80 年代前期相继实行农业联产承包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庙港农、副、工三业在高一层次上持续协调发展。工业的异军突起并没有出现农业的萎缩。以开弦弓村的统计数字为证，1979 年以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稳步增长 4%，只是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60%相比，农业则显得缓慢些。

与此同时，当中央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要按照“贸工农”方针调整产业结构的精神贯彻以后，庙港镇村两级领导感到：这确实是一个发挥本地优势、开拓致富门路的良好历史机遇，非抓住不可！于是，及时研究措施，广开致富门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农村经济的全新时期。

（一）开发养殖业

开弦弓是个人多田少的村，靠有限的耕地调整产业结构，潜力是有限的。显然种植业已经扬长，而养殖业还是条“短腿”：水

面还没充分利用，毛兔生产发展不快，猪羊生产还不够稳定。他们就把视野转向耕地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全面开发养殖业。

养兔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农村副业，深受干群欢迎。1978 年，庙港饲养毛兔 5.3 万只，户均 7.7 只，共向国家交售兔毛近 7000 公斤；1979 年，养兔发展到 8.7 万只，比上年增长一半多，户均 11 只，交售给国家兔毛 1.1 万多公斤，其中 14 个大队交售兔毛超千斤，4 个大队交售兔毛超双千斤，全镇以养兔业为主的副业年收入人均约 150 元，占总收入的一半；1980 年，养兔 12.2 万只，平均每户养兔 17.6 只，向国家交售兔毛 1.4 万公斤。由此，庙港不仅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毛兔生产的重点公社，而且使吴江县“毛兔之乡”这一美誉在国内很快传扬开来。

这个公社为什么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呢？主要原因是领导重视发展养兔，树立典型促进养兔，防治结合保障养兔，价格提高自发养兔。饲养形式大体有三种：以 1980 年为例，一种是生产队集体办场，固定专人饲养。这样做的有 91 个生产队，养兔 11700 只。它的好处占用劳动力少，有利于加强饲养管理；第二种是队有户养。这样做的有 26 个生产队，790 户，养兔 3300 只。它的好处是集体不需增加兔棚，投资省；第三种是专业户饲养。合群大队 4 队就是这样做的。它兼有以上两种形式的好处之外，能使老年农妇找到力所能及的好行档，60 岁上下的女社员在自己家里为集体养兔，劳动强度较轻，一年可得 1000 多个工分，拿回本人的粮草绰绰有余。例如，遐迩闻名的“养兔状元”——更楼港村孙关林，六七十年代是生产队长，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人均分配只有 70 多元，自家透支 1200 元。1982 年，他成为养兔专业户。第二年在乡有关部门帮助下，贷款 600 元，添了一只纯种公兔，学习人工授精技术，又自己买书，钻研繁育门道，才使养兔业逐渐上水平。1985 年，他家有 5 口人，3 个孩子 2 个在外做工，1 个读书，一共饲养 105 只良种兔、80 只小兔、

4张蚕种、1只猪、4只羊，还承包5亩水稻、1.5亩饲料地，所有农活全靠夫妇俩操劳。他俩忙起来一天只睡二三个小时，但对人说："过去是为养家糊口而忙，现在是忙在勤劳致富中，透支款已经还清，年收入可超万元，真是越忙越有劲！"

回顾养兔生产，养兔给庙港带来了三个好处：

其一，为农业提供了优质肥料，促进了粮桑生产。1979年，庙港1万余亩三麦，平均单产327公斤，比上年增64公斤，总产增56万公斤；春夏两季蚕茧产量2951担，比上年增42担，如七一大队第6队，户均养兔20只，光上半年为农业提供优质有机肥600多担，使44.5亩三麦单产达到336公斤，比上年增15.8%；春夏两季蚕茧产量比上年增15.7%。可见，施用兔肥，不仅增产效果显著，而且有利于改良土壤，降低成本。

其二，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经济收入。如1979年上半年，全镇交售兔毛6700多公斤，调出种兔9242只，合计收入23.5万元，户均36.2元。较突出的七一大队第3队社员朗洪兴，一家4口，上半年除养5头生猪外，还养毛兔40只，出售兔毛收入181.8元，出售种兔收入61.8元，兔肥投资作价55.9元，合计收入299.5元，平均每人近75元。由于兔子是食草动物，可以不用粮或少用粮，养兔也不需要强壮劳动力，所以成本较低，社员都争先恐后地饲养。不仅社员养兔收益大，而且集体养兔收益也不少。上半年，有62个集体兔场，个个兔场盈余。如曙光大队7队一个新兔场，养兔106只，派一个妇女当饲养员，不到五个月，扣除养兔成本、工分报酬和兔棚折旧，净盈404元。

其三，为农副产品出口增加了货源。当时兔毛是国外市场的热销商品，供不应求，每吨兔毛平均售价2.5万美元。倘若一年产毛1万公斤，即为国家创汇25万美元。国家用这笔外汇，能换回钢材1000吨或尿素1500吨。国家还实行外汇分成，镇上得到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以进一步支持农副工业齐头并进。

庙港还将《毛兔大发展、兔毛大增产》的经验在全国养兔技术培训班上，向国内从事养兔业的干部、专家、专业户作了全面介绍，把养兔技术向大江南北传授、推广，很快在国内掀起一个养兔致富的热潮。

太湖之畔的庙港原有较好的畜牧生产条件，可利用围垦湖田作牧场，6千亩荡滩，估产30万担蔸草等作青饲料；有营养丰富、奶牛爱吃的洋大头菜，在桑地夹种1000亩，年产五六万担。初步匡算，每头奶牛一年需吃81公斤精饲料（如大麦粉、六角粉、原粮粉或面籽饼等），加上适量的地产大头菜、丁香萝卜、白菜、包菜、南瓜、青草、稻草，可年产牛奶3吨。1980年，为了上奶牛饲养业项目，镇上先试养10头奶牛，一面人工繁殖，一面产奶，年产30吨左右，并加工成奶制品出售。到1984年，多服公司就与供销社合资联营，扩建到养300多头的奶牛场。如那年9月份引进的100头，不仅10月份开始产奶，其中90%交售给苏州牛奶公司，当年为市区提供鲜奶27.8万公斤，供应4200多订户吃一年，成为苏州市农村的重要鲜奶产地之一；10%就地应市，生意兴隆，供不应求。而且一年中生下20多头小奶牛，扩大了奶牛饲养、牛奶生产。

此外，村村组组利用太湖滩涂，大力发展养羊（山羊、湖羊）、养禽（鸡、鸭、鹅），繁蚌育珠，网箱养鱼，盛产畜禽、太湖银鱼、太湖大闸蟹、甲鱼、鳗鱼、蚌珠等。每项养殖业，犹如一棵摇钱树，给家家户户招财进宝。

（二）壮大蚕丝一条龙

栽桑养蚕在庙港可谓历史悠久。据县志记载：1931年全县蚕桑产量创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达6.8万多担，其中庙港产4000担之多。但在旧社会，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受到束缚，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蚕桑生产发展缓

慢。到解放前夕，蚕桑生产奄奄一息，全县年产茧仅 2.3 万担，庙港降到 1800 担。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蚕桑生产得到发展。经过四年恢复，1954 年庙港总产茧达 5618.2 担，比解放前夕增长 3 倍多。此后趋于相对稳定阶段。如 1956 年全镇饲养蚕种 11229 张，单产 25.1 公斤，总产茧 5632.4 担。1960～1962 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了蚕桑生产，全年饲养蚕种跌为 2427 张，单产 20.1 公斤，总产茧仅 976.6 担，滑入解放后历史低谷。之后，由于“文革”十年动乱，一直徘徊在 1954 年的产茧水平上，如 1971 年饲养蚕种 10629 张，单产 26.4 公斤，总产茧 5612.9 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蚕桑生产才得以前所未有的发展。

例如，全县粮茧双高产的先进单位开弦弓村，通过改造老桑园，建设新桑园，获得年年增产，蚕茧总产从 1975 年的 325 担上升到 1978 年的 363.5 担；亩产蚕茧从 1975 年的 106 公斤，上升到 1978 年的 117.3 公斤；蚕茧总收入稳定在 5 万元左右，1978 年达 5.4 万元，占副业收入的 32.7%。单蚕茧一项，每人平均收入达 40.8 元。干部群众笑着说：“金山银山一担挑，蚕桑村庄展新貌”。他们的主要做法：

一是端正思想认识。蚕桑生产是该村的一项传统副业，大家把桑园比作“小银行”，季季有收入，月月有进帐，年终分配有保障。可在十年动乱中出现桑树常年失管，老桑长期得不到改造，养蚕年年缺叶。1978 年后，全村干群挑土墩，填洼地，大搞平整土地；改老桑，栽新桑，建设百亩大桑园，经过两个冬春奋战，初步实现格田成方，桑地成片。

二是大搞多种经营。为了高速度发展蚕桑生产，他们在建设百亩新桑园的基础上，坚持桑地有计划种植绿肥，做到以地养桑，以桑养蚕，绿肥喂猪，桑条夷梗养羊，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

三是坚持科学培桑养蚕。该村认真学习浙江省云龙大队的经验，克服重蚕轻桑的错误倾向，坚持从育苗抓起，年年桑苗自给，实行新桑专管，做到桑园长绿肥不长草，桑叶喂蚕不养虫，桑树定人伐条，桑园长相规格化，使76亩新桑园亩产春叶达300公斤，全年产叶2750公斤，实现平衡高产。养蚕在期期彻底消毒的基础上，坚持粮桑饱食打基础，温湿标准不马虎，合理饲养下功夫的基本经验外，连续几年进行小蚕两回育，向高工效经济养蚕新技术方向前进，因此，养蚕张数不断增加。由于养蚕的科学技术年年革新，用叶量年年下降，工效不断提高，蚕茧逐步增产。

在发展栽桑养蚕过程中，庙港农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早于70年代，示范推广小蚕坑房育，年均张产32.5公斤，列县前茅；1983年冬，推广密植速成丰产桑技术，先在3个队、87户蚕农地上试种23.1亩，当年取得亩产茧63公斤、亩产值270元的好成绩；继而，1984年冬春又扩种密植速成丰产桑277亩，一年时间经过摘芯整枝、肥培管理、普遍茁壮成型，为拓桑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桑地的收入也比较高，一亩桑地蚕茧加蔬菜的净收入一般都在400元以上。还可以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但历年来，由于粮食的制约，蚕桑生产发展不快，蚕桑产量在600-700担之间徘徊。1985年，在粮食定购任务减少的有利条件下，村里测算一下，总产稳定在150万公斤左右，三者关系就能安排有余。接着腾出一定的粮田，调整产业结构。年初，全村打破队界，统一规划，一共改桑278亩，使新老桑地发展到696.4亩，占可耕地面积的23.5%，户均桑地1.2亩，还明确规定桑园承包期15年不变，使集体桑分到户的蚕农舍得投本，放心在桑园管理上下功夫，做好开沟、施肥、剪枝、除虫，都能抢季节，抓得紧，肯花工，使桑园长势普遍良好，产叶量高，亩产茧、亩产值也大大提高。1985年新桑做到当年种桑、当年养

蚕、当年得益。其中新桑调查折算，亩产茧达52公斤，亩产值217元，最突出的第七生产队拓桑10.3亩，亩产茧高达80公斤，亩产值达335元。由于，果园相对集中，形成规模效益，那年开弦弓村蚕茧总产首次突破千担大关，达到1076担，比上年增加323担，增长44%，成为吴江县第一个年产茧50吨（千担）的村，平均亩产茧76.8公斤，创历史新水平。

看农村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庙港干部群众又探索改革新路，发展蚕丝生产。

长期以来，蚕丝生产分属农贸工三个部门主管和经营，产茧归农，收烘归贸，缫丝归工，茧丝生产难以全面协调，造成蚕茧生产上重数量轻质量，重蚕农利益，轻工贸效益；收烘环节上，重收烘进度，轻茧质保护，重经济核算，轻为农服务；贸丝生产上，则因前两道工序质量得不到保证而造成生丝质量差、效益低。为了搞好协调，理顺关系，挖掘生产的内在潜力，提高茧丝生产的综合效益，庙港正式将缫丝厂划给乡多服公司管理。从此，初步形成了茧丝生产一条龙的管理体制，这在县内是一个创举。

为了适应新管理体制之需，乡里着重抓了以下两项工作：(1)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经济责任。由一名副经理负责组建茧丝科，协调各环节生产，确立茧丝生产整体观念。茧丝科还负责搞好各工序间经济承包合同的签订，分别考核，单独核算。(2) 健全岗位责任制，完善考核指标。首先健全各生产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任务明确，职责分明，从制度上保证各道环节的协调；其次，增添新的考核内容。如蚕桑技术辅导站增加上茧率、茧层率和解舒率等蚕茧质量的考核指标；茧站增加蚕茧适时处理、消灭毛脚茧、掌握烘茧适干等收烘过程中蚕茧的质量保护考核指标；对丝厂的质量、效益等指标的考核，提出新要求。由于明确了目标，落实了责任制，完善了考核指标，使得各道环节配合密切，

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蚕茧生产为收烘和丝厂考虑，收烘为蚕农和丝厂着想，丝厂支持蚕茧生产和收烘工作的协调局面。

通过实践，茧丝一条龙生产这种科学管理体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给1985年茧丝生产带来诸多好处：一是科学养蚕水平上升。为加强生产指导，20个村配备30名技术员，速成丰产桑园得到全面推广，比常规栽桑增产桑叶35%，专业承包治虫取得大面积成效，每亩耗药从1.5元降到1.1元，指导农民扩养春用多丝量蚕品种，占全年发种量的60%，各种蚕药小包装送到农民手中，普及方格簇85302片，使农民一年增收20万元，使丝厂得到大批优质蚕茧。二是茧丝数量增加，质量提高。1985年，蚕茧产量685.9吨，比上年增7.5%，亩产茧83.4公斤，总产、单产保持全县第一。茧丝检验上茧率为96.4%，50克干壳量为10.1克，与上年持平，先上茧解舒率78.4%，比上年提高8.5%，适干率达100%，干茧解舒率达73.2%，获县一等奖。生丝品位达3A28，居苏州市第一，获省优产品。生丝正品率达100%，比上年提高2%。三是农民收益逐年提高。这年，该镇蚕茧收入321.4万元，比上年增10.8%；户均收入534.8元，比上年增52.11元；亩产茧达390.6元，比上年增30.64元。丝厂增盈后，较好地处理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拿出7万余元作为优质蚕茧加价，返回给农民，每担蚕茧提取1元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新建联户坑床，奖励共育，扶持困难户发展蚕桑等。总之，茧丝生产一条龙管理，较好地协调了蚕农、茧站、丝厂三个环节的生产，调动了三者的积极性，为庙港八九十年代蚕、茧、丝生产不断增添新活力。

（三）发展蔬菜产销一条龙

庙港地处太湖南岸，具有独特的太湖小气候自然条件，小粉土面积占全镇耕地面积的60%以上，土壤、气候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发展蔬菜生产，由此，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副业。这里种植

的蔬菜品种较多，有特色名菜，如吴江小黄瓜，列为江苏名菜之一，畅销国内外；吴江雪菜，加工后味道鲜美，贮存一二年不变质，与四川榨菜齐名；太湖萝卜，皮薄水分多，生吃甜脆。而且各家各户都有种植蔬菜的习惯和丰富经验，产量高，质量好。

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庙港学习外地经验，办起农工商蔬菜联合公司，实行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联合公司下设蔬菜购销经理部、酱菜门市部和蔬菜加工厂等三个单位。购销经理部，主要负责蔬菜计划种植、技术指导、收购推销等业务；蔬菜门市部，主要直接经销各类酱菜制品；蔬菜加工厂，在原有的基础上，征用3亩土地，建造2万担容量的窖，增置150只大缸，扩建部分厂房，主要加工生瓜、小黄瓜、大头菜、红萝卜、辣茄等腌制品。1980年加工13种鲜瓜菜8.9万担，产出成品7.5万担，产值44.1万元；1981年加工鲜瓜菜12.8万担，产出成品10.7万担，产值63.4万元。同时，试制成甜香卜、大头甜支卜、蜜汁萝卜、甜汁黄瓜等土特产品，供旅游者消费。

但是，蔬菜一哄而上就出现供大于求的难题，许多鲜菜常因缺乏加工手段而受霉烂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4年，庙港采用镇、村、队合资联营等办法，投资3200万元，继镇办蔬菜加工厂后，又建8个规模不等的农副产品加工厂，开展加工—贮藏—销售"一条龙"服务，提高了产品的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开辟了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光一家镇办酱品厂，当年就地收购7万担鲜坯大头菜、红萝卜和丁香萝卜，通过初级加工和综合利用，制成14个品种、4.9万担酱制品，畅销上海、西安等城市，销售总额达86.4万元，平均净增值达16.7%，其中丁香萝卜通过加工成白糖丁香片，净增值可达20.1%，比出售鲜坯，运输成本下降40%，减少损耗68%。开弦弓村也根据本村的产品资源，投资20多万元，兴办罐头食品厂、粮食酿酒厂、豆腐坊等加工业。如罐头食品厂，精制五香熏鱼、凤味鱼和各种

水果罐头。由于质优、价廉、味美，一上市就见俏。据资料，1985年后8个月中，鱼制品的净增值达29.8%，水果制品的净增值达19.1%。进入90年代，全镇蔬菜年加工量达3万吨，为生瓜、大头菜、黄瓜、萝卜、冬瓜等大路货地产品解决了出路。庙港等村蔬菜加工厂与外贸部门联系，扩大紫紫叶生产，加工后出口日本，取得良好效果，首创苏州市内出口蔬菜之路。

1989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大力发展蔬菜生产，服务城市居民生活，庙港又在东部沿太湖的富联、罗港、月字圩、富强、太平桥、庙港、合群、五联、曙光等9个村和毗邻的横扇镇6个村一起建立苏州市直供蔬菜基地。一是组织一套管理班子，成立蔬菜产销合作社，配备一支技术服务队伍，并狠抓硬件投入，开辟1031亩蔬菜专用基地，投入70多万元，大搞菜地基础设施建设；现已达到年产蔬菜18类、6万吨。二是为改变农民文化素质低、技术老化、接受新技术能力差、生产水平低的局面，采取会议宣传、技术培训、现场参观、实地指导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人员，通过广播、黑板报和印发技术资料等向广大菜农传授生产技术，通过各种努力，明显提高了蔬菜生产水平。如国家农牧渔业部植保总站IPM项目的示范村——富强村，在实施世界银行出资支持中国探索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的无公害化效果，减少蔬菜高毒剧毒农药施用量，用科学的方法降低蔬菜的残毒量，最终达到蔬菜世界无公害化标准的科研试点中，经过两年示范推广，基本控制了剧毒农药施用，生产的蔬菜在市场上更受欢迎，产销两旺。而且于1995年4月，由农业部主持的"世界银行IPM项目评估计划会"在吴江市召开期间，与会专家曾考察该村，对这一蔬菜无公害化试验所取得的成果和在防治模式、减少用药、培训人员、经济效益上均给予高度评价。三是通过各种渠道组织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专用生产资料，解决菜农难购新品种、特效药的困难。如茄科类、耐热白菜、西洋芹、秋茼

苣、绿花菜等种子、种苗引进，提高了社会效益，解决了市场短缺产品；四是狠抓富强村蔬菜病虫综合治理、五联村雪菜生产与加工增值、曙光村金月明蔬菜专业户等典型，以点带面，逐步辐射，促进了新技术的普及推广；五是发展有特色的规模化的区域生产，拓宽蔬菜销售。曙光村金月明户，近几年承包1.2亩耕地，根据市场行情，先后从上海、武汉、嘉兴等城市，引进种植马兰西芹、美芹、卷心红包菜、菜芽、觜角菜、觜角尖、潮洲菜、苦瓜、龙头角、葡萄梨番茄、金丝瓜、白花芥兰等30多个名特优新蔬菜，收获后全部销往宾馆饭店，供不应求。光1993年总收入2.3万元，亩收入近2万元。现在金月明户的带动下，附近农户种起特种蔬菜，走上靠蔬菜发家致富之路。进入90年代中期，这个蔬菜基地正在加大投入，搞好田间工程、生产设施建设，开发尼龙大棚种菜，进一步推广蔬菜名特优品种；积极引进试验示范各种新品种，把高产、优质、高效且有竞争力的品种推广开来；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模式和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压缩大众化产品，推广淡季蔬菜生产，均衡上市，使旺季不过剩、淡季不缺货，提高复种指数，改进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推广综合防治技术，降低蔬菜农药残毒，发展"无公害"、"绿色"蔬菜，既促进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利于消费者的食用卫生和身体健康。

（四）搞好社会化服务

当实行30年的"工分制"退出历史舞台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伊始，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联产承包制还必须向前发展，目前看来，'统'这个侧面要发展。所谓发展，绝不是重新回到集中劳动、集中经营的那一套，把农民的手脚捆起来，而是要适应新情况，发展各项事业，为农民分散的家庭经营服务，'统'这个侧面发展了，'分'那个侧面也就更有条件发展，整个合作经济也就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庙港先试点，再

向各村推广建立"四站一队"（即农技服务站、水利服务站、各种经营服务站、会计服务站、农机化管理服务队），初步形成统分结合的框架结构，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巩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机制。

此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强壮劳力越来越少。1989 年，开弦弓村 612 户，一家劳动力全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纯农户，只有 7 户。例如：

（一）、姚金山家

户主：姚金山　　51 岁　初小　务农

妻：姚关宝　　48 岁　文盲　务农

子：姚凤泉　　27 岁　小学　务农

媳：姚凤娟　　20 岁　小学　务农

（二）、陆金观家

户主：陆金观　　36 岁　文盲　务农

妻：周唐英　　37 岁　文盲　务农

女：陆红方　　8 岁　在小学念书

子：陆方明　　5 岁

正因如此，单一的为农服务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经营之需，迫切要求服务体系向配套化、综合化方面发展。

1990 年 7 月，村级农业服务体系开展创建"六有六统一"活动。当年 8 月，开弦弓成为全县第一批 108 个农业综合服务达标村之一，到 1992 年底，全镇村村成为农业综合服务达标村。开弦弓村多年来强化农业综合服务，共投资 41 万元，建成一个设施配套、手段先进、功能多种的村级服务站，为夺取农业丰收和协调全村农副工三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该村综合服务站按农技、农机、管水、植保、种子、农田基本建设等专业项目提供服务，站内共有专业服务人员 38 人，设有农机、肥药和种子三个仓库等后勤设施，服务人员按农技、农机、管水、植保等

专业服务项目制订岗位责任制，分工协作，灵活作战，按期考核，服务站负责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供应种子、化肥和农药等，还把提高农民技术素质、改善经营管理、确定现代农业的意识作为本站的基本任务，开展系统化的为农服务：建立农技学校，全年培训农技服务站人员、村干部、示范户20多次；建立示范丰产方，运用新品种、新农技搞试验、示范；通过舆论工具向广大农民宣传农技知识、贯彻增产措施；进行农业机械专业规范化服务。在建立健全农业综合服务站的同时，各村兴办经济实体，到1994年底，庙港有17个村服务站办起各类经济实体，使服务人员在经济实体的收入中有了工资来源，成为既是服务组织，又是经济实体。从而，经过上下左右的艰苦创业，庙港形成了以市级服务为依靠、镇级服务为龙头、村级服务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进一步发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庙港农业综合服务站建立以来，做到了以下几条：（1）队伍比较健全。各村农业综合服务站在原有的基础上，为了扩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内容，适当调整并充实服务人员。据统计，全镇现有常年服务人员461个，村均23人，人均服务面积63亩，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1994年，全镇服务人员报酬总额达93万元，人均年收入2015元（不含平时零工性收入），出勤日均报酬13元。（2）运转比较正常。大多数村服务站能做到年初有计划，平时有记载，年终有考核，确保了农业综合服务站的正常运转，使"六统一"服务有了明显提高。全镇农业服务站的常年服务人员，总出勤7.15万天，人均出勤195天，在全市最多，比全市人均147天多48天。他们实行统一机耕：夏种时耕翻麦田，秋播中机械开沟，还提供机械栽秧；统一排灌：机电两用，排灌分开，适应农作物生长，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统一供应肥药：根据测土配方和粮油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及时供应并指导科学

施用不同的化肥农药；统一供种：主要是80年代供应晚粳秀水04，90年代供应丙88-122这两个单季稻当家品种和扬麦5号、汇油50号等麦油作物当家品种，年供应稻麦良种15万公斤。先行的村还统一供应采用稀播（种谷从原来每亩50-60公斤降到现在30公斤以内）而育成的单季稻壮秧；统一植保：早于1967年，开弦弓村建立病虫测报点，随后镇村都建立病虫情报网，测报点上病虫，提出面上防治病虫意见，从而对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病虫害，在不同的生产时期分别采用有效的防治方法，还对各类农田草害，以点带面地进行化学防治，效果良好。还拓宽了服务项目，如机压麦，桑地、林果植保统防，小蚕共育等。(3)设施比较配套。为提高农业综合服务水平，各村借助90年代农业升温之机，加大对农业服务硬件设施的投入。1994年，村级投入农业服务的经费，总额达143万元，亩均73.7元，基本农机21元，水利96元，仓库场地4元，补贴服务人员报酬22万元，其他投入17元，当年新增中拖3台、手拖7台、工农36型远程喷雾机1台、东方红18型弥雾机6台、手拖开沟机7台、新筑水泥渠道901公里，新建农机仓库7间、200平方米，明显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4)实体办得较好。各村十分注重服务站办经济实体工作，并开展综合经营。如建立小工厂、小农场，承包果园、鱼池，从事劳务运输。通过以工养服、以农养服、以副养服、以劳养服，壮大了服务站实力，增添了服务站活力。

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地处吴江西南部人多田少的庙港，一方面稳定稻麦（油）两熟生产。从1991年至今年均复种指数为194.4%，夏熟粮油面积年均调减1390亩（其中三麦面积从1991年的48.1%降为1994年的28.3%，油菜面积则从1991年的42.8%升到1994年的47%），使粮食稳定在亩产500多公斤、年产1342万公斤，油菜籽年产133.9万公斤；另一方面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鼓励有条件的村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1987年，全镇第一个种粮大户——开弦弓村9队姚金山，共种22.7亩水田（包括口粮田3.3亩），在村农业服务站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水稻亩产高达633公斤，超过全村平均单产92公斤；粮食总产达到1.5万公斤，扣除每亩所花的农药、化肥、机耕、雇工等项农本，开支200元，20亩需付费用4000元，净收入11533元，获得地增产、人增收的好结果。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来，发挥了利益驱动功能，扩大了农户经营自主权，成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由于劳动工效低，“露天工厂”经常开夜工，农活还来不及干，一亩田一年要花50工；现在，稻麦两熟亩用工量锐减到20来工，最经济的降到15工以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不但“告别”开夜工，反而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并日益得到开发、利用，使农村旧貌换新颜：第一，二三产业勃兴了。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在致富欲望的驱动下，积极寻找就业门路；另一方面区域性集体经济组织也创办各类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发展生产，由此勃兴了第二、三产业。农民直接参与商品流通的，如五联村蔬菜加工业年销售额达540多万；轮穗村木材市场年营业额达4000余万元。据统计，1994年，全镇17184个农村劳力，48.1%已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转移到二产的占35.2%，转移到三产的占12.9%，农村经济收入达到7.4亿元，比1978年增长85倍，年均递增134%；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9亿元，劳均创16003元，其中第二产业17507万元，占61.2%；第三产业3970万元，占13.9%。第二，农业基础稳固了。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普遍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反哺”于农业。十多年来，该镇乡镇工业共提供建农金257万元，分别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农机修添、农技推广、农业开发、路桥修筑、农业服务组织补贴等方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250万公斤左右、油菜籽总产上升到近100

万公斤，镇村人民的"菜篮子"品种丰富、质量上乘。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了。1984年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在大农业中，除乡镇工业获得突破性发展外，种养业大踏步发展。桑地面积从5700亩扩大到8969亩，内塘养鱼从4299亩扩大到6202亩，蔬菜种植从1700亩扩大到3900亩，果园从无发展到600亩，由于面积扩大，现在，每年生产蚕茧1.9万担、水产3.8万担、家禽20万羽、果品70万担、蔬菜瓜果8000万担，分别比1983年增加166%、233%、46%、8500%、40%。第四，集体经济壮大了。农副工贸的良性循环及发展，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积累，据历史资料，1994年镇村两级集体积累的资金，已由1978年的1200万元，增加到11400万元，年递增为115%。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社会事业的进步，也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农民生活"小康"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逐渐上扬，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23元增长到1994年的3072元，16年增长24倍，年递增率124%。同时，80%以上的农户翻建新楼房，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电风扇都已进入寻常农家，摩托、冰箱、洗衣机、空调的拥有者也日渐增多。当吴江首批且率先荣获全国农村电气化县（市）称号后，庙港实现了用电标准化，村民从少到多地吃上自来水、用上液化气、装上电话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正在奔向农村城市化。1994年末，全镇人民储蓄额达2760万元，户均3700元。

附一、1958—1994年庙港镇粮食生产分类播种面积及产量表；

附二、1958—1994年庙港镇粮油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表。

附一：　1958—1994年庙港镇粮食生产分类播种面积及产量表

单位：亩、斤、万斤

年份	三麦			双季早稻			后季稻			单季稻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1958	48621.1	452.8	2201.3	5191.7	484.8	251.7	5201	302	157.1	26316	620.1	1631.9
1959	43810.9	434.0	1927.6	7209.3	321.8	232.0	8137.3	427.5	347.9	21611.1	582.8	1259.6
1960	35890.4	545.4	1957.4	5958.0	485.7	289.4	1261.3	311.7	226.3	20671.5	599.5	1239.3
1961	45577.6	366.6	1670.9	6345.7	405.8	257.5	7181.6	315.7	226.7	20678.2	480.7	994.1
1962	41545.5	433.7	1802.0	3124.9	465	145.3	3379.6	285	96.3	22511.7	579.8	1305.3
1963	42711.3	435.6	1860.4	4542.8	515.5	234.2	4918.9	378	185.9	20874.4	577.4	1205.2
1964	42372.6	542.1	2297.0	6328.8	493.7	312.4	6950.1	489.4	340.1	18883.6	754.6	1425.0
1965	41125.6	623.3	2563.5	6471.2	659.4	426.7	7209.7	453.8	327.2	18617.3	825.8	1537.5
1966	43631.9	633.6	2765.2	8974.4	733.3	658.1	10780.3	493.4	531.9	15052.7	850.2	1291.8
1967	43318.6	584.9	2533.8	8488.7	614	521.2	10144.3	541.5	549.3	15689.5	756.8	1187.4
1968	43234.4	519.5	2246.2	8369.8	610.8	511.2	9999.6	429.2	429.2	15832.8	625.2	989.9
1969	51591.3	538.4	2777.5	13218.1	588.3	777.6	15077.4	589.8	889.3	10756.7	763.6	821.4
1970	56981.3	467.7	2664.9	20600.9	507	1044.5	22160.9	466.8	1034.5	3717.2	648.8	241.2
1971	57442	491.0	2820.6	21442.5	552.2	1184.1	23748.9	473.6	1124.7	2078.2	618.2	128.5
1972	57307.6	568.5	3257.7	21308.4	672	1431.9	23969.5	511.4	1225.8	1858.5	896.6	166.6
1973	57409.5	524.9	3013.6	21332.9	658.3	1404.3	24772	512.2	1268.8	1134	802.3	90.9
1974	57491	575.9	3310.7	21492.2	687.8	1478.2	24973	549.2	1371.5	851.7	1022.0	87.0
1975	57692.2	525.6	3032.1	21720.6	691.3	1501.5	25261.4	497.7	1257.3	563.1	911.9	51.4
1976	61358.2	576.4	3536.4	21908.7	768.3	1683.2	25823.4	562.3	1452.1	—	—	—
1977	46162.7	645.3	2978.7	21912.1	646.6	1416.8	25822.3	493	1273.0	—	—	—
1978	58354.7	595.5	3472.2	21950.4	632.1	1387.5	25700.4	587.3	1509.4	—	—	—
1979	57608	711.5	4098.7	21873.3	724.6	1584.7	25493.8	718.1	1831.7	—	—	—

1958–1994 年庙港镇粮食生产分类播种面积及产量表(续)

单位: 亩、斤、万斤

年份	三麦			双季早稻			后季稻			单季稻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1980	9903.9	700.5	693.8	20473.6	706.7	1446.9	25510.1	440.3	1123.7	—	—	—
1981	9899.8	564.9	559.2	19000	709.7	1348.4	23672.5	406	961.1	1944	660.7	128.4
1982	9900.6	650.1	643.6	18320.6	731.6	1340.3	23118.6	657.4	1519.8	2286.4	825.5	188.7
1983	9899.9	597.8	591.8	18322	614.6	1126.1	23088	753.6	1739.9	2281.4	858.5	195.8
1984	9895.7	767	759.0	15864	744.5	1181.1	19025	748.5	1424.1	7361.1	912.7	671.8
1985	10902	449.3	489.8	11153	715.8	798.3	13499	713.5	963.2	8657.4	817.9	708.1
1986	9836.9	550.8	541.8	9447.5	811.4	766.5	11668.3	738.7	861.9	10454.1	909.1	950.4
1987	11269	547.1	616.5	9784.4	660.1	645.9	12031.8	734.3	883.4	9967.5	983	979.8
1988	11768.7	529.5	623.2	5669.9	521.5	295.6	6918.9	767.2	530.8	13965.8	1013.8	1415.9
1989	10280.9	490.3	504.1	1953.2	725.1	141.6	2298.8	696.7	160.2	17618.5	1026.6	1808.7
1990	10408.9	544.9	567.2	1481.8	757.9	112.3	1751.2	738.4	129.3	17956.8	1060	1903.3
1991	9968	546.2	544.5	—	—	—	915	756.8	69.2	19793	1082	2154.8
1992	10492	598	627.4	—	—	—	—	—	—	19750	1091	2146.1
1993	9067.7	603.4	547.2	—	—	—	—	—	—	19587.5	1095.7	2146.1
1994	5510	562.6	321.0	—	—	—	—	—	—	19446	1123.4	2184.6

附二：　1958—1994 年庙港镇粮油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表

单位：亩、斤、万斤

年份	粮食			油菜籽			年份	粮食			油菜籽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面积	亩产	总产
1958	48621.1	452.8	2201.3	2740.6	67.3	18.4	1980	55887.6	590.5	3300.4	4650.4	254.5	118.4
1959	43810.9	434.0	1927.6	2577.2	104.6	26.9	1981	54516.3	539.5	2941.3	4650.6	371.5	172.8
1960	35890.4	545.4	1957.4	4560.5	80.2	36.6	1982	53626.2	688.6	3692.5	4650.4	482.6	224.4
1961	45577.6	366.6	1670.9	4198.9	47.3	19.9	1983	53591.3	681.8	3653.7	4649.5	244.5	113.7
1962	41545.5	433.7	1802.0	2748.5	67.4	18.5	1984	52145.8	776.6	4049.7	5860.7	267.1	156.5
1963	42711.3	435.6	1860.4	2815.5	78	21.9	1985	44211.4	669.4	2959.4	8910	246	219.2
1964	42372.6	542.1	2297.0	2784.4	83.2	23.2	1986	41406.8	753.7	3120.7	9632.3	218.8	210.8
1965	41125.6	623.3	2563.5	2573.4	132.2	34.0	1987	43052.7	726.0	3125.7	8313.7	250.8	208.6
1966	43631.9	633.8	2765.2	3120.2	118.4	36.9	1988	38323.3	747.7	2865.5	7202.3	308.7	222.3
1967	43318.6	584.9	2533.8	3283.5	160.9	52.8	1989	32151.5	813.2	2614.6	7882.6	264.0	208.1
1968	43234.4	519.5	2246.2	3367.7	227	76.4	1990	31598.8	817.4	2582.8	7696.7	325.1	251.7
1969	51591.3	538.4	2777.5	3628.9	180.4	65.5	1991	30676	898.2	2755.3	8859.0	314.7	278.8
1970	56981.3	467.7	2664.9	3771.2	176.3	66.5	1992	30242	920	2782.2	8249.3	362.2	298.9
1971	57442	491.0	2820.6	4020.7	196.2	78.9	1993	28655.2	940	2693.3	6912.1	355.8	245.9
1972	57307.6	568.5	3257.7	3390.5	227.6	77.2	1994	24956	1004	2505.6	9146.3	270.7	247.6
1973	57409.5	524.9	3013.6	3829.4	163.1	62.4							
1974	57491	575.9	3310.7	3869.6	205.8	79.6							
1975	57692.2	525.6	3032.1	3805.2	146.8	55.7							
1976	61358.2	576.4	3536.5	3811.4	201.5	76.8							
1977	46162.7	645.3	2978.7	3811.2	139.3	52.9							
1978	58354.7	595.5	3472.2	3800	271.5	103.2							
1979	57608	711.5	4098.7	4356.2	284.5	123.9							

四

农业现代化初期 80年代中期以后，遵照上级指示，苏南地区开展了以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为重点的农业现代化试点。起初，锡山、吴县、常熟三县（市）开展农业现代化试验；继而，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和省委提出的"苏南发达地区在2000年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中央和省商定将这农业现代化试验调扩到苏锡常地区农村现代化试验。

农村现代化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等几个方面，而农业现代化乃是基础。

早在70年代被县委县政府列为农机化试点的开弦弓村，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生产全靠体力劳动，如耕翻田地靠铁锸，抗旱排涝靠水车，稻麦脱粒靠人打（石臼碾）；走上合作化道路后，开始使用脚踏脱粒机、流动抽水机；1968年，出现电动脱粒机和粮饲加工机械；直到1971年，开天辟地购进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始于机械耕地，并逐步普及每个生产队，踏上了农机化之路。即使那些年份百分之百种植双季稻，也基本上做到全部田块机械耕翻、稻麦机动脱粒、灌排机电俱有，克服了劳力紧张矛盾，不误农时地夺得了粮食高产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庙港镇发展到手拖205台、脱粒机450台、农副加工机械73台、机动植保机25台、农用挂机船130条；还在1983年成立镇农机管理站，十多年来，累计培训以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为主的各类农机人员达350多人次，供应全镇农机具的零配件，开设农机"医院"，在夏秋两个大忙中保障各村没病机，开好机。继而，80年代中期，该村又被定为全县农业现代化先行村，便积极开展试验：1、建立种子基地，为全村乃至全乡繁育抗病、抗倒伏、耐肥的高产良种；2、并块调整零零散散的责任田、口粮田、饲料田，集中起来，连片种植；3、以工业规划区所在地9队为突破

口，集中责任田，实行大户承包，搞适度规模经营；4、整修全村电力线路，配备自供电，满足企业、农户生产生活用电。多年来，庙港从实际出发，由开弦弓村这个点带动全镇各村，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第一，农机化水平大为提高。近年来，开弦弓村购进联合收割机1台、中拖3台、开沟机10台、手拖15台、弥雾机20台、插秧机4台，计划新增中拖3台、联合收割机4台，修筑机耕路15条5606米、环村公路1497米，建桥1座，沟通全村，连接庙港——震泽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亩均农机动力达到3.5千瓦。随之发展，全镇农机具从小型向大中型发展，三麦生产从植保向全程机械化发展，水稻收种机械化起了步。第二，水利建设逐年加快。到1994年底，全镇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1300万元，完成土方石4.7万立方米，筑成境内太湖防洪大堤7.3公里、圩堤64.8公里、受益面积3.2万亩。站闸桥涵初步配套，农田林网全面达标；一共改造低产田4000亩，新砌永久性沟渠7公里，建成高产方12100亩；使农田基本达到防洪、防涝、灌排和降渍等功能。第三，农业服务全面开展。村村达到"六有六统一"的标准，呈现"平时靠专业服务，忙时服务队伍加千家万户"的可喜景象。第四，先进农技普遍推广。稻麦油良种覆盖率达95%；三麦免（少）耕、水稻轻型栽培和稻麦油群体质量栽培技术迅速应用，化学除草技术基本普及；多种经营引进、开发12只名特优新品；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近50%。第五，整个农业协调发展。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连续近十年保持"稻超千斤"、"麦超五百"、"油超二百五"的较高水平；林牧副渔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强，使多种经营在大农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创汇农业不断发展，已办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25家。可见，庙港镇现处于现代农艺与传统农艺交融、现代管理方式与传统管理方式并存、现代生产手段加快替代传统生产手段的农业现代化初

期。

1995 年上半年，当吴江市委市政府部署农村基本现代化试点村工作后，庙港加快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物质装备、经营方式来改造、武装、管理传统的农业，努力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其目标是：1、生产手段机械化。到 2000 年，三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生产以机械植保大力带动收种两头机械化，油菜生产的播栽和收割机械化力求突破。2、农田设施标准化。到 2000 年，农田设施标准化由现在的 70%提高到 80%以上，水利配套率 70%，“吨粮田”面积占 60%强，大中型农机通达面积率 80%。3、经营方式集约化。到 2000 年，经营方式集约化综合程度由目前的 25%上升到 75%，全镇 6100 亩粮食责任田、“菜篮子”基地和蚕桑生产等基本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生产。4、农业服务现代化。到 2000 年，全面强化村级“六有六统一”服务，走企业化经营之路，提高服务水平，使综合服务程度由目前的 60%上升到 80%。5、耕作技术科学化。到 2000 年，形成农科教一体化，在农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现代科技，使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 60%以上。

为实现上述既振奋人心又实事求是的奋斗目标，庙港已经付诸实施，见之行动。首先订规划。各村把农业现代化规划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规划协调起来，突出规模经营、农机推广、农田保护和社会化服务等项内容，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其次增投入。针对农业基础脆弱的现状，镇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扩大农业发展基金和防洪保安资金的收缴范围，多渠道筹集农业资金；因势利导增加农业信贷资金，增加菜篮子工程和多种经营基地投资，增加生产性投入，同时，增加各项科技兴农的投入，不断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肥药和新农艺，促进“两高一优”农业。再是抓建设。走适用的三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水稻收种机械化多形式的发展之路，

普遍推开"农机化"工程；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建造"吨粮田"工程；通过优化水质、美化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各类农业资源，建起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工程。第四搞改革。以提高"三率"和效益为目标，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粮田适度规模经营；以市场为导向，采用各种形式，扩展多种经营基地；以产业化这一要求，镇村农副业服务机构多办实体，使专业化服务与企业化经营相结合。第五配班子。镇村建立并健全了农业现代化建设领导班子及其各项工作责任制，确定每年的实施目标和考核事项，坚持以典型引路，推动面上，以确保农业现代化的目标顺利实现。

（吴江市经济研究中心　叶　飞）

主要参考资料：

费孝通《江村五十年》

开弦弓村档案室资料

吴江县有关历史资料

王淮冰《江村大事记》

庙港镇暨农口部门档案资料

工　业

本世纪20年代初，庙港的开弦弓村萌发了中国第一个乡村企业，它是现今庙港最大的企业集团——江苏金蜂集团公司的前身，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前奏曲。

一

蚕桑与江村工业　开弦弓村的工业发源于蚕桑。它紧邻震泽镇（民国期间设震泽市）。据范烟桥《吴江县乡土志》载，震泽"市肆列运河两岸，商业繁盛，居民多有育蚕练经，桑条遍野，产丝颇富，且光泽细韧，为他处所不及。"[1]从唐代开始，这一带就是重要的丝绸产地，"吴绫"作为贡品进呈皇室使用。蚕桑和丝绸业一直是吴江重要的经济来源。到了明代，又出现了著名的"辑里丝"（或称七里丝）。根据前人考证，辑里丝产地介于浙江南浔和江苏吴江的震泽这两大镇之间，这一区域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的技术优势，产出的蚕丝"颜色纯白，光泽艳丽，质地坚韧，弹性丰富，条纹匀整，均非世界各类生丝所可比拟"。[2]其中以北乡丝为尤佳。所谓北乡即今震泽、七都、八都、庙港一带。抗战前，开弦弓村的养蚕农户达到80%，估计1936年每户平均养蚕4.5张种，每张产茧30斤。

庙港虽以蚕丝为副业大宗，但解放以前栽桑并不多，养蚕所需的桑叶主要依靠浙江的乌镇、炉头、桐乡和吴县的洞庭山等提供。费孝通先生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在调研提纲中也提到了桑叶问题："解放前这里养蚕的桑叶绝大部分靠外地供应，解放后号

产桑地区养蚕，因此桑叶输入锐减，而本地桑叶产量又未增加，这就形成了养蚕缺叶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使最近养蚕张数还有减少的趋势。"[3]养蚕张数减少，桑叶产量跟不上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丝绸市场，特别是丝绸价格的变化。因此，我们要了解江村工业的兴衰之变不能不了解苏南蚕桑及丝绸业的曲折发展过程。

蚕桑及丝绸业宏观环境的变迁　蚕丝业是吴江经济的重要支柱，清人仲廷机在同治十三年所撰的《盛湖志》中就说："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4]从吴江全境来看，民国初年全县桑田 20 万亩，桑树 600 万株，养蚕户 21000 家，达到蚕桑业的极盛时期。[5]但到 1934 年，全县桑地减少到 9.8 万亩，产桑 78.4 万担，自给不足。[6]为了扭转颓势，1936 年 8 月，江苏省政府发布"训令"，以振兴蚕业，"凡适于蚕桑之区域，应各察酌地方情形，将所有可以垦植之地，先行劝导开辟苗圃培植桑苗。"省建设厅在 1935 年、1936 年连续两年向吴江颁发湖桑 2 万株和 3 万株，由县政府无偿配发给有关各区，但桑叶依靠外来的局面并未得到扭转。

丝绸产业销售面广量大，因此很早就与世界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而蚕丝业则直接受丝绸业影响。本世纪 20 年代，中国蚕丝业走向衰落，其原因较多，就其大者而言，有四方面。

首先是世界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掠夺和垄断。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有余力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在一度兴旺之后，开始趋向衰落，丝绸和蚕丝业也难以独善。1924 年 7 月，《新盛泽》报刊登了标题为《盛泽罪言》的文章，探讨盛泽丝绸业衰败的原因；20 年代，日本产的人造丝和蜡线大批进入中国，盛泽织物所用原料，人造丝和蜡线占了

85%，而天然丝仅占15%。《新盛泽》报愤怒地斥责道："近年来外货的充斥，日日吸收人民的脂膏，言之可怕。我中国人日常所用的，十有八九是洋货……大家试想一想，外国人经济侵略，不但是登堂入室，简直是与君共居。将来再反客为主，人民的生机在那里！"(7)

原因之二是国内战乱。1923年6月《新黎里》报有一署名"徐因时"的通讯说："盛泽以出绸著，曩昔之时，四方商贾之辇金至者，无虚日……近来国中战云迷漫，兵燹频仍，生涯乃大减色。故绸业中人，一闻奉直川粤等处战争发生，无不颦眉蹙额，忧形于色。"(8)1926年，湘鄂战争发生，9月，《新盛泽》报题为"盛泽区要闻"的报导中说："湘鄂战争发生，绸市深受影响，畅销长沙等地之华丝布，毛葛布等，竟无交易，价亦渐跌。"(9)国内如此不安定，经济如此凋敝，典当业、金融业和米业却分外兴旺。《新黎里》报1923年6月的通讯又说："营业最发达者，首推典当。米、钱两业亦不弱……数月来银楼竟多二处……其门面之装璜，钩心斗角，固不亚于苏沪。开张之日，顾客纷至沓来，几于户限为穿，其故何也。"(10)对于衰败的经济形势下钱商们却纷纷开张豪华气派的新银楼，作者深感迷惑不解。

原因之三是技术的落后。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阐述的：既然农村生产的生丝大部分出口，它就必须与西方纺织工业技术发展相适应。高度机械化了的纺织业要求生丝的粗细程度一致，断头现象必须减少到最少程度。而传统的手工缫丝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因而西方对中国丝的需求下降，造成生丝价格下跌。这仅是就缫丝这一行业而言。其实织造、印染、服装无不如此，因技术的落差而造成产品的滞销，带来产品价格下跌，最终形成全行业的不景气。

原因之四是丝绸生产、贸易中的恶行陋习和奸商盘剥。在丝绸的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产品信誉下降。华

丝布是盛泽人开发的新产品，销路很好，但对利润的过分追求却导致了产品质量日益低劣:“去年每疋有五丈足，而今年只剩四丈七八尺矣: 去年头行，大多四千或四千零，而今年起码只二千余矣; 去年则线细丝粗，故丝线匀净而贴切，今年则反是。如此偷天换日，而欲用者仍旧信用而欢迎，难矣!”(1924 年 7 月 11 日《新盛泽》报)。[11]1926 年《新黎里》报也刊载《整顿华丝布》一文，指出:“华丝布一项，为年来盛泽绸类中之最大畅销者，惟近有多数无知乡人，只贪近利，暗中渐将绸身减轻，以致出货渐有愈趋愈下之势,设不幸而再受淘汰,危险何堪设想。爰于一月十四日,由董商两会发起,邀集绸业中人,商酌整顿之法……”[12]丝行、绸庄和领(投)三业为盛泽丝绸贸易的三大支柱。丝绸两行是丝绸买卖的商行,又称“牙行”,而领投是丝绸买卖的中介人员，代估买估卖,是联结生产者、丝行、绸庄之间的桥梁,它与丝行、绸庄的区别是不面向客商，只在牙行和生产者之间活动。绸庄和领投业为了争夺利润，往往发生纠纷，甚至导致停市风潮。在倾轧争斗中,最倒霉的是广大零散机户了。抗战前夕,盛泽地区手工织机有 2 万多台，年产值占手工和电力织机总产值的 86%，毫无疑问，个体和小本经营的机户在盛泽丝织业中占了很大份额。这些机户“大绸每疋赚一二元，小绸每疋赚四五角。”[13]利润微薄，万一停市，亏本首当其冲的是机户。有的领投者还利用年关将届，机户求售心切，趁机杀价; 在绸市起落不定时，领投看准时机，压价收进、囤积居奇; 更有的领投利用机户与绸庄互不见面的空子，虚报帐目以图中饱，称之为“暗吃”或“吃码子”。[14]凡此种种，受害最深的还是机户。除了机户受害以外，蚕农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盘剥。1921 年《新盛泽》报有关于蚕农吴增荣夫妇因借高利贷养蚕，亏本后无法偿还而双双自尽的惨痛报导。还有一些奸商，用质量低劣的、过时的、带毒的蚕种冒充好蚕种出售给农民，使蚕农大受其害。这从 1928 到 1935 年间江苏省、吴

江县所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取缔伪劣蚕种、加强蚕种统制的训令、布告、公函中可以窥见当时假冒伪劣歪风之盛了。

解放前，吴江蚕桑业和丝绸工业一直在颠簸中生存。到1949年，全县仅有桑田7.25万亩，产茧2.15万担，年产丝织品393万米。解放以后，从1950年至1976年，丝织品产量一直在数百万米至一千多万米之间，1977年才突破2千万米。桑田面积则略有下降，从解放初的7万多亩下降到六七十年代的5~6万亩之间。蚕茧总产稍有变化，最低的1962年、1963年只有8000多担，从解放初到1967年，大部分年份产量都在二、三万担之间，直至1968年才突破4万担。[15]80年代改革开放，丝绸业又一次焕发了生机。1984年，全县部分地区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粮田改桑田，桑田从5万多亩增加到7万多亩，1988年又增加到9万多亩，到1993年，桑田面积已达到112000多亩，蚕茧产量也达到了24.8万担，年产白厂丝1822吨，真丝绸5338万米。[16]

从吴江蚕桑业和丝绸业的发展史来看，蚕桑业的发展完全依赖丝绸业的发展，而丝绸业的发展则视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定。江村的工业经济发源于蚕桑业，兴盛于丝绸业，其兴衰转换的进程，也离不开吴江丝绸业发展的大背景，也脱不了吴江丝绸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我们了解研究江村工业必须知道的。

江苏女子蚕业学校的蚕丝改良运动　关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在开弦弓村的蚕丝改良运动，其起因、动力及效果《江村经济》已经有详细的阐述。这里只是根据这场改良运动的组织和参与者之一——开弦弓小学校长陈杏荪1930年在《合作月刊》上发表的论文大致交待一下这一运动的全过程。[17]

1923年，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先生鉴于我国蚕业日见衰落，提倡改良蚕丝业，在学校增设推广部，出外巡回演

讲，推广新技术。这一年冬天，郑辟疆与费达生、胡咏絮等来开弦弓村演讲。当时的震泽市亦委托郑先生建立育蚕指导所，震泽与女蚕校联合办所，地点定在开弦弓村，定名为吴江县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由陈杏荪召集历年育蚕失败的蚕户20家，连同陈杏荪自己共21家，于1924年春，在费达生等指导下从事育蚕改进试验，并且由女蚕校购进干茧及木制足踏缫丝车十架，招年轻女练习生十名，传习制丝。这一年育蚕成绩极佳，最差的也有八分收成。木车缫制的改良丝，经推广部评定等级后，由女蚕校代销无锡绸厂。

1925年春，因相信育蚕改良的农户渐多，改进社添置蒸气消毒灶一座，因经费紧缺，经各家商量决定，凡购种的蚕户，每张种捐助蚕业改进费5分。这一个秋季，又派了十多名练习生去浒墅关女蚕校实习制丝法。冬天，震泽丝业公会创办制丝练习所，开弦弓村又派遣人员分批学习，到1926年春为止，共有70多人参加学习。

1926年春，建筑蚕室八间，另租民房办蚕室二处，蚕户添购足踏缫丝车70部，用木制烘箱杀蛹。出改良丝八担，经郑辟疆介绍，售于上海纬成公司，丝价特高，最高者每百两得净洋81元，全村蚕户为之轰动。

1928年，继续缫制改良丝，但产量锐减，仅八担多。这一年，丝市更加疲软，到年底才出售给上海锦云绸厂，平均价仅每百两60余元。经丝业专家评鉴，木车制丝，断头太多，而各家规格不同，虽然生产中有指导员经常察看检查，但一起出售的时候，难以统一规格。所以必须进一步改良缫丝生产。于是由郑辟疆、费达生规划经营，协助筹办，由孙伯和、施文卿、费璞庵接洽借款，由陈杏荪等招集人员，几天后愿意赞助出资的400余户，共计700余股。

1929年春，招收社员中善制改良丝的60余人，由县立蚕桑

场派员训练两个月。3 月份，建双灶六座；四五月份，建房屋30余间，全村蚕户自动组织蚕室八处。配备机器设备，共计日式缫丝车 32 部，复摇车 16 部，全部设备投入 21000 余元。八月初五正式开车。

1930 年春，添置日本绪式缫丝车八部，复摇车十部，每日出丝量约 25 斤。但欧洲销路一蹶不振，丝厂无力支持，合作社前途可忧。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说，“我们的试验直到 1935 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之后才证明是成功的。这种机器是由日本最新型机器修改而成。我们用它生产出中国最好的生丝。1935 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上述提到的“试验”，是指“设计一个要能实现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一切有利条件的工厂。这个工厂同时又不宜太大，要能办在农村里，用当地的劳力和由当地供应的原料。”(18)

沦陷时期的开弦弓丝厂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吴江于是年 11 月全境沦陷。据《吴江丝绸志》载：“沦陷期间，丝茧价格惨落，农民育蚕无利可图，任令桑园荒芜，茧产量锐减，各蚕业合作社全部停业。开弦弓丝厂曾短期（约二、三个月）被迫为湖匪抢掠的蚕茧代缫。后日寇下乡时曾驻军于该厂内，村民怕受骚扰，乃自毁厂房。”(19)《江苏女蚕校对蚕丝业改进的事迹纪要》则进一步说明：“开弦弓丝厂虽未焚炸，而其机器悉被盗卖，其房屋则由蚕农愤而自行拆去。敌伪之残酷如是。”(20)费孝通先生在 1957 年重访江村以后，在《关于开弦弓村农副业经营的一些情况和意见》中他说到这一情况：“抗战头一两年合作丝厂还间或开工。1939 年就完全停工，1941 年被拆毁（机器被日寇拆去，房子由地主拆下卖掉）。”(21)这不但说出了厂房被拆的年份，还在拆房人的身份上与前两种说法不同。沈关宝所著的《一场悄悄的革命》则详述了这一事件：“许多老年村民都证实了下面这位目击者

的叙述:'1938 年的冬天……有一天一队日本兵住进了丝厂。厂里的妇女们事先得到消息，都吓得逃走了。日本兵在厂里住了二十来天，村上遭了大难。队伍撤走时，日本人还把厂里铜、铁器从机器上敲下来带走，锅炉也被卸下拖到震泽。日本兵一走村里人都去向厂里的负责人央求拆厂，因为机器都坏得不能用了，空留着厂房日本兵还会再来。于是在第二年初春，入股的社员一起动手，在一个晚上拆完了厂房。拆厂时大家讲定每一股可分到40元钱，但那时的钞票已经像纸头一样不值钱了。我家有两股，应得80元，可拆厂时乱糟糟，谁也顾不了。后来说现钱已经分光了，要我把拆下来的奠基石拿回去抵钱。丝厂就这样被拆成了平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开弦弓生丝合作社又恢复运作，社员达到399人，共认股30300股（每股10元），但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结束，合作社也告解散。

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所提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它是中国农村首家使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村办企业。它为农村发展现代工业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实例，费孝通先生因此提出了"恢复农村企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23]这一正确的结论。它实际上是二十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的先行者。

其次，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经验。由拥有现代新技术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中去，通过合作组织这个联结体，与农民组成新型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工业摆脱传统的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集约化生产过渡成为可能。

其三，由于生丝合作社的诞生，使当地农民中第一次出现了

一个拿工资的阶层，由于这个阶层不同于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因此在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刻，工业生产对农民生活改善所起的明显作用，企业可以办在农民家门口而不必进入城市同样可以发展——这些事实使千百年来留恋土地的传统观念出现了裂痕，而新的观念则在悄悄地萌动。

其四，合作社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不够成熟，其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农民搞工业化生产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90 年代在乡镇企业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在组织与分配方式上，与合作社有很多相似之处。

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有益的教训：一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决不是独立的，它与宏观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安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和优良的政策环境，以及适宜的人文、地理条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因素。二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必须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基础，在一个教育水平很低的地区，很难形成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群体。三是丝绸这类与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的产业，在其初级阶段如果缺乏国家的有力保护，必然要被强大的跨国先进工业集团所吞噬。

二

庙港工业概述　庙港的工业起源于江村。郑辟疆、费达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开弦弓村开展的蚕丝改良和制丝合作运动，播下了庙港工业化的种子。解放后，1968 年，在开弦弓村恢复了缫丝厂。70 年代，庙港又办了窑厂、蔬菜厂。80 年代，以蔬菜厂为基础，创办了酒厂、蜜饯厂。此后，乡镇工业逐步兴起，化工、铸件等企业在庙港立足，丝织企业逐步增多。到 1989 年，庙港工业形成五大块：一是以缫丝、织绸、服装为主的丝绸

业；二是以香料、医药中间体、染料中间体、建筑涂料为主的化工业；三是以小机械、铸件、锻造为主的轻工业；四是以蜜饯、酿酒、蔬菜加工为主的食品加工业；五是电子元件及其他零星小企业。但都是低水平、小规模。90年代，一些企业逐步扩大，至今，镇办企业有13家，形成了丝绸、化工、锻造、机械、水泥制品五个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从镇办企业的产值来看，1994年达到4.83亿元（现行价），其中丝绸占58.71%，化工占7.09%，锻造占16.54%，机械占7.36%，水泥制品占7.56%，其他占2.72%。丝绸业不光产值占一半以上，效益也占一半以上。村办企业有32家，其中丝织企业17家，食品企业6家，机械企业3家，五金电器企业4家，此外还有冶铸、油桶、包装、羊毛衫、花炮、玻配、建材、皮鞋等企业。从经济总量上看，1994年完成产值2.26亿元（现行价），其中丝织占58.78%，食品占8.7%，五金电器占6.57%，机械占3.37%，其他占22.58%。在21个行政村中，开弦弓村的工业总量还是位居第一，1994年产值为1532万元，效益也居各村之首。

到1994年末，全镇两级工业总资产为2.66亿元，固定资产1.25亿元，实现经济效益（工税利留）8800万元，利润3860万元，职工人均收入4000元。

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

一、依托蚕桑，发展丝织业，并以丝织业为基础，逐步向其他工业领域拓展。自1968年恢复缫丝厂以来，庙港的农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丝织业作为自己发展工业的主攻方向，这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蚕桑资源为依托，搞丝织可说是水到渠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丝织厂如雨后春笋，至今丝织企业在全镇占绝对优势，并且形成了缫丝、织绸、服装一条龙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又逐步开发了冰箱配件、医药和染料中间体这两大新产品，改善了行业和产品结构。

二、从低水平、小规模经营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发展，形成了三根支柱。以江苏金蜂集团为主，与新联丝织分厂、中大服装公司，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丝绸生产体系，这是第一根支柱，吴江金帆集团为首的化工企业是庙港工业的第二根支柱。吴江冰配二厂和制冷设备厂则形成了庙港工业的第三根支柱。这三块的经济总量占庙港两级工业的47%以上。

三、重视科技进步，重视科学管理。庙港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远离大城市。因此，发展工业的人才、技术都比较缺乏。引进人才，引进技术成了发展庙港工业的重点措施，凡是发展较快的企业都在这方面下了功夫。金蜂集团把杨志超等制丝专家请到厂担任技术指导，进行质量层层把关；金帆集团从上海等大城市聘请了10多名技术人员；冰配厂和制冷厂则直接与上海大企业联营，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改造方面，金蜂集团遥遥领先，企业先后引进了自动缫丝机、汽流纺纱机、电脑绣花机等先进生产设备，与此同时，致力于提高职工素质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较好地实现了引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和产出。

四、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多年来，庙港的历任领导坚持把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庙港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庙港工业的集体成分占绝对优势，集体工业相当稳固。

毋庸讳言，庙港的工业经济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规模化、集约化还不够，金蜂集团一枝独秀，其他企业的规模还比较小，固定资产都在千万元以下。其次是投入偏少。这几年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总量还不大。其三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丝绸占了大头，化工、机械、食品等工业相对弱小。

新丝厂的创办及发展　自从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丝厂在1938年被拆毁以后，该村的家庭蚕丝业便全面恢复，但全村的蚕茧产量锐减，1956年全村产茧仅367担，只占1936年的66%。建国初期，由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蚕茧也属于计

划收购的物资，由中丝公司收购以后调拨给各城市缫丝厂。因此，直至1968年新丝厂建立，一直维持农村只事养蚕，城市缫丝加工的分工格局。

1967年，由村（当时叫大队）干部牵头，联络周边的五个大队，联合筹办新丝厂。限于集体资金紧张，采用认股集资的办法，由各大队自报认股，凑了27300元钱，盖起了5间平房，收集了12部脚踏丝车，招收了65名职工，在1968年5月正式开工投产。1968年至1969年，丝厂共产丝3.75吨，利润5600元。

1972年，缫丝厂由村联办改为乡办，当年产量1.84吨，亏损500元。

1976年，产丝6.5吨，质量等级2A.16，利润1.3万元。

1980年，产丝19.3吨，质量等级2A.83，利润12.38万元。

1990年，产丝118.21吨，产丝绸148万米，利税320.45万元。

1993年，丝厂成为江苏省金蜂集团，生产的项目已经从缫丝扩展到汽流纺纱、织绸、服装等，年产值达到9522万元，固定资产2642万元，缫丝机达到5600绪，其中自动缫3200绪，织机176台，汽流纺纱机800锭；年产厂丝160吨，绸264万米，绀丝286吨；利税达到1085万元，出口创汇275万美元。

1994年，企业又增加了5台电脑绣花机，气流纺纱机1200锭，产值达到2.12亿元，固定资产3600万元，利税1206.45万元，出口创汇306万美元。白丝厂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该年出口法国的生丝达到6A一档，受到省丝绸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通报表扬。

金蜂集团的发展也是曲折的（见附表）。从办厂到现在的20多年历史中，前十年发展不快，经济效益低，产品质量差。主要

原因是职工文化水平低，技术素质差，基础管理没有抓好，1982年甚至面临停工整顿的危机。从1983年开始，厂里开始认真地抓了几项关键性工作。首先是抓技术骨干力量的培训，分批把年轻有文化肯钻研的职工送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培训，并请专家来企业现场指导和操作示范。其次，针对全厂职工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开展文化补习，配备了几名专兼职教师。经过一段时间补习，提高了职工的文化素质。其三，从1983年开始，请进三名技术高超的制丝行家，从各个生产环节上传授技术。掀起了全厂性的学技术热潮，并且把技术高低同工资相挂钩，使职工技术素质大为提高。自1987年以来，生丝质量连续八年荣获全省行业评比第一。下表是该厂在缫丝上的各项技经指标变化：

年份	质量	正品率	效益(万元)	缫折	增收(万元)
82	A67	67	33	285	
83	2A23	82	47	267	14
84	3A17	95	62	264	15
85	3A27	100	83.5	258	21.5
86	3A27	98	141	259	57.5
87	3A67	99.5	192	270	51
88	3A27	99.6	207	268	15
89	3A79	99.6	312	270	105
90	4A09	99.8	540	274	228
91	3A85	100	972	283	432.4
92	3A70	100	1011.18	284	38.78
93	4A05	100	1057.39	287	46.21
94	4A11	100	1096.4	289	39.01

江村集体工业　应该说，新丝厂（即金蜂集团）自从1972年划归乡办后，经济上对开弦弓村的发展作用已经不大，而真正使村里受益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创办的村丝织厂、与新民丝织厂联营的丝织厂及村酒厂这三个企业。村丝织厂创办于1977年，当时由红卫大队集资40万元开办，是庙港首家村办厂。次年，立

附表：　　江苏金蜂集团发展概况表

项目 / 年份	产值（万元）	利税（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年购茧（吨）	其中本值（吨）	设备					出口创汇（万美元）	出口丝织品			人均年收入（元）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职工人数	主要产品产量		
						缫丝机（绪）	其中自动缫（绪）	织机（台）	汽流纺纱机（锭）	电绣机（台）		白厂丝（吨）	绸（万米）	丝（吨）				白厂丝（吨）	丝绸（万米）	丝（吨）
1968			2.5			12														
1969	5.6	0.56	2.5			12									180	1333	42	3.75		
1980	81	21.53	13.6	51.7	51.7	800									516	4826	168	19.3		
1984	156.62	26.54	50.03	106.66	67.26	1600									946	5594	280	36.42		
1988	415.71	181.91	195	264.1	264.1	3200									2638	7670	542	95		
1989	479.56	238.28	310	270.4	270.4	3200		50							2710	8980	534	100		
1990	1850	320.45	475	314.25	314.25	4000	800	108							2965	30480	607	118.21	148	
1991	2140.66	371.65	512	345	345	4800	1600	108							2961	29486	726	122	156	
1992	3526	734.32	950	470.5	470.5	5600	2400	176	400		115	30	50		3022	44075	780	171.15	255	
1993	9522	1085	2642.86	454	454	5600	3200	176	800		275	50	180	50	3750	67676	1407	160	264	280
1994	21276	1206.45	3600	432.44	351.96	5600	3200	280	1200	5	306	60	200	120	4100	142693	1491	152	338	520

新大队集资 20 万元，创办了立新丝织厂。1982 年，红卫、立新两个大队合并为开弦弓村，两个丝织厂合并为江村丝织厂。1986 年，村里与盛泽新民丝织厂联营，办起了开弦弓新民丝织厂分厂，总投资 105 万元。酒厂亦创办于 80 年代初。这三个企业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到 1990 年，全村亏损 40 万元，1991 年有了转机，联营厂获利 20 多万元，自办织厂获利 80 多万，但酒厂仍亏损 15 万。1992 年自办织厂盈利 120 多万，联营厂盈利 40 万，酒厂盈利 5 万。这一年 3 月，原村办丝织厂厂长沈志荣调任村党总支书记，他在 1993 年把原来一直亏本的酒厂一分为三，一部分厂房办蜜饯厂；一部分厂房和设备与洪泽湖农场酒厂合作，为该厂生产的"醉蟹"白酒装瓶，销往杭州；还有一部分厂房办小化工厂，花 7 万元购买技术专利，利用龙虾壳，生产医药工业需要的絮凝剂。1993 年，村办工业盈利 180 万，有固定资产 632 万元。1994 年，村办工业盈利 212 万。是年，与台商合资，投资 250 万元（其中台商占 30%），成立吴江市乾皇化工有限公司，试着从银杏叶中提炼黄酮、黄酮甙及内酯等。这些产品主要用于药品、食品、化妆品的生产。现在该厂每天能产出 3 公斤黄酮甙。

总之，开弦弓村集体工业现在的规模，产值达到 2500 万元，固定资产 800 多万元，利润 200 多万元，职工人均收入 4270 元。

江村私营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开弦弓村也出现了少数农民自办的私营工业作坊。其中最有成效的当推周玉官电子元器件作坊。他与父亲合作，雇了几名工人，1988 年的销售额就达 20 万元。但作坊的生意时好时坏，1990 年因产品滞销而停工，周玉官到河南开封去开了一爿服装店，但蚀了本。1991 年形势稍好，恢复电子元器件生产，他也改变了原来的管理方法，将原料发给工人，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加工产品。同时，在盛泽东方丝绸

市场设立了一个经营部，与几家大的丝织厂建立业务联系，贩运白厂丝。1992 年，周玉官又回到村里经营电子元器件作坊，与父亲、丈人合作，改外发加工为厂内生产，雇了三个河南青年，是年产值 30 万元，向国家纳税 1 万元，发给工人工资 2 万元。1993 年，他参照外国产品，自行设计、自行试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民用报警器，雇佣工人已增加到 20 人。1994 年产值达到 100 万元。

印刷作坊主周金明，一家五口，父母、妻女，他本人是教师。1986 年开始在家里搞印刷，有两台八开圆盘机，主要承接印表册、名片、信封，信纸之类，业务多的时候也雇一二名工人。1990 年交税 2000 元，家庭净收入 4500 元（圆盘机收入）。

此外，还有代人锯木料的 2 户，为丝织厂加工零配件的 2 户，家里安了车床，为附近工厂加工零件的 2 户，前 2 户产生于 80 年代后期，后 4 户出现于 1993 年。

这些私营工业除周玉官已形成企业，其他都处于私人小作坊的阶段，没有市场竞争力。

企业经济责任制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和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它大大加快了企业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既是一种经济分配制度，又是一种经济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源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包”字概括了这种制度的精神实质。在 80 年代，企业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指企业的承包责任制。承包制又有“内包”和“外包”之分，内包是指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管理人员、职工下达的承包责任指标和分配办法，外包是指乡镇、村或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下达的承包责任指标和分配办法。这种承包制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就外包而言，以后又陆续出现了租赁承包、风险抵押承包、“一脚踢”承包等集体经济色彩较淡的承包形式，在这里，我们研究的是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外包。

庙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 年至 1983 年，为责任制酝酿阶段，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承包形式。第二阶段，1984 年至 1988 年，为责任制形成阶段，乡镇对企业实施的责任制有两种形式，一是超利分成，即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年初确定一个利润承包基数和超利分成比例，年终根据企业完成情况进行分配。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合产供销比较稳定的企业。二是工资含量责任制，即以当年净收入（实现利润+计税工资+税金）乘以当年工资含量参数得出当年应发工资总额，工资含量参数的计算公式为：

$$\text{工资含量} = \frac{\text{实发工资总额}}{\text{承包利润} + \text{计税工资} + \text{税金}} \times 100\%$$

第三阶段，1989 年至今，为责任制的完善发展阶段，学习铜罗镇的“生产要素承包，资产滚动增值”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先进经验，结合庙港的实际情况，包定基数，核定报酬，规定上交。产值、效益、税利的指标均以上年实绩为基数每年分别提高 30%-20%，承包利润指标参照前三年全部资产的创利水平、自有流动资金创利水平、人均创利水平以及同行业创效益水平和发展后劲来确定。这种责任制的核心是所谓“四率创利”，“四率”即固定资产创利率，自有流动资产创利率，借入资金创利率和人均创利率。这四项都是一定三年不变。每年通过对以上这些主要指标考核，来确定企业的分配水平。此外，对有些企业，还可以实行股份制或租赁制及产权转让等经营形式。但目前镇级企业全部实行集体承包，村级企业有 25%左右为租赁承包（1996 年达 50%），还有少量实行股份合作制。

对责任制的监督审计由镇经济管理办公室执行，一般财务审计每季一次，全面审计半年一次。每年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承包指标作适当的调节。

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责任制已日趋完善，从 80 年代的

考核效益为主发展到90年代的考核效益、资产为主，这是一大进步。在责任考核中强化资产的保值增值率，促使企业不断注重培养自身实力，扩大规模，以加快企业的现代化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累机制薄弱而造成企业虚盈实亏或自身实力滞长的弊病。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提高企业活力，促进企业职工积极性的基本制度，它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承包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和扩大。

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双方，一方是乡镇或村，也可以是某个主管部门，他们是代表拥有集体资产所有权那一方的，另一方是企业的法人代表，他对集体资产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当双方订立承包合同时，既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又是上下级关系。所以，乡镇、村或主管部门，对厂长有任免权。在这种经济合作与行政授权双重性质的作用下，承包人的心态相当微妙。他既有承包者对企业一切事务指挥领导的权利，又有强大的政府力量作为依靠，没有了个体或私营承包者那种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的畏惧心理，同时，他认为自己是在为集体服务，对于企业前途，集体应当与他分担有关责任。这种心态，从积极的方面讲，有利于承包者大胆地开展工作，促使企业尽快发展；从消极的方面讲，难以强化承包者对企业的责任心，企业的失败不会使承包者的全部利益受到损害，当承包失败，在承包期满后，只要没有明显的贪污、渎职罪行，承包人可以一走了之，在发包者信任的情况下，只要承包人愿意，他可以继续承包。当承包人在承包期间取得较大成绩时，发包人对承包人的信任度增长；企业的实力提高，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承包人对发包人的依赖程度减弱，而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却在增加，承包人的权力膨胀，有时合同的约束力形同虚设，发

包人控制承包人的办法往往要靠个人感情，“拍肩胛”办事情，这时候承包人已经“老板化”了。

随着承包人的“老板化”，企业的家族化也越来越严重。承包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强化权力，就设法把自己的亲族好友安插在企业的重要岗位上。企业的家族化严重地削弱了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侵犯了集体利益，导致腐败的滋生，挫伤职工的积极性。

还有一些企业厂长利用自己专权独断的优势，弄虚作假，导致公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如造假帐，制造假亏损现象，逃避上交，也有的实际亏损而制造盈利现象，达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的；有的滥用“厂长基金”，伺机侵吞集体资产；有的与个体户交易，不开增值税发票，偷税漏税，等等。

由于刺激承包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承包人的个人收入，因此，当承包人的个人收入低于某些私营企业或个体户时，有的承包人往往想退出承包或确实退出承包。有的发包人为了拉住承包人，就大幅度提高对承包人的物质奖励，极大地拉开了企业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挫伤了职工积极性。

为什么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弊病会越来越大？在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初期，由于这种制度确实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端，减少了上级部门的行政干预，提高了经营者的工作积极性，所以，企业在一个时期内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承包人已经洞悉承包制中的各种漏洞和薄弱点，对于一个思想境界并不高尚而又求利心切的精明的经营者，他完全可以利用制度中的一切弱点来为自己服务。同时，我们的监督机制又很不健全，我们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就给一切投机钻营者以可乘之机。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包者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不是浑然一体、休戚相关的，往往是企业衰败了，而承包者却捞足了。这实际上说

明了承包责任制并没有使承包者真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责任制有时等于一纸空文。

承包责任制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或领域，而是带有普遍性的。今后，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这种制度还是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这需要经济学界和广大的企业管理者一起探索。

庙港工业复兴的启示　庙港工业自本世纪20年代发轫，因日军入侵而中辍。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农业以粮为纲，农村工业难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全面展开，苏南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庙港工业才真正走上了复兴之路。

庙港工业的复兴，既有苏南乡镇工业发展的共性因素，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因素。

从共性因素来看，庙港农民与广大苏南农民一样，有一股内在的冲动力量。这种冲动力量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反拨。长期以来，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难以缩小；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以此作为城市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和城市居民生活的福利补贴，使农民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分配收入上不去，生活富不起来，使农民产生强烈的致富欲望。加上苏南发展乡镇工业的条件十分优越，靠江沿海，周围城市密集，交通发达，水陆通畅，农副产品丰富，传统工业有基础，文化素质较高，能工巧匠尤多。所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除了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禁锢，开启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闸门”，为乡镇企业的产生、发

展营造了比较优越的政策环境。由此可见，苏南乡镇工业在8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是合乎自然的，庙港工业也不例外。

庙港工业的复兴，除了以上的共性因素外，还有其个性因素。这个个性因素就是庙港特有的基础。首先是产业基础。吴江是丝绸之乡，庙港农民也早有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传统，太湖小气候所形成的优越环境，使这一地区所产的"辑里丝"享誉中外。所以，庙港工业依托蚕桑，突破丝绸，是顺理成章的。其次是技术基础。由郑辟疆、费达生等人在开弦弓村进行的蚕桑技术改良运动和创办的生丝合作社，使当时比较先进的育蚕技术和缫丝技术在开弦弓村扎了根，即使后来丝厂关闭，蚕桑业衰颓，但有技术的农民还在。费孝通二访江村时，就了解到被苏州丝厂招去了40多个工人，但是还有60多个有技术的妇女，没有机会进厂。其三是心理基础。庙港农民对于自己办工业并不陌生，他们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要求。费孝通在二访江村时注意到，村里的农民对30年代创办的小型合作丝厂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太多了。"[24]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因此，庙港农民对于自己办企业，有一种深刻的眷恋和向往，一旦气候适宜，必然迅速崛起。

（吴江市委政策研究室　倪　明）

注：

(1)《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页.

(2)《吴江丝绸志》(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 第36页.

(3) 吴江市档案馆档案.

(4)《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5页.

(5)《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实业行政报告书》第二编)第17页.

(6)《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60页.(《吴江县政》第二卷)

(7)《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0页.

(8)《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58页.

(9)《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59页.

(10)《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58页.

(11)《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7页.

(12)《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2页.

(13)《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9页.

(14)《吴江丝绸志》，第361页.(《吴江丝绸志·丝绸贸易》)

(15)《吴江县三十一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第67页～68页.

(16)《吴江统计年鉴》1984年版、1988年版、1993年版.

(17)《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05页～209页.

(18)《江村经济》第155页.

(19)《吴江丝绸志》第61页.

(20)《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15页.

(21) 吴江市档案馆档案.

(22)《江村经济》第202页.

(23)《费孝通选集》第186页.

参考资料

1.《江村经济》　费孝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86年版）

2.《费孝通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88年版

3.《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　吴江县档案局、江苏省社科院经济史课题组编

4.《吴江丝绸志》　吴江市丝绸公司编　周德华主笔

5.《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　沈关宝著

6.《江苏社会科学》91/2、92/3、93/2、94/2

7. 吴江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2001、年代号9、案卷号48

8.《江村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王淮冰编

9.《吴江县志》　1994年版

10.《吴江统计年鉴》　吴江市统计局编

11.《吴江县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　吴江县计划委员会编

12.《吴江县地名录》　吴江县地名委员会编

商　业

以种桑养蚕捕鱼而驰名的庙港，千百年来其商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镇镇村两级工业和农副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庙（港）—震（泽）公路和环太湖公路的建成通车，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庙港镇的商业在参与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令人欣喜的成绩。

一

早期的商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勿及小小湖塘。”在太湖南沿一带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所谓“湖塘”，即指太湖南沿72港。这72条港中最有名气的是大庙港（现称庙港），统辖着其中的46条港。庙港的河面宽度、河床深度均为太湖南沿72港之最，历来为太湖南北水上交通、湖区渔船集散避风的主要港口。庙港，原本无此地名，后因近处诸港累年建造了永宁寺、诸葛亮庙（土地庙）、观音庙、老太庙、圣堂庙、张老太庙、濮家庙、西方庵、北盛庙、中善庙等庙宇，而以处于此地的太湖神庙为最大，遂即以大庙为港名。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从南北朝以来，长江流域信奉佛教颇盛，每逢节日，到庙宇里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平日里，庙宇内香火也不断，庙港拥有周围诸港中最大的庙宇，前来进香的人自当不少。大凡进出人多的地方，其商品流通必然比较活跃，庙港也不例外。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写道：“（庙港）镇附近有一座太湖神庙，

镇由此而得名。人们去庙宇的时候，通常在这个镇里购买物品。”当然，尽管太湖南沿一带，唐代以前已有庐舍村落，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曾写有描述当地蚕渔生产情况的诗篇，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庙港地区长期处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因此其流通的商品品种不多，流通的商品规模也是相当小的。

前清时，庙港设有水军防卡。本世纪初以来，庙港一直为基层行政机构设置地，民国时为国民党吴江二十一分部和区公所驻地，日寇入侵时为日军据点。解放初为大庙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辖今七都、庙港、横扇三镇和菀坪镇王焰村以西地区，沿湖30余公里）。近代，庙港商业由于物产丰阜（除了蚕丝业、渔业外，养殖业、种植业也较为发达，养羊乃当地传统副业，年产湖羊羔皮在一万张以上，大头菜、小黄瓜、百合等农产品也有较大的生产量），加上为太湖南沿72港之最和一直是基层行政机构设置地。因此，随着吴江全县米、丝、绸“三市”的发展和洋油、洋烟、洋烛、洋皂、洋火等“洋货”倾销本地市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军阀的连年混战，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且不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生产被破坏，通货急剧膨胀，至解放前夕，庙港各业凋敝，市场萧条。

在近代庙港商业中，值得一提的是供销社商业发展较早，且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本世纪20年代，费孝通教授的姐姐费达生女士，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为了振兴蚕丝事业，来到开弦弓村设立了蚕桑技术指导所，后于民国17年（1928年），成立了全县供销合作事业中的最早组织——“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宣传推广新技术，对古老的蚕丝事业进行了改革，并在促进生丝的运

销上作了不少努力。民国35年（1946年），吴江县成立了"江苏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吴江供销站"，次年10月设立了吴江县供销合作联合社，全县下有各类合作社188个，但至解放前夕，大多数社有名无实，有经营能力的仅11个，即同里、黎里、平望、盛泽、震泽、严墓办事处和八坼、庙港、陆港、马港合作社，以及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令人注目的是这11个社中，庙港地区占了3个（除庙港合作社和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外，尚有陆港合作社）。

二

现代商业 1949年4月下旬，庙港解放，当年6月建立了人民政权——吴江县大庙区庙港乡人民政府。庙港乡人民政府一建立，即领导组织社会各界尽快恢复经济，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贯彻上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教育私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进一步调动了私营商业的经营积极性。供销社商业，1950年3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接收了由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10月设立的"吴江县供销合作联合社"，同年11月在芦墟设立供应站，继之发展成立芦墟供销合作社，进而，对包括庙港合作社、陆港合作社、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内的11个旧合作社进行整理，建立了14个基层供销合作社。于此，庙港供销合作社应运而生了。庙港供销社成立之初各方面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固定资产少得可怜，社员用木板、凳椅搭成营业摊点，进货由肩挑至震泽、横扇挑回百货、花纱布、食盐、糖烟酒等商品。收购方面，设置简陋的采购站，向周围农民收购小湖羊皮、

蔬菜等农副产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庙港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并形成了供销社商业、个体商业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体系。

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国家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棉布、油料等商品由国家统购统销。1955年起，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庙港批准40余户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约70人），组成合作商店8个（含自负盈亏小组）。县合作总社于1954年7月更名为"吴江县供销合作社"，同年10月实行以区建社，全县共建9个区社，庙港以大庙区的身份保留、发展了供销合作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庙港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30余万元，农副产品收购额达到10余万元，供销社、合作商业机构增至13个，进一步发挥了商品的集散作用。

"大跃进"时期（1958—1960），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犯了浮夸、瞎指挥、盲目升级过渡等错误，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商业部门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庙港也不例外。1958年4月，县商业局、供销社合署办公，合作商店（小组）由基层供销社统一管理。1956年对私营商业改造后，庙港尚有小商小贩6户，从业人员9人，1958年全部纳入了人民公社供销部。这一时期，不仅一度副食品销售稀少，工业品供应紧张，而且砍掉了不少商业网点，流通渠道单一，商品购销呆滞。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系统地总结了商业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商业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方针政策，并对商业工作的各项重要原则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1962年6月县里恢复商业局、供销社建制，庙港商业机构通过调整，亦恢复

至 12 个。通过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并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改进工业品经营方式，庙港市场再度出现繁荣景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流通理论和经济政策遭到破坏，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庙港商业，除供销社、合作商业受到很大冲击外，个体商业则遭绝迹。在恶劣的大环境里，庙港商业广大干部职工仍然坚守岗位，辛勤工作，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维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努力。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庙港商业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1979 年 8 月，县商业局、供销合作社再次分设。1983 年 7 月，县供销合作社更名为“吴江县供销合作联社”，成为社员的经济联合体。1984 年，庙港供销社拥有生活资料商店、生产资料商店、采购站、五金商店、批发部、贸易货栈等企业，经营人员 88 人，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46.64 万元，年末房屋建筑面积 3857 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 1076 平方米，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 520.42 万元。全县合作商店，1979 年改称集体商店，一方面划小核算单位，一方面增设供应网点。1984 年，改变国营商业、供销社归口管理集体商业的办法，于此，庙港建立了集体商业公司，统管全乡集体商业，在政治待遇、货源安排、经营管理等方面与国营、供销商业处于平等地位，不仅起到了社会主义商业市场的辅助作用，而且充分发挥了灵活经营的积极性。是年，庙港集体商业公司拥有什货一店、什货二店、医药、五金、文百等 17 个企业，经营人员 173 人，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14 余万元，年末房屋建筑面积 1026 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 640 平方米，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 139.37 万元。在供销社、集体商业公司蓬勃发

展的同时，庙港流通领域中的其他经济成份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1985 年起，乡办、村办企业纷纷办起了集体商业。个体商业，经 80 年代初开始发展，至 1984 年底，商业、饮服个体户有 41 户，从业人员 60 余人。另食品站、水产站、粮管所等县公司（局）的延伸企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此外，集市贸易恢复后，得到长足的发展，1984 年，全年成交额达 73 万元。据 1984 年江苏省小城镇调查统计，庙港是年从事商业的总人数达 368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820.98 万元。

1986 年起，庙港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

拓宽流通渠道，把产品直接推向市场特别是直接推向城市市场。在这方面上，"庙港雪里蕻"可算是一个典型。雪里蕻，俗称雪菜，是芥菜类中叶用芥菜的一个变种，适合于腌制咸菜。庙港地处太湖之滨，土地肥沃，种植雪里蕻是当地的一项传统副业，基本上村村都种植雪里蕻，以五联村和罗港村为多，尤以五联村为最多，腌制雪里蕻也主要是这两个村，其他村则充当原料供应地的角色。五联村有 370 余户农户，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该村农民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面向市场，发展雪里蕻生产。他们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不断想方设法扩种雪里蕻。目前，年种植面积达 650 亩左右，其中春天种的一茬，约为 350 亩（包括一半左右的套种面积），秋天种的一茬，约为 300 亩左右，加上从各村运进来的，全年腌制雪里蕻达 300 万公斤左右，从事这一副业的农户达 250 户左右。说起腌制咸菜，人们自然会想到缸与瓮，可这些东西在五联村派不了什么用场。当地农户腌菜采用的是挖地窖的办法。地窖有泥窖（窖挖好后，用塑料薄膜等物与泥土隔开）和水泥窖（用水泥浇灌而成）两种。每只地窖可腌菜 2000 公斤至 2500 公斤。据统计，五联村近年来，每年腌制的咸雪菜达 220 余万公斤。有人不禁要问，庙港光一个五

联村就腌了这么多的咸菜，可卖得掉否？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该村农民从前些年起，从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改变肩挑零卖的销售老习惯，把目光投向市镇和城市市场。目前，全村200多户农户不仅在本市各镇，而且在无锡、常州、苏州、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农贸市场上固定设摊销售咸雪菜。据了解，无锡农贸市场上的咸雪菜摊点，60%～70%是由庙港五联、罗港村的人所设。庙港咸雪菜的销路为何这么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质量好，不仅色香俱佳，而且味道特美，将之与冬笋合炒一道"炒雪冬"，或将之与黑鱼片混掺一盆"雪菜黑鱼汤"，均会令人食欲大增。据说，无锡不少女性市民，一餐没有庙港的咸雪菜，便不进食。庙港雪里蕻给人们带来了美味，也给庙港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五联村上一户陶姓农户和一户潘姓农户，在上海长宁区玉屏菜场租赁了一个蔬菜门市部，销售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同时经销村上其他人的咸雪菜，从1992年11月至1993年4月，短短几个月，便获毛利6万余元。

建立发展专业市场，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挥商品集散地的作用。有人不禁要产生疑问：庙港地处吴江西南之隅，一向偏僻，近年来，虽然修好建成了庙—震公路和环太湖公路，但要一下成为一个交通中心，从而利用地域优势，建立发展专业市场，发挥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似乎不大可能吧？说实在的，我前两年听说庙港有个木材市场，大得很，生意十分兴隆，也感到很纳闷，但去年春天去实地看了一下，不仅疑团顿消，还开了不小的眼界。庙港的木材市场名称为"吴江市庙港什木调剂市场"，座落在庙港镇南的轮穗村。轮穗村有4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边有一个湖泊叫长漾，木材市场紧依着它。村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家在它的旁边做木材生意。那日前去，只见漾岸边停着好几百条船，有从船上卸下货来的，有从岸边水上往船里装货的，也有船之间互驳货的，另见有不少船上装着冲板机，正进

行着木材粗加工业务。据一位正在岸边木棚里忙生意的当地农民说，这大批的木材大多是从广西运来的（先通过火车运至嘉兴、湖州等地，然后通过水运运到这里），销往本市各地和太仓、昆山、无锡、镇江等市外各地，也有不少买户是从苏北过来的。据当地有关部门介绍，这个木材市场1995年全年成交金额达5000多万元。市场上经营人员的收入颇丰。那天，据一位当地老者说，他和村上另外二户农民合营，8天来，销了三个车皮的木材（每个车皮30吨左右），赚了一万多块钱。此外，木材市场兴旺起来后，也带动了当地的饮食业和日用品销售，市场上饭店、商店有10多家，据当地人士说，这些店的日销额达1000余元。"大市场养出了个小市场"，庙港什木调剂市场随着客户增多、生意爆满，经营场地已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在它的东边又建起了一个木材市场，1995年初正式开业，至年底，一年中成交额即达2000万元。

开拓新的经营，积极参与竞争，努力跻身大市场。对于这一点，身为在庙港流通领域大戏台上唱主角的庙港供销社是做得相当出色的。该社针对庙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市场客流量较少、社会商品零售额较小的情况，更新观念，确立了"立足本地，面向浙沪，辐射全国"的经营策略，在与浙江、上海、山东、贵州等地的一些企业建立了稳固业务渠道的基础上，开拓铁合金等新的业务经营。1994年，在开拓新的经营上创效益达50.45万元，为该社是年销售超亿元、经济效益突破百万元大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社还成立卷烟批发部，不仅将整箱的香烟销往全镇各地，还将整车的香烟销往浙江各地。遥想当年村里的小店不卖整包的烟，而只能一支支地零卖，真令人扼腕惊叹不已。

加快网点建设，促使流通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为今后的发展增添较强的后劲。在这方面上，庙港社会各界认识一致，齐抓共上。1991年，庙港乡政府鉴于原有的棚顶式农贸市场已不适应

形势的发展，投资35.4万元，建造了吴江全县第一个砖瓦结构的乡镇农贸市场，市场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摊位185个。重建的农贸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成交额达3000万元，比1990年增长了5倍。1994年，庙港供销社投资150万元，建造了总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的新综合大楼。庙港集体商业公司在镇中心（万顷西路至庙西街的转角处）建造了7楼7底、营业面积为350平方米的商业大楼。近年来，各商业网点注重门面装修和设施更新，使店容店貌得到很大的改观。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庙港的行政领导在市镇建设上，十分重视商业一条街的建设。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现今，与万顷东路平行、与庙东街垂直的庙新路上，有50余个店面，经营百货服装的有之，经营各种副食品的有之，经营饮食服务业的也有之，经营者除一些集体企业外，更多的是个体户，其中有5个个体户专职搞糖果食品的批发，规模不小。那一天笔者前去逛街，看到其不但在店铺内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食品，还将不少出样商品摆到了店门前。据当地工商部门介绍，这几户个体户的年销售额均在50万元以上，其中最大的一户超过100万元，整条庙新路的年销售额则超过500万元。西连老商业区——庙西街和庙东街，近年来也向东作了延伸，目前长度已达300余米，其中西半段上，商店摊铺，鳞次栉比，已与庙新路一起成为镇上最繁华的地段。

强化服务功能，搞好为农工作。解放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着“流通领域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连结工业和农业的纽带”，这么一句话，作为当今直接与农民接触的江镇生意人，则将城乡之间的桥梁架得更加牢固，将工农之间的纽带系得更加紧密。在这其中，庙港供销社在强化服务功能，搞好为农工作上花了不少力气。“窥一斑而见全豹”，请看该社1994年这方面的情况。是年，在春耕、秋播等关键农时季节，化肥供应遇到了货紧价扬的困难，该社千方百计向外组织碳铵、尿素、磷肥、复合肥

等货源，全年共组织化肥 3600 余吨，其中计划外达 740 余吨。同时，该社组建了一支化肥购销队伍，一年之中共向各村 19 个代销点调拨了 1600 余吨化肥，还当“行商”，开展送肥下乡活动，全年计送化肥 170 余吨。在搞好为农工作中，庙港供销社还采用“双代店”这一形式。“双代店”，即代购代销店，产生于 70 年代初中期，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其经营人员大都是上了岁数而退下来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等，也有一些是烈军属，经营的职责是向当地农民收购小湖羊皮、桑梗皮、兔毛、废品之类的物品，交给供销社后，挑回一些百货、日用什货之类的物品，销售给当地农民。近年来，随着流通体制的改革和流通渠道的的拓宽，“双代店”的性质已逐步转化为独立核算的经销点，其经营人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地农民只需村委会同意，就可向供销社申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已不限于代购代销，进货方式一改以前的肩挑货担，近者用三轮车，远者用拖拉机、挂浆机船。供销社为让新开的“双代店”顺利经营，铺垫一定的资金，并专门派人对各村的“双代店”进行管理。目前，全镇计有 15 个“双代店”，年销售在 60 万元左右，为搞活农村的流通，为便利各村农民的生活，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不仅是近年来庙港发展工业、农副业的一项努力目标，也是近年来庙港发展贸易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庙港农工贸三业协调发展，多种经营作为一出“重头戏”，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巩固提高传统的经营项目，引进发展新兴的产品，形成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制衣——销售，种菜、种果——加工——销售，养鱼——捕捞——上市等“三条龙”。在发展“三条龙”中，庙港有关部门不仅重视生产，还注重销售，特别是注重对外销售，1994 年，完成外贸收购额达 4.01 亿元，为参与国际大流通作出可喜的成绩。

三

几点结论 从以上叙述的江村、江镇古近代商业和现代商业情况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江村、江镇商业发展的一些轨迹，并可通过归纳、研究，得出一些结论。

其一是当今庙港商业的繁荣与古近代庙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昔日"处处倚蚕箔"到当今形成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制衣——销售"一条龙"，从昔日市场上的"五洋"到当今市场上的"百货"，从昔日的庙港、陆港合作社和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到当今年销售超亿元、年效益超百万元的庙港供销合作社，我们可以窥视到庙港商业发展的一些轨迹。同时，可以发现其一个特征，那就是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适应和跟随苏州、上海、嘉兴、湖州等沿江、沿太湖城市的发展而发展，扬本地鱼米、丝绸等资源充足之长，依靠"龙头"、"支柱"产品的销售从而带动商业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为我们认识商业发展的规律，开发建设市场，描绘庙港商业的美好前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此外，诸如利用本地优势产品搞辐射、积极发展供销社商业等已在近代市场上推行并取得实效的营销手段，也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琢磨，并予以借鉴运用，发扬光大的。

其二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乡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镇庙港已与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古镇震泽平起平坐，成为了一个商业流通的中转站。其原因有四，一是近些年来，苏南各地大力发展新兴的乡办工业和传统的农副业，庙港这个"小弟弟"经过数年的积聚，与震泽这位"大哥哥"在经济上具有了抗衡的能力，1994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86 亿元，与震泽的 3.55 亿元相比，已相差不多。与此同步的是，庙港镇区兴盛了起来，镇区面积从 1979 年的 0.25 平方公里扩大到 1994 年的 1.6 平方公里，镇区人口从 1979 年的 2500 人发展为

1994年的4436人，从事商业的人员从1979年的250人发展为1994年的568人，更重要的是农民手中有了钱。以开弦弓村为例，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说道："1957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去江村作过一次调查，即所谓'重访江村'。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传统家庭副业已经衰落。农民对我说：肚子可以吃饱了，就是手头没有现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才开始走上繁荣。1981年我三访江村，老熟人不再发牢骚，……当时农民不仅能吃上三顿干饭，而且手上也开始有钱买东西了。因为他们集体和家庭的副业发展了，社队又办了工厂，农村里有东西能卖出来，换到钞票，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时间推移到1995年春，费孝通教授十八访江村时，开弦弓人均年收入已达到近3000元，存款余额人均达到近1000元，有更多的钞票，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于是，庙港的社会商品零售额直线上升，1994年达到了3410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354.67%。二是庙港解放以来虽经"并区并乡"、"撤区并乡"、"政社合一"、分设"党政经三套机构"等行政机构的变革，但作为区乡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始终没有变动过。特别是1992年12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乡建镇，为庙港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使庙港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地位得到了加强，而这正是兴盛小城镇商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这一点，陆港、更楼港、罗港的情况可作充分的佐证。这三个同在庙港区域内的小镇，解放前，与庙港一样，均是太湖东南岸边商品性的渔港。陆港，据说，那里商业全盛时有50户人家做生意，集镇规模虽不及庙港，但它的乡脚范围与庙港相仿，也有五六华里。更楼港、罗港则更小一些，只有近20个和7、8个前店后宅的"连家店"。解放后，陆港、更楼港、罗港变为庙港下属的乡、大队、村，只有基层政权组织而无相应的一套行政机构。从

1956 年开始，这三个小镇的商业逐步被庙港"吞并"。至"文革"后期，更楼港集镇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残破的店铺面，退化为农村的居民点。罗港经过对私营业改造后，只剩下一爿下伸店。陆港商业虽然也被"蚕食"去大部分，但它地处庙港与七都交接处，原属于陆港"乡脚"的村子离行政机构所在地较远，正是凭借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镇上仍保留了一些商业网点。前不久，笔者去那里看了一下。小镇上尚有十几家商店，庙港集体商业公司在这里有一个副食品批发部和一家零售商店，另有个体户开的杂货店、饮食店、理发店、水果摊等。据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里早上市面较好，附近四个村的农民来上市，五六个卖肉墩更给集市增加了不少热闹气氛。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庙港的交通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长足的发展。1981 年，庙震公路修通，结束了庙港不通汽车的历史，1992 年，横贯全镇东西的环太湖公路全线通车，使庙港的交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93 年，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又让庙港的交通网络更趋繁密、活跃。前几年，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庙港近些年的实践应验了这句新谚语。商谚也云："商业随地产而兴，或便旅途而盛"，庙港的"地产"可谓丰矣，古代、近代和现代（本世纪 80 年代前）也着实因地产之丰，而使商业得"兴"，但终因旅途不便，其"兴"的程度是有限的，本世纪 80 年代后，庙港人既让"地产"更加丰之，又使旅途得"便"，庙港的商业当然要加倍地兴盛起来了。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流通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使庙港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商品流通中转站。本世纪 30 年代，开弦弓村人购置日用品，为何要通过航船，到 12 华里外的震泽镇去捎来，就因为震泽既是一个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又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开弦弓村人购置比较贵重的工业品，为何仍要到震泽去，

或者要到苏州、上海去，就因为管辖他们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庙港镇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震泽和苏州、上海的市场能让他们挑个够。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那种凭各种票证购买有限商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时，随着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庙港镇上出现了供销社、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三足鼎立式的竞争，大商店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店里面陈列的商品品种要有上万种，城市商店里的东西在这里也一应俱全。面对这一情形，村里人何必要舍近求远呢？于是，庙港镇当然要与以前的"老大哥"——震泽镇平起平坐的了。

其三是江村开弦弓的商业在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江南农村以及全国农村发展商业提供了一些启示。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追述了开弦弓村本世纪30年代的商业情况。他说，"记得有一天我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村上农民需要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和烹调用的配料或调料等最基本的日用物品），大都通过航船，到12华里外的商品集散地——震泽镇去捎来。今非昔比，现在开弦弓村共有20家商店，有"正规军"——庙港商业公司开的，有"地方部队"——村上个体户开的，有"第三方面军"——附近厂家开的，店内的商品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大凡日用必需品都可得到满足。至于香烟，那不仅不"不卖整包的"，且整条整箱地卖了。据当地人士介绍，这些商店的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村里还建起了农贸市场，每天早上，附近7个村的人们前来赶市。在这里，可以将自家产的各种农产品及时卖掉，也可以尽情地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副食品。上市时，市场内熙熙攘

摊的，10 多个“肉墩头”更增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据庙港工商部门统计，这个农贸市场 1994 年的成交额接近 1000 万元。村上饮食业也发展了起来，至今全村已有 5 片饭店，开弦弓村人不用去庙港、震泽上馆子，也可以面对满桌可口的菜肴开怀畅饮了。至于费孝通教授的姐姐费达生女士于本世纪 20 年代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 60 多年的变迁、演化，也得到发扬光大，村上纺织厂去年的生产销售额达到了近 1000 万元。开弦弓村商业取得长足的发展，这固然有不少客观因素，诸如所处地理位置较好，附近有“金蜂”集团等乡办企业，工商部门给予一定支持等等，但与开弦弓村人在大力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是完全分不开的。

其四是重农轻商“左”的政策，是造成小城镇一度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当今及今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促使小城镇趋向更加繁荣的强大催化剂。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一度提出变消费城镇为生产城镇，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一部分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致使城镇人口下降。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小城镇一度衰落了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重农轻商“左”的政策，各地努力做到农工贸三业协调发展，使小城镇再度繁荣了起来，而如何使小城镇更趋繁荣，其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重要的一环。实践说明，小城镇越繁荣，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推动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越高，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就越能繁荣起来。鉴于庙港镇的地理位置和现在具有的条件，我们应注意到，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发展商业的同时，也要开发旅游等业。应该说，庙港镇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开弦弓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作社会调查的基

地，费老在英国接受赫胥黎纪念章的大会上发表了《三访江村》的演讲之后，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相继不断前来访问，江村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因此，可否借鉴一下江阴华西村的一些做法，使江村成为一个国内外向往的旅游观光胜地呢？庙港镇北倚太湖长达 8.5 公里，与吴县洞庭东山仅一湖之隔，每当风和日丽之际北眺太湖，即有"庙港没有山，借得洞庭景，太湖山水美，蚕渔歌欢声"之感，能否藉此，利用环太湖公路，开辟一条游览南太湖的旅游专线呢？陆港，相传是唐代诗人陆龟蒙隐居的地方，至今尚存纪念这位诗人的石桥和桥联，修葺一下，吸引一些游客前来发一些思古之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庙港镇旅游业一旦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商业的发展，从而更加趋向繁荣。

其五是小城镇商业也要参与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才能有所作为，而发展专业市场，是小城镇参与"三大"的有效途径。作为乡镇级的商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长期以来处在"四等公民"的位置上，只有零售权，而没有批发权。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如再沿袭这一传统的旧模式，非但无发展可言，就连生存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庙港镇商业各单位正是彻底扫除了旧意识，牢固地确立了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的观念，冲破传统的购销层次，将自己与县（市）、市、省一级商业部门置于同等的位置上，并把自己"变"为一条"蛟龙"，遨游于浩翰的商海之中。而这其中，建立、发展长涤木材市场是成功的一着。该市场与"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江苏太湖茧丝市场"、"江苏大发电器市场"等吴江专业市场的实践和经验同时说明，发展专业市场是小城镇参与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的有效途径。鉴于庙港的实际，可否再建立几个其他的专业市场呢？

从庙港商业情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小城镇搞流通，既要

立足本地市场、外地市场，也要努力参与国际大流通；小城镇在发展中，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商业要为农业的发展而尽心服务。

（吴江市商业局　陈志强）

城　建

庙港镇与苏南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农村经济登上了以小城镇为基地，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大舞台；另一方面封闭落后的传统小城镇，冲破城乡隔阂，在融合城乡经济、改善城乡关系上，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小城镇作为现代乡村社会走向城市化的纽带和缩影，它既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头，又起着本地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一

概况　庙港集镇北沿太湖，离苏州、湖州、嘉兴三个周围城市的直线距离都在40公里上下，历史上借助大庙港水运之便，民聚市兴，成为典型的江南农村传统集镇。

庙港集镇老镇区为一东西向老街，街宽2米左右，长不足百米，位于老街中部是一座横跨大庙港名为狮子桥的石桥，桥东为东庙街，桥西为西庙街。据老人记述，庙港集市在清代已相当繁荣，老街开有南货、杂货、布店、米行、肉店、饭馆、茶馆等20多家小店和豆腐、酒酱作坊，其中多数是前门开店，后屋住人的连家店。由于离周围城市远，集镇上能买到各种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早晨渔民集中在狮子桥两端卖新鲜鱼虾，周围农民上街吃早茶和买回生活必需品，辐射半径五六华里。一年中大部分日子，集市在早上6时到9时，9时后，农民回家耕作，渔民下湖捕鱼，逢年过节及农闲季节，集市时间都会明显延长。

解放后，庙港集镇为庙港乡政府驻地，提高了集镇在周围农村中的地位，加快了集镇的发展。到80年代初，庙港集镇建成区面积达到11.11公顷，住镇人口3400多人。集镇工业从无到有，1982年全镇工业总产值达到500万元，利润50万元。

改革开放以来，庙港乡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逐年加快，农村劳动力以早出晚归的摆动形式，进镇做工、经商、搞服务，为庙港集镇建设增添了动力和活力。市镇基础设施建设逐年推进，沿大庙港两侧新辟万顷东路和万顷西路已基本形成，原来狭小的庙港老街，拓宽后全部浇上了水泥路面，沿街两侧破旧房屋进行了统一的翻建改造，新建了一批商业、饮食、饭店、邮电、银行等公建设施，以及日供水2000吨水厂、1000平方米农贸市场和大量居民新村。冰箱配件厂、丝织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初具规模，镇容镇貌和投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1994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亿元，镇村工业产值7.92亿元，集镇建成区面积突破1平方公里，使庙港传统集镇迈向开放型、多功能和农副工协调发展的新型小城镇。1994年5月，庙港撤乡设镇，标志着庙港这个古老的集镇，完成了由村到镇的历史发展进程。

集镇成因　庙港传统集镇起源于何代已难以确切查考，但从调查资料分析，庙港集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范围内，经济、地理、水陆交通、民情风俗、行政区划等多种因素交融的结果。

从地理和经济看，庙港地处太湖东南岸之滨，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润泽，为太湖冲积平原，土壤为小粉土，土质松软，肥力较高，有一个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的地理、经济环境，为传统水稻、蚕桑和渔业区。尤其是蚕桑、捕鱼业十分普及，是每家农户的主要副业和生计来源；较早就有了渔业、农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其派生出的各种手工服务业，具备了民聚市兴和商品交易的经

济社会基础。

从水上交通看，庙港为典型江南水乡，沿太湖岸线长达8.5公里，历史上有46条通湖溇港，对外交往和运输主要依赖于水上交通，各村居民沿河而居，引太湖水灌溉农田和饮用，形成带状村庄，传统小木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交通工具和运输载体。在诸通湖溇港中，大庙港居全镇沿湖岸线的中心，河床深、河面宽，便于周围村民进行商品交易活动。

从陆路交通看，集镇老街为东西走向，与太湖岸线平行，出老街东西两头，都为沿湖古道——湖荡路，向东沿伸联结庙港、七一、富强、五联、罗港等村，向西沿伸联结合群、曙光、更楼港、金明、勇星等村。湖荡路像一根"线"，把沿太湖各村的"珠"串联在一起，成为自古至今沿湖陆上干道。庙港集镇依托湖荡路逐步发育形成，当湖荡路中间路段两侧店摊和民居逐渐增多，到了出现商品交换的"市"时，也就是庙港集市形成之日。

从民间风俗看，兴建寺庙是苏南农村历史上十分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在庙港一带寺庙建得特别多，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到的该镇开弦弓村就建了两只小庙。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历史上，人们总希望通过求神拜佛的途径，从心理上祈求丰收年成和家庭平安。据史料记载，在庙港沿太湖各通湖溇港口附近都建有寺庙，而以大庙港所建东岳庙规模为各庙之首，在人们心目中，大庙中的菩萨所拥有的神力比小庙的菩萨大，因此香火也最盛。实际上，对众多烧香的农民来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农闲消闲、到集市采购生活生产用品以及访亲拜友等进香之外的附属活动，香火盛处，有利于集市的兴起。

从行政区划看，历史上交通条件差，人们的活动范围小，内容比较简单，陆港、更楼港等沿湖溇港及开弦弓等村，均有规模不等的集市，乡的范围也很小。民国期间，在今庙港镇的范围

内，分设庙港乡、开弦弓乡和大慵乡（部分）。解放后的1950年吴江全市设10个行政区，108个乡镇，其中罗港乡、庙港乡、陆港乡、大慵乡、开弦弓乡都在今庙港镇范围内。1957年和1958年两年，撤小乡建庙港乡，确定大庙港集镇为乡政府机关所在地，所辖范围延续至今。这一行政区划的变革，造成原各小乡镇政府所在集镇的萎缩，而加强和加快了庙港集镇的建设和发展。

二

城镇规划 集镇建设规划是人们在主观上认识集镇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集镇的再发展进行预测和确立建设目标及要求的一种统一的行政行为。在改革开放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庙港集镇建设基本上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访问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重要观点和加强小城镇建设规划的意见，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在他的倡导和建设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庙港镇组织开展对集镇现状的调查，探讨发展前景。1983年完成庙港历史上第一次集镇建设规划的制定工作。1984年8月，经吴江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实施，使庙港进入在规划指导下，开展集镇建设的新阶段。

第一次集镇规划

规划年限，近期1983年至1987年，远期1987年至2000年。规模与范围，近期住镇人口控制在4000人，集镇总用地13.63公顷，人均用地34.1平方米。远期住镇人口控制在5000人，集镇总用地14.4公顷。人均用地28.8平方米。发展方向是以旧镇为基础，向镇区的东侧及湖滨方向发展。

总体布局。以狮子桥为中心，拓宽大庙港二侧道路，组建面水街景。老镇区为商业、公建居住，镇东为教育用地，公路南辟为工业用地，电影院附近建文化中心，绿化湖滨游憩小区，优化

集镇环境条件。

这一次集镇规划，对老镇现状调查全面，统计数字详细，并对集镇用地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老镇功能、周围环境、发展趋势、存在问题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所作规划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根据中央关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及城乡同步发展的精神，结合庙港集镇具体情况，从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加快集镇的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农村文化，提高集镇土地的利用率，把庙港镇建成交通方便、环境优美、条件较为完善的文明集镇"。同时在搞好集镇总体布局的前提下，作出了工业、商业、仓库、道路、居住、行政、文教卫生、公用设施、对外交通、环境保护、水利防汛、渔村、绿化等14项详细规划。实践证明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庙港镇的建设和发展基本上都按照规划的要求，在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对确保庙港镇在改革开放中科学合理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集镇规划

1992年5月，庙港镇编制了第二次集镇规划。实际上这是对第一次集镇规划的一次全面调整，是对集镇和观念的再认识。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集镇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经济和观念的限制，未能预见到庙港镇改革开放中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迅速发展。1990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26万元，为1982年的4.7倍，其中工业产值6802万元，为1982年的11.2倍。第一次集镇规划用地指标明显偏紧，近期为13.63公顷，人均用地34.1平方米，到1990年底实际用地面积达到28.36公顷，人均用地47.3平方米，已远远突破原规划远期（2000年）集镇用地14.4公顷，人均用地28.8平方米的指标。同时，交通、邮电、供电、银行、服务业等公建设施的规划指标都落后于实际建设的发展。

庙港镇针对规划与实际建设相脱节的现实，认真学习邓小平

同志1992年春在南方视察重要谈话和中央十四大精神，解放思想，抓住发展机遇，把调整集镇建设规划作为指导和推动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在吸取外地城镇规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第一次规划作了全面调整，形成了符合庙港实际和发展要求的新的集镇建设规划。

规划年限，近期1995年，远期2000年。

规划范围，东至汤家扇东侧，南至粮库，北至太湖护堤，西至沈家湾。

规划指标，住镇人口近期7500人，远期10000人；建设用地，近期51.39公顷，人均用地68.52平方米，远期76.32公顷，人均用地76.32平方米，规划控制区1平方公里。

总体布局，以老镇为依托，在镇东北开辟以丝绸工业为主的轻纺工业区，面积16.01公顷，镇西开辟13.73公顷居民住宅区，商业主要集中在西庙街，通过翻建门面，提高建筑层数，建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商业区，增加镇区绿化面积，沿湖滨规划2公顷旅游度假区。同时保留和发展有一定工业、商业基础的太平桥、开弦弓两传统经济小区。

集镇建设 庙港在地理位置上离周围城市远，在交通状况较差的年代里，集镇建设处于相对独立的封闭的缓慢发展状态。80年代，庙港镇跨入了从无规划到有规划的集镇建设新阶段。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庙港镇贯彻富规划，穷建设的原则，认真抓了集镇规划的重新制订和调整，切实加强了对集镇建设的投入力度。采取受益单位负担一点，镇财政从工业利润中拨一点，城镇建设维护费中收一点的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年投入镇区道路、驳岸、下水道、环卫、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到400万元左右。如投资50万元将1100米长的环湖公路镇区段，改造成宽30米，分快慢车道的水泥路面干道，原来镇区街道都为散石路面，高低不平，扫地也扫不干

净，1993年投资33万元，全部浇成10公分厚的水泥路面，并铺设60公分直径的排水道，结束了庙港集镇无排水道的历史。计划投资150万元，将日供水1300吨的老水厂扩建成1万吨新水厂，投资800万元建成3500kV变电所一座。新建1000平方米邮电大楼，程控电话装机容量达到2000门，新建了1000平方米农贸市场和一批规格较高的住宅商品房。市容市貌有了很大改观，沿湖绿化带、镇区绿地以及周围1万多亩桑地，与万顷太湖形成桑海碧水鱼米乡的独特景观，1993年庙港镇荣获江苏省绿化达标乡镇。

对外交通 对外交通是城镇发展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庙港对外交通以水运为主，通过水运把本镇农村生产的粮食、蔬菜、蚕丝、水产品运往震泽、吴江、苏州、湖州等地，再运回盐、糖、烟、酒、火柴、纸笔、布匹、铁锅等生活用品，铁制农具，毛竹、木料、石、沙等建筑材料。通过水运丰富了本镇市场的商品种类和货源，加强了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

陆上交通以步行为主，各村有联接庙港镇区的乡道，乡道一般不到2米，以顺河边的"岸"或田边的"埂"为路基，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乡道，都是世代延续。逢河建有木桥，只有经过几个村的主要乡道上才有地方集资建有石桥，如沿太湖的湖荡路上，历史上建有多处石桥，我们在五联村调查时看到，该村在原湖塘路上名为聚粮桥的石拱桥，是清代所建。由于步行速度慢，消耗体力大，能带的东西少，只适用于周围农村的村民到本镇赶市（俗称上街）。到震泽、湖州、吴江等较远的城市或城镇，一般都乘航船或搭乘便船，航船是定期往返于周围城镇的人货兼运的专业船，便船是本村或邻村村民为某一项贸易或某一事而开出的农船。

解放后，庙港镇到震泽每天有2班客轮，并可在震泽转乘汽车到吴江、苏州等地。1982年10月震庙公路通车，结束了庙港

镇不通汽车的历史，1993 年环湖公路通车，往返旅客都改乘汽车，客轮停航，庙港镇对外联系得到不断加强。通车之初的 1982 年，庙港每天开 3 班客车，到震泽、吴江，1983 年又增开到苏州和上海班车，到上海每天一班可买 10 张票。随着全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员交往日益频繁，1993 年每日开出客车 7 班，其中开往苏州 3 班，吴江 2 班，震泽 1 班，上海 1 班，每天往返旅客 600 人左右，1994 年增加到 11 班，其中开往苏州 3 班，吴江 2 班，震泽 5 班，上海 1 班，每天往返旅客达到 1000 人左右。

公路运输在全镇对外交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全镇拥有车辆数不断增加。1982 年前，全镇没有 1 辆汽车。震庙公路通车后，汽车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 1990 年全镇汽车已超过 20 辆，到 1994 年全镇汽车已超过 40 辆，其中 8 辆轿车，其余为 1.5 至 5 吨卡车。同时，水运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庙港地处江南水乡，又沿太湖，水运条件好，运费低，1982 年，全镇有运输船 8 艘，客运轮 1 艘；1987 年运输船增加到 50 多艘，平均吨位 10 吨左右；1990 年运输船增加到 125 艘，最大吨位达到 15 吨；从 1992 年起，集体专业运输船减少到 160 艘，而个体运输船得以迅速发展，数量达到 340 艘。

村镇建设 村镇是农村村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基本社区，村镇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中，比乡镇又低了一个层次。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时期，村镇称为生产大队。1983 年 4 月，恢复乡人民政府体制，生产大队更名村，设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更名为村民小组。庙港镇共设 21 个村民委员会，220 个村民小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村镇建设基本处于自然平衡状态中，乡村之间的道路，以泥路为主，少数近镇的干道上才铺有少量石块。交通运输以河道为主，河道两岸很少有人工建筑的护坡，农民每年通过阁河泥积肥，使河道得到疏浚。村庄沿河或湖塘而

建，村民直接饮用河水，自然状态的河水是村民生活和生产用水的共用水源。

随着乡镇工业和村办工业的兴起，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功能加强，打破了村镇建设的传统习惯和格局。一是各村骑自行车进镇作工和经营服务的人员逐年增加，他们离土不离乡，作工又务农，被称为小城镇上的摆动人口，据《吴江市小城镇调查资料》统计，1992 年该镇年末摆动人口已达到 3369 人。二是村办工业和村级经济的发展，原辅材料及产品进出运输量增加，对外联系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也要求改善村镇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对外交通。本地群众中有句话叫"要想富，先通路"。在对农户的访问中，有一户周姓农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讲述了他对搞好村道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他说："我家离镇虽然比较远，村里通了公路后，我买了拖拉机，到镇上跑运输，二三年功夫造了新楼房。所以村镇建设先要通路，路通了，全村都活了，要做什么生意都可以。"在吴江全市实现镇镇通公路的前提下，庙港镇经过几年努力，完成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村镇对外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离镇较远的轮穗村，近年村办木材市场经营得很火旺，原来村里不通公路，运输完全依赖于水运，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1994 年镇村共同投资 100 万元，建设长 4 公里的镇村公路，外地来运木材的汽车可直接开到村里，全村已有 35 户农民买了摩托车，加快了经营人员与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道路建设对全村经济发展发挥出很大的促进作用，1994 年全村经销木材 6 万立方米，营业额达到 1 亿元，税利 1000 万元左右。

通水也是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庙港农村，农房沿河、沿荡而建，历史上河荡直接与东太湖相通，水质清澈见底，由于还没有受到工业废水的污染，多数河道的水质可

达到二类水标准，农民直接饮用河水。大多数农户挑水放在水缸里，用明矾澄清后饮用，也有少数农户和渔民为了节约买明矾的钱，在河水最清的早晨从河中挑水，供一天使用，这种饮用水的习惯方式，一直延续到村里通自来水。

直接饮用河水，有利条件是庙港农村水源丰盛，水质好，但也有其落后的一面，如在河里涮马桶、洗澡、放牛、饲养鹅鸭等，这些不卫生、不文明的生活习惯，曾导致血吸虫、血丝虫等传染病在庙港农村的流行。近 10 多年里，随着工业污染的加重，内河水质逐年有所下降，特别是到了汛期，当太湖闸门关闭后，内河变成了死水，高温季节，局部河段还出现臭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农民的饮用水，加快农村改水的工作提上了日益紧迫的议事日程。

近年来，庙港镇认真抓了村级改水的工作，1994 年 9 个村用上了自来水，受益人数 11874 人，2707 户。村办自来水厂深受农民的欢迎，一是有利群众健康，集中供水，可以把取水口放在附近水质好的湖荡内，经过处理，水质符合饮用要求。二是使用方便，平时村民为了吃上干净河水，常常要到远离村子的河荡去担水，而安装了自来水后，管道铺到一家一户，龙头一开，洁净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出，减少了群众天天挑水的繁重劳动量。特别是老年人，最盼望能用上自来水，太平桥村一位老太，对镇村干部说，谁帮我们解决自来水，我就给谁跪下感谢。三是有利于改善村镇环境，传统村镇都有露天粪坑穿插其中，很不卫生，村里通了自来水后，新建楼房就有了安装卫生设施的条件，从而使村里减少和取消露天粪坑，实现这一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小飞跃。

由于改水工作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庙港镇在实践中摸索到很多加快村级给水的好经验。1、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走主要靠农户集资的途径，1994 年全镇 9 个村安装自来

水，共投资 183.14 万元，其中村民集资 154 万元，占 84.7%，实践证明每农户出资 600 元，农民是乐意接受的。2、搞好示范，以点带面。庙港镇选择对外开放较早的开弦弓村作为改水示范村，镇村合作、齐心协力，经过 90 天会战，投资 21.27 万元，建成开弦弓村级水厂。镇政府抓住开弦弓村水厂通水典礼的机遇，在开弦弓村召开了全镇村主任、村卫生室负责人会议，详细介绍开弦弓村改水经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后集中力量先对南部各村分别做了动员工作，指导和组织制订水厂规划，张家浜村用 55 天时间，利用旧设备，投资 10.38 万元，行义港村化了 80 天投资 20.78 万元，太平桥村战高温 60 天，投资 245.71 万元，三村先后通水。再调头对北部沿湖各村做工作，发动攻势，金明、富联、五联、罗港等村也先后在年底通水。

农房建设 在庙港镇 29297 人口中，96%居住在农村，农房建设分布广、数量大。村民的收入积余，首先用于农房建设，使农房建设在村镇建设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

庙港镇传统农房，为了便于采光，一般都座北向南，少部分沿南北大道或河流所建农房座西向东。多数农房为 3 间正屋和厨房、猪羊圈等辅房，正屋中间为客堂，平时作为会客、活动场所，养蚕季节作为蚕室，两侧为房间（卧室），大蚕时，房间也常划出一定空间作养蚕用。厨房面积约为单间正房的一半左右，大多数农户建在西侧，与正房相接，当地称这种结构为"三间一折转"，冬季可以有效地阻挡西北寒风，而又不影响平时东南风和光照，也有安排在离河道近的左侧，便于上下河滩和用水。1982 年，全镇人口 28204 人，7268 户，其中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为 27393 人，7060 户，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为 65 平方米左右，全镇农房总面积约为 45.9 万平方米。这种传统建房形式和生活习俗一直延伸到 1984 年。

1985 年全镇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建楼房的农户，共 69 户，建

长大，生长得也最快，逐步占满了整个客堂间，这时的客堂间再不会嫌大了。

蔬菜种植是庙港镇农村仅次于养蚕的传统家庭副业。晚秋蚕事初了，桑叶已用毕，残叶随秋风落地，原来密不通风的桑园，阳光可直接照入桑园里的地面上，这时正进入种植雪菜、萝卜、青菜的季节，农户在桑地内套种蔬菜，桑园变成了菜园，庙港全镇变成了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庙港蔬菜腌制成为一项新的家庭副业，镇东五联村，家家腌菜，形成雪菜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家庭腌制业，并用承包摊位的办法，几乎垄断了上海、苏州、无锡等周围城市的雪菜市场，仅与无锡市"中萃"方便面配套供应的腌制雪菜，即每天达5吨左右。平均每户年生产腌制雪菜300担，全村每年总销售6万担左右，成为腌菜专业村。农房兼有腌菜作坊的功能，走进该村农户家里看到，客堂间里不但放着蚕具，而且还有只数不等的大缸，这是腌雪菜的必备容器。近年他们进行了改革，直接在门前场地上或堂屋里砌成1.5米宽2至3米长的水泥腌菜窖，既增大了容量，又提高了房子的利用率。该村每户腌菜年收入平均在3万元左右，大户可达10万元，农民手中有了钱，建造的楼房标准都比较高，部分农户用上了煤气。我们在一沈姓农户家看到，厨房里兼有灶头（传统砖砌的灶）、煤炉和煤气灶。主人介绍说，农忙时烧煤气灶，可以节约时间，平时烧灶头，可减少柴草的浪费，冬天低温时，就烧煤炉，用热水方便，还可取暖，三种灶置于同一间厨房内，这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巧妙结合的典型例子，从中也可看出城市化正在村镇中悄悄推进。

农房建设分散在一家一户，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主要通过用地管理的途径，加强对农房建设的管理，统一规定每户农户建筑占地每人20平方米，造楼房层数不作限制，这叫做借天不借地，另外可留屋前5米、屋后1米作场地。1991年起，又规定

每户场地按人数计算，每人 20 平方米，另外养蚕户每户再增加 25 平方米建筑占地作建蚕室用，每户 20 平方米建造猪羊棚，由于蚕室用房与住房是通用的，因此一家四人的农户，建筑占地为 105 平方米，两层建筑实际建筑面积可达 210 平方米，使用面积约 150 多平方米，人均将近 40 平方米，比市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宽余得多。

三

发展探讨 庙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既是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再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记载着庙港城乡连绵不断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充满矛盾的、时刻变化着的，又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对庙港小城镇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作如下探讨：

1、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小城镇在庙港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地把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融化进庙港小城镇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中来。庙港小城镇之所以有繁荣的今天，原因之一在于庙港人民重视和加强了小城镇（包括村镇）建设，适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找到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小城镇经济实力强了，建设规模大了，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形势面前，又给庙港小城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强小城镇建设，核心是发展和提高全镇社会生产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把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小城镇的规划、建设、管理放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使小城镇这一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的特殊社区，进一步发挥出城乡生产力发展的枢纽作用、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和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的作用，推进全镇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步伐。

2、要美化环境、保护环境。人是小城镇建设的主体，进一步加强庙港小城镇建设，着力点要放在提高包括适宜于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交活动的、能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文化需要的综合环境条件上。从庙港小城镇建设的现状看，一是要充分利用滨湖环境优势，统一规划和安排好太湖沿岸建设，借助太湖风光美化镇区环境。二是要解决好集镇周围农民住宅与市镇建设的协调问题。居民区和规划区内的村民住宅区的道路、给排水、卫生设施和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统一标准、统一规划和管理。三是加强镇区周围桑地保护。蚕桑业既是庙港的重要经济行业，桑树又是绿化、美化集镇环境的特色树种，不能随意蚕食桑地搞建设，力争使镇区周围保持相当或接近于镇区面积的桑地，使庙港集镇掩映在桑海之中和太湖碧波之上。四是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庙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已不多见，这是庙港镇投资环境中一项重要的优势条件。要优化经济结构，严格控制小炼油、小冶炼、小化工等排放有害烟尘的工业企业，防止桑叶受污染，损害蚕桑业的发展和周围环境，严格控制印染、化工等对水体污染的工业项目，坚持环保"三同时"，保证达标排放。进一步坚持和优化以轻纺、机电、食品等无污染、少污染工业企业为主的工业经济结构。五是要提倡多用有机肥。庙港农副业生产有使用有机肥的优良传统，使用有机肥，不但可以改善土质，提高粮食、蔬菜、蚕茧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可以让大量人粪、猪羊灰、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处理，控制和减少生活污染。

3、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村镇是庙港全镇居住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农村社区，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全镇城市化进程中，村这一社区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全镇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村是基本的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和现代化如何搞，首先也有一个加强规划、改善投资环境的问题，也要

强调规划先行。一是合理布局，二是加快村镇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增强村镇文化商贸功能。交通、通讯、供水、供电项项涉及，商贸、服务、教育、文化缺一不可，内容十分丰富。因此，镇、村各级干部都要充分认识搞好村镇规划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努力用规划的科学性、超前性，保证村镇建设的合理性和连续性。

（吴江市人大办公室　朱云云）

文　化

庙港紧依太湖东南岸，甘冽的太湖水通过沿湖数十条湾港源源注入庙港境内，孕育了大片沃土良田，也孕育了庙港多彩的历史文化。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大文化"，它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意义出发，庙港文化的起源最少可以推及至新石器时代，即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创造了古老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

概况　庙港的悠久历史文化，可以从出土的文物得到证实。自本世纪70年代开始，庙港从太平桥、盛家港以及太湖滩等处曾先后发现十多件古人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鱼骨镖，还有西周的石锛、石箭簇等。庙港的紧邻震泽镇，1983年在蠡泽湖遗址试掘，曾出土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商代的陶器、陶片、圣水牛骨。庙港的近邻梅堰镇，则早在1960年便发掘了龙北村"袁家埭遗址"，继而又发现龙南村的"龙南村遗址"。先后采集和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同时还挖掘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多座房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井、灰坑和束腰长形土坑墓。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这里的文化源远流长；从所见文物的制作精细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又可以看到它那绚丽多姿的一

斑。

庙港文化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必然会被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所涵盖，从而披上鲜明的吴文化色彩。无论是民间信仰，或是生活习惯，无论是语言演变，或是生产习俗，无一不呈现吴中文化博大精深、软糯细腻等特有的风貌。就民间信仰而言，尊崇鬼神即为一脉相承。昔日的庙港，有港必有庙，几乎家家户户敬神拜佛，以致这块土地也就有了“庙港”这个地名。当然，庙港的文化也有它自己的特征，那就是历尽太湖水千百年来的洗礼，庙港人民格外勤奋，品格淳厚，乡风清嘉。他们世代以种植水稻为主业，同时十分器重栽桑养蚕，始终以耕织传家，四季紧巧安排，老少皆无闲日，习惯于厮守这块富饶的土地安身立命，在小圈子里祈盼宁静求取温饱。

尽管庙港受到吴中文化的辐射，成为吴中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它依偎于太湖一隅，独处县治边远地区，旧时主要依靠水道用木船与外界交往，交通不畅最终造成了环境的封闭与文化的凝固。长期以来，庙港人就是在这闭塞了的空间活动着，过着近乎桃花源式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于漫长岁月中周而复始，在祈求温饱中安于现状，恪守陈规旧俗。直至20年代末，费孝通教授的胞姐、蚕丝专家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创办了史所未见的缫丝厂，第一批农村妇女被送往苏州城里接受技术培训并回村当了第一代缫丝女工，这种长期闭塞的格局才被打破。开弦弓村及其所在的庙港地区，终于有机会开始接触现代文明，接纳现代文化。这块古老的土地就像吹进了一股深重清新的风，冲击着唯农桑为本的传统经营思想与价值观，使庙港人的眼界开阔起来，从而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先进的生产方式。不过，这仅是一个甜蜜而短暂的梦境，随着日寇侵华的枪声响起，这梦境很快被淹没了。

庙港人真正告别愚昧落后，走向现代文明，是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那天开始起步的。当五星红旗在庙港上空高高飘扬，人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便成为庙港人向旧思想旧礼教冲刺的有力武器。如新婚姻法的贯彻执行，用火葬替代土葬的提倡，逐步改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躺在棺材里人土的千年不变的封建婚俗和丧葬旧习。从50年代开始即反复开展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对扫除封建迷信，涤荡社会污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与此同时开展的扫除文盲与普及义务教育，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则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科学素质，为彻底砸碎沉重的精神枷锁，加快步伐走向新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开弦弓村及其所在镇庙港的文化发展史，它所经历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封建社会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始终徘徊在封建落后的状态中，年复一年，裹足不前，乃至"五四"运动对它也无所触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多年，则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在不断完善中见到了显著成效。令人格外兴奋的是，乡镇工业的崛起，小城镇建设的起动，给庙港文化走上新的里程提供了有利契机。今天，庙港人不仅走出了县境省界，而且走上了国际舞台。他们大量吸纳新鲜空气，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科技手段，从而在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块新生的土地，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正与现代文明相交融，并在现代文明的撞击中经受变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庙港文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向现代文明不断攀登的时期；这也是农村加速走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与必然结果。这一点，从庙港村镇文化的全面建设与不断完善中，我们不难看到它的概貌。

二

传统休闲方式 庙港的祖先世代厮守着太湖东南岸的这块肥沃土地，他们是土地的忠实守护者。除少数人以外，无论男女老少，都靠这块土地并依仗自己的双手吃饭。夏秋耕种水稻，冬春栽培油菜、小麦；这是主业，劳力与时间化费最多，占全年的一大半。其次便是经营副业，蚕桑为首，一年养蚕 2~3 季，属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养蚕是女人的事情，蚕季间，日夜守护，其辛劳不亚于生儿育女，难怪都把蚕儿昵称"蚕宝宝"了。养猪、养羊、养兔等养殖业在这里也相当看重，差不多每户或多或少要圈养几只。饲料，尤其是兔、羊饲料中为数不少的是青饲料，老人和孩子们必须手拿镰刀挽竹篮，经常去地头田埂割青草……村民们勤劳俭朴，终日劳作，四季耕耘，年年在汗水浸泡中除旧迎新。

繁重劳动后的村民需要休息，借以调剂精神，调整体力。在这里，串门闲聊或"做客人"（探亲访友）已成为多年来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串门可在邻里间进行，也可由情趣相投者隔邻相聚。串门的对象往往按年龄、性别自动分档，话题广泛，家庭纠纷、男女婚姻等等无所不谈；而最吸引人的是本村本地发生的新鲜事，它能使人着实兴奋一阵，缓解重压下的疲惫。村里的小茶馆，更是天经地义的闲聊场所，但这主要是男人们的集散地；茶馆里除了谈山海经外，也谈生意，议婚事，甚至由族长或头面人物在此调解种种纠纷。

"做客人"通常安排在农闲时间，媳妇回娘家，外甥望娘舅……那些亲姻联系不定期却似流水不间断。然而，办喜事或做丧事，无论农忙或农闲，近亲非去不可，这是千年不变的礼俗。回娘家望娘舅可随意带上些土产，红白喜事上门则必须出"份子钱"，多少因时而定。

无论串门闲聊或"做客人"，招待必不可少的是一杯（碗）茶。尤其是贵客登门，茶水格外讲究，茶杯（碗）里除茶叶外，还要投入熏豆（文火熏制而成的青毛豆）、熟芝麻、干黄萝卜条、新鲜震泽豆腐干以及桔皮等物，开水冲泡后，色鲜味醇，清香四溢。这便是名闻遐尔，只此一家的"熏豆茶"。

这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休闲方式，然而它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休闲方式；它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直至今天仍在沿用，当然，今天的新一代自然会有新的招数，青年男女们有自己的"小朋友"、"小姐妹"群体，相互间不仅招待吃茶，还请客吃饭，而且不只满足于在村里在家中，有时还相邀一起上街进城叫上一桌，玩上一天，"潇洒走一回"，直至心满意足而归。

邻里、亲友间的闲聊或"做客人"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时常联结起来，从而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营造一种和谐、安定而讲礼仪的氛围。也许这正是人们至今尚未舍弃这一传统休闲方式的内在动力。

宗教与节日活动　宗教信仰历来是在困苦中挣扎的村民的精神寄托，信奉佛教在这里由来已久。旧时的大小村庄，庙宇林立，烧香拜佛成风。直至近代传教士进入国土，十多里外的震泽镇建起教堂后，才有了耶苏稣教徒。今天，开弦弓村仍有2户信教，只是没有了教堂，不能做礼拜，便渐渐淡漠起来。

开弦弓村原有2座庙，一在村西，叫"西庙"，一在村北，叫"北庙"。二座庙都供奉关帝、观音和刘皇老爷，只是西庙进门多了一尊八仙中的吕纯阳。在庙港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是"老太庙"，正殿供奉一家三代人的偶像：长者锦衣冠带，白须飘逸，人称"邱老太爷"，绰号"邱癞痢"；另外二尊，一尊是他的儿子，尊称"少爷"，一尊是他的孙子，呼作"少公子"。这究竟是哪位真神，谁也说不清楚，而往日进庙顶礼膜拜的人四季不绝，香火鼎盛。传说船进太湖遇上大风大浪，只须喊几声"邱癞痢"，即可平

安无事；由此推测，他们也许是湖神。其实，在风浪里翻船的灾难屡次发生，然而人们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一代传给一代，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庙堂才被拆除。

这样的庙宇，仅沿太湖二三十里的带状地段，大大小小就有28个，其他各处村庄的庙宇究竟有多少，已难以精确统计。庙里供奉的佛（神）像，大致有如来、观音、东岳、关帝、土地和刘皇等等，其中刘皇的礼祭格外受到重视。《吴江县志》记载，刘皇亦称刘猛将，为宋代将军刘锐，能驱蝗，故在江南各地普遍供奉。这可能是江南水乡以农为本形成的共同信仰。

宗教活动最普遍的形式表现为村民自动去庙里进香，最具影响又有感召力的则是"出会"（庙会）。后者常在既定日期内举办，或与民间节日活动交叉进行。庙会期间，亲朋欢聚，争观行香礼仪队伍穿村过巷，盛况空前。实际上，这种"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费孝通《江村经济》），早已渗透民间文艺活动的某些属性了。

与此相杂的便是一年3次搭台做戏：春季"春台戏"，秋季"大家戏"，以及日期不定的"老太会戏"。春台戏戏台搭在东漾滩，请来京戏班，常演《借东风》、《古城会》、《杨家将》等众人百看不厌的剧目。"大家戏"费用全村摊派，富户多认，贫者少出，一天演一本戏。"老太会戏"则由"老太会"成员负担。"老太会"由年满17岁后的24名青年组成，12年"满会"，而满会时请戏班子演戏是约定俗成的乡俗。凡遇搭台做戏，不只娱乐村民，还须抬来老太爷、刘皇老爷、土地菩萨等神像，让这些泥塑木雕共同分享。

农业讲究"节气"，每个节气或节气间排列着规模不等的礼俗，这是农家的节日。这些节日多数安排在农闲时间，或是农忙的间歇期间，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村民取得短暂的闲暇，在精神上、体力上能作稍稍调整。影响较大几乎每家必办的为清明扫

墓、七月半和冬至节祭祖等，意在祭奠亡灵，缅怀祖先；直至今日，仍把这看作子孙尽孝的义务，不予废弃。元宵圆子、二月二撑腰糕、九月九重阳糕、十月冬酿酒等，标示对丰年的庆贺，蕴含农家的深切祝愿。祭猛将、做喜春戏、十二月二十五照田财等，大多与农事、蚕事密切相关，寄托人们对丰收的期望，历来颇受重视。正月初五接路头（接财神），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年二十四夜送灶君等，已披上较浓的迷信色彩，尤其是对灶君的敬重和信赖，几乎家家户户不敢怠慢，直至今日还有好些人家依旧供奉，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至于新年，世代传承，是一年休息时间最长、娱乐性最强的农家大庆。尽管如今远不如往日热闹，人们却仍然十分看重，总是精心调度，巧妙安排，诸如吃年夜饭、贴春联，给压岁钱等等习俗不减当年，尽力营造一个"年"的氛围。

民间文艺　吴江这一方水土曾孕育十分丰富的民间文艺，以芦墟为中心的芦墟山歌，以同里为中心的丝弦宣卷，震泽和盛泽一带的民间说唱念佛句，七都和庙港一带的京昆堂名等等，都曾盛极一时，享誉江、浙、沪接壤地段。以堂名而言，1987年统计时，人们尚能记忆的全县共27个，从业者114人，临时参加搭班的约200人，合计在300人以上。这是一支长期活跃在农村的民间文艺队伍，深受村民的欢迎。

庙港的民间文艺中，堂名扮主角，其中金家扇的"金玉堂"名气最响。金玉堂唱昆曲，称为昆曲堂名，开创已有200多年，由金姓自族一脉相传。先后曾积累剧目与器乐曲约300多只，常演唱的有《文探》、《借扇》、《芦花荡》、《十面埋伏》等，共160多只；器乐曲常吹奏的有《将军令》、《花三六》、《普天乐》、《乱啼风》等，共130多只。剧目与器乐曲都备有脚本，装入2只箱笼，作传习教材，在"文革"期间全数被付之一炬。

金玉堂是以"堂会"的形式演出的，主要受聘于婚嫁、寿诞等

喜庆之家。堂主自备木船1只，专用戏箱2只，终年穿梭于河港湖荡，履约前往。他们的足迹除遍布本县西南部各个乡村外，向南抵浙江嘉兴，往北跨越太湖直达吴县杨湾等地，覆盖面方圆不下于百里。“文革”开始后，堂名列入“四旧”被扫除，金玉堂亦停止活动。

80年代起，民间文艺受到政府重视，得到文化部门扶持，金玉堂的传人金阿顺等民间老艺人重新搭班，恢复演出。他们曾多次参加本县群众文艺会演和艺术节演出，并获得奖励。如今尚健在的老艺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了，健康状况一年差似一年。他们的子女有自己的职业，或在村办厂做工，或在家务农，或外出当“五匠”，对这门行当已不感兴趣，不愿学习，濒临后继无人的景况。老艺人感到无可奈何，谈论时常常叹息：“唉，到我们这一代就要断头了。”

婚俗正在悄悄改革，它直接影响着堂名的发展道路。今天的青年男女，都热衷于模仿都市里的一套结婚礼仪，诸如拍结婚彩照、披戴婚纱、用轿车接新娘、请摄像师录像等等。这种场面，金玉堂吹吹打打的气氛显然是不协调的，因此约请的人家越来越少。婴儿“满月”或过周岁生日的习俗也在逐步改革，生日蛋糕开始进入农家，电视台“点歌”正在受到青睐，他们对金玉堂也渐渐淡漠起来。这几年来，唯有办丧事的人家对金玉堂一年更比一年器重。约请的目的，一是“陪死尸”，二是超度亡灵。当然，也不能排除富裕以后“摆阔”的潜在因素。

替丧事人家唱堂名，艺人必须在天黑以前抵达，头戴道士帽，身穿道家服，吹打道教乐曲，念唱道家经卷，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每夜每人可得40元左右；如果伴送去火葬场，还可加收10元。昔日的堂名艺人，已经蜕变成“吹鼓手”了；今日的金玉堂，实际演化为道士做道场的替身了。

三

乡镇文化事业 庙港在解放初是大庙区区政府所在地，这里也就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中心。百废待兴，文化建设也不例外。

由政府最早组建的文化专职干部队伍称"社教"（社会教育），全区10多人，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和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扫盲兴办"中心民校"，晚间集中文盲进行识字教学；群众文化活动建立"俱乐部"，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排节目演出。各地村民，尤其是青年热情高涨，都乐于参加。每到黄昏，村村亮起汽油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欢声笑语在夜空久久回荡。

60年代开始，国办文化事业加快了全面发展的步伐。民办文化站的建立，使群众文化活动得以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每个大队建立俱乐部，供村民看书读报，下棋打乒乓，闲暇消遣；有的还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自娱。民办文化站对大队俱乐部负有组织辅导任务，为丰富村民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条件。县影剧管理处建立农村电影放映队，分片包干，摇着木船到村庄定点巡回放映。轮着放映的村子，就像过节日一样欢腾，天色未暗，村民便自动搬着板凳去集中，在场地争先占领最佳位置，乐滋滋地看"白布上的人影移动，还能说话"的露天电影。县人民广播站开始在此分设放大站，负责转播县里的节目，同时也加插适量本地节目。家家都安装有线喇叭，而且家家都按时收听。这不只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是广播里每次都插入天气预报，上面有关农事的通知，如施肥料、洒农药等等，也都通过有线广播转达；有线广播的功能已超越娱乐与教育的范畴。

进入80年代后，民办文化站转为公办（国办），并开始重视阵地的建设与活动设施的更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化活

动中心。1994 年阵地总面积达到 500 平方米，分设舞厅、录像厅、像带出租门市部、桌球室、电子游戏室、图书馆等等。其中图书馆藏书于 1993 年超过万册，被命名县（市）级“万册图书馆”。现发放固定借书卡 500 多张，全天对外开放。为读者开辟的阅览室，陈列报纸 19 种、杂志 11 种，平均每日 20 多人前往查阅。营业性舞厅初次开办时，好些人看不惯，曾引起一阵议论，最担惊受怕的是姑娘们的父母，说“搂搂抱抱，不像话！”文化站为此举办了数期交谊舞培训班，扩大影响，积极引导，并重视与改善管理工作，这个禁区如今已经打开。金蜂（缫丝）集团、新联丝织厂庙港分厂、供销社等企业、商业单位，也相继开设非营业性舞厅，不定期举办舞会。1995 年正在选择文化站新址，进一步完善设施，争取达标，建成省级先进文化镇。

解放初将东岳庙改造而成的“大会堂”，开会、演戏、放电影三者兼容，沿用 20 多年，直至 70 年代末才规划重建。1981 年庙港影剧院落成并正式开业，1060 个座位，舞台也较宽敞，曾热闹了好几年。如今影业呈萎缩状态，平均每年只放映 150 天（每天一场），且难以保证上座率。接纳剧团演出更少，青年不爱看地方戏、传统戏，老年想看看不着，影剧院则埋怨上座率低维持不下去。县影剧管理处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从 70 年代开始萎缩，如今村里很难看到电影了，青年们来了兴致，便相邀同伴一起到镇上看一场。

有线广播趋向完善，1994 年全镇安装总数为 5605 只，占总户数的 91%；目前正在规划全部改装铜圈喇叭，提高播音质量，确保收听率。有线电视的铺设也在计划之内，待条件成熟，即可实施。在目前录像机尚未普及阶段，有线电视已经开通，录像片的收视率已有大幅度提高，村民的欣赏习惯也将随之有所改变。

家庭文化　受国办文化的指导与影响，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

期，大队普遍建立俱乐部，相当一部分生产队建立文化室，形成农村三级文化网络。60年代的江村俱乐部设在大队部，有一个以共青团为核心兼职管理班子，有几个活动项目。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最多时达10多份，必订的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新华日报》等，供村民自由选读。还有象棋等多种棋类，棋迷在闲暇时常来对奕。一只固定的乒乓桌，也吸引了一批乒乓球爱好者，往往自发进行比赛，情绪热烈。60年代末，俱乐部拉起一支文艺宣传队，最多时共20多名队员，添置了一批弦乐和敲打乐等乐器。苏州下来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是文艺宣传队的主力军。学唱、学演"样板戏"成为一时风尚。他们排演的《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对村里人很有吸引力，人人爱看，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宣传队也自编节目，如说唱、快板等等，用以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活动。

开弦弓村原有一个专供开会使用的大会堂，为满足村民看电影的要求，于1984年11月改造成电影院，座位约600座，自发电，配备3名专职管理人员。片源来自县影剧管理处，每天晚上放一场，票价1～2角。电影院开办4年后，便悄无声息地关闭了。电视机大量进入农家，是导致电影院停业的直接原因。

庙港农村拥有电视机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由大队和生产队购买，放在会议室或仓库里供村民收看。自80年代村办工业兴起以后，旧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家庭收入随之逐年增加，农家也纷纷置办电视机了。起初一家添进一只黑白电视机，晚上邻里聚在一起收看；后来家家户户都添置了，天黑后就各自闭门看自己爱看的节目。一家人的"胃口"不一样，收看时往往会产生矛盾，只得协商解决。在开弦弓村，现在有2只电视机的家庭已经超过100户，占总户数六分之一以上；彩电归子女专用，黑白留给老人收看，各取所需，矛盾自然缓解了。

近年来，开弦弓村的教育事业加速发展，文化水平普遍提

高，青年已全部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还出了 10 个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这就为城市文化消费方式向农村加速渗透敞开了大门，也是催化家庭文化脱颖而出并在短期内就形成气候的基因。开弦弓青年已不再满足于收看电视了，他们对录像机、照相机、卡拉 OK 等等，也都产生了浓厚兴趣。据不完全统计，1994 年家庭拥有卡拉 OK 音响和照相机的各 100 多户，已添置录像机的 150 多户。这些文化消费品大多是青年结婚时创办的，不能排除手头宽裕了，学城里人赶时髦这一因素；但也确有不少青年是用以自娱自乐，出游时带照相机拍几张风景照，休息时唱唱卡拉 OK，晚间放放录像，看看武打片、枪战片，调节正在加速节奏的生活。

开弦弓村原本不多的文化活动设施，如今荡然无存。前后 2 次制订的发展规划图上，都明显标示着文化活动区，计划建造一座综合文化楼，但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座落在开弦弓的镇办缫丝厂"金蜂集团"有一流的舞厅和音响设备，还配备专职工会干部兼管，不过这是厂里开展活动专用的。3 片村办厂，至今尚未开辟文化活动专用室。厂长的理由是：工人上班就进车间做工，下班立即往家跑，没有人留下来。集体文化场所的匮乏，业余文化生活的枯燥，可能是产生与发展家庭文化的外部条件。

随着家庭文化的兴起，营业性家庭文化户应运而生。开弦弓村首家桌球文化户，开始在自己家里摆开了 3 只桌球台，吸引了不少青年和学生。为了招揽生意，1995 年转向靠近工厂和学校的北村，租用 3 开间的一只门厅，每天下午和晚上开放。另一个文化户租用公路旁的一座小屋放映录像，兼营出租像带。经营者于室内搭个小铺，以室为家，几乎全天对外开放，黄昏以后才打烊，青年观众居多，也有一些老人常来闲坐，谈天说地看录像。经营活动接受镇文化站的指导与监督，像带由镇文化站提供，村里有录像机的家庭，差不多全到这里来租用像带。有户姚姓家

庭，夫妻俩爱看武打片、枪战片，母亲对这些不感兴趣，放映时便独自钻进自己卧室。为了照顾老人情绪，隔一茬便租回几匣《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珍珠塔》之类的传统戏曲片，放几夜"专场"。他们对村里有像带出租感到十分高兴，说："要看啥就租啥，蛮方便。"目前，家庭文化还处于初创阶段，形式与内容都比较单一，既无组织，也没有辅导，只是自发而已。但它的发展势头很猛，可以预见，无需多少年便能蔚成大观。它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传统消闲方式与欣赏习惯：邻里间的交往开始日渐减少，尤其在晚间，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不再想到串门了。连往常炎夏乘凉在场头相聚的"旺季"，由于家家安装电风扇（空调也开始进入农家了），不愿去门外纳凉，致使旺季也不旺了。

四

历史的包袱　庙港在小城镇建设的时代潮中发生巨变，而开弦弓的变化尤其鲜明。昔日的草棚早已不见踪迹，所剩无几的旧瓦房多数成为堆放杂物的仓库，或作家畜饲养室；成片的新楼房拔地而起，宽敞明亮；从1994年起，一些造型别致的别墅式民居，开始在楼群中冒尖。在村镇工厂高囱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映衬下，漫步于这里的公路或村道上，能令人忘却自己置身于远离城市的乡间。在访问一位周姓家庭时，适逢户主60多岁的妹妹从镇上下乡探亲，她乐滋滋地说："哎呀，2年多不来，下车往前走，啥人晓得走过头迷路了，向人打听后才绕道摸到姐姐家里……"也许这可以作为开弦弓村有多大变化的一个注脚。

当然，这些变化只是直观的，层面的，比这些直观的层面的更加可贵而令人振奋的则是观念在不断更新。诸如代代传承的土葬旧习，在60年代后期废除后，火葬已被人们自觉接受；自50年代初颁布新婚姻法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

被砸碎，人们已认清婚姻自由是获得个人幸福不可缺少的基础，自由恋爱得到了老年人的认可。最突出的当属改革开放后带来价值观的彻底转变，没有人感到"穷光荣"了，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忙致富奔小康成为挂在口头上的第一话题……所有这些历史性的超越，正在塑造一代新型的江村人，一代迈向现代化的江村人。

毋庸讳言，在江村—→江镇的发展过程中，历史遗留的沉重包袱仍是一条无形的锁链，一种尚难排除的阻力。有的像顽疾一样，时隐时现，此起彼伏，难以根治。婚俗革新后，曾留下一段健康发展的轨迹；然而富裕起来以后，却出现了异常现象，讲排场摆阔气的陋习迅速抬头，相互攀比愈演愈烈。1994 年中等水平的男家，"期口"（换生辰贴子）送女方 800 元；"定亲"、"堆小盘"送女方 2600～2800 元，宴请近亲 5～6 桌约 1200 元；结婚前一年"堆大盘"再送女方 6600～8000 元（另须加"盘里夹山"400 元），金器（项链、戒子等）、手表、自行车等约 2000 元；结婚新居（三上三下）7～8 万元，室内装饰约 2 万元，家具约 4000 元，酒席 30 桌次约 9000 元。从"期口"至举办婚礼，所需费用总计超过 12 万元。丧俗也在发生变化，骨灰匣入土从深埋转向表层化，并浇制圆形或方形水泥墓地，立水泥墓碑，占地从 1 平方米增至 4 平方米，出现占用耕地面积的不良倾向。婚事的"份子钿"也一年比一年加码，1982 年每份 80 元，1984 年已猛增至 200 元。其他如丧事、过生日等等，也都少不了送"份子钿"，七亲八眷凑合起来，一年开支十分可观，今天的人情债足已令人畏惧。

开弦弓村的东庙与西庙拆除后，在庙基上建造了北村和西村两个生产队的仓库，归集体使用。以往，"这里并没有宗教团体而只有宗教区域的存在"（费孝通：《江村经济》），宗教活动历来是村民自愿参加的；庙堂被拆，进香无门，求神拜佛之类的迷信活

动也就消冷下来了。出乎意料的是，熄灭已久的香火近年来却死灰复燃，且日益公开化，扩大化。北村仓库的二小间偏屋，现已供奉着5尊如来和观音，还有一尊老寿星。这些泥质或瓷质的小偶像，不足1尺高，是信奉者从玩具店或地摊上买回的。本村与外村的老太，初一、月半相继进"庙"点烛焚香。供桌前2付烛台上挂满条条红烛油，3只铁盆里堆起满满的香灰，它足以让人看清这里香火的兴盛。相比起来，"西庙"则简陋得多，供桌安置在仓库一隅，四周叠起柴草，杂乱不堪，不伦不类。不过，横梁上悬挂的小木箱格外显眼；箱内的龙袍凤冠，由一户姚姓人家化200多元置办。姚家有女原在村办厂做工，后患精神病医治不见效，便祈求菩萨保佑，盼女早日康复。类似东庙和西庙这样的迷信活动复苏的状况，各地都有发生，影响还在不断蔓延。令人惊异的是少数有知识懂科学的青年也加盟于老太的行列，似明似暗地踏进"庙"门，点上香烛，磕头跪拜。

聚在一起打麻将已屡见不鲜。多数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一家人围坐一桌，或邻里围上一圈，也有临时凑合起来的。在人们的眼里，几角钱至一、二元钱一局，纯属排遣，不视为赌。但上百上千乃至上万地下赌注，也时有发现，尤其在冬令农闲时节。政府年年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禁而不绝。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村里读书看报的人锐减，在我们访问的20多户村民中，成人购书订报的寥若晨星。一名订阅《摩托车》等2份杂志和零星购买技术书籍的青年，在同伴中已不多见，那是他自动离开村办厂，成为摩托车修理个体户的缘故。在村办厂外来妹的集体宿舍里，我们看到了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这是她们自己掏钱买回来的，买一本，相互传阅。论及这一问题时，多数人都这么回答：如今老中青幼各有各的事情，一日忙到晚，哪来功夫看书？其实不然，因为说这些话的人中间，不乏麻将迷。

发展探讨　在加速小城镇建设的进程中，庙港的村镇文化建

设受到了村镇领导的高度重视，无论是总体规划的配套，或是具体落实中的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摆上了重要位置，跨出了十分可喜的一步。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如何抓住目前这一有利机遇，加大村镇文化建设的力度，使村镇文化建设适应经济建设速度与规模，为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挥更好作用，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不断改进，尽力完善。

一、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要求，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党的十四大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基层。这就说明，农村文化建设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对此，庙港村镇领导已有充分认识，有规划，有投入，有成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完成吴江市委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任务，村镇文化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目前的发展状况显然还有较大差距。鉴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并逐步同国际接轨，对外联络与交流日益增加，我们的眼光应当放得更远更开阔些，原有的文化发展规划有必要对照面临的新情况，作一次再审视再论证再调整，然后切实付诸实施。

二、村镇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多年来，庙港的村镇文化建设在规范道德行为，淳化民风，审美娱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人类以高文化、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的文化素质整体水平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关系着在这场激烈竞争中的成败。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增加基层文化活动网点，这个要求对今天的庙港来说，仍是适合的。50年代至六60年代创建的村镇文化三级网络，“文革”开始便出现了“塌方”，最后遭至全部瘫

焕。现在虽然有所恢复，有所建树，然而从总体来衡量，还是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的。在农村经济结构形成新的格局，村镇工业占领半壁江山的新形势下，创建新型村镇文化网点，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已经十分必要。唯有这样，村镇文化才能向前再跨大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资源是第三产业的重头，全面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不仅可以搞活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还能扩大知名度，增强吸引力，是一举多得的事业。与先进地区相比，庙港起步迟，项目不多，存在较大的差距。庙港面向碧波万顷的太湖，境内河港湖荡星罗棋布，景色秀丽，环境幽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庙港的民俗民间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始终表现了自己的独特风貌……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丰富资源，急待我们去挖掘与设计。当然，在具体实施中，思路要宽一些，要放在前后左右的全方位中作思考。比如，建设环太湖旅游区，吴江市乃至苏州市都已提上议事日程，庙港镇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握必须适量适度，防止不必要的重复消耗，多多发挥自己的优势，使之形成自己的特色。例如庙港原来多寺庙，适当恢复一些有影响的寺院，形成一定规模，开展禅林参拜活动，以此吸引港台同胞及东南亚客商。又如熏豆茶原是这一地区独具的饮茶习俗，在茶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可以与其它项目诸如饮食、观光、游乐等旅游活动结合起来，建设具有庙港特色的人文景观。

四、农村经济正在加速发展，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富裕起来的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审美情趣已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尤其是年青一代，参与意识特强，一方面，早已厌倦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为历史遗留的文化生活陋习所影响，同时，外来文化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极大吸引力。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放任自流。在文化消费方面，我们有责任加以正确引导，区别良莠，规范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在

此，国办文化事业单位要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影剧院定期开展"农技电影放映月"活动，文化站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各类文化科学知识讲座，书店搞好送书下乡工作等等，进一步增加社会服务功能，提高人们的审美层次。与此同时，还须强化法制教育，加大执法力度，对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健康的，甚至是肮脏的丑恶现象，诸如大操大办、封建迷信、聚众赌博、嫖娼吸毒等等，一定要严抓严管，区别不同性质，严肃查处，决不让沉渣泛起，污染人们的心灵，污染好转了的社会空气。

总之，要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为指针，在"建设"二字上多下功夫。村镇文化是农村文化的基础工程，村镇文化搞好了，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于培养农村"四有"新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庙港的村镇文化建设已经打下良好基础，只要坚持不懈地一抓到底，那么随着庙港小城镇的崛起，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风貌必将同时出现在人们面前。

（吴江市文化馆　徐文初）

卫 生

卫生事业是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要素——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关系到经济发展，关系到"小康"目标的实现。庙港的卫生事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特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如何从落后一步一步地走向自身的现代化。

一

早期的医疗卫生状况 早期庙港的卫生事业是落后的，一方面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被神道所挤，另一方面是中国农村普遍缺少医生，广大农民基本处于自然生活状态，卫生习惯也差，庙港也不例外。

直到民国年间，庙港没有一所医院，医生也很少，大部分村庄没有医生。据沈练石老人回忆，1943 年在庙港地区只有 2 名私人开业中医，一名是他自己，从业中医内、外科；另一名王振民，从业中医外科。在农民聚居的村庄，只有大圩田村有一名叫沈傲千的医生。解放前夕在陆家港有一名叫李积勤的妇科医生。在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中就没有提到开弦弓村有医生，只有一个开小药店的浙江乌镇来的药商和接生婆。也由于经济压力和交通不便，农民生病一般不去看医生，而是求神、喊魂和拜菩萨，祈求神灵保佑安康。由于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往往小病拖成大病、重病。据徐伯庠老人说，庙港人生了病先讲迷

信，得了重病一般请（雇）四只船，一只船到浙江南浔拜菩萨，占卦、吃香灰；一只船请客人（亲戚朋友）；一只船请郎中（医生）；一只船到集镇买小菜（招待医生、客人用）。得了伤寒病发烧到舌头变黑才请郎中。因此，一旦得了危重病症，后果可想而知。妇女生育一般在家中由接生婆或年长妇女接生，由于缺乏消毒卫生知识，产妇死亡、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病等经常发生，严重威胁着母婴的生命安全。

庙港镇、村的公众卫生很差。粪便、垃圾污染水源严重，当地实行土葬，还有"地上葬"的习惯，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庙港位于太湖之滨，境内有连接太湖的46条港，祖祖辈辈饮用港水，有条件的用明矾澄清后饮用，一般均直接饮用港水。一些急性传染病常有发生。1943年庙港曾流行脑脊髓膜炎。1946～1947年大庙港及月字圩、大圩田、轮穗等村庄流行霍乱病。大圩田村因私人开业医生沈傲千免费给村民注射霍乱疫苗，七八十家农户仅死2人，大庙港死二三十人，其他村庄死人不少，棺材买不起，只能用衣橱装死人。血吸虫病在庙港大部分地区流行。《吴江县志》记载，庙港镇的骆驼港村，农户最多时有40余户人家，因血吸虫病死绝的有24户，到解放时仅剩下16户，全村只有2个全劳力；据老人回忆合群村在抗美援朝征兵时，因患血吸虫病只出了一个兵。

而庙港周边的几个大镇上则有一些医生设馆行医，且有些医家还颇负盛名。《吴江县志》载：宋代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太医院院使朱儒为吴江人，著有《太医院志》。载入《江苏历代医人志》的吴江名医有87名，出任太医院御医、吏目、院使及应诏入都诊病的8名。其中明代，如汝可霆"精医术，有族侄某，殁三日，将殓。可霆往唁，见死者面有生气，诊其脉，曰：此阳虚也，投以参附可效。口噤不得入，多方导之果苏"；汝光根对"肢体断折者可复续，肠胃溃出者能纳入"；袁

颛、袁泽精痘疹，袁颛著《袁氏痘疹全书》五卷，袁泽视小儿气色，即知凶吉。清代，如汝锡畴治温独有心得，常出新意，对膜原学说有研究，著有《治温刚要》一卷；叶在公，其"遇有大疽，以铜尺量之，治与不治立决"；戚文光"精儿科，自制药丸，秘方不外传"。清代影响最大，最有名望的还数徐大椿。徐大椿（1693—1771），字灵胎，著名医学家，其医学理论精深，临床经验宏富，医事见解独到，堪称我国医学大家，乾隆二十六、三十六年两次应诏入都诊病。其生平著作颇多，著有《难经经释》、《医贯砭》、《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兰台轨范》、《慎疾刍言》、《洄溪医案》等。由此可见，吴江向为中医荟萃之地，中医中药事业是源远流长的。

清末民初，西医渐入境内。1890 年，上海基督教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的美国传教士衡特立和医生曹子实等来震泽开设诊所进行传教，是现在所知境内最早出现的西医。民国年间，境内私立西医医院、诊所先后开设 30 余所。私立医院、诊所均自由设立，一些无病床的诊所亦取名医院。开设较早的私立医院是盛泽医院，1918 年由凌振华开设，院址在盛泽镇。规模最大的是盛泽福音医院，有医师 5 名，可容纳 30 人住院，备有太阳灯、摩托车等设备，日军侵占盛泽时，因医院墙上有反日标语，被日军烧毁。由于军阀混战，战事连年，私立医院、诊所开开停停，坚持到吴江解放的有盛泽医院和盛泽的兢雄医院、惠济医院、普济诊所以及黎里的同仁医院等为数极少的医院、诊所。私立医院、诊所的设科较少，一般一个医生看几个专科疾病，综述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眼科、花柳科等，县立医院直到 1936 年才建立，院址在县城松陵镇，专科有内、外、花柳科，解放前夕病床只有 20 张。这些公私医院规模均很小，分布极不合理。私立医院、诊所从做业务、养家糊口考虑，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相对繁荣，乡脚较大的盛泽、震泽、同里、松陵、黎

里、平望、横扇、芦墟、严墓（今铜罗）、莘塔等市镇上。医疗设备只有少数医院有显微镜和普通外科、产科、牙科等一般医疗器械。医疗技术方面，西医内科只能对常见病诊断用药。外科主要进行门诊小手术，产科能处理横位等一般难产。

当时中医力量比西医强。中医专科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骨科、针灸科、痔瘘科等。各科都涌现出不少高手。如盛泽王斗生、王杏生，芦墟费叶唐均是内科名医；三四十年代黎里凌甘伯以调理见长，擅治虚劳之症；王达泉能治红疹、白痦、风火症等急性病；芦墟许半龙擅治痈疽，察人气色预知病候，曾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立中国医学院；横扇徐佐卿擅内外科，外科的升、降、提、吊诸药均亲自炼制，临床整体辨症，内外并治；盛泽简寅陛及其子简伯龙、平望秦东园、芦墟沈立斋、同里邹云秋及其高足叶玉衡的妇科在当地都很有声望，简、邹擅调经种子，秦擅调经安胎；平望王二仁擅用散药治疗小儿脾泄；盛泽戚云棠善以推拿（俗称摩惊）治疗儿病；同里何建章悉心研究戚氏儿科秘本，凡小儿疹、痘、惊、疳诸病无不效验，本世纪30年代初，何建章治愈一瑞典籍女孩乙型脑炎后遗症，病家赠"扁鹊再世，芦氏重生"匾额一块，解放后医名仍隆；芦墟胡春芳擅长药筒针灸，治疗关节炎、中风偏瘫等症；盛泽王云亭擅长伏灸风、劳、臌、膈、哮喘等杂症；严墓日晖坝（今属桃源镇）沈家痔科是县内有影响的中医专科，创业人沈觉香治疗方法为缚、敷、熏、洗诸术。缚主要为悬铜钮子的挂线疗法，敷药"枯痔散"、"立鹤生肌散"独具功效。

中、西医为吴江境内两大医学学派，相互间有隔膜。存在隔膜原因有二，一是随着西医渐入境内，中医感到有危机感。盛泽中医协会主办的《盛泽医药报》创刊号上把西医东渐斥为"鹊巢鸠占"。二是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有"废止旧医"之说，中医受到压制。西医人数较少，政府又崇尚西医，卫生队伍发展缓

慢。1934年8月，吴江县中医公会成立时有会员282人。1947年，全县共有274名中、西医私人开业人员，其中中医196人，西医43人，护士3人，助产士17人，药剂生2人，牙医1人，镶牙生12人。1948年6月，县卫生院（前身县立医院）仅有工作人员15人，其中医师4人，护士4人，助产、检验、药剂各1人，其他4人。1949年底，全县总人口468631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37人，病床15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卫技人员数0.72人，病床数0.03张。

民国年间，政府倡导公众卫生，民间成立卫生组织，开展卫生宣传，疫病流行时，民间医生开设时疫医院，施医施药。1929年起，每年5月、12月的15日，县城进行大清扫活动。全县仅同里、盛泽、黎里、震泽、莘塔等市镇有类似活动；市镇居民的马桶由粪埠头雇工分地段倒洗，定期将粪卖给农民。全县市镇、村庄到处有小便池桶、沿河露天粪缸，粪便污染水源严重；在疫病流行季节，县内开展牛痘、霍乱疫苗等预防接种，但现存资料记载，预防接种面不广，仅在松陵、平望、盛泽、震泽、黎里、同里等大镇进行；旧时，境内妇女生育均由稳婆或年长妇女接生，极不卫生。民国年间，政府虽有取缔稳婆接生的设想，终因境内助产士不多，新法接生只能在城镇推广，农村仍由稳婆接生者居多，产妇、婴儿死亡率很高。

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事业及其医学科学的意识行为的辐射力自然是单薄的。庙港和吴江境内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交通十分落后的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健康保障，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加上生活贫困，体质差，传染病经常发生和流行，每逢旱涝灾害必伴大疫流行。在境内发生和流行过的急性传染病有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痢疾、伤寒、副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猩红热、脊髓灰质炎、炭疽病、出血热、病毒性肝炎、痢疾、钩端螺旋体病、狂犬病

等；慢性传染病有结核、麻风和性病等。境内血吸虫病尤为猖獗，重流行区家破人亡，田园荒芜。

二

现代医疗卫生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对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疾病丛生的落后状况进行根本性的治理。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吴江市的卫生工作是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医疗卫生队伍的培养和引进，大力开展各项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工作三方面进行的。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卫生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卫生面貌极大改善，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一是根据人民医疗卫生保健的需求而设置；二是跟随行政区划合理布局。市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主要集中在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设有第一、二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所、市精神病院（附设在同里中心卫生院）、市皮肤病防治所、市药品检验所和卫生进修学校。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一镇一院（卫生院），一村一室（卫生室）进行布局和建设。

1950～1953 年，震泽、盛泽、大庙（港）、芦墟区先后成立区卫生所，严墓、大庙、坛丘、横扇、黎里成立区妇幼保健站。1951 年 11 月，境内第一所联合医疗机构——平望联合医院成立。之后，各乡镇的联合医院、诊所相继成立，至 1956 年底全县有联合医疗卫生机构 17 所。同年盛泽区卫生所改为区医院。1957 年 7 月，大庙区卫生所和妇幼保健站撤销。1958 年 9 月，成立人民公社，公社领导机关所在地的联合医院、诊所改建为人民公社医院。1959 年底，全县共有公社医院 21 所，病床 395 张，

1960～1961年，撤销区医院、卫生所和妇幼保健站等区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设备充实各地公社医院。1962年底，公社医院发展到23所。

1995年年底，22所镇（中心）卫生院总建筑面积5.14万平方米；固定资产3655.43万元，其中专用设备975.88万元；工作人员1255人，其中全民编制560人，卫生技术人员1072人，内有高级职称8人，中级职称196人。

此外，集体医疗机构还有松陵、平望、盛泽、芦墟四所镇牙病防治所。

吴江各年段每千人口拥有卫技人员和病床数统计表

年份	全县人口总数	卫技人员数	每千人口卫技人员数	病床数	每千人口病床数
1949	468631	337	0.72	15	0.03
1957	533457	637	1.19	117	0.33
1965	585879	952	1.62	754	1.29
1975	693119	1117	1.61	1350	1.95
1980	716057	1347	1.88	1504	2.10
1985	733017	1561	2.13	1359	1.85
1995	777226	2334	3.00	1721	2.21

庙港镇卫生院的发展过程如何呢？

庙港镇卫生院初名庙港联合诊所，创办于1952年10月。由沈练石、李积勤、沈德庆、江碧华、周亚涛、沈傲石6人合并开诊所，沈练石担任联合诊所主任，成立初期资产仅几百元。1958年工作人员发展到十几人，开设观察床数张，资产上千元。1965年开设化验室，开展血、粪、尿三大常规检查。1967年县人民医院下乡医疗队来院帮助工作，同年创建外科手术室。1981年卫生院自筹资金8000元买下房管所建造的庙东街的7间医疗用房，结束了卫生院医疗用房出租金的历史，同年设X光室，观察病床10余张，有工作人员20余人。1970～1971年，南京铁

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小分队来院指导血防工作，开展切脾手术，1982年原址翻建一幢三层住院楼。1989年建造了一幢职工宿舍楼。1991年翻建一幢三层门诊楼。1994年，该院经苏州市等级医院评审组考核，评定为“一级甲等医院”。1985年以后，卫生院内部设制为二部（住院部、门诊部）、二组（防保组、后勤组）。临床科室有内、外、妇产、五官、口腔等。医技科室有检验、X光、B超、胃镜室和药房。主要医疗设备有心电图机、200毫安X光机、纤维胃镜、B型超声波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血球计数仪、激光治疗仪、微波治疗仪、无影灯、万能手术床、齿科综合治疗椅、电冰箱、空调等。1995年底，全院建筑面积2224平方米，病床24张，固定资产111.6万元，其中专用设备价值41.39万元；工作人员33人，其中卫技人员27人，内有中级职称4人。

全吴江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50年代，人民医院内科能做胸腔、腰椎穿刺，人工气胸、气腹，外科已能做胃、胆、脾切除等上腹部手术。卫生院内科只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外科只能做门诊小手术。六七十年代，人民医院内科对心血管病的诊治逐步发展，后能做心脏体外起搏，外科开展骨、泌尿、胸外科手术，妇产科能独立施行古典式剖腹产和宫外孕手术。80年代，人民医院内科开展电击去颤、心脏监护；卫生院能处理休克、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等严重病；骨科能做腰椎间盘髓核摘除、髋关节内外植骨融合、关节矫形、人工股骨头置换等手术；泌尿外科能做肾盂切开取石、肾切除、膀胱扩大术和直肠代膀胱术；胸外科能做肺叶切除、贲门及食道中下段癌根除术；盛泽、震泽中心卫生院和青云、庙港卫生院能做上腹部手术，同里、横扇、八都等14个卫生院能做下腹部手术。进入90年代，随着全身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纤维胃镜、腹腔镜等多种内窥镜、500毫安以

上X光机等一批贵重精密仪器应用于临床，全市诊断治疗水平大大提高。一些高难度的医疗技术，如脑外伤手术、外侧型高血压脑溢血手术、大脑半球、椎管肿瘤切除术；二尖瓣狭窄扩张术、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结扎术、中央型肺癌切除术、食道上段癌手术，复杂的肝胆结石合并狭窄三胆管切开盒式引流术；全髋关节置换术、胸腰段脊椎外伤伴截瘫全颅减压植骨内固定术、脊椎型颈椎病全颅减压植骨固定术；人工晶体植入、乳突根治术等已成功开展。

50年代起，在境内逐步实施各种医疗保健制度。1952年11月起，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实行公费医疗保健制度。1953年12月起逐步对国营商业部门、全民企业和县属企业职工实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1969年起推行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在村建立村合作医疗站（后称村卫生室），逐步形成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80年代合作医疗曾有滑坡现象。1991年起，在全市推行大额合作医疗制度，主要解决农民因重病造成的大额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黎里、屯村两镇实行保健风险结合型合作医疗制度。全市有集体办村卫生室520个，占应设卫生室村数的90.4%，其中有合格卫生室340个，甲级村卫生室215个，苏州市示范村卫生室21个，村卫生室实行集体办医。有乡村保健医生680人，保健员256人，其中女乡村保健医生（员）485人。

在村集体经济支持下，庙港镇21个行政村都建立了卫生室，并按合格卫生室要求，实现了房屋、人员、设备、制度四配套。每个卫生室平均有32.8平方米的用房，共有乡村保健医生39人，乡村保健员5人，新培养2人。庙港镇的大额合作医疗一直比较巩固，行政村覆盖率和人口覆盖率均在95%以上。

吴江在搞好市、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队伍建设的同时，50年代初起在全市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除害灭病、预防接种、防治血吸虫病等卫生防疫工作。80年代初起开展卫生城镇创建活动。在村庄建造自来水厂和卫生厕所。1991年市政府制定“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在全市大力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工作。1994年吴江市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经省考评达到了初级卫生保健普及阶段的目标。全市经苏州市考评有松陵、同里、屯村、北厍、金家坝、黎里、平望、梅堰、盛泽、八都、横扇、七都、庙港、震泽、铜罗、青云、桃源等17个镇达到了初级卫生保健普及阶段的标准。1995年吴江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一举成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既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环境条件，又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并取得了一系列防治成果：1954年起，古典型霍乱、天花在境内绝迹。1976年6月，全市达到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规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1994年经省考核验收又达到了省规定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1987年、1988年分别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和疟疾的标准。至1995年，白喉已连续20年，脊髓灰质炎连续17年无病例发生，各种急性传染病总发病率已由1985年的411／10万下降至230／10万，是吴江市传染病发病最少的一年。妇幼保健工作在普及新法接生的基础上，1982年起逐步开展科学接生、推行孕、产妇围产期保健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产妇死亡率由1957年的16.64／万，下降到1985年的1.38／万，1995年为0；婴儿死亡率由1952年的146‰，下降至1995年的11.14‰，全市人民平均期望寿命74.65岁，其中男性72.31岁，较1985年延长3.11岁；女性77.06岁，比1985年延长1.36岁。这些主要健康指标充分说明了全市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在不断提高。

三

卫生事业发展模式及趋势　卫生事业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

经济模式决定卫生事业的发展模式。在集体经济模式的推动和影响下，庙港镇及其全市农村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发展集体卫生事业的发展模式。

主要特点是：

第一、市级医疗卫生机构（除市中医医院）是全民所有制性质。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都是集体所有制。

吴江市共有 22 个镇（中心）卫生院，都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在国家财政的资助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对村卫生室实行集体办医。所谓集体办医坚持三条标准，一是由村民委员会提供卫生室房屋。二是由村聘用乡村保健医生（员）并负责其基本报酬。三是村卫生室收入、支出由集体管理。从庙港来看，每个卫生室上有天棚，下有水泥地面，做到了诊察室、治疗室、药库（或观察室）三室分开。卫生室都配置了药橱、办公桌椅、诊查台、换药台、注射台、注射凳、候诊椅凳等基本设施（有的还设置了观察床）及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压舌板、输液器、洗胃器、灌肠器、消毒锅等必要的医疗器械。据 1994 年统计，全镇 21 个村卫生室固定资产共 17.82 万元，平均每个卫生室拥有固定资产 8486 元。吴江全市 523 个村卫生室，平均每个卫生室拥有固定资产 11212 元。

乡村保健医生（员）的报酬以集体补助为主，由村民委员会在统筹的"二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或村办企业上缴利润中支付，同时从村卫生室"三费一差"（挂号费、注射费、出诊费、药品批零差）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年考核奖励基金，按照工作实绩，考核后浮动发给。庙港 46 名乡村保健医生（员）月收入（不包含农田及副业收入）在 150～200 元有 8 人，200 元以上有 32 人，共占总人数的 85%以上。吴江市 936 名乡村保健医生（员）中月收入在 150～200 元有 101 人，200 元以上有

767人共占92%。

第二、在医疗保健制度方面，坚持由集体支持的合作医疗制度。

吴江市自1969年起实行保健型合作医疗。各镇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管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基金采取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办法。基金标准由政府规定，各镇可根据集体经济水平适当调整。农民医药费用根据就医渠道有集体全报销或部分报销。1991年起实行大额合作医疗。1991~1994年4年中，全市大额合作医疗行政村覆盖率保持在95%以上，1995年达到98.4%，农业人口覆盖率均保持在90%以上；基金标准平均每人每年4.6~6元，其中由集体负担60%左右；共筹集基金1013.85万元。补偿办法由各镇根据统筹基金水平确定起报点和补偿比例，起报点一般定为500元以上，投保者全年累计住院医药费500元以下自理，500元以上分段确定补偿比例结算，医药费5000元以上不再列入补偿范围。1991~1994年4年中，全市用于补偿支出975.65万元，大额合作医疗对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1年，庙港镇实行以镇为单位统筹的大额合作医疗以来，村集体每年给予资助。

第三、在卫生院建设投资上走社会办医道路，以当地集体经济组织为依靠，多层次、多渠道集资解决。地方各级政府都能把搞好医疗卫生单位的基本建设作为一项地方性福利事业，列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采用增加地方财政拨款和企业集资办法解决部分建设资金。一些效益好的镇村企业也乐意资助地方福利事业。吴江市自1984年由政府发动社会集资建设盛泽中心卫生院起，社会集资办医局面已经打开。1985~1993年9年中，通过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和医疗单位扩大积累自筹资金等办法，全市共完成医疗用房面积55950平方米，投资1948.6万元，职工宿

舍面积25457平方米，投资1004.1万元。医疗设备添置速度加快。1986～1993年8年中乡镇卫生院完成基建项目50余项，平均每个卫生院2.27项。至1995年底，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固定资产共7424.12万元，其中专用设备价值已达2718.21万元。市、镇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卫生院医疗设施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服务项目的增加不仅收到促进当地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而且增强了自我更新改造能力，形成了卫生院良性循环的运营机制。

第四、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一网多用。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吴江市农村，由市级医院、防疫保健机构、镇（中心）卫生院、村卫生室组成了一条多线一体的医疗预防保健网络。近几年来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加强预防保健工作，加强了卫生院预防保健组建设，采用按照当地人口数配备防保组人员，每年从预防保健资金中安排资金补贴防保人员工资，开展某些防保项目有偿服务等政策，加强预防保健组建设。利用这一网络在农村广泛开展卫生宣教、传染病防治、行业卫生、学校卫生、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农村改水改厕指导等工作。加强对村卫生室和镇村企业卫生室工作人员的系统培训和业务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了镇（中心）卫生院的整体功能。适应了当前国家补贴不足，卫生资源投入较少的情况，收到了一网多用的效果。吴江市农村儿童"四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高于城市覆盖率。孕产妇住院分娩率、高危产妇监护分娩率及新法接生率均达到100%，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

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农村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的增长，给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也提出了以下一些新课题。

第一、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要向高质量深层次方向发展，

据苏州市卫生局调查预测，今后若干年内，在医疗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全市国民收入和农村人均年收入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就诊人次和需要住院的病人，也不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同时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增强，农民对医疗保健高质量服务需求增加。另外，随着镇村企业的发展，特别一些有职业危害、污染环境的企业的出现（在庙港镇也有类似情况），农村劳动卫生保护、职业病的防治也需提上议事日程，还有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等。这些情况提示我们，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在与小城镇建设，经济发展相适应，继续改善服务条件的同时，应加强内涵开发，开发新的适宜技术，培养卫技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开展新的防治项目，使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向高质量、全方位、深层次发展。

第二、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还应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小城镇现代化建设步伐。

在各级政府重视下，尤其对卫生院实行市、镇分级管理体制后，卫生院的医疗用房、仪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但有调查资料表明卫生院的发展与县（市）级医院、特别与城市医院相比，其递增率显著偏低。从庙港镇卫生院发展来看，在全市仅属中等水平。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农村小城镇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卫生院是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价格短期内不可能按成本核算放开，而社会物价指数不断上升，卫生院人员工资大幅度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后对卫生院还需实行倾斜政策，增加倾斜度，继续采用各级财政拨款、集体经济扶持的办法加强镇卫生院的建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

村卫生室是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网底，是农民就诊第一个接触点，大量的（据调查约有 70～80%）病人在卫生室得到处理而做到小病不出村。因此，改善村卫生室的服务条件和提高乡

村保健医生（员）业务水平至关重要。目前，吴江市村卫生室建设档次不高，平均水平低于兄弟县市。就拿庙港镇来说，村卫生室平均面积不足 40 平方米，普遍没有配备高压消毒锅，致使消毒隔离问题严重，卫生室软件建设不够，离苏州市要求距离较大。因此，甲级村卫生室建设应被镇、村两级重视，把它当作为农民办实事的一项工作，依靠村镇企业资助，加快建设步伐。同时，要加强年轻乡村保健员的配备，做好新老交替工作，加强乡镇保健医生（员）的系统业务培训。

第三、合作医疗制度要扩大内涵，向多功能发展，逐步建立保健风险结合型合作医疗制度。

目前，吴江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大额合作医疗为主，重点是减轻农民大额医疗费用的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发生。此种制度与黎里镇等地实行的保健风险结合型合作医疗相比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庙港全部是大额合作医疗，以村为单位的保健型合作医疗已停办多年，且大额合作医疗基金标准较低，限制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今后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大额合作医疗基金标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村逐步恢复保健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全镇建立起保健风险结合型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切实解决好农民的基本医疗保健和大额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

（吴江市医学卫生学会　浦德琪；
庙港镇卫生院　沈勇明）

婚　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本质"。对于庙港地区古代婚姻习俗风情，我们主要从与其邻近 10~20 公里的震泽、平望等地的史志记载以及今日庙港的风俗来窥其一二。康熙《吴江县志》作者认为"今大江以南江楚吴越之风大约相同者十之六七，间有小异或千里而异或数百里而异。若欲于百里之间独自为风而不同于他处，则寡矣！"[1]的确，处于太湖之滨的庙港，对外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较为发达，深受各地风气影响，其中对其有着直接影响的便是震泽、平望等重要市镇。因此，本课题研究我们主要除了寻访老人从遗风遗俗中窥其一斑外，便是借助于邻近地区镇志和吴江县志为参考了。

一

早期的婚俗　早期庙港的婚姻缔结是有这样几个步骤的：

1、配亲

古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月下老人的安排，因此青年男女是不可私订婚姻擅作主张的，甚至连双方父母也不便亲自出面。因而，便需媒人在其间穿针引线。即所谓"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只有通过媒人缔结的婚约才算是合法的。一般而言，除了专职的媒婆，媒人一般是在双方间走动的至亲好友。男方的媒人称之为"行媒"，而女方的则为"坐媒"。

配亲的过程一般包括"纳吉"和"请帖"。所谓纳吉是指择婚之初，男方委媒到女方提亲。而"请帖"则是将双方的年龄、生辰八

字写在红帖上去问算命先生，所谓"决于命卜"。其实，"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分作出决定的工具，同时也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2)。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仍是双方父母及彼此的家境。"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而兼决于命卜，故迟速不同。聘定装送称家有无，间或论财，达者弗为也。"旧时的婚姻既是解决生活的手段，是双方家庭及家族间的联盟，而决非婚姻双方情爱方面的私事。因此，择偶的标准是从家世的绵续、家业的兴旺衍生而来的。"刑"、"冲"、"克"、"害"自然是大忌，而"不冲不克"则是缔结婚约的基本条件，若是"旺夫益子"、"夫荣子贵"则有了结成连理的良好基础。年轻的当事人的意见是不予考虑的，他们甚至无从得知对方的性情与志趣，更不用谈情投意合了。

2、定亲

婚姻关系及婚姻的确定是由"担盘"来完成的。一般需"担小盘"和"担大盘"。"担小盘"又叫"通讯"，"通讯"后女家不可再接受其他帖子，所谓"一女不受两家茶"。如果定亲后未成婚前，男家孩子不幸死亡，女孩便成"望门寡"，女方虽可以重新许配，但被人看轻。成婚前，男方定好"日脚"，将首饰、衣服、绸缎等堆于盘中送至女方家中并通知婚期，这便是"担大盘"。婚期决定后，女方不可推迟，只可提前，实际上改期的很少。如果女方答允婚期则回赠礼物，俗称"回盘"。这样"行盘"与"回盘"便算是正式结结了婚约与婚期，只待婚礼如期举行。

3、娶亲

娶亲是已确定的婚姻关系的最终实现，通过婚礼告于亲邻，使其缔结关系及婚生子女合法化。因此，庙港地区对娶亲极为讲究。"婚礼男迎妇于女家，古礼也。今苏州之俗婚礼废亲迎，独吴江行之，犹有古之道也。"(4)而乾隆《震泽县志》则认为"特为烦猥，不能翻载之"(5)。"亲迎有六礼，曰登龙、曰请新、曰请期、

曰请送、曰抱嫁（亦曰'扶鸾'）、曰酒米（近更曰'祈启'）。女家有三答礼：曰迎龙（以抱嫁答），曰坐筵（以请新答），曰登龙（以登龙答）。友以银钱礼物贺娶妇之家，曰'送婚'，贺嫁女之家，曰'送花粉'。婿入门，有奠雁、见外舅姑诸仪。若女家奁具盛者，先一日使亲友送于夫家，夫家设席，曰'待行官'。妇入门，有拜舅姑、庙见、拜灶、踏袋、坐床、撒帐、坐筵、花烛等仪。亲族以银钱等物见，曰'相见礼'。礼毕，好以币帛、冠履茶果等献舅姑、亲族及媒妁，曰'上见礼'。此后有望朝，归宁等礼。"[6]这只是方志中对繁复礼俗的简要记载。

二

近代婚俗 到了近代，一方面西风东渐，欧美婚仪日益渗透进婚俗，而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吴江自然受此影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所推行的社会兴革对庙港地区社会生活的嬗变也具有深刻意义。然而，庙港毕竟只是一农村小镇，传统习俗仍有着浓厚的社会基础，难以轻易退出，这样，近代在庙港一带流行的大都是"新老法结婚"。"文明结婚"实际上是新旧杂陈，但其间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日益深刻和普遍的变迁。

既然封建礼教逐渐松弛，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便日趋活跃，特别是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的知识青年更是领风气之先。《新盛泽》报民国12年12月1日张一振撰文《改良婚姻之研究》认为"由条件和意义中发生恋爱，更由恋爱而缔结夫妇"，倡导文明恋爱婚姻观。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仍起着作用。在市镇中，父母之命已绝非权威，但"媒妁之言"仍是必需，只不过在新式婚仪中，专职的媒婆已由"介绍人"所代替，实际上"介绍人"仍履行的是媒婆的职责。在乡村，"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谈论自己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和羞耻的。"[7]而媒人仍是换帖、通讯、谈条件的中介，"村里的人说作媒是一件

好差使，因为媒人从中说合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8]人们仍要占卜，但占卜已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即使算命先生的判断和顾客的意愿不一致，顾客的愿望通常是犹豫不定的，她不一定要把算命先生的话当作最后的决定。她可以找这位算命先生再商量，或者另找一位算命先生。"[9]真正起作用的是男孩父母的喜好。

旧式的婚仪仍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寻常村民中。其基本的程式如下：冠礼，所谓冠礼，据古志介绍，男子"至将婚之前一日具冠……其冠多出亲长所赐"[10]一般帽子由舅舅相送。而女子"将嫁而后笄。冠笄之日蒸糕以馈亲邻，名曰'上头糕'"[11]。成婚当天早晨由专门的"妆花妈妈"为出嫁梳头妆扮，替她带上凤冠。妆头时嘴里要含着银子，咬着手帕，而脚则踏上"笼头"上，"笼头"是新娘母亲的嫁妆，现在又传给女儿。"妆头"可谓极其庄重，是对女儿出嫁成亲的一种极度重视。男方面在午后用迎亲船"迎亲"，自家兄弟及亲朋至友从之，谓之"陪娶"。女方一切准备妥当，由自家父亲或兄弟抱着或背着上轿，谓之"抱嫁"。这时，出嫁女要大声哭叫，俗语曰"哭发"，所谓"娘家不哭不发"。"新娘抬出大门时，娘家人需用一盆凉水泼在门槛外面，即民间所说'嫁出囡圄泼出水'，今后娘家事情与女儿无关"[12]。路上，新娘要换掉娘家的鞋，也有的在妆头时即换过，以免带走娘家的气，而拎着外太（即外祖母）传给的脚炉，炉内生火，则象征婚后生活红火。到夫家后，由"装火妈妈"领着新娘在早已点好的三堆火堆盘绕三圈以避邪。男方家门口铺上芦席，考究的人家则要铺红布。新娘由喜妈领进家门，点上花烛，举行婚礼，拜天地后，用红绸带让男女双方各执一端进洞房，进洞房而要双方面对面，进洞房坐新床，由值班喜娘在床顶上撒果子，即所谓"坐床撒帐"，一般是发芽豆、花生（长生果）、枣子等象征早得子嗣的果子，子孙桶内要放红鸡蛋，结婚的第一天晚上让一男孩撒上一泡尿以讨子之吉利。当夜或第二天，拜舅姑、拜祖祠，婚礼结束。那时

庙港地区还流行"闹洞房"，所谓"三朝无大小，太公可以住在床里甩虎跳"，至于此俗始于何时，人们也不得而知。第二天，新娘家带礼到婿家"望朝"，当天女儿回门，即"归宁"。当然，何时"归宁"时间不一，古时间隔一月，而民国时期则间隔一天。过后四五天女婿带内装有蹄膀、糖等物的纱罩去慰问丈人，谓之"望静"，也有称相赠以表慰问。总之，这些婚俗除了宣布成婚外，重要的还表明婚姻是兴家兴业的需要，而延续香火则是其另一重要目的。良好的祝愿，各种做法与禁忌使婚姻的社会意义昭示于人。

虽然新式的婚仪未被村民采纳，但在旧俗中已融进不少西洋婚仪。当时，有些已采用新式的曲调如《婚礼进行曲》，新娘已可不戴盖头，而只需戴副墨镜，着花衫、花裙，这些都是从镇上租来的，第二天早晨便归还。而新郎则大都着长袍马褂，戴礼帽。大户人家有专门的司仪主持婚礼，有证婚人、介绍人等等，而一般的村民结婚是没有如此场面的。新的只是文化的最外围即属于物质建设和与其直接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层面，而文化的其他层面特别是传统的恋爱观、婚姻家庭观在村民中间仍屹然不动。

连年的战火，长年的萧条使得小媳妇与小女婿及"入赘制"在庙港地区普遍起来。由于贫困，人们不得不弃婴，同时为了省去操办婚事的一大笔开支，人们领养小媳妇，即"童养媳"，有些小媳妇甚至是襁褓之时即抱来喝婆母的奶长大。在这种似婆似母的关系中，小媳妇温顺听话，与婆婆及丈夫和睦相处。在小媳妇成长的历程中，她还是家庭中重要的劳力，帮助婆母养蚕、养羊，料理家务，照顾家人。等男女双方长大成人，选定日脚，"并亲"成婚。而传统的"一切复杂程序如做媒、行聘、接亲船、轿子等等都不再需要了……婚事的费用，可以缩减到少于 100 元"(13)，但是，"小媳妇"制度在省去礼仪与费用的同时，也"使姻亲联系松散，影响亲属结构的正常功能。它对妇女的地位，甚至对年轻夫

妇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都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她们缺少双方的父母供给的聘礼与嫁妆"[14]。因此，人们在经济困顿的情况下无奈才采用"小媳妇"制度，而且轻视这一制度，一旦经济有所复苏，生活归于安顿，便又恢复起传统婚姻制度。

"小女婿"则是男孩多的贫寒人家通过介绍人将其给无儿子的人家做小女婿，等男女长大成人后，举行婚礼，但是不叫嫁女儿，而是叫女儿结婚。总的来说，小女婿较为少见。但招赘入门则相当普遍，上门女婿也不像在其他地方地位较低，有些人家生了女儿后不再多要子女，加之儿童夭亡率高，因此在女儿成年时往往招婿上门。女儿结婚时，女方负责房屋和家具，而男方则要准备嫁妆。婚后生下子女，从母姓。只是，女婿上门得改姓，甚至不可以继承女方之家产。在庙港地区，历史上招女婿便是一种被视为明智、经济的做法，有些人家甚至连续两代都是独养女，尔后招女婿。

聘礼与嫁妆是庙港人婚姻生活及其整个人生历程都非常重要的因素。担小盘，担大盘就是男方将聘礼正式隆重地送到女方家里，而聘礼的多少往往是女方父与男方家长通过介绍人谈判而定的。体面的聘礼对于女方来说是女儿高贵身份的象征，因此，万万不可随便。热烈而争持不下的讨价还价正是女方父母争面子及对女儿疼爱之情的自然流露。而嫁妆一方面是父母对女儿爱心的表示，另一方面也是女儿未来婚姻生活中家庭地位的重要保证，没有像样的嫁妆是很丢面子的，它也是新媳妇抬不起头的重要源由。在婚礼中，凡是女方的嫁妆都用红丝绵系上，一眼便可辨认出来。普通人家嫁妆大致来自聘礼，比聘礼稍多些，一般包括四季服装、首饰、床上用品及日常家什。其中，两条丝绵被及必要的家仪是必备的，哪怕是最贫困的人家也会想尽办法置备的。婚被的做作是极为讲究的。被面不可拼，一般为三幅面子四幅底，缝时不可打结也不可断针。当然婚被是由女方的姨妈、姑妈相

赠，在庙港，送婚被是连同包袱一起的，送嫁妆时则由女方叔伯兄弟背着，且第一个背包袱的是伯伯家儿子。每个背包袱者均可获得夫家的礼金，只是按排列次序递减。“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新的家中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15]。因此，嫁妆的置备常常也是女方父母必定要认真筹划，而搬嫁妆一定是公开且极为张扬的。古志中将“女家送奁具至婿家”称为“铺房”[16]，一般安排在结婚一天。送嫁妆的队伍由“进门糕，笼头高”开道，“进门糕”由女方舅舅相赠，“进门糕”音同“进门高”，其用意赫然，实际上媳妇的地位高低是与“进门糕”后嫁妆的丰厚程度成比例的。而看嫁妆则又是当地老少妇孺皆而为之的，边看边品评物什的多寡与档次的高低。“而聘礼与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为每一家物质基础定期的更新”[17]，只不过，女方家庭对新家庭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在外孙出生前，外婆必须来“催生”，送上全套婴儿衣服以及尿布、摇篮等等，而女儿家分家时则要送不全套的厨房家什，其中必须包括火钳。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舅舅要送书具、文具，且要向教师送礼物以表敬意，总之，舅舅有义务负责教育好外甥，而外甥成年后分家析产时，舅舅则又是最有权威的仲裁者。

这段时期，庙港人的婚姻生活仍具浓厚的传统色彩。婚姻是“合两家之好的外交结合，在农村里，娶媳妇是雇一个不付工资的女工”[18]，娶媳妇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绵香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9]由于偏重亲子关系，由于家庭是“事业社群”，夫妇间的正常关系往往受到损害，夫妇更多是“相敬如宾，使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亲密的障碍”[20]，“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内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21]。另一方面，婚姻

的基础本不是彼此间的好感与爱意，既然配亲、定亲、娶亲都不仅是当事人自己的事，那么奢望夫妇间的感情生活则是不现实的。对于既不可以自己有职业，又不能从父母处继承家产的青年妇女来说，婚姻是他们克服贫困的手段，“脾气的相合，理想的相同，感情的和合”[22]就不能成为婚姻的基本条件，这时感情只是婚姻的奢侈品。夫妇间在别人眼里是亲密的，会被旁人耻笑。“生小孩之前，丈夫对她的态度是冷淡的，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在讲话的时候，丈夫都不会提到她，甚至在家中，只要有别人在场，她的丈夫如果表示出对她有一些亲密的感情，都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结果会成为人们背后议论的一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夫妇之间坐也不挨得很近，而且彼此极少交谈”[23]。只有当妻子生了孩子后，夫妻间才较为自然地交谈，但是一旦妻子怀孕，夫妻就必须严格地分床，而孩子生下后，为了照顾孩子，夫妇之轴又自然成偏轴。在子女未成年前，子女一般是与父母同床而寐，至少也是在同一个房间，即使分床或分房间，子女也可以很自由地出入父母房间，挤到父母床上。孩子在一定意义成了横在夫妇间的门闩，成了一种拖累。但是，如果公开将子女视为拖累，将公婆叔姑视为障碍，则是不为社会理解，反而招来批评和议论，因为夫妇间亲密是乡村社会不予承认的。

此外，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则根深蒂固的。男子汉守着老婆是没出息的，“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24]。在庙港茶馆是男性的圣地，茶馆里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各色的男人，偶而有女人出现，是会引来一阵关注与议论的。年轻的丈夫是绝不会带妻子去茶馆的，而在市镇的面店饭馆里出入对也是极为罕见的，在庙港人眼里，老婆是“家子婆”，是不可抛头露面的，而妻子也总是在家里忙碌。

由于江南轻纺工业的发展以及新思想、新生活观念的传播、

不少妇女走出家门出外做工挣钱，有的到无锡、苏州等城市，或是到震泽、平望这些附近市镇，而有的就在村里工厂做工。特别是费达生先生创办的开弦弓村缫丝厂使妇女能走出家庭而就近务工，对于改变村民的旧观念更起了直接作用。出外务工比例虽小，但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在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因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着直接的贡献。妇女在社会中地位逐渐起了变化”[25]，出外做工的妇女和她家人都很容易意识她的贡献，“此外，工资由工厂直接付给她本人。至少在这个时候，她可以将她的一部分工资按她自己的愿望去花费”[26]。出外做工，妇女有了自己的职业，也有了自己的朋友与同事；同时新技术及新管理方式的采用也提高了妇女的素质，增强其信心。妇女已不再甘于埋没于杂务烦事中。此外，“儿媳从婆母处分离出来可以减少日常的争吵。但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的关系松散”[27]。

三

变革中的现代婚俗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新《婚姻法》颁布并日渐深入人心，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风气使庙港青年为之兴奋，也使一些家底薄的青年男女省去了筹办婚事的大笔开支。50年代在一些受新思想影响较深的年轻人已风行新式恋爱婚姻。如开弦弓村有一对青年，一个教书，一个是农村基层干部，原住一个宅上，彼此觉得对方人品好、能干又有文化，互相通通书信，便商量结成夫妻，一样东西没置办就举行婚礼，总共才花费百十块钱。当然，在“文化大革命”前，老式的做法仍保留一些，如定亲时的换帖子、行盘，结婚时带红盖头、坐花轿，妆花妈妈也继续替新娘上头妆扮，但程序已简单多了。老法虽然保留，但已不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由于政府的倡导，大部分人家更多采用新法，只有少数经济实力颇丰、讲究形式的人家才保留

老式作法，且即便是老法，也要征得年轻一代的同意。W.R.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记述的两对新婚夫妇的婚礼则是典型的新法。婚姻是"自由选择的"，夫妇俩都是开弦弓人，从小就认识，不算命，没有人做媒，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事，没有聘礼，嫁妆只是被褥和衣服，双方都不给钱，"新娘是自己徒走到夫家来的"。夫家的亲戚和社长参加婚礼，并讲话，然后夫妇双方发言，向毛泽东像鞠躬，然后回到新房里，休息一段时间，新婚夫妇与客人一起吃饭[28]。许多程式已大大地简略，但婚宴是一直保留的，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最"革命"的"文革"时期。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酒水吃过了才算是正式结婚了。

十年"文革"时期，人们恋爱，婚姻观念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突出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根据并不在于经济生活本身，而更多的政策导向，有些甚至带有行政命令和强制色彩。

首先，择偶标准与模式都有较大变化，人们择偶标准开始偏重于"成份"。由于"血统论"的影响，成份成了罩在每个村民头上的影子，时时刻刻左右着人们的命运。根正便苗红，可优先获得机会，享有参军、进厂或当干部的特权；而出身富农或地主，即成份不好，便失去了很多机会且要殃及家庭。出于人们对政治的虔诚与膜拜，同时也是基于理性的计较，人们不得不看重成份与政治表现。但青年男女本人的身体情况，劳动表现等直接影响挣工分能力的诸种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同时，随着破四旧，移旧风，易旧俗，人们的择偶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父母作主，媒妁之言已被革去，青年人开始依靠自己和介绍人来寻找理想的配偶，但是，组织出面领导搭线却普遍起来，有些甚至部分剥夺青年人自己的权利。这种现象在镇上的学校、医院及公社机关等知识青年较为集中的地方较多。如在分配学生到庙港工作时人为地安排男女比例，领导出面牵线搭桥，甚至个别还硬点鸳鸯谱，

其次，青年择偶范围有所扩大，但“村内婚”现象仍然较普遍。这主要是农村各级组织的倡导，集体生产和集体政治活动及文娱活动日益频繁，青年男女间正常的交往被支持，这为青年男女的择偶提供了机遇。随着初、高中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青年择偶范围有所扩大。此外，出于经济的考虑，有些条件好的女青年开始流向工分值高、田少地多的地方。甚至，男青年也愿意到这些生产队做上门女婿，这必然对“村内婚”构成挑战。六、七十年代，在庙港最典型的这类流动要数南北之间的婚配。由于农民仅靠集体农业生产的工分收入和自留地作为生活来源，因此田少地多，就能比田多地少获得收入更多，且比田里活要轻些。庙港北片沿湖的生产队田少地多，而南片则是田多地少，这样，南片的“田上人”就愿意嫁到北片，或者到北片“上门入赘”。而南片的男青年又不得不在条件更差的村庄选媳妇。在户籍制度严格，社区间社会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婚姻又再次成为摆脱困境的跳板。这必然使南片“村内婚”的比例有所下降，同时也缓解了北片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即使如此“村内婚”现象仍较普遍，人们仍希望在彼此熟悉，背景相近的人中择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同村人知根知底，心中有数好相处。“好儿好女不出村”就是人们看好“村内婚”的写照，这种心理影响较为强劲。知识青年下放庙港期间，虽与村民共同劳动、共同学习，但是，知识青年与当地村民结成夫妻的却极少，人们宁可放弃条件较为优越的婚姻对象，也不太愿意与背景迥异的人生活在一起。此外，庙港长期以来交通闭塞，村间交往频度低，也是导致“村内婚”较为普遍的重要原因，北片“湖上”还有湖荡路可连接各村庄，而南片“田上”则与公社之间无路可通，村村之间仅有小路相连，农用小船和航船是其主要交通工具。这种闭塞一直持续到1982年震庙公路通车。再者，非常实际的“抱工分”矛盾使村民不愿接纳新迁入人口。庙港地区人多地少，资源有限，人口流入过度必然导致工分值下降，

因此村民更希望本队或本生产队之间的通婚。"村内婚"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但对稳固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倒有好处，毕竟大家都生活在相知相熟的环境里，行为举止受到周围舆论评价的制约。

再次，旧礼俗遭到彻底冲击，婚礼的操办受到了严格控制。一些旧的婚俗，如换帖、行媒、堆盘、迎亲等均被视为四旧扫除，媒人、喜娘、妆花妈妈则被视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同时严格控制酒水的规模与级别。规定酒席最多只能两桌，不得用蹄膀，由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等组成横扫队，发现谁家使用蹄膀，立即将蹄膀倒入粪桶里。规定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不得办酒席也不得吃酒席。基层干部还劝阻自己亲属不去参加。但村民却希望尽可能把酒水置办得像样些，只是有不少村民偷偷摸摸地办酒席，今天两桌，明天两桌，零零碎碎之间争了面子，也平衡了与各亲友的关系。还有的，则是乘着干部出去开会或冬季兴修水利的机会，想着将婚宴办得稍体面些。"文革"期间结婚是不许放鞭炮，也不同意敲锣打鼓。由于政府的种种规定与宣传教育，移风易俗、婚事新办还是能逐步被大家接受，因此"文革"期间，婚礼办得相当节约与省时。一般是吃了中饭，男家去女家请，介绍人、小姐妹陪嫁，当晚吃过晚饭，小姐妹即回女方家。闹洞房是不允许的，大家只是在新房嗑嗑瓜子吃吃糖果，气氛还算喜庆，第二天新娘即回门。一般喜糖是不发的，嫁妆也非常简单，但是最新式的生活用品总是最先在嫁妆中看到。

70 年代末，随着苏南社队企业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安排进厂，特别是女青年。另一方面，农村逐步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可逐步摆脱单一的经济形式，人们对社队的依赖也进一步降低，相反对家庭的依赖却有所加强。户籍虽还是阻碍人们流动的因素，但是人们对户籍的依赖已有所降低，这样人们便有可能外出务工或讨外地

媳妇. 农民家庭收入增长较快，在不同家庭间收入拉开差距，而收入水平又更多地取决于容许每个成员的努力与才干。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持久而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婚姻生活诸方面。

80年代初，进厂务工是开弦弓村青年最理想的职业，而女青年理想的对象是“进厂的工人”，且最好是“本大队”。随着个人才干与收入的直接挂钩，人们开始在择偶时从政治条件转向现实的经济条件与对方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上。男女双方（特别是女方）在为自己择偶及其父母（特别是女方父母）在为自己子女择婚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将来过日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家境（特别是房子）、身体、人品（重要的是不败家）。勤劳节俭等等是女方及其父母择婿时人品方面的重要标准，而这些都是着眼于振兴家业。

多种经营的开展，家庭副业的恢复及村办企业的兴起，都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庙港村民重新讲究结婚排场，又致使结婚费用较大幅度增长。结婚费从五六十年代的五六百上涨到80年代初的二、三千元。据宋林飞教授当时对开弦弓村的调查单新房里的家具与陈设及生活用品已达到1973元，如将房子翻造、酒水包括在内，那么要达到三千元左右。这对当时普通家庭是较为沉重的负担。当时一般农户都要在儿女成婚，尤其是儿子娶亲时借债。家长们认为为儿子娶亲成婚是必需的，如果由于自己手头拮据而使儿子娶不上亲或娶不上好媳妇，那是很没有脸面，也是愧对祖宗的。而女儿出嫁时，嫁妆比不上其他人家也是不体面的。因此，不少家庭从孩子很小时就开始省吃俭用来筹措结婚费，对父母而言，子女婚嫁是最大的事，也是最大的开销。这种心理与40年前没什么两样，“在婚丧礼仪的场台，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29)。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

席[30]。此外，与过去相似，平时的储蓄主要用于婚嫁等礼节性开支；婚礼的各个场合都需要炫耀财富，以实现与提高家庭的地位。此外，来参加婚宴一般都是送了礼金的亲朋好友，酒水上的节省往往是不可取的。而男方婚礼排场不体面，新娘子及其娘家会深感到没脸面。为了娶媳妇，为了媳妇心满意足，举债置办也是必需的。过去，为了节省结婚费，曾流行"小媳妇"的做法，而今"小媳妇"制已被革除。因此，解决生活拮据，条件不好的男青年婚姻问题的现实选择就是娶外地媳妇和"上门入赘"。

娶外地媳妇从5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从外村、到外县，逐步扩展到外省，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70～1982年从外县嫁到开弦弓村的妇女就有31名[31]。娶外地媳妇相对而言，费用较低成功的把握较大。外地媳妇的引入，也部分缓和了庙港地区长期来形成的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同时，娶外地媳妇也造成了不同文化调适与传播，当时，娶外地媳妇也必然大大简化婚礼仪式，降低开支，使传统的旧俗发生变更。

80年代初，"上门入赘"对于儿多、经济困难家庭中的男青年是合理的选择，上门招女婿可以不必改姓，且可以完全继承财产，在成婚时，男方只需带少量"陪嫁"，上门入赘，除了节约费用外，还为男青年改变处境，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提供了可能。庙港四周乡脚的男青年乐意到市镇及其邻近村庄上门入赘而获得进厂做工和上镇做生意机会。

娶外地媳妇、上门入赘等择婚形式，大大拓宽了青年男女的择偶范围，也改变了其择偶方式。这两种方式至今仍继续着上升趋势，已成为庙港人婚姻生活的重要方面。

四

当代婚俗嬗变走向　80年代中期以来，庙港地区的农村经济和小城镇经济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村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

快，其中又尤以住房面积扩大居住质量改善最为显著。而随着村办工业，镇办工业的迅猛发展，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得以较快扩散、传播，对青年人的婚姻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择偶标准还是择婚范围与方式，无论是婚礼的操办还是夫妻间的感情生活，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嬗变。

首先，青年男女视野开阔，择偶范围扩大，标准更趋于感情相合与个人才干。来自四面八方的务工青年汇聚于村办、镇办企业中共同生产，共同切磋技术，彼此间自由交往，达到思想、感情上的交流。而随着乡镇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特别是轻工业对外来女工的需求，招工用工范围不断拓宽，近者外乡外县，远者全国各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技术交流的发展必须导致社会交往的发展，而交通状况的大大改善又促进社会交往，人们的择偶范围进一步拓宽；青年人之间的了解程度也日益加深。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在252对夫妇中，有78.31%婚前已是彼此认识，其中有59.04%的已是比较熟悉和了解，这其中36.55%是由同学或同事而发展为夫妻的，但也仍有22.49%的夫妇是同村的（即村内婚）。这比例与过去相比已大大降低（1949年至1981年开弦弓村的341对夫妇中，有60.4%为村内婚）[32]。这样对于稳固婚姻的感情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拓宽了青年人致富之路与成才之门，有志青年可以有所作为。因此，传统的门第观念，择偶时重视家境的做法都显出了其落伍之处，青年男女更看重的是对方本人的人品，才智与能力，同时文化程度的高低也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择偶标准之一。对于女青年来说，勤俭能干脑子灵的挣钱能手是较为理想的人选，如果再加上人品好、没有什么不良习惯那就更为上乘。而对于男青年来说，漂亮能干会理家的女青年则是合适的婚姻对象。但是，这些都必须以"相处和睦"为前提，感情的和合已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标准，"处处

看，合得来则成，合不来则分”已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当然在同等条件下，家庭及自身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将会更优越些。

其次，生产方式由农耕转向工商，必然带来生活节奏与作息时间的改变，人们加快了婚礼筹办的节奏，简化了程式。青年男女大都务工或经商，闲暇难得，他们对传统嫁娶方式的繁文褥节与拖沓冗长心怀不满，但是迫于世俗力量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折衷行之。一方面缩减了过于繁复的程序和时间间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其中的一些做法。过去，定亲担小盘、担大盘，要耽误很多时间，而现在大家功夫抓得紧，年青人往往采取“一落盘”，定亲担大小盘，三合一。过去，婚期很长，从送嫁妆、亲迎、望朝、回门、望静要持续个把月，而现在，往往是早晨出发搬嫁妆、迎亲，午后便是新娘子回门。第二天则是望朝、望静了，有些人家甚至安排在一天中。过去，宴请宾客往往要三天九顿合家老小，有些路远的还住宿在主家，而现在一般都是一顿酒席后即回，有些工作忙的亲朋照常上班，只在到时来喝喜酒吃了便走，主家都能接受。现在，市镇上有不少人家已仿效城里的做法在饭店或单位食堂里一次性宴请以节省时间，图个方便与省力。现在即使是蚕罢或春节农闲，也没有了闲人，或务工，或做生意，或搞副业，人们深感“没辰光”，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可花在那繁琐的仪式与老派的作法上。当然，在这一点上，老辈与小辈，女方家庭与男方家庭仍未能达成最终的统一，但彼此没有冲突，双方都在妥协、让步。

再次，实际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新生活方式的传播也对婚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是双向的。一方面，人们感觉到日子好了，生活富了，操办儿女婚事该尽可能奢侈，气派。似乎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人们感觉到像样就该按老法子来办，一样也不能少，因此传统婚俗又复出登台，且越演越烈，花费也因生活水平提高，花样复杂而剧增。现在，在庙

港及其乡脚仍流行拿贴子，且要行小盘和大盘。行大盘时，男方要给女方送去金首饰，其包括一只戒指，一只手镯，一副耳环和一根链以及"衣裳钿"。而"拿帖子"时要送八斤糖，四斤毛线一两斤丝绵及彩礼。在庙港及其"乡脚"一般是在结婚前半年行盘，且基本是在结婚登记后。换帖子而未行盘，女方是不可以在男方家吃饭的。而行盘后男女双方交往则自由多了。这些繁琐的环节增加了开销同时也牵扯当事人及其家长大量精力，甚至还会导致矛盾。随着楼房普及率的提高，新房的装修与陈设也日益考究。除了新婚夫妇的专用房间外，大多人家都建了新人专用的卫生间，浴缸，抽水马桶等先进设备，一般在子女娶亲时进了农家，经济宽裕的人家甚至连同长辈的卫生设备一起添置，因为大家还不习惯两代夫妇合用一套卫生设备。在七一村我们还看到新婚夫妇有两间新房，一间作卧室，另一间作会客室。这种做法在房子紧张的年代里是不可想象的，会客室的出现，一是交往繁多的需要，二来也是对个人生活尊重的表现。家具与灯饰也总是追求新潮，乡村里新房的陈设总是跟着城里流行节拍。而嫁妆总是最最流行家电与日用品的小型展览。从 80 年代初的落地电扇到全自动洗衣机，再到现今的电热油汀、空调；从黑白到彩色，到直角平面，再到时下的视霸。昔日锃亮炫目的凤凰、永久彩车已被山地车、变速车代替，而殷实的人家则陪上了"木兰"轻骑。这其间涌动的是生活条件改善后的攀比，最终将结婚费用抬上一个更高台阶。庙港青年眼下的结婚费用至少在五六万之间，如果包括住房建设则要高达八九万。然而，新房边上父母弟妹的房间的摆设则是相当陈旧的，五六十年代简单的婚礼未留给现在的中、老年人什么家底，对比之下更显得新房陈设的讲究与豪华。然而在现代陈设之间却总见传统的影子，房内里各类盆桶里撒满喜果、长生果、发芽豆象征早生贵子，虽有了抽水马桶，但子孙桶里也要让男童象征性地撒上一泡尿；新房里放上两段甘蔗，则是甜甜蜜蜜

的象征，这些做法无伤大雅，讨个吉利祥和，人们都很乐意采用。现在新郎自然是西装革履，帽子自是他们不喜好的；然而，作为男方按老法照样要行"上冠礼"，送上一两百的帽子钿。虽说今日的庙港交通已四通八达，接亲船与花轿已让位小轿车或是摩托车什么的，考究的还有摄像机尾随后，然而"抱嫁"，"绕火堆"却依然如前。庙港人自己也说："生活好了，老法子到又兴了。"老法子在某些方面很顽固，即使是最新潮的年轻人也无法说服自己或说服父母、亲友免去酒水，他们虽已会披上西洋的婚纱，会去旅行结婚，然而仍要摆设喜宴，约请乡邻及亲友，在庙港人眼里，七八百元一桌的酒水是不可无的，只有吃了喜酒，男女双方是正式夫妻，这是庙港的"婚姻法"。虽然人们心里很明白登记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但仍执著于喜宴。有些庙港的年轻人已到松陵或苏州工作，有些甚至已北上京城或南下广州，他们在工作地举行婚礼的同时仍要回乡里设宴摆酒。结婚喜宴因其重要文化功能，全国各地都很重视，然而在庙港喜宴还有着更为严肃、庄重的意义。在庙港，除了邀请乡邻与至亲，还必须要请来男方的"小朋友"和女方的"小姐妹"。过去，各只有七八个"小朋友"和"小姐妹"，而现在小则四五十，多则上百，他们都是男、女方各自的要好朋友。"小姐妹"在女方怀孕后要"担汤"，而孩子降世后，孩子的舅舅要给"外甥团子"，数量因亲戚及"小朋友"、"小姐妹"人数而定，然后由孩子父亲去分发给亲戚及"小朋友"、"小姐妹"。而"小朋友"与"小姐妹"的程式，送"外甥团子"的礼俗，无不围绕着婚姻关系及其子女的合法性而展开，可见其重视喜宴的原由。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宴请范围不断扩大，四邻八舍，"小朋友"、"小姐妹"，新老亲戚、同事、同学，甚至还包括双方父母的"小朋友"（俗称"老朋友"），一般都在二三十桌左右，这必然加重主、客双方的负担，普通人家都有难言之苦。此风愈演愈烈，且难有"刹"下之势。大家推波助澜将结婚费用推到了令

彼此都难以消受的地步。

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生活方式的采用也荡涤了某些陋俗、恶俗，使婚仪更适应新生活。“闹洞房”之俗渊远流长，人们无法知道其源于何时何处，但许多人深受其扰，却又无可奈何，现在，庙港城乡“闹洞房”之风不兴。酒席若设在饭店宾馆，一般不去主家，而即便酒水设主家，席散之后很少有人闹洞房。一是现在每家新房都装饰一新，有些甚至是空调房间，大家都能知趣识礼；二是，现在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剧增，不必以闹洞房来寻开心。这样，席散过后，年长的聊聊天，吃吃茶，而年轻的最多是看看电视、录像、唱唱卡拉 OK，或打打麻将，大部分因功夫紧而饭后即告辞。新颖舒适的套房于 80 年代中期起逐步为庙港人所喜欢，客厅便代替了老式的客堂，其布置新潮、摩登，这样，各类祖宗牌位，各路神仙塑像就不易驻扎下来，拜灶，祭祖也就更容易消除。

第三，80 年代中期以来，在庙港人的婚姻生活内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传统的婚姻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夫妇关系只是配角，革命年代，夫妻间正常的感情生活被为异端，长期以来，亲密的夫妻关系是不妥当的，也是社会难容的。但是，随着爱情成为择偶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也因缘于居住条件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休闲方式的改变，婚姻关系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过去，饭后闲时要么一大家子天南海北，要么邻里互相串门闲聊，要么桥头街口纳凉消暑；而现在，电视机、录像机日益走入寻常农家，人们更喜欢在家看电视。核心家庭即“小家庭”比例日益提高，而联合家庭即大家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即使在大家庭中，往往是每对夫妇均有各自的房间和娱乐休闲设施，这样，夫妇间单独相处的时间大大增加，而与父母或岳父母相处的频度则大为减少。现在，长辈对这种做法再也不会表示或至少不会公

开表示不满，而晚辈也是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的调查发现76.5%的丈夫最经常与妻子儿女共度闲暇，而仅有1.99%的丈夫与父母或岳父母在一起。而87.10%的妻子认为她们最经常与丈夫、孩子在一起，只有4.44%的妻子认为她们最经常与父母或公婆在一起共享闲暇。同时，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有3%左右的夫妇最经常将子女交给长辈，而夫妇单独在一起，这比重虽很低，但毕竟表明他们已将夫妻关系视为主轴且愿意承认此点。虽然如此，由于贯彻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传统的育儿方式仍居主导地位，人们即便有空余的房间也是将子女带在身边，甚至同床而眠，可见子女在夫妻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庙港人观念中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实际生活中丈夫的对外交往频度远高于妻子，孩子与妻子相处时间较多，有29.03%的妻子也认为她们最经常与孩子在一起。但是，现在在庙港有不少丈夫也担起了辅导孩子的学习的任务，有10.76%的丈夫认为他们平时有空，最经常辅导小孩学习，而妻子最终经常辅导子女的比例则是8.76%，这可能男性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有关，同时由于有不少妇女要在乡镇企业上夜班，这样，也会导致丈夫更多地承担育子的责任。与传统的婚姻关系相比，虽然妻子也较多照顾孩子，母子轴仍占有一定位置，但是这并不危及夫妻关系；相反，孩子还是稳固夫妻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感情交流的纽带。同时过去公婆与丈夫之间的母子轴已不再是重点，婆婆也不再是具有权威的家长。现在，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及婆媳关系三者中，人们更看重夫妻关系，但婆媳关系不好仍是影响母子关系、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有不少家庭因婆媳不和而分灶、分家，甚至不相往来，但因此而导致夫妻离异则不多见，这其中既有男多女少的影响，也是婆媳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过去，婆婆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权力中心，而媳妇经济上难以独立，媳妇的私房钱是非法的。而现在，媳妇多数有自己职业，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相反婆婆却因缺

乏老年社会保障而不得不依赖于晚辈，其对儿子、媳妇的影响力已下降。

夫妻关系中另一深刻变化则是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其自我意识逐步萌发。开弦弓村妇女传统上不干农活而主家务，而今日，大部分庙港妇女都是田里头样样干，养蚕缫丝行行精，妇女是家庭经济主力。一方面，庙港是蚕桑之乡、丝绸之乡，妇女是乡镇工业、集体经济的主力；另一方面，妇女又是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的主力。特别是1994年年底以来，从邻镇横扇刮来的"羊毛衫风"又使能干妇女再显身手。不少家庭或单独，或联户搞起了羊毛衫加工，一般男的负责采购原料，联系外加工，推销等，而放样、机织、检验以及管理外来妹都落在妇女头上。夫妇间分工井然有序，共同发家致富。而妇女则通过羊毛衫加工更多地参与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眼界大开，信心倍增。同时，加工户由于活急量大，人手不够，常常将部分加工零活放给邻居或好友去做，开成了一个外围加工圈，有专业技术的女青年，一般在家用封套机套封，而年长些则从事技术要求低些的缝钉扣等。这样，不仅富了自身而且富了一片妇女。妇女收入提高，经济上的独立，帮助妇女从昔日对丈夫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她们在家庭中地位也因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有所改变，她们已敢于对丈夫的游手好闲表示不满，也敢于因丈夫的不忠和不轨而提出离婚要求；但同时，她们对丈夫频繁的社会交往也表示了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庙港妇女是凭其勤劳与灵巧，而赢得了自信与自立。在庙港，无论老少，都以"勤俭"为本，无论是新婚燕尔的新娘子房间里的封套机，还是老年妇女新添的用来卖小菜的小三轮车都可见此庙港特色，而走在庙港的村头路口常能看到采桑叶和割青草的白发老妪，可谓生命不息劳作不止。同时，勤俭也是她们用来评价他人的重要标准。现在在庙港，无论媳妇来自何处，何类家庭，只要她勤俭便能赢得大家的信任，也是夫妻和

美、生活幸福的保证。如在开弦弓村有来自苏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上百个外来媳妇，其中既有个别"懒"、"笨"、"馋"的媳妇，她们不愿进厂务工，也不愿下田干活，更不愿搞副业，只是在这家中带带小孩，做做家务，但也有既勤力又而耐劳，既会做人又善处事的外来媳妇。对于这些好媳妇，开弦弓村人没有因她们来自苏北等外乡而歧视，相反却非常赞赏，很"看得起"，有些外来媳妇还是乡办企业或村办企业的中层干部。据庙港镇妇联主任介绍，外来媳妇中闹矛盾的绝大部分是妻子太懒，不愿干活，却贪图享受，故三天两头吵架、闹事；而勤俭持家的外地媳妇则少有家庭矛盾。

庙港妇女虽然已能在经济上独立，但是她们却难割舍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女的那份感情上精神上的依赖，完全要求她们彻底独立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同时，她们还没有能够摆脱传统的角色期待，在行为举止间限制自己。现在，在庙港，丈夫出外娱乐是无可非议的，且是不必向妻子告假的，而妻子如果外出消遣则会带来丈夫及公婆的不满，也会破坏夫妻关系。在调查中我们得知有9.16%有空丈夫最经常出外与朋友聚会，而只有2.79%的妻子最经常出外与小姐妹一起玩。虽然镇上有影剧院、歌舞厅，但已婚妇女是不可以在这些场合出现的，丈夫也绝不会带妻子去这些地方。在他们（她们）眼里，妻子该是本份而老实的。人们对于婚前正常男女交往还能持理智态度，即使是男友，也能容忍其女友在行盘前与其他男青年健康交往，但对已婚妇女异性交往则非常敏感，媳妇们也总是恪守妇道不越雷池。

庙港人的婚姻生活至今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则在庙港却有一个领域还有待进一步蜕变。近几年来，渔民收入大增，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且渔民大多已从船居改为陆居，在庙港镇沿着湖滨最气派的楼宇大抵是渔民自造的。但是优厚的物质条件并未能吸引村民与渔民通婚，在庙港少有村民或市镇上的居民愿意与渔

民子弟联姻，渔民与村民仍有不可逾越的通婚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来自封建社会对渔民的歧视以及对渔民所采取的隔绝政策，另一方面，隔绝也导致彼此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的差异。过去太湖渔民四处漂荡，居无定所，因而与陆上居民通婚可能性极低，大抵在圈内择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即便前几年渔民经济地位上升较快，生活较村民富裕，村民仍然不愿与渔民通婚，渔民仍是"圈内婚"，这一现象今后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因为扫除村民与渔民间隔阂还需依靠社会进步与观念更新。渔民与村民间隔绝是滞后于整个庙港社会生活发展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双方。

（东南大学　沈群红）

注：

(1)《吴江县志》康熙卷十六。

(2) (7) (8) (9) (13) (14) (15) (17) (23) (25) (26) (27) (29) (30)《江村经济》第231、30、29、31、39、29、32、32、34、165、165、166、85、85页。

(3) (11)《吴江县志》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卷二十八。

(5)《震泽县志》，乾隆。

(6)《平望志》，清光绪十三年重刻本，卷十八。

(10)《震泽县志》，光绪刻本，三十八卷。

(12)《吴江风情》，天津科技出版社，第85页。

(16)《震泽镇志》，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18) (20) (22) 费孝通：《外访杂写》，中国展望出版社，第43、43、43页。

(19) (21) (2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0、41、47页。

(28) 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

(31) (32)《江村信息》，第23、22页。

生 活

由婚姻的缔结而派生出来的是生育、家庭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心理问题。而家庭的组成结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又不仅是由婚姻关系决定的，更重要的它们受着社会（区）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而显示各种不同的状况。

一

生育礼俗 据《平望志》介绍，“妇人妊子，亲戚以糖、蛋、核桃、龙眼等物馈者，曰‘送汤’。其母家以粽馈，曰‘解缚粽’，寓易产意也。子生三日，具汤饼亲友，曰‘三朝面’。亲友以银钱及他物在月内馈者，亦曰‘担汤’。至戚馈鱼肉等物。曰‘送熟汤’。满一月剃发，曰‘剃满月头’，复具酒肴燕亲友，曰‘满月酒’。子过一岁，设寿星神马，具果疏、酒食拜神，又设盘具、笔砚、权衡、印剑等物使子自取之，曰‘拿周岁盘’”[1]。

在庙港地区，“担汤”自古就有，且一直保留至今，只是随着物质条件不同，所担之物有所不同。庙港流行“担生汤”和“担熟汤”。所谓“担生汤”是在孕妇有两三个月身孕直至临产前这段时间里女方亲友送营养品给孕妇。过去一般是鸡蛋、蹄子、肉、枣、糖等物，而现在除了营养品外还有毛线等物。亲戚来担生汤，主家要置办酒席。过去亲戚三三两两来，酒席较简单，而现在一般都是把该来的亲戚约约齐，一起来担汤，统一置办酒席以节省时间。在庙港，“担生汤”是一定选好日脚，农历正月、五、六、八、十、十二月是不能担汤的。如正月担生汤，小孩会是

"蒸笼头"，而五月，音谐忤，小孩会是忤逆胚，十则音同"贼"，小孩会是贼骨头，十二月为年末，也不宜担汤。因此，担生汤要尽可能避开这些，只不过年纪大的更看重，而年轻人则无所谓多了，甚至有些年轻人只知要避开却不知缘由。小孩出生后要熟汤，"小姐妹"要买长糕，送小孩"百岁钿"，一般担熟汤放在满月前，送去些糖，奶粉等以表慰问。

小孩满月，旧时要设满月酒，而现在一般不做。过去，孩子满月后要去亲戚家做小客人，而现在也不必急着去，而是可以放到春节期间再去拜访。对于这种变化，庙港人推说大家都很忙，其实除忙外，对孩子及妇女的关心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人们为了防止小孩受风寒或遭惊吓，尽可能不外出，就连去医院看病、打针也非常慎重。

在庙港，生育礼俗方面也是不断移风易俗，讲究日益简单了，但是"外甥团子"这一特色却一直保留着。"外甥团子"由孩子舅舅做了送来，一般要做七八只纱罩，然后由孩子父母逐一去分送。除亲友外，必须包括父亲的"小朋友"和母亲的"小姐妹"。收到"外甥团子"是一定要还礼的。由于"小姐妹"、"小朋友"越来越多，而送去的"团子"与还礼在价值上又极不相称，因此大家都深感此礼俗的麻烦，但即便如此，做父母的必须去送，否则会落下看不起亲友的罪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姑姑也是负起义务的。姑姑要在第一年送鞋和袜，鞋里要放红蛋；第二年又送鞋子，第三年则是衣裳和豇豆（意味长，长即长）。姑姑送来这些后，孩子父母则要盛上两只蛋饺、一条鲤鱼、两块肉、两只圆肉和一碗糯米饭。现在，大家觉得这些过于繁杂，于是便改为一片生肉，一条活鱼，这样对双方都便利，但是送鱼肉不可以成单。这些对双方做家长的，做舅舅的、做姑妈的都是不可推卸的，否则万一孩子有什么不测，就很难交代。而近年来，在庙港刮起了担外甥、侄女风，且年年都有些讲究。如 1995 年伏天，庙港"担

风"中规定必须七种带核的东西每样七个，这使原来的程式又更添上了迷信色彩。

庙港人在孩子出生问题是较为讲究的，这在过去是因为医疗水平低下婴幼儿成活率低，而现在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们非常疼爱孩子，因此总担心做得不周全会有什么不妥。而对于产妇饮食与休息等问题上显得较为开通。过去一般农家的产妇营养是难以保证的，也无甚忌讳，除了过咸、过凉的，其他大抵都吃。现在，人们也没有太多的禁忌，一般什么营养高吃什么，什么流行吃什么。前几年城里流行鸽子、乌骨鸡，庙港产妇很快也同样规格。在产妇营养与休息问题，人们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一般人都认为医生的话是要听的，有些拿不准的事情也总要向医生咨询。如过去老法子接生要产妇产后不能睡觉以免昏死过去，现在人们懂得产后休息的重要性，一般都让产妇遵照医生安排，庙港通过新婚学校、婚检、围产期检查等种途径、多种形式宣传优生优育科学知识，科学不断战胜落后与愚昧，也荡涤陋俗。但是，由于生活条件过于优越以对下一代素质的过分关注，有些孕妇往往休息与营养过度，导致胎儿营养过剩，甚至引发难产。这看似生活改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质还是没有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目前，镇医院正在积极筹办爱婴医院，认真推行母乳喂养，宣传保健知识，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是改造民风民俗的重要途径。

二

人口控制　由于人多田少，庙港传统上有着自发的人口控制观念与方法，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已注意到溺婴现象，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认这是

不好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免贫穷呢?"[2]"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父亲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父母的眼中，女孩的价值是较低的，因为她不能承继'香火'，同时她一旦长成，就要离开父母。"[3]庙港上了年纪的妇女谈到溺婴时，说:"多了，是养不活的。一般有了一个儿子，就不再想要。最多也是再要个女儿。有的人家有了女儿，领个小女婿，就再也不要了。"在没有控制生育其他措施的年代里，为了确保子女不受穷，通行的办法就是溺婴或将孩子送寄他人或送进城里。有的老人甚至一连溺杀了十个骨肉。此外，开弦弓村传统的接生方法也为溺婴创造了便利。产妇坐在子孙桶上分娩，胎儿娩出后落入桶内，如果不想要便将水倒入桶内，盖上桶盖，溺婴即告完成。母亲听到婴儿啼哭，乃至挣扎声，但也无奈。同时，溺婴也是一种人口的自然淘汰。有一妇人生下一男婴，溺杀，但小生命顽强，几次三番将桶盖顶起，母亲无奈只好留下，最后辗转送给他人抱养。由于庙港地区耕地资源紧张，常年受灾，因此常常有孩子送不出去的现象发生，这更加剧了溺婴。除此以外，"人口到了饱和点后，过剩的人口自得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4]。庙港到松陵、苏州、无锡等地谋生的人很多，这对于减轻人口压力也有一定的帮助。根据 1935 年的统计资料，整个吴江地区是江苏省家庭平均人口最低的地区，平均每户 3.9 人[5]。开弦弓村"1935 年时，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 4.05 人"[6]，"16 岁以下的儿童，总共只有 47 名，平均每家 1.3 个"[7]，如此低的人口出生率是自我控制人口的结果，也是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导致的。在人们观念深处，人们希望绵延的香火，人丁兴旺，择媳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是"身体健康"[8]，有生育能力。在开弦弓村"正因为人口控制是为了预防贫穷，一些较大产业的家庭就不受限制有更多的子女。他们自己有为数众多的子女感到自豪，而在人们的眼中又视为富裕的象征"[9]。开弦弓村控制人口的种种做法，是迫于现实的残

酷，但久而久之，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更具有了经济头脑。

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该地农民仍保持了溺婴这一传统，这使得庙港地区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阶段，仍保持着全省最低的增长率。50 年代末以后，由于政府提倡多生子女，禁止溺婴并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和必要的宣传教育。为了防止溺婴，将所有临产的妇女集中起来严加看护，日夜开会宣传说溺婴将受监禁的处罚而阻止溺婴。有位妇女准备溺婴，婴儿啼哭，由于害怕吃官司不得不将婴儿从桶里抱起。人们将禁止溺婴朴素地理解为"毛主席喜欢小孩"，"逐步放弃溺婴的传统做法是政府倡导与要求的结果。1966 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到 1899 人，比 1954 年增加 459 人，即 31.9%，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10)。1964 年江苏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落实节育措施，但广大农村出生率未有控制，后来随着农村节育与避孕措施的逐步采用，溺婴才最终在庙港地区绝迹。与全国一样，"文革"初期也是庙港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70 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与落实，特别是各种便利安全的科学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人口控制又有了保证。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庙港地区曾动员已生育两胎都成活的妇女采取节育或绝育手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排队做手术，如果说这个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毕竟是符合妇女意愿的，妇女们都能接受。不少妇女听听长辈诉苦，为自己能免除溺婴之苦而感幸福，而长辈对计划生育工作也较支持。80 年代以来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及后来的"独生子"政策在庙港也未遇到阻力，人们自觉拥护并支持。该地区六七十年代就有不少独生子女家庭，80 年代以来，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又不断上升。如开弦弓村，50 年代一对夫妇平均有子 1.46，女 1.1，而六十年代则分别为 1.41 和 0.96，70 年代（包括 1980、1981 年）则降低为 0.86 和 0.77(11)。1984 年，政府将照顾生育二胎的对象增加到 11 种，刚开始几年，还

有一些庙港人享受政策照顾生育二胎，而现在，放弃二胎指标已越来越普遍，几乎90%的夫妇放弃指标而领取独生子女证，有些甚至主动找妇女主任、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要求放弃。有些夫妇即便暂时保留指标，但其意愿也极低，特别是晚辈。王淮冰同志1993年调查时，1992年开弦弓村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没有1户要求生育二胎，而今年调查时，周凤英主任告诉我们有36对夫妇放弃了二胎指标，没有申请。开弦弓村如此，整个庙港也是这样。该区计划内二孩率以及计划外二孩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三访开弦弓村时得到很有把握的答复"这在我们这里没有多大困难的"[12]，而今天计划生育和妇女干部对此把握更大，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友善的接待。

近十年来，庙港乡镇工业，特别是丝绸工业发展，大大增加了妇女进厂务工的机会，女青年比男青年更易进厂，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重男轻女观念。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妇女就业机会还会增加，"男女都一样"会更深入人心。现在当地农民就有一比"儿子是的确良——挺括，而女儿是棉毛衫——贴身（即舒适)"，而当地招婿入赘的习俗会继续流行，且庙港经济的发展必会招来各男青年上门落户，这也会进一步淡化男尊女卑，人们会从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意识到"男女一样"，而确立正确的人口观念，使男女性别比趋于正常。

即便如此，庙港计划生育工作仍认真地开展着，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务农的育龄妇女每个村民小组有信息员，了解妇女行经情况以此来监管，而对于务工的育龄妇女则由厂里女中层干部、班组长负责管理。即使是流动性较大的外出务工的本镇育龄妇女，庙港地区也采取了有效的管理，如有些村规定外出育龄妇女应该在五.一、春节回来，村妇女干部或亲自上门看望了解情况或召集开会。总之，对全体育龄妇女的管理形成了高效有力的网络。另外，庙港根据蚕桑之乡的实际，选

用的妇女干部特别是村妇女主任大都是养蚕剥茧能手，担任蚕桑辅导员。她们在平日手把手的辅导、解困中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村民总是相信她们，自然也相信她们宣传的政策。此外，由于计划生育工作中最大的障碍是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老年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养儿防老"仍有实际的需要，因而庙港镇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奖励措施，另一方面则提高农民保障程度。庙港农民在领结婚证时，政府要求他们参加新婚保险，保其中一方；而在领独生子女证后，则又将独生子女费转为养老保险给领证夫妇，再保另一方，这样夫妇双方都可得到安享晚年的重要经济保证，解除了后顾之忧。

开弦弓村传统上自发的人口控制迫于贫困，而今日庙港人自觉的计划生育行为则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所带来的观念更新的结果。随着工业化、基本现代化的实现，庙港人会越来越科学地对待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口的素质必会有彻底而全面的提高。

三

生活质量 庙港，经过世世代代的风雨，如今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过去，在解放前人们所穿的衣服主要是以亚麻布或者棉布为主，尽管开弦弓村的工业以蚕丝业为主，但是丝绸在那时只是出口的，并非为本村农民消费，当时"只有少数人在正式场合穿着丝绸衣服"[13]。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生产积极性随之提高，粮食产量也增加了，由此农民购买生活用品的能力也渐渐提高。"据 1951 年和 1953 年末对 709 户的统计调查资料，仅棉布一项土改前农民人均购买 16 尺，土改后为 26 尺。"[14]可以说从解放后至 50 年代农民在穿衣上不再有困难。而衣服的式样，颜色在"文革"十年中是单调的，直至 80 年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

改善，社会交往渐渐多起来，许多人才开始注意穿着打扮。过去很少人问津的丝绸进入了寻常人家，化纤、尼龙、毛织品、针织品、毛线等成为人们购买的对象。而且，随着人们追求美的意识加强，已经注重衣服款式的新颖、美观、大方，特别是许多青年人，不再像上一辈愿意自己动手做衣服，大多数是购买成衣，诸如金利来、花花公子、梦特娇、杉杉等名牌服装，如果你随便在镇上走走，你会发现衣服已不像过去起着区另身份的标志。因为人们平时不再穿补丁衣服，即使在干农活时也是穿较旧的衣服，所以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情况在庙港已不复存在了。

解放前，这里大多数农民为了生存拼命地劳作，即使解放后头几年，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搞"穷过渡"，在50、60年代农民的日子也是比较艰难的。70年代末实行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又发展了家庭手工业、农村副业，温饱才不成问题，进而开始注意营养问题。不信你随便拜访一些普通人家，就会发现，在平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荤素搭配，荤腥食品一般有肉类、蛋类、家禽、水产等，素食主要是各种蔬菜、豆制品等。食物品种如此丰富，就是儿童的零食也是多种多样，诸如：酸奶、果冻、膨化食品和各色冷饮更是吸引了不少孩子，现在一般一天花2至3元购这些零食已经很普遍，而在70年代，孩子们只能吃到一分钱二块的"梅饼"，或五分钱一包的杨梅干、桃片等。

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民来说，在满足了吃穿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考虑最多的是住房问题。盖房子可以说是中国农民一生当中的大事之一。30年代开弦弓村农民所住的房子主要是由城镇里的专门工匠修建的。房屋一般是砖墙、木架、瓦顶，且"修建一所普通房屋，总开支至少500元"[15]。其实，开弦弓村农民真正有建房的心愿，还是在1978年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逐步发

展，农民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手头上开始有一些储蓄，于是渐渐地产生了盖房的念头。不过在80年代初期，建房还是有困难的，“比如土地少，建筑材料不容易买得到等等”[16]。加上当时农民主要还是倾向于为衣食等基本生存条件做较多地改善，因而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农民盖房的投资才有所增加。这一时期一般花3~4万元就能盖起一幢不错的楼房。这以后，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现代城市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影响，近几年来，人们觉得花十多万盖的楼房，只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样，几乎家家户户盖起了房子。据对252户庙港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有69.48%的人家住的是自家盖的楼房。而且，随着建材工业的发展，人们又讲究起室内的装璜，不再像80年代中期那样，家家类似，外表是砂墙，屋内是石灰粉刷的。现在，室内一般都用上了墙纸、地毯、地砖、吊顶、护墙和拼木地板，外表则开始贴马赛克、墙砖、锦砖，各具特色，有的高雅、富丽；有的清新、舒适，而住房的宽敞又是现代都市工薪阶层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满足了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后，这里的农民又把购买力投向用和行的方面。在用的方面，现在大多数庙港人已经不满足过去的“老四件”了，可以说中低档的消费品基本普及，一些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也渐渐多起来。据这里的252户居民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黑白电视机、缝纫机、收录机的拥有比例分别是84.53%、81.75%、41.67%，而彩电的拥有量也占38.54%。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商品意识越来越强，为了更准确、及时、广泛地获得大量的各种经济信息，节省宝贵的时间，一些有条件的农民和村干部的家，安装上电话，有的甚至配上了BP机。在这调查的252户中，就有19.45%的家装了电话，有6.35%的人家有BP机。这些在60、70年代，人们根本不敢想的高档家用电器，如今不再是都市人的“专利”了。其次，在使用的灶具方

面，过去人们普遍使用的是大灶，直到70年代末以后，煤气、煤炉才为人们使用。以252户农民的抽样调查统计来看，有88.48%的人家有煤炉，74.6%的人家用了煤气灶，而传统的大灶依然存在，其比例为83.33%。虽然现代化生活用品能为人们带来方便、清洁，但是庙港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生活用品。再次，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庙港的交通变化。由于这里水网密布，历史上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船。甚至在50年代船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现在人们最喜欢使用的是自行车，不过近几年，摩托车又开始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而传统的小三轮正在减少。还是以252户居民的抽样调查统计为据，94.43%的人家有自行车，这一比例高出小三轮的0.8%，但是拥有船的比例为60.72%，因为这里紧靠太湖，船是他们生活、交通的重要工具。而且就在水运发展的同时，庙港公路已经建成，特别是1982年，震庙公路通车后，汽车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90年，全镇汽车已经超过20辆。当船停航时，人们就改乘汽车。除此，还出现了“三卡”机动车，相对汽车而言方便、省时、价廉。交通的不断发展，便利了人们生活，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庙港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开阔了他们与外界接触的视野。

经济的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变迁，才使得庙港人的生活发生了上述诸方面的变化。我们知道，庙港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多地少，历史上这里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单纯依赖种植水稻是不可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还必须发展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而从本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庙港的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由于多种方面的因素，其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1978年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在开弦弓村则是在1982年后，才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改变了

开弦弓村农村经济结构，尤其是80年代初以后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使得长期只能靠种粮食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由此一些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寻求生活之路，农业和工业同步发展，为庙港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由于每年家庭收入的增加，他们已不再为温饱发愁，开始讲究"衣着漂亮，吃讲营养，住要宽敞，用则高档，行讲方便"的生活方式。当然，庙港人们的生活水平要真正达到小康水平，毕竟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四

经济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庙港人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了农村社区中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变化。不论是家庭结构，还是家庭功能及家庭闲暇生活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家庭结构 家庭以"主干家庭"类型为主。我们在此所称的"主干家庭"就是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所指的以一对已婚配偶为核心，再包括几个依赖于此家的次系亲属"，此种类型的家庭，开弦弓村在30年代占58%；而"大家庭"即"有一对以上已婚夫妇的家"，通常人们又叫"联合家庭"，开弦弓村在1936年不到全村家庭总数的十分之一。解放后，开弦弓村的家庭类型也没有多大变化，例如1956年"联合家庭"占全村家庭总数的10.9%。而今天则还是以"主干家庭"为主，但是"核心家庭"开始出现，并有上升的趋势。从这252户居民的抽样调查，可以看到56.87%是主干家庭，21.03%是核心家庭，而联合家庭只占13.1%。因此，从30年代以来，"大家庭"的观念，在江村一直不像中国其他农村社区那样为人们所重视，而是在慢慢地淡化，代之而来的是家庭小型化。

以"主干家庭"为主是该镇家庭类型的特点，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庙港的家庭功能的变迁。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功能是和

生育、生产、消费、赡养和教育等。解放前，开弦弓村的家庭是生活与消费的基本单位，同时它还兼负生育、赡养、教育的职能，那时，人们把生育不仅看做是“传宗接代”，向祖宗表示孝敬、姻亲关系及妇女社会地位的确认，以及建立夫妇间亲密的关系，稳定家庭群体里各方的关系”[17]；而且还认为“生育子女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例如：孩子很早就可以对家庭福利作出贡献，最终是父母老年时的经济保障。”[18]而从1952年在农村开展计划生育以来，生育功能明显减弱，但人们还希望有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毕竟孩子是维系夫妇双方感情的纽带。至于生产功能，解放前这里的农民主要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经营单位从事种植业、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土改以后，尤其是50年代初合作化运动，农民自愿协作，办起了合作社，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功能在弱化。因为在那时，搞农村副业、家庭手工业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农民只能依靠生产粮食，勉强维持温饱。到80年代初，由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家庭的生产功能又得以恢复，曾经在60、70年代一度中断的家庭经济又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家庭手工业发展势头迅猛。拿羊毛衫加工业来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羊毛衫的机器，许多女孩出嫁时，父母还为她们准备一台羊毛衫编织机作为嫁妆，以期她们结婚以后，在业余时间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为自己增加更多的经济收入。一般来说，庙港的羊毛衫加工业其原料主要来自外地，织成的羊毛衫则运往外地销售，只有中间加工环节是在家里进行，因而人们又称它为“两头在外”的工业。正是由于诸如羊毛衫加工业的家庭经济的发展，需要形成采购、运输、销售等相互联系的经营环节，促使一些已经分家的家庭又合作起来。在镇上我们了解到有一农户，家里有两儿一女，都已经成婚。其中小儿子与女儿合搞了羊毛衫加工业，因为生产需要，孙子只好由老母亲照看，儿子主要负责采购、推销等业务，

女儿则在张家港的妙桥租柜零售羊毛衫，而加工人员是雇佣的外来劳动力。因此，虽说这几年出现了“核心家庭”这样的小家庭，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更有效地经营，使得一些家在分开之后，在合的方面有所强化。尽管经济的发展，为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不少变化，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老年人的赡养还是由家庭来负担，前面提到的“主干家庭”在这里占主导地位，也是与老年人的赡养有关。最后，教育的功能不再以家庭为主。解放后，随着教育制度的建立健全，教育子女的功能已转向社区。

家庭功能 在庙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传统的家长制、父权制、夫权制却得到了洗刷。长辈、父辈不再以权力服从，而是以经验服人、以理服人，夫妇间是平等协商的关系。首先，我们以252户居民的抽样调查统计来看，在大事、小事上夫妇协商作主的分别占60.56%、37.25%，而由父母或岳父母做主的则分别为8.76%、9.31%。并且，家庭还出现了民主化趋势，父母对孩子不再像解放前以封建习惯来控制小孩，而是倾向于以平等身份教育子女。如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这252户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由父母提参考意见，子女作主的占56.57%，而子女独立作主占6.77%。其次，在对待婚姻上，比较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而在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万万不能违抗的，尽管解放后，通过宣传和贯彻《婚姻法》，人们开始提倡自由恋爱，不过总的说来，在“文革”之前，人们的择偶方式还是传统的做法。“文革”之后，人们思想观念才真正发生了变化，自由恋爱结婚才渐渐多起来。尤其是从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婚姻的质量，追求婚姻生活的美满与幸福。从这252户的抽样调查，其中自由恋爱成婚的占49.4%。再次，妇女地位大大提高。相当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而言，庙港的妇女在解放前地位就有了改变，尤其是30年代缫丝之业实行了集体工厂制度以后，

一些妇女到工厂挣钱养家，她们的经济地位相对稳固。但由于封建观念的深厚，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才真正开始得到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庙港绝大多数妇女独立自主意识加强，家里家外都显示出她们的才能。

家庭闲暇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影响是多方面的，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社区的闲暇时间有所增加，我们知道，闲暇生活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曾十分重视闲暇时间和对闲暇时间的研究，他称"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的本身"。可以说闲暇生活为人们自由活动和求得自身发展提供了机会，而闲暇生活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生活质量的好坏，其主要内容包括休息、娱乐、学习和交往等。

对于庙港人来说，解放前他们的闲暇时间主要是平时劳动后的晚间及农闲时间。在晚间主要是一家人团聚，吃饭，谈话等，而在农闲时间，男人们上茶馆，在那儿互通信息；妇女则带着孩子走亲戚，回娘家。解放后，人们在闲暇时间里，不单单是谈天，走亲戚。尤其是在实行责任制后，人们拥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看电视，看电影，听广播，读报看杂志等。有的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种花，养鸟等，特别是年青人不仅在附近的舞厅、卡拉 OK 娱乐，还结伴到外地旅游，欣赏祖国的秀丽风景。不过人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看电视或走亲戚。据 252 户居民的抽样调查统计，丈夫或妻子平时看电视和录相的分别占 25.5%、26.69%，丈夫平时在家看书、看报的占 14.74%，而妻子平时看书、看报只占 3.96%，可见，庙港的一般家庭中，丈夫是比较关心外界，注意各方面的信息，而妻子平时有空最喜欢在家和家人拉家常，或者串串门。在社会交往方面，解放前庙港人主要是以血缘、地缘纽带关系进行交往，不仅在生产、生活上相互帮助，而且出于休闲、娱

乐的需要，人们集聚在一起，从事各种形式的游戏或活动，例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提到，在日常生活中，当某家由于缺乏劳动力来搬运笨重货物时，邻居们齐来帮忙；遇到经济拮据，也可以从邻居那儿借到小额现金，不计利息。解放以后，人们相互之间交往的习惯基本没有变化。如在70年代末以前，庙港人走亲戚是相当频繁的，一般是在年初和"蚕里"两次请客人，而且吃了中饭，客人会多玩一会，有的甚至吃过晚饭再走。而在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不仅走动频率低，而且客人总是匆匆地来，饭毕稍事歇息后就走。即使过春节，也只在过了大年初五才开始走亲戚，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似乎不在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生活的节奏，而无暇顾及其他，甚至忽略了朋友、同事之间的交往。就以252户居民的抽样调查来看，在逢年过节"到亲戚家，尤其是长辈家"的占95.56%，到"平常关系很好的朋友家"占4.44%，遇到困难最先求助于亲戚，例如在被问及最有可能向谁借钱一问时，选择"向亲戚借钱"的占53.88%，其次是"自家兄弟姐妹"占33.47%，而向"同学、同事借钱的"只占12.65%。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发生了变化，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大了，但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交往在庙港依然存在，这对于稳定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无疑是有益的。

五

心理变迁 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面前，庙港人的心理变迁既按其自身系统相对独立的变迁规律在发生着变化，同时又在其他社会变迁系统的影响和要求下而发展。

1、角色变迁及其适应问题。 随着庙港社区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庙港人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样化。亦工亦农阶层担当社会角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角色，勤劳和朴实憨厚是农民角色

的基本社会期望；一是工人角色，技术性要求、精明的效能感和开拓性又是企业人员基本社会期望，角色的变迁要求亦工亦农阶层有良好的适应。同时职业的变迁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不尽相同的心理素质要求，这样又带来了职业选择中的困扰，不明白自身的心理素质能否担当某一社会角色。如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其劳动对象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土地或植物，劳动时主体感极为强烈而当其从事饮食等服务性行业时，必须要考虑到服务对象的主观意愿，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上的不习惯使其产生低人一等、低三下四的心理感受，以至于不愿从事这类职业。

在角色变迁中其心理适应问题主要表现于角色的心理冲突之中，农民的固守恋土心理和务工时离农心理倾向的冲突、农民的小农心理、迷信心理和现代企业要求的人员心理素质的冲突甚为突出，也亟待引导和解决。

2. 人际关系格局变迁及适应问题。随着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变迁，庙港人的人际关系正处于旧格局向新格局转变过程之中，原先人与人的关系以家庭、宗族为纽带，关系双方是互惠的，在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时，根据亲密程度的不同而把不同的人区别开来，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标准采取不同的行为。随着社会转型，越来越多的庙港人走出家庭，走入工作群体，社会交往越来越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因而人际关系正发生新的变化，以"特殊主义"取向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格局正向着"普遍主义"取向的人际关系过渡。在这一变迁中，宗族心理必然要被削弱和取代，而社会习俗中长期积淀的亲属（戚）观念一时又难以被冲破，这里形成了适应上的矛盾。长期受狭小的生活交往圈限制而形成的较差的交往能力，又使一些庙港人缺乏娴熟的交际沟通的能力和技巧，也制约着其处理好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

3. 心理压力的变迁及适应问题。农业上长期的精耕细作和

本地区的高产稳产农业特点，使广大的庙港农民承受着较小的心理压力，然而职业的变迁和生活方式上的节奏加快，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紧张感和心理压力，务工农民亦工亦农要比单纯的城市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生活上的紧张感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按劳动业绩领取报酬和务工的失业危险，实在而言其失业危险要比城市工人的失业危险大。再说，工业技术上不断革新对务工农民提出不断提高的要求，相对于长期从事较为单一的农业劳动的农民而言，不可谓没有压力。这一系列生产、生活上的压力集中到庙港人身上时，有时会产生焦虑心理、挫折心理等，对其心理调控和适应提出了新的要求。

4、消费心理的变迁及适应问题。生活方式的变迁使江镇人消费档次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有所更新。但也使一些人产生了攀比、虚荣心理，一些人在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指向上产生心理矛盾。

5、社会价值心理取向的变迁及适应问题。上述的几种心理变迁在文化上都有其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当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一定的社会变迁时，植根于斯的社会价值心理取向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变迁。庙港人在对传统、权威、科学、时间和新的经验等的态度上也产生变化，但还说不上是与社会变迁是同步的，其间势必也存在着适应上的矛盾。

总起来说，在目前的社会变迁中，庙港人的心理变迁存在着以下特点：

1、丰富性与杂乱性并存 在庙港社区的变迁中其心理变迁尚需靠其主体多方探索，缺乏较为全面的完善的引导，同时在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条件下，其心理内容中不可避免地混杂有其他社会形态中东西，这些杂乱性恰恰体现了其丰富性，其心理变迁既以感性因素为基础，又渗透着理性因素，既有庙港人特有的心理，又有超越这一地域范畴的世界性心理。

2、狭隘性与广泛性并存 庙港人的心理变迁带有一定的直接性、经验性、表面性和浅短性，仍带有狭隘的封闭性，但就其社会变迁的方向和目标而言还要求其更具有间接性、理性、深刻性和长远性，还需有更广泛的开放性。

3、易变性和稳定性并存 随着社会的转型，庙港人的"社会心理永远顺从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普列汉诺夫语），其心理变迁具有时代性和顺变性。但是庙港社区的道德风尚、社会风俗习惯等要素，经世代相传已沉淀和凝聚在人们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其变迁又带有历史继承性、缓进性和相对稳定性。

4、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 庙港人心理变迁顺应时代的进步向人的现代化的心理素质要求的转变是积极的，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消极心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着，诸如：小农心理、失衡心理、宗法心理、中庸心理、宿命心理、习惯心理、依赖心理、急躁心理、冷漠心理、妒嫉心理、奴化心理、怀旧心理、暴富心理、官本位心理等等，它们对庙港社区积极的心理变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庙港社区的现代化变迁对其心理变迁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而庙港人要达到现代人的心理素质，并不是随社会变迁通过心理变迁就能自然而然地成功的，还有赖于有计划、有目的的心理导引，可以从如下的一些方面着手：

1、加强个体社会化的指导。 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文化，取得社会生活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使个体习得基本的知识、技能和社会风尚、传统、道德以及法律等社会规范，得到生活目标的指点和社会角色的培养。一般要通过基本社会化、预期社会化和发展（继续）社会化这样几个阶段。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庙港人社会化要注重从现代化人的心理素质目标出发，（1）在学校中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步指引和落实，注意课程、教育教学内容、教法等对心理发展的主导；（2）在成人社会中，可利用报刊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创设健康向上、乐观进取的社会文化环境，并渗透进人心理素质的发展目标以促进其继续社会化；（3）在家庭中，成人要充分重视儿童的心理演变和家庭氛围，并鼓励子女获得更高级的职业和实现更高的教育目标；（4）有必要在学校和社会上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为个体社会化提供心理指导，解决心理矛盾，疏导心理困扰。

2、重视心理变迁中的心理环境建设。这里主要谈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环境建设。（1）要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2）要转变职能，改变过去消极、被动、保守的心理，树立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在指导思想上，要由"小循环"向"大循环"转变，在工作对象上，要由对"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在工作内容上，要由"由上到下"向"由下往上"转变，在干群关系上，要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3）要理顺关系，引导港人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4）要探索新的机制，目前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的基本框架，可由六个递进式的基本要素构成：a、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主导要素）；b、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主要任务（工作特性和内容要素）；c、以基层建设为基础（工作对象要素）；d、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前提（工作方法要素）；e、以发挥党员作用为保证（工作力量要素）；f、以领导班子建设为关键（工作环节要素）；（5）要注重实效，要重视遵循心理规律、运用心理学技术开展工作，并将心理咨询和心理商谈引入到工作中来；（6）要勤于学习，适应新的形势，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做好工作；（7）要加强宏观指导，正确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经济，以求工作更贴近经济、贴近实际、贴近人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适合于当今的社会变迁，适应并能促进人的心理变迁。

3. **强化社会控制**。在庙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人们的心理变迁出现了多种现象：面对着各种文化的撞击可能会出现心理失衡；面对着社会分配的不均衡会增强其相对剥夺感，面对生活事件的增多会使其心理负荷加重，面对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会加深其心理危机，面对传统社会化的落后方式会削弱其心理承受力，面对着心理疾患的躯体症状化人们心理保健意识却很淡薄，这些现象轻则使人焦虑、烦恼、痛苦、无所适从，重者导致了社会适应能力下降、行为偏差、个性扭曲、越轨犯罪和产生各种心理疾病。如几年来在更楼港村先后有三名在盛泽丝织厂工作的女青年因被怀疑偷窃或失恋等原因而引发精神病。1994 年下半年，庙港中学高三年级几名学生团伙犯罪触犯多项刑律。由此看来强化社会控制在当今变迁形势下极为必要也极其重要。

强化社会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逐步建立起有力、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首先应大力发展专门的心理机构，引入专门的心理学工作者，可以在学校和企业中开设心理咨询机构，并提供信函咨询、热线电话咨询、职业选择咨询、人员素质测评、开设心理知识讲座等社会服务，可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理医学模式，在医院中设立心理门诊，疏导心理障碍，干预心理危机，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其次应把提供精神卫生、心理康复服务工作纳入到更广泛的社区服务体系中去，充分发挥社区的生活服务、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服务一体化的优势，为人们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第三建立起与庙港现代化进程相吻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在增强家庭凝聚力和支持力上下功夫，积极创造有利于家庭和睦、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

(2) 在社会化过程中加强社会控制，主要培养个体的自我控制和集体意识。

(3) 加强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法纪、社会道德、社会舆论和习俗等在社会控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4) 广泛深入地普及心理知识，可以利用社会化过程，各种社会传播媒体和社区服务体系等，在庙港人中普及心理学知识，我们应使每一个现代公民都能应用心理学的原则和技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心理学家"（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米勒语），这样才能促成庙港人思想、行为、人格上的自我革命、自我建设和自我养成，完成社会现代化的心理建设。

（东南大学　沈群红　韩　静；
吴江市港监处　屠福其；
吴江师范　张建华）

注：

(1)《平望志》，清光绪十三年重刻本十八卷

(2) (3) (7) (8) (9) (13) (15)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5、25、32、26、88、87页。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

(5)《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页。

(6) (11)《江村信息》，第36、68页。

(10) (12) 费孝通：《三访江村》，《费孝通学术精华录》第65、65页。

(14)《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5页。

(16)《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第69页。

(17) (18) 殷一兵　汪和建：《论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意义及理论、方法再省察》，《江海学刊》1994.1。

组　织

在庙港社会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是最突出的，也是最直观的，党政组织从解放前的强加给村民的"保甲"行政体制过渡到了解放后的互助合作、人民公社，进而发展到1983年体制改革后的乡（镇）体制，组织体制网络逐步建立和加强。同时，伴随着组织体制的不断强化并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千百年来在村民乡间邻里起着广泛而深刻作用的家族、宗族势力影响已变得日益淡化和弱化，组织制度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其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革完善并逐渐向现代化迈进。

一

"保甲"行政体制时期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教授对解放前的"保甲"这种"强加的行政体制"作了简略的论述，并认为"对这个村子来说，它完全是新的……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存在过。"(1)但是，保甲这种体制以其法定的地位一直在庙港延存到解放时。

1928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正式统一规定了县政府组织(2)，定县以下为区（20村里组成）、村里（百户以上乡村为村，百户以上市镇为里）、闾（村里居民以25户为闾）、邻（村里居民5户为邻）。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引用了1929年6月重订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村里改称乡镇，县与乡镇之间设区；由20至50乡镇组成区。后乡镇扩

大，区改由 10 至 50 乡镇组成。1934 年，改行三级制，10 户为邻，10 邻为闾，10 闾以上为乡镇。推行保甲制度后，废除闾、邻，代之以保甲。

“保甲是个旧词。这种体制是宋朝（公元 960–1276 年）的行政改革者建议的”[3]。保甲制度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立基层行政机构，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制度。“为共同担保，共同责任之制度”，其作用“可为增进地方行政体系整肃之方，故其目的，将使无一家无一人不得其治焉。”[4]自宋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利用保甲制度维护和强化地方统治，只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保甲制度松弛。

南京国民政府派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与武力进攻相结合，推行保甲制度。蒋介石视“编查保甲与编练壮丁两事，实为组织民众与训练民众以充实自卫力量最重要之关键。”[5]从“剿匪”省份开始迅速在各地推广，至 1934 年，在江苏省也推行了这种保甲制度。直接到乡村的实施，估计还要稍晚些，费孝通先生 1936 年夏在庙港开弦弓调查时，此项“新体制的实施准备，最近方告完成。”[6]

保甲编成后，执行“管、教、养、卫”任务。管，由县长派员会同保甲长按户清查人口，发给门牌，登记表册。然后制定保甲规约，用以强令人民承担协助搜捕共产党人及革命者的任务，同时推行联保连坐，一户“通匪”或“纵匪”，他户不报者，负连坐之责。保甲内的人民处于被监视被管制之中，失去了政治自由。教，进行“党化”教育。养，保甲内居民负担名目繁多的保甲经费。卫，保甲长把保甲内 18 岁以上、45 岁以下男子编成壮丁队或武装民团，进行军事训练，修筑工事，保甲长往往借机向人民敲诈勒索，人民劳役、经济负担更加沉重。如 1946 年 10 月 28 日，庙港所隶属的震泽区龚区长召集该区乡镇长会议，决议各地抽征适龄壮丁，适龄而未被抽征者，每名捐资 3000 元。[7]

保甲制度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多次呼吁取消保甲，国民党置之不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进一步清查户口，整编保甲。推翻保甲制度，打倒保甲长，已成为人民的迫切要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反动保甲制度和蒋家王朝一起寿终正寝。

而真正在乡里间起组织协调作用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三纲五常"等；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乡里邻里的种种规矩，家族、宗族的势力和影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广泛而普遍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自然而有效的作用。其基本的网络是这样的："三纲五常"→乡规民约→家法宗法→村民。

二

互助合作 1949 年 4 月 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吴江。30 日宣布吴江正式解放，成立吴江县委，下辖城厢区、同里区、平望区、黎里区、芦墟区、盛泽区、震泽区、严墓区 8 个区委。属现庙港镇管辖区内的大庙、开弦、大儒三乡都未建立党的组织，所有党员都属震泽区委领导，各乡皆由上级党组织委派指导员开展党的工作。

吴江解放初期，物价飞涨，市场萧条，农业凋敝，自然灾害相继发生。保甲制度尚未摧毁，太湖土匪猖獗，封建势力勾结匪特，造谣诬蔑，挑拨党群关系，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大庙、开弦、大儒三乡中有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等反革命分子 86 人，伪政、蒋政、伪军等反动骨干 180 人，一般坏分子 210 人。[8]

为了尽快安定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大庙、开弦、大儒三乡在震泽区委、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人民群众抗灾，妥善安排群众生活，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另一方面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群众自觉检举

揭发相结合的方针，迅速肃清流窜惯匪及反革命分子。同时，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和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作了组织准备。

1950 年 2 月，建立大庙区，同时建立中共大庙区委。1953 年 3 月以后，随着党员人数增多，即以乡镇建制每乡（镇）成立一个党支部。当时下属 14 个乡（镇）建立了 14 个党支部，归中共大庙区委领导。在现辖区内有当时的罗港、光荣、庙港、盛港、陆港和震泽区的开弦共六个乡的党支部。从设置大庙区到各乡建立支部之前，由于党员人数不多，都参加区委机关支部活动。区委和各乡支部的建立，对解放初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起到很好的组织推动作用。

关于互助合作，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就有“集体排水系统”、“合作工厂”、“互助会”的描述。当然，这与解放后大规模的并且迅速地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合作化运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解放前合作化运动的继续，或者是对近代市场经济的抗拒性反应，而应看到这场运动多方面和更深刻的原因。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主张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他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9)。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改造小农的原理，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表示要以劳动互助合作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1953 年 8 月，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标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为此必须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农业改造成为由国家间接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农业，以为工业化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资金和工业原料。根据这个总

路线，同年12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农业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和农业合作化的形式，即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示范章程》，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方向。全国各地合作化的发展即按此方向进行。

在吴江县委、区委及各乡支部的组织下，吴江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迅速。到1952年7月，全县有互助合作组10750个，占总农户40%，互助组阶段一直延续到1954年底。1955年是初级社大发展的一年，并且很快地转入了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即高级社阶段，到1956年11月，全县98.8%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高级社。庙港的合作化运动与全县的步调是一致的。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表明，组成合作社后80%以上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组。其结果，正像费孝通先生在《重访江村》中所写的那样，“合作化过程中，过去许多不能种田的土地现在开成了良田，耕地面积扩大”，“农业增产了60%”，提高了生产力”(10)，“合作化发动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又化成了农业增产。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们心花怒放。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情绪，‘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11)这就是当合作化高潮卷到庙港时的热烈场面。但也产生了像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副业的萎缩及孩子失学等问题。

1956年3月，县委根据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需要，作出并区并乡决定，将原有9个区委合并为城厢、芦墟、盛泽、震泽、严墓5个区委，将108个乡（镇）合并为48个乡（镇），并建立了乡党总支。这样，大庙区并入震泽区，所辖小乡也两个并为一个中乡。各乡设党的总支委员会，受中共震泽区委领导。在现辖区内的有当时的中共庙港（盛港）乡总支委员会和中共开弦（光

荣）乡总支委员会。

1957 年 8 月，吴江县委遵照上级指示，进行了撤区并乡工作。到同年 10 月底，原有 5 个区委全部撤销，48 个乡（镇）合并为 23 个大乡，这样中乡再度合并为大乡，其中由庙港乡、开弦乡和罗港乡的部分村合并，成立庙港乡党委，直属中共吴江县委领导。在现辖区内有当时的中共庙港乡委员会和设置在今金明村所在地——陆家港的中共大儒乡委员会。通过整编，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层次。1958 年 7 月至 9 月，吴江全县 23 个乡和 7 个县属镇，进行个别调整，撤销龙泾等 5 个乡及芦墟镇。同年 9 月，大儒乡撤销，将其东部六村并入庙港乡。

在互助合作时期，千百年来在中国农村占据主导地位的家族、宗族势力受到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几乎被消灭得无影无踪。在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家族、宗族意识被当作“私字当头”、“小农意识”受到了严厉批判。在政府的号召和广大农民得到翻身解放后释放出来的巨大政治热情相结合下，尽管当时也还允许农民家庭保持自己原有的财产而搞单干，但绝大部分农民都纷纷加入了互助组，继而是合作社，使得个别没有加入的单干家庭在无形中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发展的最后结果也是以加入告终。人们在思想上很快地接受了表明他们自己身份的“社员”称号并感到自豪。

三

人民公社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以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起源于毛泽东关于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合并小社为大社的构想。早在 1955 年，他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所写的按语中说：“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2]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

等地农村视察时对人民公社作了明确的概括:“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3]就在这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后,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将高级社合并转成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有两个含义:一是规模大;二是综合性强,公社既是农村的经济组织,又是农村社会生活单位,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公”是说这种组织虽说是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形式,但它实际上已超出了“集体”的范围,更多地带有“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平均主义)的性质。

在人民公社运动最热火的1958~1959年,人民公社被看作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1958年开弦弓村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14]庙港乡党委改称庙港人民公社党委。1960年1月,庙港公社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根据当时的党员登记表统计,全公社有共产党员299人,其中女性17人)在大跃进中,庙港公社曾发生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底,中共中央对人民公社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直到1960年冬,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中共中央才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从集体经济的体制、措施等各方面作了调整,确定了“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纠正了一平二调等“左”倾做法,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民经济等。1961年3月,中央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后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又确定了“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

续到 1983 年，基本未变。1961 年初，遵照上级的指示，吴江县委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这次整顿对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改造落后社起到了一定作用。庙港公社对于国家、公社和大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情况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处理工作。同时对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错划右派分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和摘帽工作。

1963 年 7 月起，一场以“四清”（清理帐目、仓库、财物、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点到面在全县展开，这次运动虽然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党员和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扩大了打击面，挫伤了部分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这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庙港公社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到 1965 年底庙港公社共有党小组 98 个、党员总数 467 人。

1966 年 5 月，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严重泛滥。1966 年底，庙港公社党的组织同全县各级党政机构一样受到严重冲击，陷于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

1967 年 1 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1967 年春的庙港，根据上级指示，由

公社人民武装部"拿总"，设立生产办公室，负责指挥全社工农业生产。1968年3月，经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夺权后组成的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批准，建立吴江县庙港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作为庙港公社的行政机构。

1969年4月，九大召开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庙港公社随同全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中，许多干部、群众被批斗隔离审查，发生了很多冤、假、错案，不少无辜的同志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精神和省、市、县的部署，庙港公社开始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到1970年2月，全公社重建党支部25个，恢复了组织活动。但由于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在整党建党中，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多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毕竟重建党组织，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同年9月，庙港公社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庙港公社第四届委员会，恢复了党委领导制，党委书记由革委会主任兼任，从此在过去政社合一的基础上又进入了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一直延续至1981年6月庙港公社第七届人代会选出公社管理委员会，实行党政分开为止。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逐步展开，这个运动，干扰了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工作部署，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派性斗争中，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逐渐有所恢

复和发展的各项工作再次出现曲折。

1975 年 1 月后，各条战线开始整顿，形势有明显好转。吴江县委从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入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但到 1975 年底，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在全国刮起，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使我国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之中，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些领导干部遭到打击。1976 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此，县委及各级镇社党组织的工作才日趋正常。

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大二公”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私有、家族、宗族等观念更无立足之地。就是亲戚间的走动，甚至是一向被村民们认为是人生大事的婚丧嫁娶等，其应采取的态度或形式不但要受到舆论宣传的深刻影响，有时还要受到行政行为的强制干预。如庙港的村民们有着春节后新年里“做客人”的习俗，这是正常和必要的。但在一个时期里，政府号召去“做客人”的人一律不许带上糖果等礼物，甚至还派人在桥头、路口等地站岗，发现有人带了甘蔗、糕点、糖果之类的东西即予没收。再如庙港人在结婚时有“办喜酒”的习俗，有一段时期，政府又号召结婚的人家一律不得操办“喜酒”，要新事新办，只允许发喜糖以庆。大操大办固然应免，可完全禁止又似不近人情，所以乡亲们往往会在新事新办几天后偷偷地邀一些娘舅、姑父等至亲来家补办酒席。由此两例可见，在人民公社时期，家族、宗族势力既无存在的必要，也无存在的可能。

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和组织路线。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庙港公社党委带领全社人民，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对“文革”期间以各种名义立案审查的案件进行了复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强加在干部头上的诬蔑和不实之词，使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蔑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的改革特别重视，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25项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主要精神是给农民“松绑”、“放权”，充分发挥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所制定的新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的开始。此后，承包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多种新型承包制形式开始施行。到1983年，庙港与其他地方一样，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步基本完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经济职能又一次强化，家庭观念，特别是家族之间和亲戚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紧密起来。因为分田到户后，由于各个家庭劳动力之间的多少差异，劳动力富余的家庭，田间劳作要比一般家庭完成得早，而劳力缺乏的家庭，特别在农忙季节，就显得人手不足了，于是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又一次出现，而且是无偿的。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一直存在。一直到90年代初，随着村级农业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田间劳动对劳力的要求逐渐减少，无偿互助的情况才逐渐消失。此时，一般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在乡镇企业就业，农忙时才回家务农，农闲时的田间劳作一般只是在上下班之余即可完成。此时也出现了经济收入较好的家庭不再务农、田间劳作全部雇人完

成的情况。

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正常，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得以正常实施。1981年6月25日至26日，庙港公社召开七届一次人代会（80名代表，到会76名），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建立公社管理委员会，重新实行党政分开。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对乡（镇）级组织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早在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就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了改革的试点，试点结果表明：将人民公社党、政、社合一的体制分开，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发展。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人民公社政社分开。接着，宪法修改草案正式将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在农村建立乡政权的改革写进了宪法修改草案，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农村基层政府为乡、镇人民政府，而不再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此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改革便在全国普遍展开。

1983年7月，庙港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工作。7月9日和7月10日相继召开了庙港公社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和七届二次人代会，改公社党委为乡党委，并把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中的政权职能分离出来，分别建立乡人民政府和人民公社经济联合会（取代公社管理委员会），从而完成了政社分设的体制改革工作。随后，对村一级组织也进行了改建工作。在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的36号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计划地建立村民（或乡民）委员会试点。”1983年中央又发出35号文件，对如何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建立什么样的村民委员会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1983年秋，庙港在结束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村一级废除原“大队”的名称，改称“村民委员会”，并把原带有政治色彩的大

队名称进行了更名工作，如原21个行政村中的友谊、繁荣、庆祝、红旗、胜利、东方红、丰民、团结等大队更名为更楼港村、庙港村、西草田村、太平桥村、张家浜村、行义港村、民字浜村、渔业村。村以下的生产队则都改称为村民小组。

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1987年11月24日全国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所以，村民委员会不是作为一级政府机构。对于村民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法》中第2、4、5条中也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有：（一）管理社会事务；（二）带领村民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还要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做好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体改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发展集体经济、稳定农业基础等工作上仍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如在农事生产上，村村实行统一规划、统一供种、统一供肥供药、统一植保联防、统一农机作业、统一灌排等，村级综合服务得到不断完善和加强。

1983年，在乡以上的行政体制上也作了部分调整。这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并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苏州地区，将吴县、吴江、昆山、太仓、沙洲5县和常熟县（改建为市，县级）划归苏州市管辖，江阴、无锡2县划归无锡市管辖。因此，还要按照当时的行政体制，庙港在行政隶属上完整地表达应该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县）、庙港（乡）。

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198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庙港乡在县委

的指示下，分三批进行整党，按照"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对党内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进行了全面整顿。历时三年多的整顿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到1986年底庙港乡共有党支部42个、党员1091人。

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庙港乡党委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帮助乡党政干部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确的方向，从1985年起至今庙港乡连续举办了学习党章培训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规定凡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乡、村级干部也要定期到党校接受轮训。同时，还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大力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1989年根据党中央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精神要求，庙港乡党委联系、检查实际情况制定执行了《关于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几项具体制度规定》、《关于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在建私房中执行审批制度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并进一步提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认真清理党政干部违法违纪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两个问题。这些相应措施的制定贯彻和落实，对加强庙港乡党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和农业社会化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991年4月26日庙港乡根据苏州市委和吴江县委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庙港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乡农工商总公司，同时相应撤销乡经济联合委员会，从而进一步在组织体制上赋予经济工作职能，加强对农村经济的领导力量。适当调整部分领导班子，根据拟定的乡镇农工商总公司，乡镇经济管理办公室和乡镇工业公司3个工作《条例》，分别明确了各自的工作职责以及乡党委、政府和农工商三套班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乡镇企业管理体制工作趋于规范化、制度化。

1992 年 12 月 8 日，庙港人民在欢庆吴江撤县建市半年后，迎来了庙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庙港乡，设立庙港镇，这是庙港镇三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喜事。至此，庙港在行政隶属上该完整地表述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庙港镇。乡改镇对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是强大动力，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以更新的观念、更大的魄力、更强的合力、更好的精神、更实的作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即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还要按照相对集中、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经济建设，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

今日庙港的组织建设，已基本形成了党、政、经分工明确，紧密协作的格局。镇党委作为党的基层委员会，主要负责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决策本镇区域内的重大问题。党委下设组织、纪检、宣传等办公室负责其具体职能工作。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各自负责其条线工作。镇政府作为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主要负责本镇内的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社会治安等工作。政府下设民政、计划生育、文卫成教、村建、环保、土管、城管、综合治理、法律服务、人武部等职能部门，开展具体工作。镇农工商总公司作为农村经济规模壮大、社会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一大标志连同其下设的各个专业公司已成为本镇社区经济活动的指挥中心、协调中心。庙港的党、政、经组织在本区域内，对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对小城镇的建设规划，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作用。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乡镇党政机构的设置要向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省乡镇党政机构的改革将在 1996 年全面展开，这次改革的主要任

务是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转变职能是重点，是第一位的，一定要从职能的调整和重新配置人手，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

现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党代会都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把本地区建设成为基本现代化地区的要求，吴江市还提出了要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这是我们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嘹亮号角。我们认为，在向基本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农村是重点，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基础。其中农村组织建设方面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中共吴江市委党校　沈永明、张宇红、钱雪华）

注：

(1)《江村经济》第77页、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

(2)《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9月第92期。

(3)《江村经济》第77页。

(4) 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526页。

(6)《江村经济》第78页。

(7)《吴江县大事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8) 据1958年统计。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2页，1991年版。

(10)《江村经济》第230页、224页、230页。

(11)《江村经济》第238至23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7—258页。

(13)《人民日报》1958年8月9日。

(14)《江村经济》第252页。

法　治

透过南太湖如烟似梦的悠悠岁月，站在社会主义法治大潮浩浩荡荡的今天，追寻从江村到江镇的法治发展之风雨历程，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在庙港"这个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的窗口"之生发扬延并由此静思全国农村之法治前景，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自当是悠远而典型的。

一

法治在此地最初的萌生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时期，但真正起步却一直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质性的发展则是近在眼前的80年代之初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庙港社会的法治发展状况大致可划分作新旧两个时期: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法治时代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庙港社会度过了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岁月，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经济上千百年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小农经济状况，政治上始终陷于专制腐败、法度废弛、动荡不安的恶境。

长期以来，庙港地区几乎没有专门的法治机构，也没有公开的公正的法治制度。至清末前，都是沿袭古代旧制，讼案需至县衙击鼓告状。

直至清末，吴江县衙在震泽设巡检署，办巡警，主管西南一带的治安。民国3年，吴江县成立审检所，主理全县各类讼事。日伪期间及抗战胜利后，设立吴江地方法院。期间，侵华日军曾

于1938年秋由名叫福其的中队长率兵进驻庙港，建立由本地恶霸地主朱文珍为队长的自卫队和外地汉奸鲍某为队长的清乡队，拉民夫筑篱笆修炮台，封锁太湖，管制庙港。

清政府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公布过《大清新刑律》和《大清民律》等近代法律法令。1853年太平天国军政权颁告了《天朝田亩制度》并有水兵船队过境庙港。其后，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政府有过《中华民国宪法》，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有过《施政纲领》，直至国民党南京政府宪民刑商诉院各法统编一体的《六法全书》，但皆为过眼烟云，未能深入此地，未在庙港社会留下一点法治痕迹。

民国年间，庙港沿湖匪患严重，本省军警连年数番调集重兵、配备舰船飞机围剿湖匪，浙江警界亦曾前来庙港会剿，但历次剿匪都是仅遏其势、未除其根。旧政府还曾有过限垦太湖浅滩、限制太湖捕捞、限制桑茧外销的地方政府条令，但终因缺乏系统的法治，更无具体执行机构和监督措施而皆成一纸空文。

庙港因地处太湖边缘、偏远不便，旧时极少有讼师光顾往来，亦未出现有记载的刑民讼案，乡间讼争多数自生自灭。迄今吴江本地史料所及各类讼事，无一出自庙港人"击鼓"所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此间及其周边的乡村的人们，至多只是偶尔从罕见的书刊报章之上，或串跑江湖的"说书先生"们的唱词表演之中及茶肆酒楼之内的闲谈杂论之间，诧异而敬畏地闻知过什么"皇法圣旨"、"国法家规"、"按例法办"等等略略沾带"法"字的只言片语，懵懂而痴茫地知晓些许诸如"皇法大如天"、"国法不可违"、"包公是青天"、"大清刑律三百年"等等神秘而飘忽的"法"之存在及效用。

除此之外，他们对"法"究竟是何物，有何用，与社会及自己又有何之关系等等，则视之为十分遥远而虚幻的桃花源中事了。

（二）新中国以来的法治概况

1949年渡江战役后不久，解放军二十八军之一部主持组建的县区乡三级武装工作队进驻庙港，中共庙港地区的乡政权和村组织随即建立，武装工作队的领导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在宣传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律法统的同时，迅速开展剿匪肃特、禁毒禁赌、镇反肃反、打击流窜犯罪，取缔反动道会门，彻底根绝了千年太湖匪患，稳定了全庙港地区的治安形势。

1949年底，吴江县设立司法科，行使审判权。1950年，吴江县人民法庭成立，震泽设分庭。1951年，将吴江县人民法庭改建为吴江县人民法院。庙港地区先是隶属震泽分庭，而后统归县法院管辖。

1950年初，庙港地区各乡村均成立土改评议小组，贯彻实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改法》，按全地区人口土地的总指数为人均耕地面积1.27亩计算，实行无田或少田者分入、多田者分出的土改政策，平稳顺利地完成了土改。随后，1950年4月底起又组织宣传《婚姻法大纲》，在全乡范围内由点到面，宣传反对封建婚姻、实施一夫一妻，废除了当时庙港地区普遍存在的童养媳、“订小亲”、“调换亲”和赤裸裸的买卖婚姻，童养媳们纷纷回到娘家，不少寡妇得以再婚。不久又大张旗鼓，宣传了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庙港乡村深入人心。

《土改法》、《婚姻法》和《宪法》的宣传实施，是庙港地区旷古以来的法治壮举，乡民们首次听闻“法律”这个神圣而陌生的名词，亲身经历和享受到法治带来的丰衣足食的安定生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确信社会主义法治的春天将会给他们带来真实的幸福和长治久安。斗转星移，换了人间，庙港地区一步跨入了亘古以来最稳定、繁荣、平安的时期。

与此同时，吴江县公安局设震泽分局，向庙港派出公安特派

员一人，属县局干警编制，隶属震泽分局，成为庙港地区有史以来首位政府专设的常驻治安执行官员。根据"党管政法、党管干部"的原则，该公安特派员行政业务归公安条线，日常工作和党组织关系在乡党委，服从当地党政和县局的双重领导，主管全乡的治安和户政工作。在乡党委乡人委的领导和公安特派员的主持下，21 个行政村及乡属机关事业企业先是设立了治保干部，一般由党支部中专职委员或党政领导兼任，又陆续发展建立了村治保组织和乡治保委，形成了上下联结的村乡区域治保网络。并以此为基础，由部分治保组（委）为基础组成民间调解组织，负责调解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具体调解由乡民政助理员主管，主要依照"依靠群众，就地调解为主"的方针，依赖党和政府的行政权威和基层网络组织，通过现场说理评判平息民间纠纷、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收到较好的成效。

其间，党和政府设立的乡粮管所和供销社，承担了当地农家绝大部分蚕茧稻麦油菜羊皮的统购统销和收购包销，取缔了中间盘剥，消除了买卖风险，广大农民沉浸在新生活的安定欢悦之中。50 年代中期起至 60 年代中期的 10 多年中，社会主义法治在庙港地区蓬勃兴起，社会治安长期稳定，刑事犯罪案件绝少发生，民事争讼亦甚罕见。真是法律神圣、执法干部形象高大、党政领导可亲可敬，呈现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

随着互助组、合作社在庙港地区的建立，农村集体化公有化的步伐猛然加快，各村在 50 年代末纷纷组建高级社并一跃合成人民公社。这时从党内引向全社会的反右整风、庐山会议、社教运动和日益急迫的党政一体化态势，客观上冲淡了方兴未艾的社会法治环境，阻滞了良好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及至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狂潮骤起之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指示"、各级党组织的文件和政策，已完全取代了初萌待发的社会

主义法律和法治的机制。

"文化大革命"时期，庙港地区党政权力机构全部瘫痪。在当时充任党政领导机关的"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运作中，尽管公安特派员的工作仍在维持，甚至为侦破"恶攻"、"反标"之类的"政治案件"而一度有所加强，但这决不是法律和法治的前进，而是毫无生气的非法治性的历史倒退。

经过50、60、70年代长期的积累、贮存、蕴积、动荡、发展，迎进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小批市镇职工和知青下乡，又接纳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批城镇机关干部和知青的插队，长期封闭的庙港乡间开始涌动一股新鲜的外来气息和文化气质，与外界的交流和剩余的资金劳动力在70年代初逐渐兴办起乡镇企业，率先兴起的是传统的缫丝、酿酒、织布行业，继而化工、机械、家电等行业相继开花，传统的自然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开始被冲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经济的家庭承包的全面铺开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商品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合同在庙港地区逐渐成为经济交往的必然需要和重要手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江南农村县乡逐步提倡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次年，《刑法》和《刑诉法》二部大法公布并于1980年1月1日起实施，拉开了社会主义法治从新的起点全方多层次兴起的序幕。稍后，1982年3月起试行《民诉法》、1982年7月起实施《经济合同法》、1987年1月起实施《民法通则》。庙港社会在刑、民、经三大法律领域全部直面着社会主义法治迅猛推进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折性的重大变革，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唤醒了庙港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启动了庙港社会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各类法律机构开始在这块土地上萌生、发展，各种

法律手段和法律知识开始在这块土地上传播、使用，庙港地区跨入了前所未有的法治事业兴旺发达的时代。

1979年底，吴江县恢复公检法三机关。1980年在震泽设立了人民法庭，加强扩充了震泽公安派出所，以后又组建了震泽公安分局。1982年起，庙港乡组建了由公安特派员领导的治安机构，增加了人员，扩大了业务，改变了几十年一人单干的局面，开始设想准备筹建公安派出所和发展公安业务专业分工。同年，在乡政府设立专司民事调解和法制宣传之职的司法助理员，其行政编制和党组织关系在乡，业务管理在县司法局。1985年起，按上级部署成立了乡普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展了长达10年的"一五"和"二五"普法教育，宣传了"《宪法》、《刑法》、《刑诉法》、《经济合同法》、《民诉法》、《民法通则》等三十余种法律法规。而后，经国家业务条线组织指导，乡党委乡政府支持决定，乡财政和乡属企业资助配合，通过合同制招干、复退军人选调、离退休干部回聘等多种形式，于1985年2月和1987年5月相继建立了公安派出所和司法办、法律服务所，在下属80多个村厂站建立完善了治保委和调委会。90年代初，又与吴江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对口，成立了庙港镇综治办，统一规划协调全庙港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除此之外，国家还在太湖地区分别设立了专门的渔业和水资源管理机构，管理太湖渔业的冬春捕捞和网络规格，控制太湖滩涂和水资源的开发使用，保护太湖各种天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法律意识的唤醒和法律机制的启动，打消了庙港乡村群众怕改革多变、政策多变的顾虑，推动了庙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人们逐渐在社会经济生活和社区行为中运用起法律手段，如在家庭田产承包、乡镇企业的产供销、农副产品的订货、农户的建房用地等事务中纷纷引入了合同文书。这些经济合同中较多地订立了法律约束性条款，使契约迈出了从传统道德信用向现代法

律规范转换的步伐，农民们从思想到行为都实现了对法律法治的接受和运用的重大转折。部分企业和家庭在分家析产、继承赠与、租赁买卖、承包联营、建筑劳务、银行开奖等经济和社会事务合同中还引用了公证书和工商鉴证。有的还进一步摆脱了单一行政调解各类纠纷的模式，寻找工商司法等仲裁诉讼渠道解决债权索赔之类的经济法律事务。

如今，庙港地区已经形成了镇公安派出所、司法办（法律服务所）、综治办三位一体的法治机构，80 个村厂站治保委、调委会、综治委，配套 280 多名治安调解综治干部。派出所、司法办、综治办从各只有一间房一个人，发展到共同拥有一幢 3 层楼、近 20 名干警、2 辆警车、5 辆摩托车及电脑、移动电话等现代化的装备。在治安、户政、刑侦、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都拉得出、做得好、有分工、有合作，成为庙港地区社会法治的中坚力量。

今天，整个庙港社会已经多层次全方位地普照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阳光之下，全庙港地区已实实在在地运作于经过党和政府无数艰辛努力才开拓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法治机制之中，不仅庙港镇村上下已构筑起门类齐整、功能较全、规模可观的法治机构，而且很多庙港民众已经逐渐熟知共和国陆续颁布实施的成百部法律和上千种法规，甚至已有相当数量的庙港乡间人士善用法律手段，操纵法律武器来维护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各个领域的合法权益。

二

庙港社会是以太湖为摇篮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又是在古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和旧中国连续数十年的战乱动荡后及新中国波浪曲折、艰辛倍尝的大背景下一步一步走向法治的。其间，中华民族千百年悠久古老的文化传统、江南水乡厚重浓烈的

风土人情、太湖流域纯淳糯润的地域习俗，对庙港法治犹如"毛毛细雨湿衣裳"，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庙港人和庙港社会，不同程度地牵制到庙港地区的法治进程。

以下所述五个曾经长期顽强存在的传统状况和现象，其某些环节和表现可谓源远流长并延续至今尚未完全消弥，不仅已经影响过以前的庙港社会的法治状况，而且还可能波及到庙港社会今后的法治前景:

其一，宗教盛行、"老爷"治人

此地自古流传道: 庙港庙港，就是庙多港多，有一条港就有一座庙。相传整个庙港地区共有流入太湖的小港小叉72条，每条河港之畔都建有寺庙，沿湖诸浇港更是庙宇林立。仅庙港集镇一公里方圆的范围内，就有东岳庙、土地庙、张老太庙、邱老太庙、永定寺等著名大庙10余座，至今部分庙宇遗迹尚存。

这些寺庙不属"正宗"佛教门派，仅是各自为师的乡间散教，但旧时却远近闻名、香火不息。至今尚有50岁以上的老婆婆们，在每逢阴历初一、十五照例要到老庙基上去焚烧香火、"拜老爷"、求"好愿"。

世代以来，庙港乡民们尊称庙里的泥菩萨为"老爷"，他们中间很少有知"法"的，却基本上没有不烧香"拜老爷"的，也很少有"不服贴"寺庙中供奉的"泥老爷"的，其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是旧时社会黑暗，当地官府地主剥削农民比较苛刻，庙港乡民盛传:"农民头上二把刀，租米重、利息高，苛捐杂税躲不了"、"一年忙到头，放下小砻床没有米"。当时多数农民租种地主的租田，上好田亩每年租米达13~15斗，一般田也要7~8斗，当年借一担米10年后要还1048担。高租高利盘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捐和税，如酒捐、人头税、地皮税、印花税、壮丁税等等。农民在经济重负和政治压迫之下，整日劳顿与恐惧相伴，平日逢初一、十五、冬季农闲则日日供香，烧上一支香，还上一

个愿，求太平求丰收求健康。

另一方面是庙港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科技水平更低，旧时面对风急浪高的浩浩太湖，自感风险莫测，桑蚕稻麦菜羊鱼虾的收成也都仰仗于"天老爷"，蚕病、人病很难防治，多是听天由命、束手无策。令人惶恐的"龙卷风"、"蚕毒"也时有发生、无法抗拒，只有通过拜佛烧香、建庙供神来寻求安慰、祈求平安。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年也须烧高香"谢娘娘"。久而久之，庙中的"老爷"便被人捧成了高深莫测的治人治天的万灵法宝。

"拜老爷"这一土种宗教在庙港沿湖世代流行，总的是在播种和延续着愚昧落后，但也不必排除其中也存在收邪导正、安分守己的淳化民心民气的另一个效应。

其二，湖匪猖獗、吏治废弛

庙港地区以前流行一种"官兵捉强盗"的孩童游戏，做法是放牧樵草的孩童们于劳动间歇中分作二组，人多而强壮的一组扮作"官兵"，人少而弱瘦的一组充当"强盗"。按游戏规则："强盗"只允许一个一个地偷偷逃窜，"官兵"则可一拥而上合力捕盗。游戏的结局总是"官兵"大获全胜，"强盗"被捕尽剿灭。

而现实生活中的旧庙港，却并无如此称职的"官兵"，更无安民惩恶的法治。该地区直至民国以前，从来没有专职治安官吏，民国以来亦无常驻治安军警，更谈不上专设的司法体制和机构了，习惯上便由乡吏兼行司法职权。而乡公所之类的治安主管机构原本十分弱小，乡吏对百姓争斗索偾和小偷小摸之事往往随口胡断，稍涉疑难争纷，便借口"案情复杂须送县报官"而不予理断。有的治安官吏不只贪财好色，有时自己还肇事犯案，造成社会治安乱上加乱。如民国 24 年，庙港水上巡警蔡某与安徽巢湖客商方某在镇上茶馆赌博，为赌资输赢争执之中发生扭打，蔡某当时以"地头蛇"身份暂居上风，但当夜反被方某执尖刀报复刺死。上报后吴江县长亲赴庙港，在太湖大堤上搭建芦棚开棺验

尸，盖的二个幼儿跪地恳求，最后对方某判刑12年了结。

解放以前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是统治和压榨老百姓的最基层组织。国民党统治后期，震泽警察分局偶尔派巡警勘踏庙港及太湖水域。抗战胜利后，有民团、自卫队之类的乡土保安组织，实际上只是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爪牙和鹰犬。群众评价为"乡长打船造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走南闯北"，讥讽官职越大越贪心、越不务正业。

如此腐败的吏治状况，伴生出庙港民谚所传的"割不尽太湖里的蒿草，捉不完太湖里的强盗"，太湖沿岸匪患严重的状况可以想见。太湖"强盗"之结小股、作零星小案的大多来自吴县东山和吴江菀坪、南库的本帮外籍团伙，成大队、作大案的则多数由河南、海州、安徽的武装流窜匪徒组成。他们凭借太湖沿岸风急浪高，一年四季芦苇蒿草漫生，日隐芦蒿丛中，夜出三五成群，拦截湖中单只渔船和岸边单身行走的客人，有时白日结伙成队登陆入村，公然打家劫舍、杀人掠财。其中，也有标榜"劫富济贫"、而专抢地富豪强之财的，但更多的是袭劫势单力薄的贫苦人家。许多湖匪亲朋结伙、祖辈相传、游荡太湖、兼作渔樵、逃避税收、赌博吸毒、流氓斗殴，无所不为。

直到解放军二十八军组织庙港地方政权武装工作队于1949年春夏一举剿灭湖匪前，旧中国历代政府面对太湖匪患，都是虽有剿匪之举、皆无灭匪之力，往往出现"官兵来，强盗退，官兵回，强盗返"的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周旋数番后，沿湖匪盗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危害日甚。民国年间，曾出现过太湖沿岸麇集匪船100多艘、持有轻重武器甚至火炮的匪徒800多人、半年之中发生劫案达75起的匪盗高潮。江浙二省军警曾出动50余艘舰船、千余名武装人员数次会剿，航空署还曾动用轰炸机四架投弹助剿，但皆未完成铲灭匪患之业。当时的庙港地区，真正是人人惊骇不安，个个担惊受怕！

其三，自我约束、自我治理

庙港自古以来盛产蚕虫稻麦鱼虾羊菜，人民普遍勤劳，善理家业，群众家庭大多自食其力，自给自足有余，虽有匪患而终无兵燹，社会环境和生活水平稍好于周边地区，求太平、怕是非、保自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作风也容易滋生，自我约束和自我治理的习惯便日久成自然。

庙港人和庙港村坊很早就有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吃亏是福"、"便宜是祸"、"不贪外快"的克己让人传统；有"宁可饿煞，不可脏了手脚"、"宁可冻煞，不贪别人衣着"的禁止偷盗的行为准则；有"男人当家传种接代"、"女人立灶烧菜做饭"的安身立命的民间风气。面对太湖土匪抢盗严重的威胁，有大点的村坊不是一家一户提心吊胆过日脚，而是联合起来自我保护，自发轮流守夜，用锣鼓土枪报警，使湖匪不敢登岸入村，做到冬防火灾、夏防奸盗、全年防强盗。也有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家设法"认干亲"、"拜先生"及私通湖匪，依附于权势求得保护。

大多数庙港人和庙港家庭都有安分守己、劝人为善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辰光勿到，辰光一到，一切都报，今生不报，来世定报"，对因果报应和天命天罚十分信奉。由此促使人们十分安分守己，平时养蚕种田牧羊打渔都讲究"自吃自"，不去贪占别人的利益，季节年度上市进行的茧、鱼、米、羊、菜的交换买卖中也都不"作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抢价"（低价抛售或高价抢购），自觉维护良好的交易秩序。

庙港人还反对相互争斗，提倡自我治理，历来有凡事先看"苗头"的习惯，如"苗头不轧，苦头吃煞"、"煞到底、苦到死"、"一场官司三代仇"等民间术语，都是调和折衷、预防纠纷的良言。一旦遇到乡邻斗殴、地界争执、兄弟分家等纠纷矛盾时，他们往往不是"报官"，而是请来一位"众家娘舅"，那是一位与争执

双方可能都沾亲带故，但其辈份偏大、人品较好、威信较高，是在乡间说话算数的权威人士。由他当众说理点拨，让众人当场评判是非。所谓"有理无理，出在众人嘴里"，而"众人嘴里"的"理"，业已由这位"众家娘舅"调好音定好调了，所以结局往往是众口一致、皆大欢喜的。这种"众家娘舅"有时能起到官方无法代替的作用，巧妙而合理地平息社会矛盾。对此种"娘舅"的活动，历代政府不仅不予干涉，有时甚至有意纵容，使其为我所用。

其四，家庭社会、"规矩"重重

地处太湖一隅的庙港地区在旧时代里，家庭社会举手抬足之间凡事皆有"规矩"，这些"规矩"虽不十分"生猛"，有些乍听起来可能还稍稍带有"温良恭俭让"之味。从广泛性和持久性上分析，实际上其给予庙港社会家庭生活的影响之深之重，完全可以说决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性制约措施可与其相提并论！从法治渊源和哲理角度去观察这些"规矩"，可见其既是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和太湖沿岸水乡泽国暖湿气温的长期滋养而生的纯朴民风之映射，又是千百年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彼时彼地演化隐形之大成。

从家庭"规矩"来看，主要是男权至高、女权低下。如在庙港农家，有儿子的就油然而生出该家族已经完成"传宗接代"的优越感，多儿孙的便是"家业兴旺"而高人一等，仅有女儿或没有儿女的则被社会歧视为"绝子绝孙"而矮人三分；不论贫富，儿子有权继承上代传下的房屋田地，是"父传子、子传孙"，尤其重视传"长子长孙"。女儿则凭"父母之言"托媒婆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一嫁了事，"嫁出囡娥泼出水"，如果女性不是招女婿（享受"女婿是半子"的待遇）的特例，则不论上代财产怎么多，女儿也无半点继承分毫的可能；婚姻上面"规矩"更多，什么媒人一上门、聘礼一收进，女方就是半个男家的人；"订婚酒"一吃，就是"生为男家人，死为男家鬼"，退婚再嫁不再可能，寡妇再嫁就被婆家"扫

地出门"。历来也一直没有法律登记或财产分割的其他做法。

从邻里"规矩"来看，素有"金乡邻、银亲眷"的说法，重视邻里和睦、相互照应。邻里村坊相互借钱借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不签契约，也不写借条，一般也不收利息，届时有钱还钱，有物还物，很少有抵赖或形成纠纷的；邻居一方翻旧屋建新房的，一般都要先邀请四邻吃酒商议，四邻都点头同意的，主人便可建房，造成后对邻居通行采光空气流通有点影响也无人会提出争议，如有争议也会被众人所弃。但当时只要一人不点头，新屋就不能妨碍此人任何一点方便。

从社会治安"规矩"来看，"私了"之风甚烈。除了杀人放火等重头大案，庙港乡间习俗上遇及偷盗之类的刑案时，不论事件大小，大都对鸡鸣狗盗的"梁上君子"们人赃并获后即以麻绳捆绑，当众吊梁予以痛打一顿，如跪地叩首求饶保证不犯，即一放了之；对强奸通奸等性质的事件，则将作奸之徒赤身裸体捆扎串联训斥教育，即时保证悔改者亦被放脱；还有少数对奸盗作案者采用以钱赎罪、以亲代罪、以罚抵罪的做法。当地官吏对这种情况"睁一眼，闭一眼"，视而不见，不管不问，乐得省事，形成了典型的"民不告，官不理"的乡间常例。

从社会是非"规矩"来看，庙港人倒是一向重过错责任、重证据对质的。如对民间争殴情形，一般认为吵架"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动口"又强调"不许骂人"，"骂人要吃耳光"。更不许打人，如打人则"动手是只狗"、"先动手者错"。被打者如认为"吃亏"，则可以"打回风阵"，如被逼死人命，还允许去事主家"闹尸"、"敲家生"，均被认为是合理可行的行为；此种事件发生后，乡间父老评判双方谁是谁非时，照例要求"亲眼目睹"的乡亲们当着事件双方陈述作证，双方当事人可以"当面对质讲清爽"。就是奸盗之事也必须"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而"睹讲"也是要"吃耳光"的。这些作法包含了某些恶俗，但也存在着防止故意诬陷、

减少伪证、误放走真凶的合理性。

此外，有关"不知者不为罪"、"不知法不受罚"的免责传统观，流传更为深入广泛，至今仍有不少人深信不疑，奉行不移。

其五，生意买卖，守信随俗

庙港作为太湖沿岸的蚕茧羊鱼的重要产地，虽因远离交通线而僻居太湖深处，但此地干茧羊皮及鱼货菜类向来品佳质优，驰誉江浙一带，农畜商品交易一向兴旺，生意买卖形式多种，守信随俗最为重要。

此间早期的农副畜水产品买卖，多在濒临太湖的庙港集镇周市区的空场地进行，手提肩挑蚕茧羊皮稻米鱼菜的卖者在露天市场里口中喊价，沿途挑捡看验的买者自会接口还价，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就会即刻产生一致定价，而一经定价便须成交。众人在旁观看，无论卖家或买家中的哪方翻悔不成交，都会受到在场者一致的鄙视和声讨，在场者谁也不会再与这个公开违约者成交。

也有来自附近城镇如震泽、南浔、湖州的较大商贩，为大量购取干茧、生丝、羊皮、银鱼而沿湖奔走深入农户渔家，预先付给卖家"定钿"而包下其近期将要出产的本季农畜产品。"定钿"一般是买十付一，即订十分货先付给一分货的货款，取货时这一分"定钿"就折抵货款，再付另外九分款便告银货二讫。如果商家付了"定钿"，到时不来收货，"定钿"便由农家"吃进"。反之，如农家在商家取货时无货可交或少交时，商家则要求农家返还二倍以上的"定钿"，以补偿损失。这与现代法律规定的"定金"及其执行规则，倒是十分贴近的了。

比较大宗的生意买卖或涉及复杂关系和背景的财物交易，其成交就远非如此简单快捷了。有的就会使用契约，如房契、地契、借契、货物契约、期票等等，这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庙港集镇一带已经公开流行。不少契约双方还约请"中人"起草契约文

书，再由双方签字画押，“中人”有时还同时兼见证人或担保人。少数契约一方还提请另一方提供担保款或担保物，作为执行契约的风险保证。也有一些契约不采用复杂的书面形式，只是口头商定几个条款，喝酒碰杯之间干杯认可即可，如建筑雇工、运输合伙、货物租借、钱物保管之类，多以口头契约充当信用承诺。

当然，庙港社会这些旧时的“口约”、“定钿”或“契约”，基本上都是人格信用，绝大多数仅只是以买卖双方相互的人身信誉和资财信誉为钮带，并无实质性制约保障，更无行政约束或法律强制力。发生违约时，财势浩荡的一方尚可仗势逼迫对方赔偿，权势弱小的一方往往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吃亏。此间曾有毁约翻悔而大出打手、形成世仇的。

三

穿越庙港社会漫长岁月的法治动态及其古旧积淀，对照庙港地区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替和精神物质生活变化，已经显见社会法治的演化实在就是全部社会形态变动的反映，社会法治的兴废也就是整个社会盛衰的标尺。不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必然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主要部分的法治同样遵循着由低级向高级进发的规律。剖析以下四个阶段性的法治行为和心理状况的时空表现概况，从中更可领悟庙港社会法治发展的阶梯态势之真味：

第一阶段：先天不足、只畏惧“法”、实不懂法

悠悠千百年以来，庙港远离繁华城镇和交通线，直至1982年震庙公路修通前，多少年间只有往来于震泽—开弦弓—庙港之间的乡村“航船”与外间通商走动，农户家庭产品绝大部分就地生产就地消费，仅有几类特种产品如干茧、干羊皮外售给震泽及浙江湖州、南浔的中间商贩。乡民们在闭塞偏安的小天地里，受传统教育、愚民政策和“人治”环境的制约，对“法”闻之而敬畏、动

之而惧怕，其实却实在是一无所知。

此间历代教育，向来重在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宗教、生存、自然、人文等方面，从旧式家庭私塾、族塾、村塾到县学，从新式小学、中学、高中到师范，除民国以来增添修身科目，新中国后设立政治理论课程外，在本世纪80年代前始终不曾包含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内容。久而久之，人们对"法"的认识多数仅停留在空泛神秘的状态，只知敬重畏惧，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不像对日常接触运用的本地社会行业家庭"规矩"这些乡土不成文准则那样熟知而常用。

古时，君主"金口"，言出法随，成文法不多，既有的成文法也不公布，已公布的也流传甚少。清代的《大清律》、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等虽有印行，但发售数极小、传播力极微，未能深入民众，更未能影响到庙港这一类的江南乡村。新中国前的庙港一带，除了极少数乡吏、乡绅、乡教对《大清律》和《六法全书》略微有知外，百姓们实不知这些东西，即使乡吏、乡绅、乡教们也是仅知《大清律》和《六法全书》之皮毛，究竟什么内容，恐怕只有"天知"了！

并且，历代统治者在庙港乡村都无一例外地施行愚民政策，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故意不公布应予公布的法律法规，不宣传应当宣传的政府法令，不公开应当让民众知晓的政府机构职能和法治官吏的权利义务职责范围，以便其无拘无束地鱼肉乡里欺压民众，稳稳当当地维持"人治"体制，永远做"人上人"。

在这种陈旧愚昧的忌讳"法治"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整体背景之下，庙港乡民在处理社会事务中很难想到需要"法"，也不太可能知道自己这件事需要的"法"是什么？对"法"有什么用？什么"法"管什么事？找什么机构去执行什么"法"？基本上是摸不到头脑的。由此造成千百年来，庙港乡民们遇到社会性事件和冲

突，只有找"长"的，没有找"法"的，"长"可寻而"法"不可知，"长"于事有助而"法"难觅其影。随着社会之变迁，人们最初是找兄长、找族长，后来是找甲长、找保长，再后来是找队长、找乡长、找所长，直至找镇长、县长，基本上没有找"法"的，更没有自己利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渠道去力争应当属于自己的权益的。

第二阶段：因循守旧、不习惯于法、更不使用法

新中国建立后，庙港人民亲历了人民政府大力清除旧时代种种陈积恶俗，迅速实施《土改法》、《婚姻法》和《宪法》的轰轰烈烈的高歌猛进型的法治勃兴情景，分享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带来的初步繁荣昌盛和安定生活的幸福果实，逐渐知道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功能和作用，了解了新中国颁布实施的几部大法及其主要内容，也都拥护和感谢人民政府推进法治对发展经济、富裕人民、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然而，庙港地区因其经历过旧时代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长期习惯于"人治"，尚不能很快领悟并适应"法治"。而新中国成立后虽已初建法治，但毕竟涉及的领域不大、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具体不多样、用法调整牵动的社会关系也相对较狭小，真实运转的"法治"范围与庙港社会的日常生活需要存在的差距也太大。并且，新的社会主义法治在50年代初快速起步后，虽然成果累累，但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70年代随即陷于停顿乃至急转直下式的倒退，这种唐突的历史哗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退了庙港人民对法律和法治的热情，制约了庙港社会全面熟悉法律、习惯法律、使用法律的时间进程和心理进程，加大了历代相传的法律虚无、神秘、无用之惯性阻滞力。

其时，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法律神秘思想、法律虚无主义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人治"传统及"官尊民卑"的"官本位"品级观念等陈规旧习在庙港社会仍有较深影响，加之当时

庙港社会经济还是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成分仍然不多，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偏于闭塞，许多旧时代的"老规矩"、"老习惯"仍在朝夕沿用。而作为庙港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接触面更窄，江南农村的传统思想方法沿袭更深，在法律知识于社会之中的传播应用并不频繁的现实里，更习惯于用小农经济的眼光和极为有限的自身体验去认识和理解法律，容易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因循守旧地习惯老事物、老"规矩"，不适应刚刚萌生的法律和法治机制，也不可能马上去使用当时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十分有限的并且配套措施和机构极为稀少的"法律"及其机制了。

因此，无论是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整个庙港社会虽然曾经兴起过社会主义法治浪潮、已经传播过共和国颁布施行的几个大法，甚至还有相当不少的庙港人知悉到具体的法律条文，偶尔也还有人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过法律和法治机制（如分得土地、结婚登记、选举投票之类），并且实际上法律观念和法治机制也确确实实登陆在庙港大地并已经有所作为，但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既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也不是深入广泛的。庙港社会这时在总体上对法律和法治机制仍处于不习惯和不运用的状态，当时乃至其后相当时期内的庙港人和庙港社会的运转还是言必称"文件"、"指示"，事必"照规矩"和"按政策"的，决无凡事要找个"法律规定"、来个"依法决定"的。

第三阶段：囿于微观、不常用法、也不善用法

二十世纪70年代起，庙港社会在苏南乡镇工业日渐萌发的新形势下，依靠50年代末和60年代至70年代初来自苏州吴江震泽等地的大批知青干部下放庙港乡村形成的人才优势及开弦弓等处原有的蚕茧缫丝基础，陆续办起缫丝、织布、机电、化工等乡镇企业。随着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决定改革开放和推行法治的一声春雷，农村田市家庭责任承包、桑田渔塘成本费用承

包、乡镇企业供销经营承包、农副产品商业交易等如雨后春笋般蜚生迅长，庙港农民和企事业单位在商品交换、承包合同、收货结款及民间财产、土地、婚姻等问题上，日益增多地需求法律知识和法治管理，公安司法等法治机构在庙港社会应运增生，《刑法》、《刑诉法》、《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民诉法》、《民法通则》、《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等十数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其公布后不久，即在庙港地区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宣传和应用。吴江县公检司法机关的法制宣传车和宣传组队频频进出庙港集镇，由本地司法员和县里律师主讲的经济民事法律讲座场场爆满，经济民事合同的鉴证和公证被较多地采用，民事经济债务人身权利等诉讼和仲裁已不稀罕，部分乡镇企业还出现争相聘请律师和司法员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情景。有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学法用法热潮在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庙港社会中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当时在政治上，悠久历史中沉积下来的旧的传统习惯尚占有相当稳固的市场，人们既不经常也还不善于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手段，庙港地区的法律普及和法治运转自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经济上，庙港社会农副业商品经济的兴旺和乡镇工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为附近城镇工商业拾遗补缺才得以发展和生存，包括平时的产供销都离不开外地大中企业的扶助和支持。这种历史和现实形成的主从层次清楚的协作关系，加上农村传统行为模式的影响，使庙港农户和乡镇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比较习惯于看面孔凭关系办事，常常不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误认为稍予认真就会"弄僵"关系、断绝财路，屡屡发生因法律手续不清而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的"吃亏生意"和"蚀本合同"，加上庙港农村旧有的"一场官司三代仇"的老观念作祟，不少农户和企业更是自我束缚在只靠关系不靠法的圈子里难以自拔，自食了委曲也不

能求全、产销陷于困境的后果。

同时，庙港地区一些乡镇企业和农户在本地农副畜产品和低档工业品市场趋向饱和的情况下，于80年代初中期曾相继远赴东北、西北、西南乃至新疆西藏开辟新的销售市场，而这些内地边疆的新市场普遍存在着商业采购力偏高而市场销售回笼率偏低的现象，许多销售单位回收货款较难、呆滞帐目过多，需按法律程序诉讼仲裁解决的欠款事项随之增多。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对外经济贸易在江南乡镇的逐渐兴起和中外合资合作事项的日益增多，导致庙港社会面临的法律问题更加面广量大和错综复杂，法律的掌握和法治机制的运用已不仅仅限于国境之内，已十分紧迫地需要熟悉和使用国际间的法律法规和惯例。但相关企业和农户及其上层机构在办理这类法律事务时，由于平时接触法律知识和法治机构不多，容易用有限的自身体验和小农经济的"门槛"盘算去运用法律，出现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自作聪明地抛开法律或错误地运用法律，轻率丧失来之不易的合法权益。

第四阶段：面对困惑、既需要法、又难理解法

经过十多个年头的全速推进，庙港社会的法治状况在9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初具规模初见成效的程度，无论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社会治安的控制状况，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民间乡村的日常生活，大多已规规矩矩正步走在依法管治的轨道之中，每一社会行业管理的最终依据都有一个十分"正宗"的名叫"法"或"条例"的法律或法规，每一项社会事务都有一个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法治的推行，在庙港社会可以说是已经行进于空前威仪和实效显著的正途之上了。

可是，庙港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厂长经理和村长村民们就在这时遇上了为数不少的法治难题：如他们为了解决遗产分割、老人赡养、财产界定等家族社会事务时，郑重其事地向法律部门申请进入公证鉴证等法律程序并领取了法律文书，其后另一

方不按法律文书履行时，出具法律文书的法律部门竟然无能为力，他们被告之要寻询另一法律部门才有可能解决；当他们为了索还债权或获取合同损失赔偿，不惜花费巨额诉讼费用历经数番开庭审判，得到限令对方于数日内立即全额还款或赔偿的法律判决书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调解书时，却在付诸执行后数年也未能拿到对方的一分钱，原因是对方经济困难暂难即时执行判令；当他们为了经常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专门重金聘请声名赫赫的大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在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却忽然发觉自己的顾问仅仅只能"顾"和"问"，只能动口而不能动手，远不如头戴大盖帽的其他执法官员更高大威猛而有权有力；当他们正儿八经地将自己名下的财产签订合同交由他人承包，坐等每年收取高于银行利息的"上交费"时，到头来却被承包人经营失误鸡飞蛋打亏了本，向承包人索债的债权人反将出资的发包人列为被告提起诉讼，最终判决竟写明"发包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归还责任"。如此等等，使庙港社会和庙港人对日益增多的法律和法治忽生困惑，不用法有些事没法办，用了法可能造成这些事更难办，是耶非耶?

静而思之，庙港社会对于法之需要之际产生的法之困惑，是否源自其世代以来更习惯于"人治"，且自身农村旧习过深过重，法律细胞过低过少？或是源自现行法律程序过于严谨浩繁？或是源自眼下法制尚不完善，法治机构功能有限？抑或是诸般因素皆有所源乎？再莫非就是庙港"这个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的窗口"及广大中国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尚需设置一个缓冲过渡的稳健发展的分期推进过程，以使法之普及、法之理解、法之运用和全社会法治之运转获得一个密切融合、良性循环的整体协调能力？

四

如果说，旧中国及其以前的法治并未在庙港地区真正启动而

仅仅只是投射出一个徒有其影的虚幻光环的话；那么，新中国创建之初的突飞猛进式的社会主义法治之壮阔波涛，则给在法律意义上沉睡了悠悠数个世纪的庙港社会带来了石破天惊的轰响，烙下了深刻永恒的现代法治初兴之印记。

本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社会主义新时期法治改革在庙港社会的推行，乃是名符其实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法治浪潮，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庙港社会和庙港人的传统习俗和行为习惯，以质的飞跃变革着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间生活，使庙港社会在共和国法治大潮的推动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活力和新面貌，用"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来概括庙港社会从江村一一江镇的法治发展之全貌，应当是颇有意境的。

而今的庙港社会，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法治巨浪的洗礼，已较完整地在各方面显现出崭新的法治面貌：

从思想认识方面考察：庙港社会从1979年国家颁布《刑法》、《刑诉法》这两个发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法治之先声的两部大法开始，特别是自1985年全国"一五普法"拉开帷幕以来，由乡镇普法领导小组牵头，普法办公室主办，公安、司法、综治办配合，先后印发法律宣传资料30000余份，举办法律专题讲座300余次，开辟法律橱窗和壁报10余处，利用广播电视进行法律宣传80余小时，开考全国"一五普法"、"二五普法"干部考试和职工农民考试5次10余场，培训和考核国家干部30余名，培训法律宣传教育骨干近100名、乡镇基层村厂站公司干部180余名、在编职工和农民10000余名，中小学生500多名，宣传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刑法类、民法类、经济法类、诉讼法类的法律法规上百个，使全庙港地区的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学校村庄的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都受到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尤其是党政机关干部中的大

部分不仅已经精通本人工作条线的行业法规，而且还具有较全面的综合法律知识和运用能力，其中党委和政府分管政法的领导及司法助理员和公安派出所等执法人员，更是精益求精，已表现出"专家型"人才的雏形，完全彻底改变了庙港社会千百年来官不讲法、民不知法、事不依法的落后状态，初步跨入人人知法、个个守法、办事照法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从社会治理方面考察：庙港社会自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 1979 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来，早已根除了旧时代屡剿不断的太湖匪患，禁绝了前后持续百余年的沿湖地区的盗匪云集、凶杀抢劫、歪风不绝之怪状，扫灭了吸食鸦片、贩卖妇女和封建反动道会门，严格控管了整个庙港地区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严厉打击了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彻底整肃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了庙港地区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近年来，庙港地区已有了配备十多名警官的公安派出所、各有三名专职干部的司法办公室和综合治理办公室。一所二室近 20 名干警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吴江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的协调指挥下，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加强"基本队伍、基本组织、基础工作"，动员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切实担负起"确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联手协作在全庙港各机关团体事业企业和各村建立了治保委（组）50 多个、调委会 40 多个、综治小组 80 多个，配备专兼职保卫、调解、综合治理干部近 300 人，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管一防"目标责任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每季一自查、每半年一互查、全年一次总体大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社会防控面的漏洞。共登记注册外来人员和出租给外来人员居住的房屋达 1200 余名 100 余间，新建加固防盗门和保险箱共 600 余家，设置厂企警卫和居民区护村哨护楼哨达 100 余人、安排"两劳"释放人员重新择业自食其力十多名，有效地预防在先，大大

减少了流氓斗殴和流窜偷盗案件的发生。公安派出所在市公安局业务科队的指导下，对现行案件运用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及时侦破，常年侦破率保持在100%，强化了威慑打击力度，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将庙港地区的刑事犯罪件数连年控制在周边地区的最后位置，并在吴江市各镇中长期保持刑事发案率最低的记录，受到上级多次嘉奖。现在，整个庙港社会的治安状况长年稳定，镇村上下社会安定、民心稳定，除偶尔尚有小规模偷盗作案外，各类刑事案件基本上被控制到少发生、不发生。

从经济发展方面考察：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法治，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家颁布的大量经济民事类法规和与之配套的法治机构的运转，有力地反作用于庙港社会，促进了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推动作用。自80年代起至90年代中期的短短十多年中，庙港地区申请工商鉴证、公证处公证、律师见证及司法助理员咨询审查的农田劳务承包合同、建房买房合同、货物购销合同、产品加工合同、经营承包协议、借款协议等经济法律文书竟达2500份之多，涉及金额超过1个亿人民币！其中，通过鉴证公证见证剔除劝阻的无效合同数十份，涉及标的数百万元，避免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损失。期间，庙港乡镇骨干企业和企业家聘请律师或司法助理员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有30来家，几乎占到全部重点企业的80%；邀请法律顾问参与签约谈判的有100来起，涉及项目投资将近5000万元人民币；聘请律师和司法助理员办理的法律事务400多起，涉及债权债务1600多万元，索回经济权益1300万余元；由律师及司法助理员起草和审查企业联营、中外合资、进出口贸易合同章程协议等，也在100起以上，涉及金额近1000万美金。吴江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其他有关执法部门，一方面通过侦破刑事犯罪案件、承办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等法律事务，为庙港地区解决了企业遇到的大量难题；另一方面多次提出依法治厂、堵塞

漏洞的法律建议，使相关企业“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尝到了主动用法的甜头。本市不少法律界人士，还经常走访庙港乡镇企业，观察掌握乡镇企业对国家法律和法治机制的需要情况，从法治的角度研究其治理特点、分析其存在问题，切合实际地对它们进行因地制宜的法律开导、对症下药的法律指导和持之以恒的法治引导，初步改变了庙港社会乡镇企业、农副畜产品经营户、农工商运建服承包户们原来知法不多、学法甚少、用法更少的状态，行之有效地引入法律知识和法治机制，协助他们制定了企业管理经营决策方面的法律防范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他们理顺了生产经营关系，协助他们渡过创业艰难的初级阶段，迈向开拓前进再创辉煌的中高级阶段，使法律和法治在庙港经济中逐渐得以生根开花结果。

从民间生活方面考察： 旧庙港社会延绵了数个世纪直至不久前乃至当今的诸种社会“规矩”和民间旧俗之多数已被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的滚滚法治浪潮冲刷改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而逐渐转变为有益于社会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的合法行为道德标准和通例，3 万多庙港乡民们在日益增多地走出乡间、“升格”为“市民”的同时，其日常社会生活习俗和行为习惯也于自觉与不自觉中、主动与不主动间步出峡谷、演化跃升到合乎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和有利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之内，其中相当部分的民间生活行为已经非常法治化或趋向法治化了。如世代相传沿袭已久的婚丧嫁娶、翻房建屋、兄弟分家、婆媳争斗、师徒不睦、老来无靠等农村传统问题，至今其恶俗无益部分的内容大多已荡然无存，很多已被新型规范的法律性手续所取代：自由恋爱的新婚夫妇，必先办理健康体检和民政法律登记，尔后才操办民俗必备的盛大婚宴，入洞房前还必定不忘按照法定条件前往镇政府领取一张新宠儿的“准生证”；兴建新楼的农家，不再恪守上代长辈所说的“宅地祖传，有钱就造”并仿效他们“请风水先生相过”

便"选个黄道吉日破土动土"，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衡量法定条件，先申请建屋用地，再测量规划设计定图，审批后才着手开工；分家析产或继承遗产的弟兄们，有时竟也能想到要给出嫁在外的姐妹们留下法律规定的小小一份，有时还会异常认真地会聚一堂，字斟句酌地共同立下一份传子传孙的协议文书，甚至还要合家跋涉来到市里寻找法律部门给予公证见证；古老的农村婆媳争斗戏中代代上演的"媳气婆，婆逼媳"式的家庭恶作剧导致的一幕幕寻死觅活的悲剧，十年前每年还总要有几十起上百起，也总会有几个"服农药、上梁吊"闹死为止的，如今在乡镇村厂站45个民调委184名民调员十余年的辛勤努力下，从婆媳斗、夫妻斗、弟兄斗到妯娌斗等传统的农村家庭内部纷争已减少到十分稀罕的程度，"上吊吃药"形成的"非正常死亡"已降低到基本没有；蚕桑渔牧和商业手工业行业身怀"祖传绝技"传带徒弟的、乡镇企事业单位保送培养农家子弟上学深造的、辛苦一世、多子多女、老来反而被互相推诿无人赡养的人们，纷纷采用起十分现代的"合同方法"去寻找出路；师徒之间往往通过《从师学艺契约》去划定师徒之间三年之内的权利义务关系，"吃徒弟"和"杀师傅"的不合法恶俗都得以防范在先；企业与代培人材之间较多采用《代培服务合同》来明确育才者与成才者相互间的资助额度和服务年限的指数，不必担心企业中途停资和学生"书读好、人跑掉"；父母与众多子女之间有时也用《共同赡养协议》来固定每个子女每月每年必须支付的固定数字的赡养费和带有强制性的保证交付程序，尽管兄弟姐妹们在签字画押时难免会有尴尬之感及相互埋怨之语，但到底促成了老有所养的天大之事，说不定还是这群父母子女们重新反省而长久和聚的催化剂呢！还有不少庙港人，不仅安分守己勤劳致富，而且居安思危行动在先，还是青年便买起了养老保险，刚刚办厂开店就办起了房屋设备商品财产保险，甚至为尚在牙牙学语的幼儿办妥了教育安全保险。仅此打住，也足以

窥见法之于现代庙港社会之家庭民间生活是如何的交融一体、密不可分了。

五

尽管庙港社会的法治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佳绩频传、生机勃勃，已经带来了令人耳目全新的现代社会环境，已经培育了继往开来的跨世纪的法治氛围，但展望庙港社会日渐深入的社会改革和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现代化的需要，其有待填补的法治空白和需要完善的法治链环也急需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及时规划：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目前庙港社会的总体法律意识并不强，法治水准也并不高，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企事业职员，无论是工人商贩还是桑渔菜农，思维习惯上一如既往地还装有"官本位"为上、"钱本位"为实的主导线，"法本位"和"民本位"意识尚显淡漠，更未扎根，法律虚无、法治可有可无的陈腐习俗仍未彻底铲除，远未从根本上确立法律是现代社会治国安民的唯一准尺，是每个公民自律自强的唯一权杖之现代法治理念。

对此，庙港社会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将把普及法律，宣传法制作为法治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全社会的普遍学法和各个社会领域的专门学法，使三万多庙港人民熟悉国家已经颁布实施的几百部法律和千余项法规。其中，党政机关干部、法治机构干部不仅必须先行一步学法在前，也确有必要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与本地区本机关本岗位的管理服务职责相关的数百个法律和行政法规；企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代理人将更多地研究运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商务购销、金融财贸、标准管理、环保安全、质量责任、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借以依法去管理企业、发展生产、合法经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渔民、店员、工人、学生们也会较多地懂得社会通用

的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一些法律规定。人们将会完全确立法律法规是全社会唯一公认有效的管理规则和竞赛规则、法律手段是解决一切社会争议的最高手段，将比较熟知面广量大的社会法治机制的功能作用，初步达到心中有法、遇事不慌的境界。还有不少涉外经济人士在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不但已树立起较强的法律意识，而且已了解了很多的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学会了预防和处理国际投资和商贸争纷的法律本领。

其次，在行为机制上，庙港社会现行的日常运转还主要习惯于使用和依赖"行政模式"而不是法治模式，庙港社会的社会事务的处理方式还主要采用行政指令和行政传递而不是法律机制，庙港社会的对外社会经济交往还主要建立在传统习俗之上而不是法定条件内容之上。不单整个庙港社会面的行为操作大量流于非法治状态，即便是单个庙港人的具体行为准则也还相对停留在传统思维和感觉推理，多数的人和事还是依靠直觉和经验在制办，各个层次的运行动作也都缺乏法律性思维和法治性机制。

从现在起，庙港社会就要在强化法律意识的基础上，十分重视用法治观念来调节思维状态和行为结构，尽早摒弃积重难返的旧习惯旧传统，避免社会行为机制的单一行政指令化和行政指令的非法治性及个人行为的粗放随意不规范化，全面倡导社会运行的法律化思维规划和规范化操作行为。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庙港社会可能做到社会面的运转基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社会事务的处理方式主要源自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社会行为的令行禁止主要出自合法规划转动的社会发展预程，法律和法律知识将成庙港社会凡事凡物的先行依据和启动程式，法治机制将成为庙港社会管理第一线的和最主要的运作手段，行政指令和行政传递将作为辅助性的操作性补偿动作。彼时的庙港人，将不论其来自何村何厂，其祖族背景和文化层次及个人爱好、职业有何区别，一般于事于物皆已善于感悟其法治机制、掌握其法定条件、

规范其操作行为，随带着法律思维。这于国家权益、社会公众权益、单位团体权益、乡土区域权益及个家庭权益，都将受益增效。

再次，在社会环境上，相对平安的庙港社会之镇村四周，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宁环境尚存其间，不良分子和不良行为尚未绝迹。80年代以来严重刑事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的发案数虽均低于周边地区，甚至自相对照已呈小幅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刑案总数还是居高不下，外来人口流窜作案的偷盗案件尤其多犯，"六害活动"更是屡禁不止，其中"搓麻将"形式的赌博几乎是星罗棋布十分普遍，社会面貌的"脏乱差"及自然环境污染日甚一日也非常令人担忧。

鉴于以往的教训，庙港社会今后的社会环境治理，将必须从最基层的治安防范和环境护理着手，摆脱固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按"重在治本"的要求一手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一手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基层工作，着眼于二十一世纪，防患于未然。一要以青少年教育为重点。以社会治安和环境护理为体现，深入开展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全体庙港人民的素质，大力营造"社会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使刑事犯罪分子无处下手，不良分子和不良行为没有市场，"六害活动"包括"搓麻将"无人参加；二要强化公安治安巡逻网络、强化外来人口管理和动态社会管理、强化日常社会秩序和劳动力流动管理，进一步加强治安现场和治安防范。同时要依靠民间力量，创建"安全金库"、"安全村"、"安全小区"、"安全工厂"、"安全商店"和"安全家庭"，力求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实现庙港社会本地刑事发案率为零、外来刑事作案侦破率为100%，建成高度文明安全、犯罪分子不敢入境的地区；三要以创建省级卫生镇为契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初全面启动社会环境依法护理工程，发动全镇人民人人动手、个个监督，

确保庙港社会和太湖水域及空间做到地不污染、水不污染、空气不污染、人和天地空气一样干净、家里和街上一样干净、城镇和农村一样干净、环境和人一样文明。

最后，在法治机构上，虽然公安、司法、综治三个法治机构已分别驻扎庙港社会10年、8年和3年，三家所部干警已近20名，工作开拓也是连年进取功绩显著。然而，面临庙港社会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随同大环境必然要进入全面法治的时代重任，这支队伍不仅在机构上功能不多、职责有限，在装备技术上相对落后陈旧，在人员素质上也是因先天原因而不尽如人意，在操作模式上更是完全步行政指令模式之后尘并严重囿于传统而有待改革。同时，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法治机构及其中介机构如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以及现代法治必须的有关行政单行法规的执行机构均尚未正规出现在庙港社会，这对世纪之交间庙港社会的法治进程和庙港3万人民的法治需求，就不只是单单一点的"不便"之所能包含的了。

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国家对外对内法律规范的逐渐统一，庙港社会各行各业对法治机制导致的法律需求会与日俱增，法治机构对庙港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所起作用会日趋增强，将最先得到改组强化的是公安和税务，然后陆续投向庙港社会的法治性机构依次会是法院、律师、会计师、税务师、检察院、环保等。本世纪末以前，功能较全装备较先进的新式警署将在庙港社会组建，总员将达到30人左右，主管全庙港地区的治安、户政、交通、刑侦、政保和日常全天候社会管理工作，配有20多辆警车及警犬、电脑等多种足量现代警察用具，在开弦弓和太湖大堤等重要地区将设立分警署或警站；同时，执掌庙港社会税印的拥有税员20人、税警10人，共30人的庞大税务所也已建立，税费通过电脑连接银行直接由纳税人主动径行交纳，税员负

责开列清点纳税人名册和检索核审税目税额，一经发现偷漏税款的，直接由全副武装的税警催查罚办，触犯刑律的会被送交市税务法庭由税务法官审判；嗣后，市人民法院向庙港社会派驻了一个由8名法官和8名法警共16人组成的庙港法庭，主要审理依法自诉的轻微刑事和一般民事、行政、经济案件，判决生效后不能自觉履行的，驾驶警车、佩带警具的法警将依据当事人申请，随即予以强制执行；接着，市人民检察院在庙港设立了专司惩治贪污贿赂罪和实施刑事行政民事检察的由3名检察官和3名司法警察组成的检察室，高居于庙港全社会的各法律机构之上，履行"法律之监督"。其间，庙港法律服务所从司法办分离出来，成为自收自支的民间法律服务机构，日后发展成为正式律师机构；市律师、税务师、会计师们自由结伴前往庙港开所执业，庙港本地经国家考试获取从业资格的同类人员也加入其中，并逐渐发展成为本地人为主、外地人客串的常设的法治性中介机构；主管土地、空气、水资源、鱼资源、动植物资源以及产品质量监检等诸方面的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也相继向庙港派驻出配员3～5人不等的专设监视机构，其中环保部门单独在太湖湖沿设置耗资巨大、颇具规模、装备精良的水陆空一体的环境监测站，常年维护太湖水陆空立体区域的清丽纯洁，使庙港地区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名闻海内外的水乡自然风光休闲度假游览胜地。

虽然离"有法走遍天下，无法难出家门"的高度法治的现代化社会还有相当距离，但庙港社会的法治发展史已经表明，中国农村的法治进程不管如何崎岖漫长，终将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庙港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的惊人巨变一样，社会主义法治浪潮在中国城乡的汹涌推进，也必将给庙港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精神物质生活带来令人更加惊叹的质的飞跃！

（吴江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杜　挺）

人　才

庙港，处在"名士多于鲫鱼，琵琶盛于饭甄"的江浙间，史称"儒林里"，它"以其宋元以来人文独盛衣冠甲地于一邑故名"。由于历史的远去，我们已经难以数清这里究竟出过多少举人进士，也难以数清曾有多少名人雅士在这里留连忘返。然而就是这块弹丸之地，本世纪以来就有许多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领袖人物走出或驻留于此，干出了许多引人瞩目的伟业。他们中有孙本文、孙本忠、孙世实、费孝通、郑辟疆、费达生、项怀诚……

一

马克思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庙港社会的发展，正是与一些有志于庙港富强繁荣的人物有关。我们可以从20年代以来庙港土地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中看到庙港是怎样孕育出自己的人才来的。

1、土丝改良运动

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太湖流域农民的主要副业、当地人以蚕、粮、菜三分天下，其中蚕稻紧相衔接，有民谚"蚕箔落地，有钱栽秧"。明代，由于朝廷鼓励农桑，加以农村家庭丝织业的兴起更进一步刺激缫丝业的发展。但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丝业呈现衰退趋势，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扶持、振兴蚕业，采用科学养蚕、机械缫丝，丝质大为提高。我国著名蚕桑缫丝专家郑辟疆及其追随者费达生等人早年先后东渡日本，研修蚕学，

目睹日本蚕丝业蒸蒸日上，反顾国内政治腐败、蚕业衰落，立意改变面貌。1923 年，郑辟疆任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在校内成立推广部，面向农村掀起了土丝改良运动以振兴蚕丝业。此年冬，郑辟疆与费达生等人下乡，到蚕区震泽、双杨、开弦弓、吴溇、大庙港等地巡回宣传。1924 年，震泽议会委托女校两家合作，选庙港开弦弓为基地，开办“震泽市、省立女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1928 年，陈杏荪、费达生、孙守廉、沈秩安、施文卿、杨文震等人筹划并在开弦弓集资，于次年初成立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是当时江苏唯一的制丝社。不久又兴办了机械缫丝厂，这是我国近代史上兴办的第一个农村缫丝厂，是我国合作事业的先声，也可以说是现代乡镇企业的鼻祖，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开弦弓村丝厂成立，郑辟疆积极支持，并将女蚕校内由爱国华侨欧谭惠然女士所赠的全套小丝厂机械设备拨给该厂使用。为了使丝厂得到健康发展，费达生作出了辛勤艰苦的努力，给庙港人带来了希望，也提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今天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2、抗日救亡运动

地处太湖之滨的庙港人素来向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当战争的烽火燃烧到家门口的时候，当家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庙港人同样能挺身而出浴血奋战。1938 年，中共党员庄绍桢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派遣，到太湖边开展抗日工作，经人介绍进入国民党县政府任政工队长。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地址在严墓，政工队中就有许多积极抗日的庙港青年。他们在庄绍桢的带领下，进行抗日宣传，还多次袭击日伪军。1938 年冬，中共中央特科派山东人丁秉成到吴江开辟工作，丁秉成通过同里人王绍鉴的关系，与战斗在太湖边的七都、庙港、横扇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程万军部副司令曹绍信建立了联系。丁秉成曾在庙港发展过

学校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1972 年中央号召大抓教学质量，为知识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当时恢复了统考，开展了一系列竞赛活动。很明显，知青做教师的班级在教育质量上明显高于同是代课的非知青老师教的班级。如今，庙港的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部分都是当时知青教师的学生。而知识青年本身也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得到了锻炼，茁壮成长。震泽知青姜人杰，1964 年插队庙港后就与农民打成一片，成了当时典型人物。他历任了开弦弓村学校教师和庙港文化站站长，担任过乡宣传委员，后又担任了吴江县副县长，现为苏州市外事办主任。苏州知青张克裘，1968 年插队庙港后在这里落户，到 1992 年调任吴江实验小学校长，在庙港奋斗了 25 年，为庙港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他在担任欢喜桥辅导小学校长时，积极探索教学规律，力求使学生"爱听"、"会做"、"善思"，提高教学质量，他包教的班级在全乡各类统一考试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既抓辅导课的教学工作，又坚持担任主课教学，提高了所在学校的教育水平。他所在的农村小学办学条件很差，他多方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翻建了新校舍，开辟了运动场，建了围墙，使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他担任庙港中心小学校长，为掌握第一手资料，探索教育规律，经常深入基层，抓教学质量。同时，他制订了教师岗位责任制，推进了庙港的教育水平。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70 年代后，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庙港，使庙港的知识结构得到了飞跃。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奉献于庙港，对庙港的经济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现任庙港镇党委书记庞启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庞启剑，农艺师，60 年代毕业于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1979 年来到了本市蚕桑生产重地——庙港，但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蚕桑面积仅在 5000 亩左右，他一到庙港就规划蚕桑生产。他担任乡多服公司经理后，更是大力发展全乡桑地和加快蚕

茧生产。1980 年，省科委给吴江市下达提高蚕茧出丝率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是系统工程，难度大，综合性强，周期长。这个任务落到庞启剑身上后，他立即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攻关小组集中攻关，有时为了取得一个精确可靠数据，和同志们在试验点日夜奔波，反复验证，反复核实。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1984 年，省科委在庙港召开科技成果鉴定会，这项"提高蚕茧出丝率的研究项目"通过了鉴定，检定结果指数分别比 1980 年提高 21.58%和 27.32%。庞启剑主持的这个项目，获得了较大面积的试验成功，创造了国内较大面积出丝率的新水平。这个项目获 1984 年江苏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庞启剑也被评为 1984 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1983 年，庞启剑担任了庙港乡经联委副主任兼多服务公司经理，负责抓全乡农副业。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经营，针对庙港具体情况，抓了四个一条龙的配套服务（蚕桑上，栽桑、收茧、缫丝一条龙；蔬菜上，种植规划、品种更新、收购加工、经销服务一条龙；水产上，挖塘、育苗、管理、收购一条龙；畜禽上，苗禽苗畜调剂、技术辅导、防病治病、收购经销一条龙）。这四个一条龙的配套服务，适合当年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规模，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这四大项目每年的总产值均超过 300 万元。1985 年庞启剑又抓了"茧丝生产一条龙"的试验，使养蚕、收烘、缫丝系统化。这样，蚕农多生产优质茧支援缫丝厂，缫丝厂则拿出一定利润用到蚕桑生产上，对蚕桑生产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6 年他担任经联委主任，1987 年 10 月乡党委又决定由他分管全乡工业，而庙港乡办工业起步晚，底子薄，他上任后主动下厂调查研究，在整顿原乡办企业的同时，又发展一小批新兴企业。与外地联营的锻压厂、香雪海冰箱二厂，就是他振兴庙港工业的起步项目。1991 年他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狠抓经济工作，促成庙港工业公司与香港捷诚公司合资建立苏州捷利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1994 年他担任了庙港镇镇委书记。

4、改革开放、实现农村基本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给庙港人创造了一个改造家乡、建设家乡的机遇和动力。庙港镇的领导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庙港改革开放中，历任党政领导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1989 年底周玉龙担任书记后，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完成了撤乡建镇的历史使命，是建镇后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心支持了教育事业的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留给了庙港人深深的印象。他用二年的时间，筹集了 300 多万资金投入教育，开弦弓村小学一个冬天就从一排用了几十年的旧平房中搬迁到一所全新的颇具规模、设施齐全的校舍中。为解决孩子们喝水和学校环境卫生问题，又专门为学校挖了深井，建了水冲式厕所。在庙港他开了每年为教师办几件实事的先例。教师的奖金缺口，大多数由政府部门垫补，外地教师浮上两级工资，教师使用煤气全部由政府部门统筹。连学校的图书馆缺图书，他也亲自派车购买了 2 万册新书。1994 年 3 月，已调任副市长的周玉龙回到庙港，放心不下的还是教育，看到刚刚达标的镇中心小学涉及到庙港镇区的道路扩建，一方面要紧缩校园面积，另一方面，小学生每天将穿越江浙两省的主要公路干线，会给小学的安全带来影响，他就与现任党委的同志一起订下了学校近期大搬迁的规划。不仅于此，其他方面他也做出了特殊贡献。

改革开放，给庙港人带来了机遇，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敢打敢拼。首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庙港人开始在生产知识的运用和技术技能特长上发展，他们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把传统的家庭经营引向了专业化、商品化，专业技术人才的潜能得到了发挥，出现了养兔专业户、养蚕能手等能工巧匠。其次，不少庙港人进一步拓宽了

思维，投身了市场经济。如南京大华力变频器自动化有限公司经理徐骏，自苏州电校毕业后安排进南京自动化设备厂，搞技术工作，后又就读东南大学电力工程系，改革开放为他开辟了舞台，他只身去了珠海，担任了中科院中高公司项目部经理。后回南京办了中高公司南京分公司，从事变频器销售工作，业务量不断扩大，现在他又自己办起了大华力变频器有限公司，面向社会招收人才，使公司业务不断兴旺，前景看好。他为吴江水泥厂安装的变频器节能效果明显。

市场经济和工业产业的发展，给庙港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广阔天地，庙港的木材市场在全市领先一步。在创办集团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陈圣江创建的金蜂集团和沈分明创建的金帆化工集团。

陈圣江，男，庙港土生土长的农民，吴江市劳动模范。曾任庙港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工贸合营吴江庙港缫丝厂厂长、金蜂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任庙港镇党委副书记。1982 年 9 月 20 日，做了 9 年村党支部书记的陈圣江走马上任，接任了庙港缫丝厂厂长。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培养人才，先后选送近百名年轻的技术工人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全国丝绸培训中心等地培训。在费达生教授的支持下，他针对产品质量、产量同时过硬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为了保证茧源，他推出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户养蚕，推广科学养蚕技术，成立了养蚕、收烘、缫丝一条龙生产，建立了自己的蚕茧基地。他经反复论证，顶住压力，更新技术设备，决定上自动缫丝车。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聘任杨志超教授作为顾问，高级工程师作为技术指导，确定“缫丝操作测定日”，并规定每月逢五进行操作比赛。自动缫丝车上马成功，产质量同时提高。1986 年，正品率迅速上升到 95%，并连续数年获江苏省优质产品称号。金蜂牌白厂丝达到 4A 级以上，符合国家出口标准，产品远销澳大利亚及欧美国家。

陈圣江在办厂过程中，一手抓政治、抓职工的思想素质，一手抓效益、抓企业的运行机制。关键时刻，常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从单一的企业向集团型转化，组建了省级集团公司—"江苏金蜂集团公司"，紧密型企业有庙港缫丝厂、金蜂丝纺公司、吴江第四丝绸厂等。如今，陈圣江继续了费达生的事业，把"金蜂"发扬光大。

沈分明，可以称得上是庙港后起的企业家，现为庙港农工商副总经理兼金帆化工集团董事长。1988 年初，沈分明出任庙港化工厂厂长。当时产品单一，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沈分明上任后烧了三把火：一是全面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级承包责任制；二是成立科技攻关小组，重点开发新产品；三是采用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重点培养科技及管理人才。至 1990 年就开发出 10 多只新产品，为企业创利 20 多万元。为了应付化工产品行情多变的情况，他带领攻关人员走南闯北，跑市场、摸信息，与国营大厂挂钩，同科研机关结缘。1993 年初，当富马酸在国内市场刚出现时，他已开始策划该项目的实施。不到一年时间，由华东理工大学设计安装、国内品位最高、产量最大、生产工艺最先进的 2000 吨级生产项目，列入了吴江市"兴吴工程"。1994 年 5 月份，开始投入批量生产，产品经华东化工学院鉴定达到优级品位。沈分明始终把眼光盯住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敢于创一流水准。他已开发成功产品 30 多只，其中"金帆牌"枯茗醛、溴化纳、大蒜素、富马酸出口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累计创汇 180 多万美元。当主要依赖进口的泛酸钙在国内销售形势日见旺盛的时候，他又三番五次地跑科研单位，请教工程技术人员，与上海三维制药公司合作开发、投资 2500 万元的泛酸钙项目的兴建成功，使金帆化工集团将成为国内泛酸钙的主要厂家，产品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总量的 80%。

二

庙港，作为江南的一个普通农村乡镇，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一块人才成长的沃土。那么，庙港具备了怎样的条件而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呢？

1、特殊的区域环境

庙港，滨临太湖。太湖湖面宽阔，碧波万顷，不仅以湖光山色美丽、物产丰裕而著称于世，而且以其渊源流长的湖文化和湖文明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太湖人。正是这太湖，陶冶着庙港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一方面，他们能以社会发展为己任，把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学术成果与社会变革、社会事业融合为一体。另一方面，他们能接纳外来人，让有识之士来了解庙港，建设庙港、发展庙港。因而，庙港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成就卓越的人才群。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初以来，这里曾培育出了一批批风流人物。他们中有——

学术界泰斗级代表人物：我国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孙本文，我国家蚕育种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孙本忠，我国蚕丝教育的奠基人郑辟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农村丝厂的兴办者费达生等。

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级的代表人物：原上海肿瘤研究所所长、医学家孙麦龄，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环境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卫生专家孙棉龄，国际激光学术研究会副主席、激光物理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陶亨，中国丝绸总公司高级工程师项志生，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施行觉，杭州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蒋保纬，苏州丝绸工学院教授杨志超等。

担任县（处）级以上各级领导重任的代表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吴江市市长张钰良，苏州市外事办主任姜人杰，吴江市副市长周玉龙，《无锡日报》主编庄国荣，无锡轻工业学院党委委员、组

织部长李凯等。

有突出贡献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代表人物：全国先进教师开弦弓小学负责人汤庆文，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金蜂集团女工周雪妹，江苏省劳动模范、庙港镇党委书记庞启剑，江苏省劳动模范、吴江市实验小学校长张克裘等。

跨出家门至大学深造，为庙港争得赞誉的新一代年轻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到美国攻读化学博士的现为旧金山纽约州州立大学教授吴卫明，当年的苏州市高考状元、首届李政道奖学金获得者、北京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倪卫红，现在夏威夷工作的土壤分析博士张伟峰，毕业于东南大学创办"大华力"变频器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徐骏等。

2、悠久的历史传统

庙港虽然是太湖之滨的一个农村小镇，然这里历史悠久，留有较多的历史遗迹，如吴越时吴越交战地吴越战，唐代诗人陆龟蒙隐居过的陆家港、放鹅的养鹅浜，有清代天文学家王锡阐题记的水月庵遗址等。从庙港这地名看，这里以前信奉佛教的人很多，有"条条港有庙、庙港的庙最大称庙港"之说。王锡阐《水月庵记》中也写道：这一带"元真子钓矶、王著作书院皆为学佛者所居乎"，佛学文化对庙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从庙港人的性格传统看，这里的人朴实、勤劳，富有正义感。他们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从本地实际出发，以自己勤劳的双手，使物产丰足，生存有余，并且不断积累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财富。20 年代这里的人埋头小农经济，有着费孝通先生在《扬子江下游农民生活实地调查》中所说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出现了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联的社会学家、蚕桑学家、医学家，直到下一辈才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早年的庙港人以勤劳朴实创建着自己美好的家园，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渔业和其他生产，大部分人养蚕、养羊、运输或做小买卖。植桑

养蚕在这里已有悠久历史，《吴江丝绸志》记载：相传曾寓居过庙港一带的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作中就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桑箔”及“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棹缫车”之句，足见养蚕业的普及和庙港人的辛劳。他们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不断改进操作技术。当年，郑辟疆、费达生等人筹建的开弦弓生产合作社及丝厂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徐绍阶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的一文中赞扬该社“份子健全、组织严密，自选种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现。”当今的庙港人继承了上一辈的勤劳朴实的高尚品质，也涌现了一批勤劳致富的典型人物，如养蚕能手张阿巧、养兔专业户孙关林、全国技术操作能手周雪妹等。我们从周雪妹这个庙港金蜂集团的普通女工的成长轨迹中，也可以看出庙港人在太湖的养育下形成的勤劳朴实的一面。她 1983 年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作为缫丝工，上班八小时手脚不停地巡回接头，一班下来常常累得精疲力竭，但她还是一心扑在操作训练上。回家在烫水中放进卵石做反复抓练，以提高手轻水稳摸无绪茧的成功率。正是由于这种近乎严酷的勤奋才使她在行业比赛中连连夺冠，荣获丝绸行业全国操作能手。

从庙港的风俗传统看，庙港人大多胸怀大志，勇于向外开辟新世界。大凡农村人物，都有恋乡恋土的观念，普遍认为“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庙港人则不同，历史上他们就有不少人能离开本土，去外面闯世界。庙港人离开本土外出的比较突出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通过求学之路而走出庙港的男人，另一类是不识字却能毅然外出去做帮佣、奶妈、女工的女人。男人们跨出家门而出人头地的大有人在。20 年代的孙氏弟兄在外面取得了盛誉，其儿孙辈在他们的启迪下也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孙守廉的三个儿子亦都外出求学，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而女人们跨出家门也为庙港带来了外面的信息和开放的思维。解放前后，庙港村村都有人在城市里做佣人，奶妈，她们回到家乡使一些传统习性改变，如订亲不收聘礼，很多方面接受了新思想。据1989年至1994年统计，庙港考上大中专院校外出求学的达170余人，在吴江各小乡镇中属上游水平。

从庙港人才的精神特质中，我们看到庙港人才不管在本土，还是在域外，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庙港这水乡小镇能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就是因为庙港人才目标远大且把自己的成果与社会贴近。在学术界能创一流水平的庙港人数不胜数，以孙陶亨为例，他投身激光物理学，瞄准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以来获国内外多次奖励，主要有美国爱姆玄斯特大学柯普立奖，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现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年到庙港开弦弓村姐姐费达生处养伤时，看到了庙港这块土地上萌发的农村工业化的萌芽，他被这些新生事物吸引住了，一访江村开始起步，他整理分析的庙港开弦弓村调查资料成了他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至今，他连续十九访，不断发掘了庙港和庙港人的发展现象，把社会学研究推向了一个个高峰。他在《九访江村》中写了对乡镇工业农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思索，通过调查，得出了"工业与农民生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的结论，接着他的研究瞄准了农村的体制改革，着手了小城镇研究。费孝通把江村推向了世界，江村成了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江村与费孝通先生一起齐名于世。

从庙港的代际传统看，庙港人才现象中人才链现象特别突出。人才链是指一定才能的人在两代或两代以上连续表现出来的现象，卓有成效的庙港人集中在更楼港、陆家港一带，集中在孙氏、项氏、施氏等大家族中。他们形成了血缘相近的人才链，以孙氏为例，蚕桑学家孙本忠和社会学家孙本文是兄弟、与蚕桑学

家孙守廉是叔伯兄弟，他们的祖辈有晚清秀才孙忆轩、县城中榜上有名的孙兰江，父辈有贡生、小学校长孙祖禄和开布行的孙钧甫。孙本文的儿子孙世实，是北京大学优秀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烈士。孙守廉的三个儿子都是专家，大儿子孙麦龄是医学家，二儿子孙棉龄是环境卫生专家，三儿子孙陶亭是激光物理专家。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的父亲，就是当年跟随郑辟疆积极宣传土丝改良的中国丝绸总公司高工项志生。项怀诚的姐姐项小英，是北京妇女保健所主任医师，她于1956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一生从事医学事业，在妇女儿童保健方面有独到的成果。施氏家族除中国科大教授施行觉外，还有在上海有一定名声的原资本家施成生等。这种生理和文化精神传统使一代又一代人茁壮成才，人才辈出。

庙港人才不仅在血统上有代际承继的传统，在事业上同样是代际传统明显。庙港人继承上一辈的传统以养蚕、缫丝为业，如今，在市场上有较高声誉的金蜂集团用的"金蜂"商标就是沿用当年费达生所创造的商标，"金蜂"集团的缫丝业就是继续了当年费达生等人的优良传统。如今，费达生的学生，与费一起搞土丝改良的杨志超是"金蜂"集团的特聘顾问，长期驻在"金蜂"集团，因为"金蜂"集团继承和发展了上一辈的创业精神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健康地发展。

3. 良好的心理环境

创造，是人的全部体力和智力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一种活动，而其中，人的心理素质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庙港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庙港人才之所以能创造出卓越的成绩，其良好的心理素质起着很大的作用。庙港人才主要有以下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是独创心理。庙港人才有其强烈的独创精神，他们能在接受先辈经验的基础上，勇于创造，他们胸怀大志瞄准一流目标不断创新。如孙本文1921年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

后，1928 年与游嘉德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东南社会学会，把中国的社会学从萌芽期推向了成长发展期。1930 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孙本文担任理事后被推为理事长，他出版了译著 20 多部，他的代表作《社会学原理》，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学论坛上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于今天的社会学发展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孙麦龄 1957 年调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时，致力于医疗目标管理和应用的开发工作，并领导该院医务人员进行针刺麻醉研究。1958 年 10 月，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国内首次发表针刺麻醉应用于扁桃体手术的临床报告，开创了麻醉新途径。陈圣江对全国技术操作能手的培养也有其独创性。当本厂职工周雪妹在全国技术操作比赛中获奖后，陈圣江为了构建企业的人才梯，每逢操作能手比赛他都要派出新手参加，后又有朱金妹、徐巧林两人夺冠。一个乡镇企业有三位全国技术操作能手也属罕见。

二是容纳心理。庙港人像太湖那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人才。1923 年，省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率领费达生等人开展土丝改良运动时，当时的开弦弓小学校长陈杏荪把郑辟疆等人请来庙港传授新法养蚕技术，为女校的土丝改良运动提供良好的土壤。1929 年费达生等人选择开弦弓村建立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时，庙港人孙守廉正任县农业银行行长，就积极筹集资金给以支持，人们称之为该厂的乳母和保姆。费孝通 1936 年到庙港开弦弓进行社会调查，庙港人也给了他热忱的支持。费老在 1984 年写的《农村调查自述》中写道："1936 年暑假回到家乡，离出国上学还有一些日子，所以想到乡下去休养一下。我姐姐费达生正在开弦弓开办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这个村子里盖了一个厂房。我就借了一间卧室，呆了下来"，"我是在和这村子里的人们接触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各方面去提问题。我是本地人，加上我姐姐和这村子里农民的关系，农民们总是有问必答的，我随手记下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的知识。到我离开村子的时

候，笔记本里的材料已经不少。因而想不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写成一本有关农民生活的书。”

三是专一心理。庙港人不好高骛远，而是从实际出发，选定目标后就持之以恒，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费孝通 1936 年一访江村开始了社会学研究，至今 60 年了，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他花了几十年的心血不断地对开弦弓进行了全面的追踪调查研究，从解放前至解放后对开弦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解剖，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开弦弓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足迹。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农村的发展问题，1936 年一访江村提出了“饥饿是中国问题的症结”，1957 年重访江村提出了发展副业是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1981 年三访江村提出了发展乡镇工业问题，1985 年九访江村又开始研究农村体制改革问题。孙本忠年幼时随母饲蚕，耳濡目染，萌生爱蚕之心，小学毕业后进苏州甲种农业学校后又进国立南京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4 年至法国先入蒙里贝里农业专门学校蚕科，后又考入里昂大学动物学系专攻蚕体生理，1928 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江苏省农矿厅蚕丝技正，主持全省蚕丝改良。1930 年后历任中央大学教授、蚕桑部主任、浙江大学教授、蚕桑系主任。在我国丝业衰落的 30 年代，他满腔热忱地把欧洲蚕种改良先进经验介绍进来。解放后他的工作热情更旺，全身心地投入蚕种事业。1955 年在全国桑蚕选种与良种繁育会议上，他主持制定的家蚕选种工作试行方案经中央农业部批准成为我国家蚕育种的基本准则。1960 年他撰写了《中国养蚕学》初稿第三章，蚕品种及其选育，将我国近代家蚕育种的规划、设计的经验技术等方面汇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家蚕育种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费达生自日本归来，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蚕桑业，在完成了家蚕的蚕种改良和到缫丝技术改良后，在 88 岁后她又向野蚕研究进发，现在 93 岁高龄还念念不忘她的蓖麻蚕研究，目

的是为了贫困的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

三

庙港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出类拔萃的人才，使庙港这块土地开始苏醒。外来人才在庙港发挥了聪明才智，不仅为庙港带来了信息，带来了知识，带来了文化，带来了新观念，而且把庙港推向了世界；他们也通过庙港这块土地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知识，进一步增长了才干。庙港与人才共生共荣，纵观庙港人才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

1、社会发展与人才发展同步

时代造就人才，人才推动历史前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庙港人才现象正吻合了这个原则。自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才。当年，庙港以种地植桑为主，孙本忠、孙守聚等研究的是蚕桑学，其目的是要利用这特殊环境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走出一条富裕之路。正是当时轰轰烈烈的蚕丝改良运动，才使郑辟疆、费达生来到庙港。在抗日烽火中，孙世实投笔从戎，成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改革开放又为庙港人展示了一个新天地，陈圣江、沈分明等人才脱颖而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2、社会实践活动是人才发展的源泉

费孝通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考察和分析江村的社会现象，将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查，在庙港这个点上反映了社会现象，1938年出版了《江村经济》也成了费孝通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该书大部分是叙事的，他介绍了姐姐费达生推广先进技术的努力，农村遭受的苦难，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风俗、信仰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费孝通的先生马林诺斯基为《江村经济》写了序，赞扬

它"资料丰富，叙事生动"，"论点有根据"，而这些成绩都来自于费孝通的亲身社会调查，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对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是个推动，于是乎再访、三访、四访直至近期的十九访，每一访都有具体的收获，使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了深一层的了解。项志生，没有正式上学，但他跟随着郑辟疆、费达生搞蚕学、办电厂，他是蚕校的编外学生，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逐渐在本领域内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项怀诚长期从事金融财税事业，经长期探索，在各类刊物发表一百多篇论文。

3、人才团现象对人才潜能的发挥有着强烈的推进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改进、创造生存环境的人，不是以单个人独立出现的。庙港的人才就几乎是成群结队的。从郑辟疆带领女校学生开始到知识青年插队庙港，人才团现象比较突出，人才团中的人才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形成有机整体，人才效应才奏出了最强音。当年费达生创立开弦弓丝织厂，靠的就是一大批丝绸人才的共同援助，其中有她的老师郑辟疆，也有当地的蚕桑专家孙守廉、项志生等人，他们团结一致，才使土丝改良工作不断推开。当今，改革开放，发展庙港经济，也同样靠人才团的齐心协力，从历任党委书记到企业领导、技术人员、互相配合。他们从兴修水利、发展教育、科技兴农、开发工业等各个角度有机结合，人才群体作用的发挥才使庙港经济得以发展。胡玉成组织开庙港港，周玉龙重视教育、庞启剑进行技术攻关、科技兴农，在庙港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

4、人才的知识特质是人才成长的基础

一个人要成为专门人才，跨出家门有进大学深造的机会，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应。一个人在自己的区域环境内、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在强烈的社会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感悟能力，而进大学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有利于成为专业人才。我们看到庙港人才大多是经过正规学历教育，举例如下：

孙本文	北京大学	后赴美国留学
孙本忠	南京师范学校	后赴法国深造
孙守廉	东南大学	
孙麦龄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孙棉龄	上海医学院	
孙陶亨	北京大学	赴美国进修
孙世实	清华大学	
郑辟疆	杭州蚕子馆	赴日本考察
费达生	女子蚕业学校	赴日本留学
费孝通	东吴大学	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
项怀诚	山东大学	
项小英	上海军医大学	
庞启剑	浒关蚕桑专科学校	

除上述人物外，新一代庙港人走出家门，经过大学深造，在各自工作的领域里有所突破，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出力，为庙港争夺荣誉。

（吴江市人事局　俞前）

教　育

号为"儒林里"的庙港，其人才成团簇现，俊彦代出，是与其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相关。人们把振兴自己的家族、期望自己的儿孙能继承、实现自己的光宗耀祖之梦这种原始的思想注入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中。由此而形成了尊崇读书、尊崇学人的民风，一代又一代相传；并不断地升华至理性，从而表现在对教育的极大重视和办学的巨大热忱上。而这又成为庙港社会发展之客观基础和支柱，是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变迁的主要途径。

一

早期的庙港教育基本属于旧式教育，为传统的家庭、宗族教育；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新学的兴起，庙港的教育从传统模式脱胎转向新的教育运行模式。

1、家庭教育　它主要担负着儿童的早期教育、职业生存教育及伦理观念的教育。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记录了当地早期教育的情况："孩子出生之前，当母亲的已经有了明确的责任。在妊娠期间，当母亲的要避免感情冲动，避免观看令人憎恶的事物，禁忌吃某些食物等。这种看法叫胎教。期望母亲的良好行为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性格。对父亲则无特殊的要求，只是认为他应避免和妻子同房，因为这被认为对孩子的生理发育不利，甚至可能导致夭亡。"[1]这虽然描写的是在近代的情况，但其习俗主要是传承古代

所有，这可以称得上是庙港人早期的胎教情况，说明这里已基本形成了优生观念及其具体的行为习惯。

此外，这里的人们对于儿童的出生还有一系列的庆生活动：如妇女怀孕期，其娘家亲戚则需探亲"担汤"，送各类营养物品，诸如红糖、红枣、桂圆等，送小儿的被褥衣衫；婴儿诞生三天时，产家则应把面条和糕团送到诸亲友家，以告孩子已来到了这个世界；孩子满月时（出世一个月），则应剃头，并设满月宴以宴诸亲友；孩子满周岁时，则举行抓周庆典，在婴儿面前放诸代表社会生活的三百六十行的职业物件，让婴孩随意抓取，意在测试其长大后的职业取向等。而这些通常又主要为男婴而作，女婴一般为每个家庭所容为1～2个，许多情况在出生时即被溺死。

虽然人们对孩子（主要是男孩）的出生表现了极大的重视，而实际上对孩子却不属溺爱。比如孩子的小名一般称为阿猫、阿狗、阿土、阿根的，甚至出生时还特地用一种"蜡烛"包把孩子包裹起来，这是因为"由于经济压力需要控制人口；儿童为数很少；婴儿死亡率高；迷信鬼怪恶煞；要子嗣的愿望及有关的宗教伦理观念。从这众多因素的结合中可以看到，活下来的孩子便受到高度的珍爱，虽然从外表上看，对待孩子的态度是淡漠的。""人们迷信孩子的生命会被鬼怪追索，受父母宠爱的孩子尤其如此。保护孩子的一种办法，就是向鬼怪表示，没有人对这孩子感到兴趣；其理由是鬼怪性喜作恶，看父母溺爱孩子，就要进行打击；孩子既然受到冷淡，鬼怪就不再继续插手了。甚至有时采取这样一些方法，名义上把孩子舍给那些被认为大有影响、甚至在神道面前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以求得保护。"[2]因此，父母原来在表面上表露出来对儿女的珍爱被小心地掩盖起来了。

孩子吃奶时间一般为1岁过后即断奶了；如果是最后一个孩子则可至2～3岁，甚至有6～7岁、近10岁的。喂奶时间和次数也不定，母亲主要依据婴儿的需要作相应的满足。孩子未能站

立时，大多有家人轮流抱着，不大独自睡在小床上，乃至能站立后，则站在一种"立箱"里（正四棱台状，口内围为圆形，高1米左右，中间有一插板，孩子可立于其上，如有屎屎在上，可以抽取出来清洗），母亲和家人在劳动的间隙可调教孩子；当幼儿能自行走动后，主要在家人的看管下，在家中自由行走或在家门口的屋场上，或到邻家中玩耍。这些主要取决于这一带的农妇基本不到田间劳动，其劳动分工主要为家务和养蚕缫丝纺织等事，他们可以在劳动中兼顾孩子的养育任务。而父亲则是家法的执行代表，当孩子顽瞑不化时，母亲往往不是惩罚他，而是吓唬他要告诉其父，于是其父经常用敲打的办法来惩罚孩子。"傍晚时分，常常听到一所房子里突然爆发一阵风暴，原来是一个坏脾气的父亲在打孩子。通常这阵风波往往由母亲调解而告平息，有时，也在夫妻之间引起一场争辩。"[3]

当孩子到了5～6岁时，他就要去参加打草、喂羊等劳动；14岁时则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农副业技术，并参加农副业劳动；16岁时则有一个"拜太"仪式，即成年仪式，通过宴请诸亲朋以告孩子已长大成人，可以订婚娶妻了。到20岁时，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全劳动力，可以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接过家庭劳动的重担。而女孩则在5～6岁时，就要开始学习女红和妇道，如针线和烧饭、带弟妹孝敬老人等。过了12岁，一般都耽在家中，不再外出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了，而与母亲一起共同操持家务和养蚕、缫丝等。

在孩子们的吃穿方面，这里有这样的传习："冻小子，饿老子"，意指小孩在穿着方面可以穿得单薄一些，吃得也不要考究，但需让其吃饱。腌菜、萝卜、鱼、蛋及其各种蔬菜是村里人的主菜。

在家必须听从长辈的言传身教，这是家规不能逾矩。

渔民的家庭教育情况与岸上村里的家庭教育情况不尽相同，

赛。其对人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于舆论，所谓"吐沫也能淹死人"，还有各种家规和族规、村规等。如正月元宵，女孩要会做"灯圆"点心，男孩则要学会串龙灯。农历七月七是姑娘们乞巧的日子，这个日子正是女孩比赛女红技艺的日子，各家姑娘要把自己的织品和绣品拿出来展览，让大家评价。二月二，则是男孩比赛划船的日子。通过这多种类型的活动，来提高青少年的职业和生活技能，同时也增进人的伦理道德的意识，尤其是违背三纲五常，不仅会受到村及其社区里人们的舆论压力，族长还会召开族里的会议作出相应惩罚的措施，以儆效尤。

此外，这里修建了大量的寺庙亭庵。相传庙港有46条港，每港必有庵或寺。这些寺庙不属一种宗教类型，其中有诸葛庙、关帝庙、土地庙、娘娘庙、天将庙、东岳庙等。这些主要是因为庙港处于吴越分界，茫茫太湖风险较大，兼之蚕桑业常要受虫虐侵袭，反映了庙港人渴望平安天佑的心理状态，而其客观功能则为村民们树立了一些良好的楷模形象，对于淳化民风民气具有重要的作用。

3、学校教育 对"吴江县志"等史料进行查考，庙港历史上未办过县学、州学、书院、义学、社学等旧式学堂。这里主要没有一个相对人口集居地。庙港子弟的求学，一般先在其乡间私塾就读。这种私塾一般是就义庄或宗祠内设立专教一姓子弟的，也有以一家或数家设馆请师的；还有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教授的。这种塾馆几乎遍及了庙港的每一个村落。私塾入学年龄不受限制，小到3、5岁，大到10多岁，甚至18、19岁，每塾人数多少也不尽相同。如家塾可能只有1～2个学生，族塾和村塾可能就稍多些，塾师自行设馆的就更多。课程从识方块字开始，然后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再习八股文。塾内强调习字。其教学方法大抵是读读、写写、讲讲、背背，进行的是个别教学，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可根

据每个学生的天资及其进塾的时间来定，其培养目标一般百姓子弟能粗识字即止。农民子弟一般读2~3年书；家中较富，一般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可多读些书，其余都要从事农田和副业劳动。而一些望族视其子弟的情况，可要求高些，主要为进登作准备；此外还为他们将来管理自己的家产作准备，于是便要到震泽、南浔、吴江县城、平望、湖州、嘉兴、苏州等地的县学（或州学、书院、社学、义学）去求学，然后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学生入塾率为10~20%间。渔民子弟和女孩不进塾。学生第一天进塾要给每个同学敬糖茶和点心，叫结友茶，意在同学间往后要甜甜蜜蜜，团结友爱。塾内读书要遵守塾内的规矩，如果学生违规，或者读书不用心，先生可以用戒尺打学生的手心，还有立壁角来惩戒学生。

塾馆由于是私立的性质，不受官府管辖；但塾师虽有受聘或自己设馆之分，其办学自主权仍有所掣肘。如果是受聘，其主权在聘家；如果是自己设馆则自主权大些，而需受百姓的心理认同，其经费的来源主要由弟子家庭贡纳。一般家馆，塾师主要吃在主家，逢年过节（一般每年2~3次，过年和看蚕结束），再领取一些俸薪归家，其多寡一方面取决于主家的贫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主家对塾师的信赖度。而族内所聘的塾师则主要靠吃轮家饭，每生一定数量的贡纳；如给些鸡蛋、油、米之类；塾师自己设馆的，则按照事先约定每生收一定数额的先生费，以使塾馆正常运转。

二

庙港教育发展至1912年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进入了新学和旧学的交替时期，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与古代相异无几，但这一时期新学的兴起和费达生等的养蚕缫丝革新技术的推广教育则在庙港的土地上发生了重大的震撼力。

1、新学的兴起 就庙港来说新学创办最早的是五都第一小学。当时是1912年，在现庙港东五里的罗港村，该学校于1936年停办未复建。

而五都第二小学则是办学较好的一所学校，当时是1913年，已是晚年的前清秀才沈珩伯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怀有报效家乡之心，决心在自己的家乡开办新学以传播新思想、新知识，造福乡人。得到当时所辖震泽县国民政府的批准，于3月开办学校，校舍借的是大庙港村的永定寺，校名定为"五都乡第二小学"（国立），也称公立学校，它必须根据当时教育部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学生就学时间为6年。初时学校办了两个班，学生6岁可入学，学生的年龄不等，沈珩伯为校长兼教师，其儿沈月贵、媳袁友慈为师。后发展至4个班，教师5人，用的是班级上课制，教学组织形式为复式（复式教学，即2个以上年段的学生同在一室学习，教师通过动静搭配、小先生等办法使学生始终都处在学习过程中）。课程设有国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英语、武术，每周还有音、体、美各一节。1920年学校发展至完全小学，分1～6年级，时沈珩伯病逝，由县政府委任袁友慈接任校长职。袁身为幼师毕业生，通音律，能弹奏多种器乐，在其努力工作下，学校的音、体、美活动甚兴。由于该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由县政府拨款，经费又远不足学校的正常运转，只能进行教师减员，学校又缩剩两班为三复式教学。1936年，日军占领庙港，永定寺被日军焚毁，学校被迫停办。1939年，一些教师借东岳庙办了两个班，召集学生20多名复学，授课内容又复改为《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但增加了珠算和算术，因为庙港为游击区，日寇湖匪交错往来，学校时开时停。1945年抗战结束后，当地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发起复校活动，得到政府批准后，借用民房边办学边筹措资金修建校舍，开设了3个班为1～6年级，学生80多名。1949年时学校已有4个班，学生100名

左右，教师为8名。

而开弦弓村小的新学则脱胎于旧学。它是在桂华初1919年春所办的私塾的基础上所建。由于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建立了合作丝厂，又进行了成人职业技术培训，这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求学的热情。原来只有6名学生、1名教师的塾馆一下来了30名学生。在此情形下，学校又聘了三名教师，以新学的方式办学。1936年被县政府命名为公立小学，学校的注册学生又增至100多人，学制6年。一方面因为是战时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学校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脱离甚远，如农忙或家务事繁重，学校又以班级授课的形式进行，学生脱下的功课常常是难以补救，学生实际就读人数不多，常常是20人左右。

其实新学在农村中的扎根是有其极为艰难的历程。首先由于迷信，也由于传统教育已经因延了几千年，在人们的心灵上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开始群众大多持不信赖的态度，尤其是其学校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加以调整，学校的授课方式又为班集体授课，对学生个人的发展缺乏针对性，学校中又多女教员(一般说来，女教员在乡村中是没有威信的)。所以新学最先并不为村民们所欢迎。

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私塾作为"民粹"又重新被不适当地抬高，把新学看成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这是人们观念上的一种偏误结果；而同时，这里为太湖湖寇、游击队、日寇的交战区，战争期间，学生寥寥，也不能再作正常的班级授课，兼之日寇对新学的肆意摧毁，在这一时期庙港的私塾又一度兴盛。

2、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展　这项工作不仅在开弦弓，而且及至庙港、吴江、苏南一带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其在中国近代职教史和丝绸发展史上也可堪称一项重大举措。

其宏观背景是二十世纪初，本来中国以制丝发明最早，是古代丝业最发达的国家，然而在此际，丝业的危机已初露端倪，苏

南主要丝业产地的丝及丝经出口下降，丝市出现了萧条景象，"此于浔震丝业前途，正未可有乐观也。"(4)

其微观背景是开弦弓一带蚕种已连年退化，病害蔓延，收成未几。在此种情形下，著名蚕桑丝专家郑辟疆及其学生费达生等东渡日本归来后，通过两国政府在蚕丝业方面的举措的对比，立意改变面貌。郑辟疆作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址在苏州浒关）校长，在校内成立了推广部，以在农村掀起土丝改良运动，振兴蚕丝业。

1928 年冬推广部首次组织师生下乡宣传。据言，他们事先准备好桑、丝、种、具（桑具）和改良木制缫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雇船两艘到吴江蚕区震泽、双杨、开弦弓、吴溇、大庙港、严墓等地巡回宣传展览，历时两周，每至一处，郑皆站立船头向两岸群众演讲，用通俗浅显的例子对比科学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则以推广部指导员身份参加这次社会实践，和另一位女教师在船头上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女蚕校师生还三三两两到茶肆酒楼进行宣传。"(5)

此次宣传活动，对蚕区农民的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蚕校与震泽市议会合作，选定开弦弓村为基地，成立"吴江县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开办指导经费 1200 元，资金来源由二家单位分摊。1924 年春，"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胡咏絮带领费达生等四人来到开弦弓村，她们带来了改良蚕种及养蚕科学技术，提出'蚕病可以毁家，消毒可以丰收'的口号。"(6)挑选养蚕惨遭失败之蚕户 21 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实验，先是对每户派出的一人进行新法养蚕技术培训，通过赠送改良蚕种，对蚕具进行消毒，集体共同暖种，稚蚕共育，改用了木制脚踏缫丝车等方法。其效果，所有采用新法养蚕的人家共缫得生丝 176 两，每百两较土丝约增益 10 余元。

实验的成功，极大地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清规戒律，破除了

迷信，提高了生产力；并为蚕桑丝业走向机械化、集约化、科学化生产奠定了基础。据载：

1925 年时，开弦弓村民已争相购买蚕校的改良蚕种，全村均养"洋蚕种"并全面推广育蚕缫丝新法，这一年出产的改良丝为 1385 两，每百两售得 65 元，较土丝市价高出 15 元多。

1926 年春，实验进入更深层次，改进社建造蚕室 8 间，添置改良缫丝车 70 余台，并自制了木制烘箱用于烘蚕，年末产量 8 担余，卖价每百两 75 元，比土丝约多 1 / 3。

事实上，其改良蚕种每钱蚁蚕收蚕可达 20 斤以上，而土种不超过 12~13 斤，一般只能收 5~6 斤。所以接受培训的人和地方越来越多。

其指导培训成绩如表[7]：

区别	地　　点	指导所数	指导蚕种额	指导员人数
一	吴江城区、越溪	2	610	2
五	震　　泽	15	8100	46
七	严　　墓	11	7370	22
十	五　　都	4	1440	6
合计		32	17520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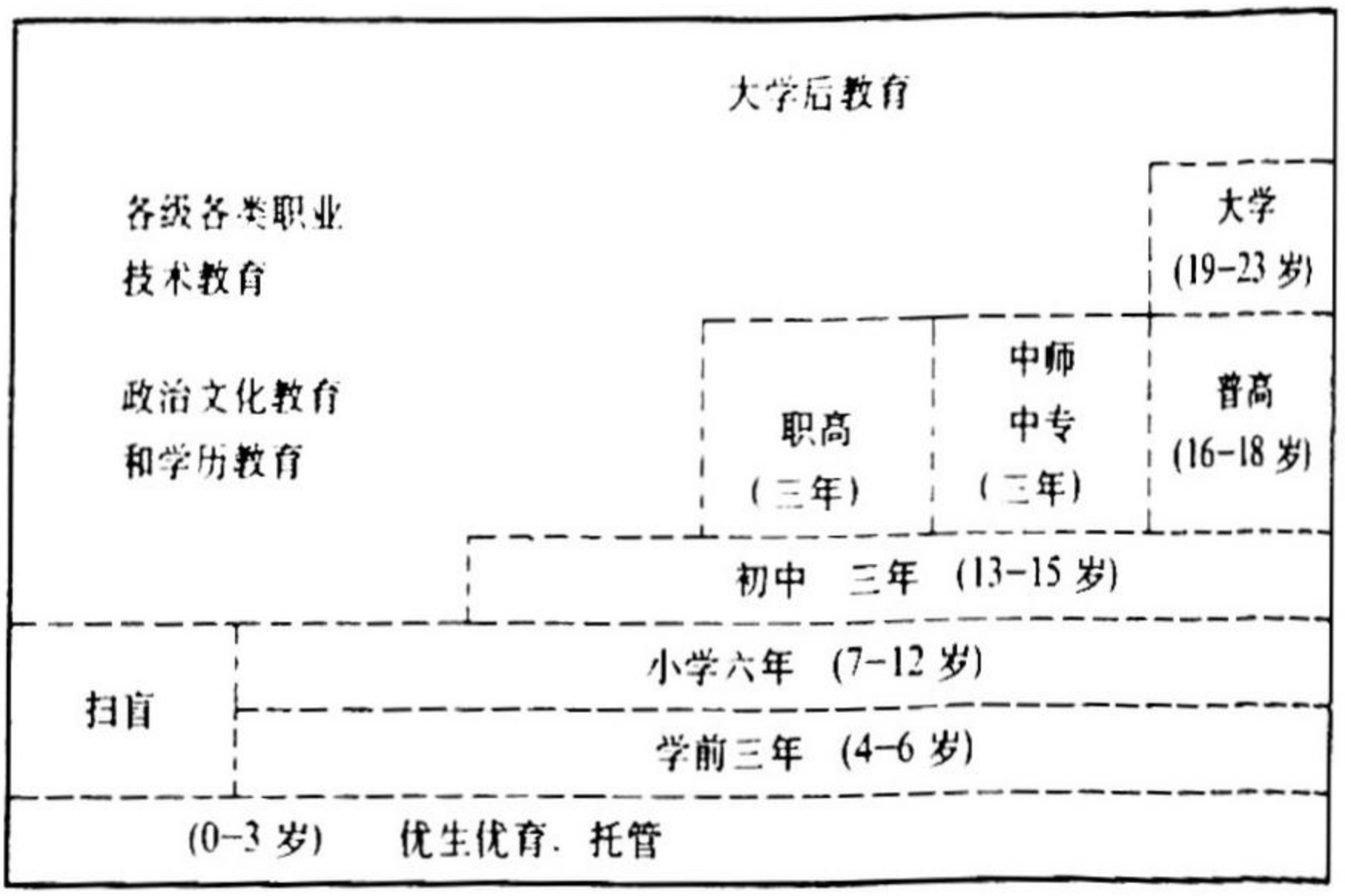
此外，在改良土丝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改进社向机械缫丝进军。而这项工作的开展，又是从培训管理及操作人员入手，他们选择了过去缫制改良丝成绩优良的人传授制丝常识，同时还辅算术、语文等课程作基础来提高员工的素质。此外还进行专项工程专项指导。由蚕业指导员执行指导职能。还开办夜校传授养蚕知识，如养蚕大要、栽桑大要、合作大要，并为农民开设珠算识字等课，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这些工作，按日本学者古田和子言"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8]。

三

1949 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模式作了大变革，力求使学校教育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并进行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教育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的探索，教育为提高学生的素质服务的探索，吸纳地方教育资源完善学校教育的探索。学校教育得到了比较健康的发展，家庭、社区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经过 40 多年来的不断充实完善，庙港的学校教育结构基本显示三教统筹、并驾齐驱的局面，并构成从零岁到终生教育网络体系：



其管理方式为三级二线管理。三级为县（市）级、乡（镇）级、村级；二线一为业务主管，一为行政主管。其基本核心单位为三块：中心小学、中学、成人教育中心校。

中心小学：包括中心校和辅导小学、村校，同时兼管学前教育部分的幼儿园。

中学：包括二级二类教育，一为初中，一为高中；高中部分

又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庙港在历史上曾有过1所乡中，5所村级联办中学，联办中学受乡中管理。

成人教育中心校：成人教育中心校不仅具备管理自己学校内部的职能，还兼管乡镇各条线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包括扫盲、职业技术培训、生活教育、党员教育、政治教育、学历教育（各种层次的学历，有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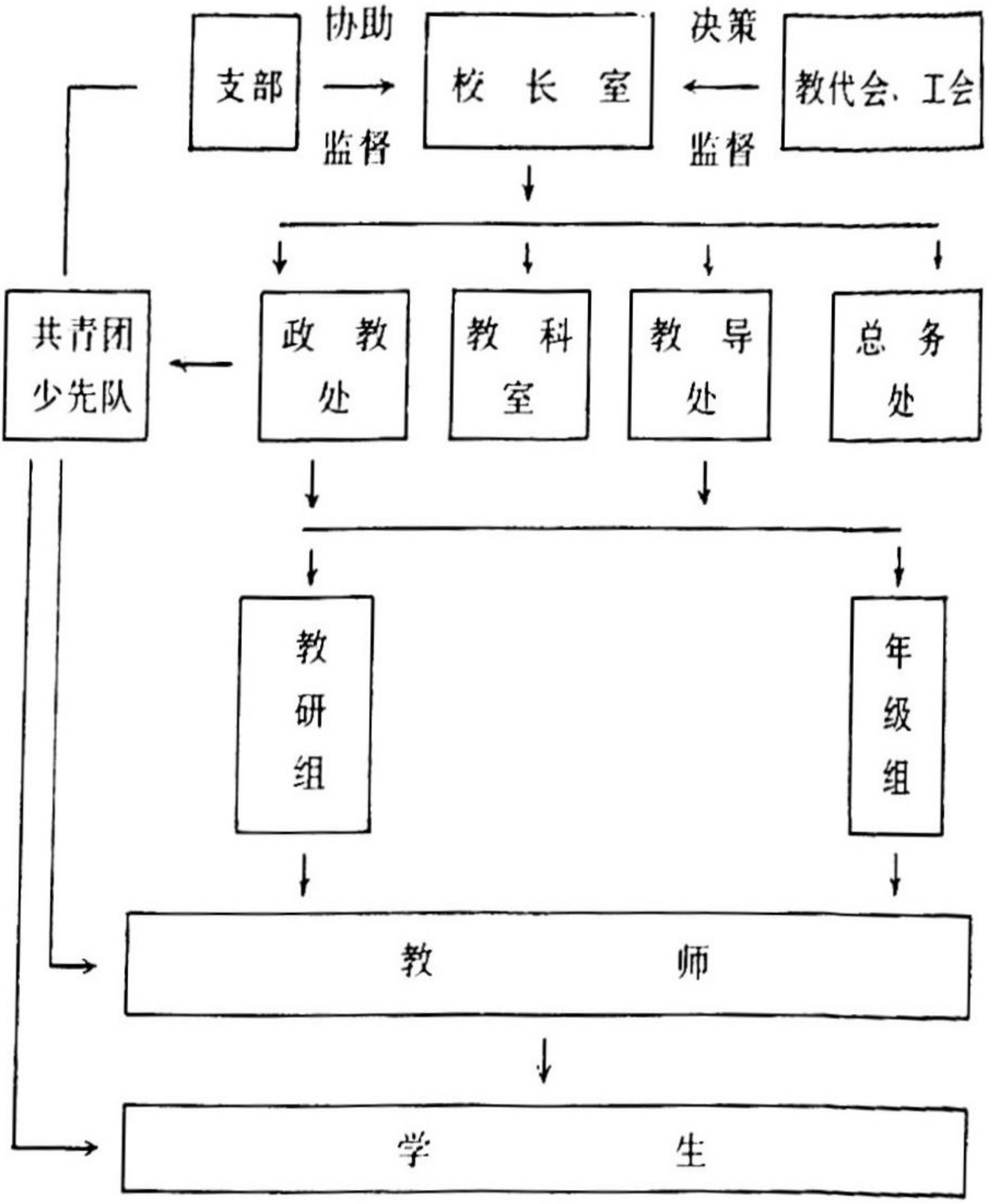
学校的办学经费80年代前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80年代后为国家财政拨款和地方财政拨款、义务教育附加费征收、地方赞助、校办企业赢利等多种途径解决。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县教育部门和乡镇教育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其行政同时受同等行政单位和上一级业务主管单位领导。教师月工资解放后至80年代末基本是：大学本科起点54元，大专为48元，中专35元。以后逐步增加。1993年起，一般中学高级教师月收入可达700～800元，中级为500～600元，初级为400～500元。

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内部有教职工代表会、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等群团组织；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制。其内部管理图式见图(1)：

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学校教育承担着主要的教育重任，家庭和社区作为协助配合学校开展教育工作。

1、早期教育（指的是0岁至学前期的教育）

作为“零岁教育”这一意识行为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大力宣传优生优育。这项工作主要由乡镇妇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执行，医院、学校作辅助配合。从未婚夫妇婚前教育开始，通过性知识教育、新生儿育儿教育指导等来提高优生优育的实效。推广胎教经验和新生儿育儿经验来抓好婴幼儿的早期哺育工作。学前三年的教育则主要有学校附设的幼儿园负责。



图(1)

儿童这一时期的教育在过去主要由家庭所承担。解放后妇女从家庭逐渐走向社会，走向生产主战场，与男人一样同工同酬。特别是副业的削减，及其后期乡村企业的兴起，妇女不再仅是围着锅台和蚕房转。孩子出生不久后，母亲一般受生产队的特殊照顾做些轻便的活，晴时小孩被带到劳动的作业场，雨时则完全可以在家了。有的家庭则把小孩关在屋内，或有兄姐照拂等，或者兄姐

带弟妹随班读书等都有。虽然作为其兄姐自身年龄尚小，不应承担带领弟妹的重责，但在某些方面则催促了兄姐们提前成熟。作为弟妹，有同侪相伴，其发展速度比与成人相伴要快一点。80年代后，乡村企业的发展，农村家庭经济开始好转，乡村企业也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等。部分孩子入托（入托费很低，独生子女保育管理费，一般单位可以报销，非独生子则可报一半），有的则干脆请保姆到家来带孩子。而事实上，据记载1936年在庙东小学已附设过幼儿园，当时已有30名儿童入园。解放后，中心校和辅导校也附设幼儿班，入园儿童为60～90人，但当时的入园率很低，只有2～10%左右。直至1982年才开始重视幼儿学前教育。庙港除中心幼儿园外，19个村设幼儿园，入园率为60%左右。至1989年时已有24所幼儿园，入园幼儿已达84.7%左右，目前正在向90%进军。幼儿园的教师除中心校和辅导校只有1～2名正式幼儿师范毕业生外，其余的为民办和代课教师，未受过幼师特殊训练。但在80年代末，由于国家强调师资的合格，进行师资合格强化培训，并要求通过省级统一考试，师资学历的合格率一下子从7%上升到35%。而开弦弓原来师资都为初中学历，通过专业合格证考试和函授都取得了幼师合格证和幼师（中师）学历文凭。幼儿园授课为国家教委统一规定，有语言、数学、常识、游戏、音乐、体育、美术，幼儿园注重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习和发展。中心幼儿园的办学条件正在从三类向一类发展，1993年平均每个教师教幼儿数为26.25人（不包括保育员），教师师资合格率为84.7%，其管理方式是三级二线管理：

第一级县（市）级：县普教行政←→教研室幼教教研员

↓　　↓

第二级乡（镇）级：中心幼儿园←→幼教辅导员

↓　　↓

第三级　　村　级：园负责人——→教　　师

涉及到学前教育，其发展之所以缓慢，主要一方面在于传统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观念，认为小孩有专人看管为好。

2、九年义务教育（指的是小学一年级至初中毕业这一段的教育）

这是1985年作出的一项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措施：沿海发达地区在1995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庙港在解放后历经了多次反复和波折，终于在1991年底通过江苏省教委的检查验收，基本达到九年义务教育的各类指标。其过程是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旧教育改造期

1949年解放后，吴江县人民政府通令接管吴江各级各类学校。其方针是："原封不动，先城后乡，先公后私"。对私立学校采取维持、改造的办法，办理申请立案手续，向公办过渡；将办得较好的私塾有计划地转为民办小学。

其时，庙港只有小学，其中心校长（东庙港小学校）金纯武继续留职，小学仍沿用"4.2"分段学制：初小4年，高小2年。1950年暑假，调七都小学教师董宗麟接任校长，金纯武调离庙港。时庙港小学布点为：中心校一所，为3班，4个教师，实行复式教学，下面附管8所学校，除一所学校为2班2教师复式外，其余都为单班一师校。学生入学率达30%，1952年时达70%；师资合格率达45%。当时中心小学的办公经费每月不足10元，而在当时来说这10元也是相当能抵一些用场的。一般来说，应付学校日常开支是足足有余的。就学校教师的伙食费，他们在饭店包饭，每月为8元，且每天有小荤。学生交学杂费每学期：1～4年级为2元，5～6年级为3元，其中30%左右的学生如果出生成份较好（贫下中农、工人）则可以享受减免。这种交

费的情况一直延用到 80 年代中期，由于工资改革和物价的调整，学杂费有些提高。课程开设语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和音、体、美等。除了学校的正常工作外，学校教师还需担负配合社区宣传教育的任务，参加冬学扫盲（一般用晚上的时间）每星期 3~4 次，配合时政有婚姻法宣传、农业科技宣传、银行储蓄宣传、征粮宣传、抗美援朝宣传等。据当时刚从中师毕业的新教师王玉明回忆，教师的心情十分舒畅快乐，感到了一种承担重大责任的骄傲，从而大大激发了工作热情。白天主要忙学校的教学，抽时间还到学生的家中去家访，晚上则配合区公所（当时乡叫区公所）自己编写剧本，排演节目到各村去作巡回宣传。即使是年纪大的教师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些活动。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教师的职业地位甚高。至 1956 年时学校的在校生已有 500 名左右，教职工为 21 人，其中专任教师近 7~8 人，占总数的 70%左右。而作为村校教师，其工作的难度和劳度比中心小学要大得多。从课务量来说，一个教师既要教各年级的各门学科，又要身兼多职既当校工又当校长、教师；从办学条件来说，大多学校设在破庙里，无黑板，无窗户，用庙里的供桌当讲台，庙里的半桌和门为学生的课桌，学生自带板凳，墙上刷上黑漆就作了黑板。教师每周要到区或乡里去开会，开会时往往需步行并自带被包，可能一走就是几十里。平时教师以校为家，一直到放假才回家。尽管是这样，心中却没有一点怨气。农民对教师是十分尊敬的，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和谐。当时整个庙港小学的教育质量迅速跃居为震泽片之先，1952 年中心校当年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入中学。

第二阶段　教育发展困难期（一）

1958 年 3 月 11 日，省教育厅就普及小学教育问题发出通知:“要求从 1958 年起，在 4 年内完成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使 95%以上的学龄儿童都能入学。要求各地充分发挥潜力，采取

扩充学额办二部制，增设民办班等办法，尽量多收一些学生。"[8]在此指示下，西从勇星丁家港，东至亭子港，南到民字浜，学校规模迅速扩展了一倍，从原来的11所小学扩至22所小学，教职工从21人增至115人，其中民办为85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降至30%，学生入学率60%左右。开弦弓小学在校生有165人，教职工为10人，仅招收本村儿童。这说明当时小学已达到了村村有校，学校办到学生家门口的状况。由于人民公社成立，庙东小学相应更名为庙港公社中心小学。建立中心校辅导制，时庙港中心校管理范围为东始亭子港，西至丁家港，南临长荡，并分成了三个片，以中心校联动三个片辅导校，再有片辅导校分级管理下属18所村小。

中学教育也开始起步。1958年9月，县文教局委任原师范副教导杨定淦携其学生王廷贤（吴江师范师二学生，提前毕业，庙港人）到庙港创办庙港中学。另外从震中调去龚立升、凌景鸿老师，职工汤加生、张仲丘，当时在时间紧迫、经费十分微薄的情况下创办中学。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仅10天时间就初步在永定寺废墟旁弄了几间旧屋，把由震中代招的110名学生接回学校，边上课边建新校。白天上课，晚上师生们带着绳索到农民家去买旧屋的砖和厝（江南农村坟上的小屋）屋砖，三年时间，仅花去了3万元，造了6间教室，办公室4间，宿舍20间，平均建房费17元/平方米。学生全部住校，每人每月交食宿费6.6元，学校的办公经费每月40元，当时的物价较低，如一级虾0.64元/斤、蟹0.72元/斤、鸡0.64元/斤。学校开设课程门类齐全，除语、数外，还有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育。虽然学校地方狭窄，学生要参加建校劳动，但学校的每一门课程不肯缺失。其首届毕业生于1961年毕业。

1961年，在自然灾害威胁下，中小学教学受到了严重影

减. 就整个吴江县的教育规模看，高中减了5个班，初中减去了30个班；小学1960年有1825个班级，76650名学生，儿童入学率为90%以上，到1964年时只有1279个班级，43677名学生，入学率为46%。这里主要是根据省1959年的《民办学校暂行规定(草案)》而对农村中小学进行了撤并整顿。庙港中小学也经历了这一曲折。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历过这一时期困难的周老师（当时民办教师）回忆道:“当时社员连肚子也不饱，根本谈不上让子女上学读书，学生大量停学。1962年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施教全村11个生产队、400多户人家，仅剩18名学生，我一人从一年级要教到四年级，教室在庙里。而我们民办教师的工资不再按月发放，因上级提出要‘以生养师’的原则，这样一来我更糟了，原来每月18元工资，现在每生收费3元，18名学生一学期只收54元，根本不能维持生活。当时的大队支部和中心校长看到了这种实际情况，他们非常关心我，从大队公益金中支出了一点，学校从上级拨款中多照顾我一点，总算帮我熬过来了. 当时说实在话，我的思想波动很大，不想干这一行了，很想离开教育岗位，但想到领导的关心，我也很难开口，又看到这18名学生天真可爱，如果我一走，谁给他们教学呢？我左思右想，一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一直到1964年，国家形势逐步好转.”

其间为了抑制流生，在永隆村试办了半耕半读，由张村老师任教，上半年试点，下半年全面推开，全乡耕读班如雨后春笋。这种半天劳动，半天读书的办学方法，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又有利于使学校教育度过困难期，取得了在困难年间坚持办学的大胜利。

1964年，耕读班重新转入全日制，全公社拥有近30名公办教师，70名民办教师，村校31所，入学率为80%以上，这是庙港教育事业的第二次飞跃。

第三阶段　教育发展困难期（二）

1966 年，"文革"开始，由于对 17 年的教育事业成果进行了全盘否定，学校秩序被打乱，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学校一度关门停课。1967 年才开始复学，并成立了乡教革组（教育革命委员会）。1969 年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学为二·二制（即初中 2 年，高中 2 年），中心校的中心职能被废止，实行革命委员会领导制，革委会由学校教师代表和工人、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下中农代表驻校并具体参与学校管理。学校课程大量削减，每学期中安排一月有余时间放忙假，部分时间学生归队劳动，大部分时间则有教师带队到生产队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小学低年级主要为拾稻穗、糅菜籽等，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要参加收割、种田、撒猪灰、学做垅头等。为实践毛泽东的"学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晒黑一层皮，炼红一颗心"，课程教材也作了大修订，主要是更为面向生活实际，中学以工基农基代替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则以时政"讲用"（学习《毛泽东选集》心得交流）"大批判"（如批判自己的私心杂念，批判刘少奇、林彪，批判大毒草——"文革"中被认为是有毒的书籍，如"三花"：《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如《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水浒》、《红楼梦》等等）。一般学校每周要开一次大会，班级每天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许多学生能背《毛选》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会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的选段。

这一时期中由于全国树立了张铁生（交白卷英雄）、黄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的作者）为榜样，学校基本废除考试，包括毕业和肄业、升学考试，学校的文化知识教学质量处在最低点。教师来源除了以前分配来庙港的大中专师范生外，新教师补充大多为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他们作为代课或民办教师，其待遇要大大优于当地普通农民，月工资 24 元，而务农的话可能每

月报酬不到 15 元。所以大多为大家所向往，虽然这些人没有进过师范，但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及其宽阔的眼界、求进的心理，给农村学生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并调整了一些思维方式。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锻炼。这一度虽然为教育的荒废时期，学生所学知识基本功不很扎实；但这一时期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却相对比较强，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力。因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通过各种途径的再学习（岗位学历合格证和各种形式的再学习），迅速成长为今日庙港各条战线之中坚人物。

第四阶段　教育的复苏期

这一段时间为 1978 年至 1985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重新朝向理性的轨道发展。教育作为"文革"受创最严重的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尤其是"文革"中一度停止的高考又重新恢复，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气象。重知识、重教育在整个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学校教育质量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于此，中小学教育稳扎稳打。小学四率（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中学三率（入学率、巩固率、普及率）得到了逐年提高。但这一时期的优生率和差生率成为相对明显的对照，流生问题成为学校开展工作的难点。一方面渔民子弟没有习惯求学，再兼之渔民作业的流动性较大，学校教育与渔民生活实际脱离甚远，渔民子弟的教育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农村的小农经济思想也比较严重，读书的功利思想占上峰：即如果读书就一定要跳出龙（农）门，否则还是趁早去打工。因此，这一度学校的流生较为严重，尤其是初中，重年几达 50%。

第五阶段　九年义务教育达标期

这一阶段为 1985 年至 1992 年。1985 年国家颁发了教育发展纲要，规定了沿海发达地区要在 1995 年前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任务，其具体要求，江苏省自订了细则，如下：

一、学校管理及办学质量

1、规划、制度:

从学校实际出发制订校园建设整体规划和学校布局规划。

每学期制订学校工作计划。各项规章制度齐全。

2、校园:

校园内教学、活动、生活分区，布局合理，绿化好；有校黑板报和宣传橱窗。

校园清洁卫生。

3、班级:

班级规模恰当，每班学生数村小不少于30人，中心校（含市镇校）40—50人，初中50人左右。

乡（镇）举办培智班。

4、管理:

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教学秩序正常稳定。

5、普及教育:

小学：入学率99%，巩固率99%，毕业率95%，普及率98%以上。

初中：入学率90%，巩固率95%，毕业率90%以上。

二、领导班子及师资队伍

6、领导班子:

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表率作用好，办学思想端正，执行方针、政策、法规，关心教师。

7、师资队伍:

教师学历达标，小学80%，初中70%以上（含专业合格证），学科基本配套，中心校及中学配备专职音、体、美教师，中心校还应有专职自然教师。队伍稳定，教研活动正常。

8、师德:

教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师德良

好，遵章守纪。

三、基本设施

9、生均占地面积：

村小20平方米，中心校（含城镇校）15平方米。

初中（含联中）20平方米。

10、生均校舍面积：

村小3.2平方米，中心校（含城镇校）3.5平方米。

实小3.8平方米，初中（含联中）4.6平方米。

11、附属设施：

有围墙、校门、校牌、旗杆、班牌以及有关专用教室的牌子。

12、校舍：

校舍安全，门窗完好，玻璃齐全，教室（含专用教室）和走廊为水泥地面。

13、课桌、讲台：

课桌椅完好率100%，三分之二为新的或基本新的（含教师办公桌）。

14、教室：

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基本符合要求，采光好。

15、专用教室：

中心校	8室	初中	8室	联中	4室
辅导校	4室	村小	2室		

16、图书：

小学生均8册，中学生均15册，书橱书架配套，陈列安放有序。

17、体育、教学器材：

小学教学器材按省教委1989年6月编制的《小学数学、自然、音乐、体育、美术电教教学仪器、器材配备目录》配置。

中学按省教委《初中理科、音乐、体育、美术、电教教学仪器、器材配备目录》配置。

而面对当时的中小学现状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是有很大难度的。尤其是学校的基础设施距离甚远，需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当时庙港的经济在吴江范围内亦属落后，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开放，经济发展形势的好转，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农村教师队伍开始不稳定，特别是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有跳槽现象。

1990年在吴江九年义务教育达标鼓点越来越密的当儿，乡党政一班人坚决果断地作出决断："要穷不能穷学校，要苦不能苦孩子"，通过多方筹资，作了中小学的重新布局和大调整。把联办中学全部并至乡中学，小学移地重建，资金投入共300万元。在这过程中，群众捐款甚多，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庙港人的义务教育意识。小学四率达到4个100%，中学三率也分别达90%、95%、90%以上。当然，在达标过程中，政府行为起着决定的作用。尤其是中学三率达标是有一定的困难，村镇企业的发展冲击着学校教育，如邻镇横扇的羊毛衫制作业，像一般旋风兴起，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出价是每工45～90元（金蜂集团职工平均每天的收入为30元），这对于家庭经济不太富裕、学习成绩不太好（升学无望）的学生来说，无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在许多家长教育法制意识未建立时，以短近的眼光作出让自己的未成年女儿出去做工的决策行为。我们就92届初中学生的追踪发现，三年中学生流失84人，占学生总数的45%。而在小学的达标过程中，其主要困难，在调查布局。我们的许多村干部把在自己村撤除学校看成是自己"败家"的一种行为，而村民们也没有把调整学校布局看成是整个庙港社会进步的一项战略举措，只图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持反对意见。为此，乡镇三套班子实行分工定责，承包做思想工作的责任制，才使原有的20所小学改为16

所，就庙港地区每年出生人口350人左右看，其小学布局还可以更为趋中，以更大地提高办学效益。此外，这也符合群心所向。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年轻的父母已难给自己的孩子进行择业定向。因而，多数父母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基础教育上。虽然目前各村小的教育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有许多家长还是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镇上、城里去读书，这就出现了择校生（不享受义务教育权利，需向所选择的学校交纳较大的一笔教育赞助费），目前庙港每年有30多位学生家长为孩子作这样的选择，这在吴江的其他乡镇此种现象还要明显些。

而师资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吴江市局加强了对村小教师教育质量的管理，直接考核到各村小，具体每学期抓了教师的"五认真"（即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教育学生）及其教学质量抽测，还对村小教师进行了基本功考评和新教师的三年上岗考核，其中村小教师的基本功考核内容包括写字（钢笔、毛笔、粉笔三种字）、朗读（语音音准、语气、语调的把握）能力考核，新教师三年上岗考试则是对新教师的上课、备课等业务及其教育理论掌握状况诸方面的全面考核。

3. 高中段教育 这一段的教育包括了二个类别，一为普高，一为职高。庙港高中是在1970年开始于原乡初中基础上开始办的，教师为原初中师资，第一年共招收100名学生，第二年起一直至1975年都是以55名新生招生的单轨高中。1976年至1980年又恢复双轨为100名新生，招收的学生全部为本乡。从1970年至1978年作为"文革"后期，学生升学和毕业都不参加考试，主要由学校和村（街道）革委会推荐，课程内容也变理化生卫为工农基。课时有1/3为参与社区工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由教师带队，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中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学生在农村期间还承担农民的扫盲，政府的政策宣传等工作，另外也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这一

时期主要是学习张铁生、建立庙港学生自己的"朝阳分校"（张铁生所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点名）。

1979 年至 1982 年，学校进入了教育的第一个春天，师生学习热忱空前高涨，学生参加高考其升学率在吴江排位在前。1980 年至 1984 年间，学校普高未招新生，只招一班（42 名学生）职高生，其主要是执行县政府决定，调整整顿高中，切实保证初中教育质量。职高专业为电工。1985 年至 1987 年又恢复双轨普通高中，1988 年开始又回到单轨，从 1990 年开始兼担七都地区的普高教育任务，1994 年电工专业改为企业管理专业。历年来其虽不属重点高中，但全体师生同心同德，高中段教育质量一直走在吴江地区同类学校之前。

4. 成人教育 包括各级各类的教育，从学历上既有扫盲又有初高中、中专和大学层次；从类别上看有职业技术培训，也有人口生存生活常识培训，还有时事政治教育等。

庙港的成人教育于刚解放时期主要着力于扫盲工作和配合当时政府的各项政策的宣传。其中对青壮年扫盲工作有四次大的运动。第一次为 1951～1952 年，第二次为 1956～1958 年，第三次为 1964～1966 年，第四次为 1991 年。乡镇政府每年召开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把扫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拨出一定的经费用于扫盲。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村扫盲任务，专门发文下达指标，实行行政负责制，一级对一级负责。通过定期包教制度，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制度等，切实完成扫盲任务。至 1990 年，对全乡 15～40 周岁的农村人口 12174 人作调查，非文盲率已达 96.49%。

目前成人教育除中小学校外各个企业也成立了教育科，专门负责职工培训，一般每年训练可达 4000 人次，其中扫盲为 1000 人次，各种专业专题培训可为 3000 人次，每年有 60 个班开设，下面是几个段的培训情况：

年份	各种专业培训班(期)	其中(人次)							党员干部培训(人次)
		扫盲	农科技培训	蚕桑丝培训	副业培训	工业培训	畜牧业培训	渔业培训	
1981年	40	600	1000	800	700	700	105	37	1139
1986年	56	1200	1000	1000	700	1750	145	65	1221
1989年	70	1300	1000	1000	700	900	195	100	1370
1993年	70	1300	1000	1000	700	900	300	175	1745

而金蜂集团——以20年代费达生等在此创办的缫丝厂为基点的企业集团，在今天仍然运用当年办厂时的基本方法，边生产边培训职工。而今他们集团内有自己的学校，不仅负起了本厂职工的继续教育任务，还运用该设施帮助贫困地区培养技术工人。从1983年起他们已经办了48期培训班，每期培训时间1～6个月，培训总人次为10500人次，平均每个职工岗位学习时间每年达210学时。

5. 特殊教育（指的是聋、盲、弱智等残疾儿童的教育）

过去这些学生大多在学校外。随着教育的普及，学生开始随班就读，但总的来说针对性不强，未进行因材施教，分类教学。1990年吴江成立了聋哑学校，庙港有2名学生到聋校就读。其余半聋1个，半盲1个，弱智9个随班就读。中心校就8名弱智学生进行半随班半辅读尝试教育。

6.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其主要承担配合学校教育任务工作）

社区教育一方面依然是依靠舆论工具，订立乡规民约等，并通过广播、书刊、黑板报、橱窗等进行。此外如公安派出所等单位经常深入学校开展治安、法制、交通等宣传教育，许多单位、企业则作为学校的德育基地。其家庭教育的一些情况已在早期教育中有所表述。有许多仍然沿袭了传统习惯，如胎教。而一些庆

生活动在"文革"中虽一度被废止，1978 年后又有复兴。早期由于母亲主要从事家务和养蚕劳动，可以兼管孩子，而在副业萎缩的当儿，这里的农妇更多地需要在田间劳动，婴幼儿往往也被带往田间，很少抱抚，而孩子稍能走动便在田间玩耍，进而割草、养兔等，家里的家务劳动要帮一把，孩子们很少有零花钱。现在 20 多岁至 40 多岁的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80 年代后，孩子们更多地被庇护了起来。这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了，家庭经济条件好了起来，一些现代化的家务劳动工具进入家庭，极大地减轻了家庭劳动负担；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至多两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核心、太阳，不用说不做家务劳动，连学校里的值勤劳动常常还会有成人去替代。不是家长管教孩子，孩子可以指挥成人。此外家长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读书。有时还需执行学校教育的辅助工作，如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等。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越来越宽松，对孩子们的独立性要求、承担责任要求也越来越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口袋中的零花钱与成人的月工资相差无几，孩子们到过年的时候，可以拿到成百上千的压岁钱；而小学三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上下学则往往还需成人接送。在上下学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成年人匆匆地用自行车驮着孩子上学，或倚着校门翘首期盼学校放学的钟声，并在众多的孩子中寻找自己的孩子，然后背着孩子的书包回家的景观。

当然，其中还有很大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大潮中，还有孩子辍学的暗流。据中学王书记介绍，目前社会分配的不平均，还有个别家庭确实存在着供不起孩子上学的现象。为此，学校针对这种情况，给孩子以一定的学杂费的减免，以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九年义务教育权利的享受。即使是这样，辍学的暗潮仍是抵挡不住，虽然庙港曾寻求通过乡规民约来制止这种状况的继续蔓延，如规定企业不能使用童工、家长必须

承担未成年儿童入学的义务等，但收效还是不大。

由于这里民风淳朴，青少年犯罪案件发生率甚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一般为小偷、打架斗殴，而吸毒、性错罪、赌博等未曾出现过。这里的孩子体能方面还是比较劲健，相互之间多互相关怀。我们看到某一初中学生患有严重白血病，家庭经济不能完全承受她的医疗费用，在这样的情形下，首先是从她的同学老师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对她的关爱，就一年，社会为她捐助了 10 多万元医疗费，是她整个医疗费的 90%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校的课程加强了学生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学校管理强调了对学生的德育，学校成立了德育领导小组，还有学生的组织，如学生会、团支部、少先队等，以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四

从前面对三个不同时期庙港教育的描叙中，我们已能比较明晰地看到教育确实在向着现代化方向一步一步地走来：一方面它在为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作着助力剂；另一方面它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自身，并走向自身的现代化。确实，庙港的许多事实也在证明着"教育是开启通往现代化大门的钥匙"。(9)

首先，它是一项现代化发展的人才基础工程。

从人才培养、使用和再教育的主客观因果关系构成的人才循环图式（如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才的第一起点在于教育，第二、第三以至无穷的起点依然在于教育。庙港社会发展的积累及其几个重要的变速期，无一不是证明人才在期间的作用，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这块土地对人才的养育。

智力投资人才开发	→ 人才的分配与使用	→ 成果的创造与运用	→ 知识经验的积累、推广和运用	→ 人才的再教育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50年分析了83个国家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关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成人（15～40岁）识字率低于50%的国家人均收入不超过200$，有30%的文盲收入不超过350$，6%为575～1000$，2%以下的文盲可以达1000$以上。几十年来，庙港的义务教育基础夯实，使得其人口文盲、半文盲比率大大降低。据庙港的几项统计资料得出，1964年13～40周岁的文盲、半文盲为6715人（文盲为5710人），文盲率49.70%，文盲半文盲人口为427人，文盲半文盲率为3.51%。1992年15～40周岁劳动力人口中的非文盲率已达98.32%。其乡镇经济情况也呈示了相应的状况，而目前人口中的文盲率情况可以说明庙港人口的文化素质已有了大幅度提高，已能承载社会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任务。

另外的一项数据也能说明这一问题。解放以来，庙港人口的受教育人口覆盖面越来越大，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在1992年已达到了90%以上，其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的人口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时间(年)	小学(人)	初中(人)	高中(人)	大学(人)	合计(人)
1964	186.26	20.89	3.16	1.1	211.41
1982	349.09	138.89	25.05	0.83	513.86
1990	342.14	203.42	35.40	2.19	583.15

其中初中情况，1990年是1964年的5.8倍，高中为3.9倍，大学为1.9倍。实际上我们从近几年庙港人才输出和输入（主要指分配调动到庙港工作的拥有大中专学历者与庙港调出或

升人大中专生）两相人口文化对照中可以看出:

年份	输出		输入		逆差	
	大学	中专	大学	中专	大学	中专
1988	23	12	7	5	−16	−7
1989	8	12	9	7	+1	−5
1990	26	10	16	7	−10	−3
1991	19	9	5	6	−14	−3
1992	14	15	5	9	−9	−6
1993	21	11	8	4	−13	−7
1994	25	40	9	3	−16	−37
总计	136	109	59	41	−77	−68

庙港教育不仅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为其他地方培养了许多人才精英（这在"人才"一章中已有重点阐述）。而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被经济学家认为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一般认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可比文盲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高43%，中学文化程度的可提高108%，大学为300%。事实上庙港的经济在这几年中也有了巨大的变化，1986年庙港的工业总产值为0.36亿元，1993年已达5.29亿，其年增长率为13.04%，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8614万元，人均为6343.6元(折美元为1094元)。

其次，它是现代化观念进入人的思想深层的有效通道。

"重知识，求变化，有自信和求开放"为现代人的应有的心理基础。在庙港重知识求变化是富有历史传统的。而这种心理素质的形成首先是从感性开始，逐渐升华到理性层次，特别是郑辟疆、费达生等在开弦弓村等地进行蚕桑丝改良及其由此而开展的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使庙港人深刻地意识到技术和教育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因而他们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习俗，敢于向迷信挑战，敢于向自我挑战；而入学和办学的热情也不断升温，从因陋就简的村庙中上课，到现在，各校都基本达到

省义务教育颁定的标准，就开弦弓小学已几经迁移，从过去只有一间民房到今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时间	操场面积	校舍面积	备注
1919年	无	民房1间(15平方米左右)	方桌两只，无黑板，无讲台
1929年	无	民房2间30平方米	课桌30副，风琴1台
1949年	无	13间平房	课桌50副，讲台4只
1974年	2.1亩	平屋21间667平方米	课桌180副，讲台6只
1990年	6.18亩	大楼27间1221平方米 平屋4间 116平方米	有电教设备，会议室 运动场，图书室等

1992年为镇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年，全镇人民通过多种渠道集资筹款达300万元，其中40万元为捐资额，平均每个劳动者捐款达32元。

而"有自信，求开放"，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学校加强了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通过学费老、知庙港、爱家乡的一系列调查教育活动和专题班队活动来进行，还补充了自编乡土教材等，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开放式的教育模式在其中也发生了作用，解放后，学校遵循了学校教育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指示，努力与学生的社会生活保持联系，"文革"中的开门办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块教育大协同（学校、社区、家庭）等作了有益的尝试，而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走向学生生活实际，特别是从"应试教育模式"转变为素质教育的模式，学生的自信心求开放的心理素质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

再次，教育也濡化着这里的人的品性，融铸着人的性格。

一方面由于这里滨临太湖，过去太湖水利工程未修筑好时，灾害连年；另一方面这里为战争交战地带，这种不断面对灾难的现状，必然形成人们斗争的品格，因而过去这里的人好勇斗，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教育的推进，这里的人变

得越来越淳朴恭俭，刑事案件立案数，在吴江来说排位较低，1992年仅有9起，吴江市各乡镇平均为19.43起。

此外，教育在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也显示了其重要作用。

人们从过去只满足于吃饱穿暖，走向享受美的生活。业余生活更多充进文化知识成份，并不断地提高着人的审美水平。居居开始趋向于装修美化，家庭闲暇生活也多地依赖音乐、书画、报刊、电视节目、旅游、收藏等，人们有关心时事政治的，也有喜欢音乐、体育、美术的，每百人订阅报刊份额率从过去1965年只有0.2份，到1995年的10份，目前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收音机，人们更趋向于追求完美，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6.8部（苏州地区农村为3部），而审美能力和情趣的提高是人全善至真的更高境界。

在这同时，庙港的教育也不断地获得了自我充实完善的机会，向着自身的现代化进步，这种变化显示在这样几个方面：

1、教育结构，从过去只有私塾这种单一的教育结构转胎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立体教育体系，构成了从零岁到终生的完备的教育网络：幼教、小教、中教、成教并驾齐驱。

2、教育思想。过去的学校教育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教育普及率只有10～20%间，到今天不仅注意到教育为大众服务，每个学生都享有就学的权利；而且还注意到教育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从培养单面人格的人转向培养全面人格的人；还注意到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使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

3、教育运行模式，从过去的封闭教育模式转变到今天的开放的、民主的、公正的、崇尚科学的教育模式，在今天的学校中已形成了"学生的发展高于一切"、"学校的教职工是学校的主人"等观念，进行民主的动态的管理，教学方式方法也从过去的单向传授转变为多向的互动启发式，重实验，重探究，其教学手段也

从过去的口传耳听到今天的各种现代化教学器具进入课堂，可以说这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些重要标志。

4、教育规模。从过去的零星松散简陋走向规模集中，教学设施齐备。这个过程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史，1992年调整了布局，小学撤并了4所，小学撤了4所。现有的学校教育的教育能力为：

	年在校生数(人)	校园面积(亩)	校舍面积(m^2)	教职工总数人	其中专任教师达标
幼儿教育	796	61.34	8191.6	35	·
小学教育	1628			119	80%
初中教育	967	35.38	7141	102	80%
高中教育	209				
成人教育	3600	3	800	3	100%

当然，这样的规模状况尚需加以进一步调整，以提高其规模效应。庙港的教育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步伐，有其自在发展的规律。

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对教育发展的一种自然要求。在落后的小农经济中教育基本上是父传子承，其内容为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其方式是手把手的亲身体验；而当经济开始从单一经济方式转向多种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它又需要一定的语、算知识作为其经济运作的基础；当农民逐渐从体力上解放出来走向机器化大生产时，它就需要其工作者具有相应比较全面的文化基础知识，能知道机器运转的一些基本原理；当人们从经验型生产走向依托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那它又不仅需要的是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更需大量的高中乃至大学的各种专业人才为社会发展的劳动力。并且学校教育越来越从点缀装饰走向务实，学校的办学思想逐渐地从为个别少数学生的利益服务发展到为全

体学生，并为全体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服务；学校教育从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走向依据社会生活特点汇集地方教育资源，调整自己的教育内容和工作目标。

它亦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浸润和滋养。这里的百姓素有尊师重道之风，这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表层礼仪上，一切以先生为先；而且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有什么大事，大多要去请教一下附近的教师；乃至庙宇、祠堂被人们当作圣地，但在那里办学，并不认为是亵读了神灵；在经济分配上，庙港人有这样的传统，即使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也要首先保证教师的收入，从不拖欠教师的工资收入。

尤其是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一班人深刻地意识到教育在庙港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地位，建立了教育优先的观念，每年一定要为教育办几件实事，教师的奖金和后顾之忧作为党政议事日程上的大事，就经费一项，学校的重要经费来源除国拨经费外，需镇贴补学校的款项有：全体教职工奖金指标数的 70%，基建费（校舍、食堂、教工住宅、学生宿舍等）、日常维修费、图书器材费等。此外，还对外地来庙港的教师向上浮动一级工资，几年来，庙港对教育的投入如下：

年 份	财政收入（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元)	收得教育费附加费(万元)	实际投入教育（万元）
1989 年	260.1623	1005.90	40.3116	74.363
1990 年	284.6307	1133.50	55.1669	81.692
1991 年	438.6411	1230.45	101.921	169.253
1992 年	570.7581	1553.92	71.9513	201.133
1993 年	756.5713	2164.00	86.0041	163.101

（注：上级财政拨款不计在内）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社会的尊师重教的热情。教师职业成为庙港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这样的尊师重教氛围里，使得一大批自负“兼善天下”之责

的知识分子自甘淡泊、自甘清贫与庙港人一道艰苦创业，并在从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思想品位，磨砺着自己的品格修养，在教书育人中进行着人格全方位的自我完善。

近几年来庙港有54名教师通过自学函授达到了大专学历水平，有9位教师获得了省市级表彰。中小学连续多年被评为吴江文明单位，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奉献，才有庙港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才有庙港人才的成团簇现，才能使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能源。

然而反顾庙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我们依然能看到庙港的发展在1990年前基本呈平稳缓进的势态，只有在近几年中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其原因，其中教育占有重大因素。我们从1964年和198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就能看出，在这两个年段里，庙港人口12周岁以上文盲率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数和吴江的平均数:

	庙港%	吴江%	全国 %
1964年	56.91	73.9	35.7
1982年	39.93	33.46	22.8

另外的如每千人拥有的文化程度也显示了这样的状况，且其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

大学:

	庙港	吴江	全国
1964年	1.1	1.2	4.0
1982年	0.83	2.38	6.0
1990年	2.19	7.22	14.2

高中:

	庙港	吴江	全国
1964年	3.16	9.13	12.6
1982年	25.05	42.89	66.0
1990年	35.40	61.02	80.6

初中:

	庙港	吴江	全国
1964 年	20.89	34.97	44.7
1982 年	138.89	177.38	178.0
1990 年	203.42	242.53	178.9

小学:

	庙港	吴江	全国
1964 年	186.26	215.75	270.8
1982 年	349.09	345.44	352.4
1990 年	342.14	391.70	370.6

并实际造成了庙港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短缺，1992 年庙港仅科研人员 9 人，工业部门中，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 0.326 人（全国 3.9 人，前苏联 18 人），每万人中农业技术员有 4 人（全国为 4 人，日本为 18 人）。

而掣肘教育发展的又有这样几项因素:

其一，过去这里没有形成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小城镇，这种人口散居的状况，带来了学校教育的效益不高，而未设立书院等学校设施，庙港的学生求学需到外地，正是这种地域距离因素，庙港人在过去接受比较高的教育人数不多。即使在解放后，学校办到了学生的家门，而其过分的分散，也必然带来了师资精力的分散、教育设施的使用上的浪费。

如开弦弓村小学师生比的情况:

1936 年	1949 年	1956 年	1958 年	1966 年	1976 年	1986 年	1994 年
1∶10	1∶20	1∶18.75	1∶16.5	1∶19.29	1∶16.15	1∶16.45	1∶19.33

从这些数字看，开弦弓村小学师生比从未超过 1∶20，而全国一般为 1∶22；然而教师大多担任两个年级以上的课务。随着外地大都市和庙港城镇的迅猛发展，农村师资队伍的稳定越来越将成庙港教育的重大难题，这几年来几乎每年有多少个教师进

来，就有多少名教师出去，一般每年进出有16名左右。而新进来的大多是新教师，当他们业务成熟了，他们就要申请离开庙港；尤其是本科生很难留住他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校的教育质量。而留下来的教师作为步向城市化的逆潮流，肩负农村文化科学知识播种的重任，会有许多实际生活困难和心理上的不平衡，这仍将是庙港教育发展的重要掣肘。

其二，这里为许多战争战役的交战地和自然灾害的重灾区，每一次的战事和灾害都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损失，使得学校在许多情况下关闭，如五都一小就是一个脆弱的新生儿，它被扼杀在摇篮中。

其三，教育的法观念在群众中还未深刻建立。女性和渔民文化程度低下。过去这里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比较严重，女性入学率低；就人口普查资料得文盲率人口男女各占19.99%和80.01%，这种女性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反过来也会影响下一代的发展。而这一切可以归因为当地居民对教育没有引入到一个深层需要的层位上来。此外，渔民入学率低是与其职业生活不定有关。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学生流生甚多，我们可以从1983年至1990年初中生跟踪中可以看出：

	入学数（人）	毕业数（人）
80级	148	100
81级	261	167
82级	359	275
83级	430	246
84级	300	262
85级	301	261
86级	257	206
87级	168	134
88级	343	245

89级　　345　　267

此外，在我们看到大量的流生现象的同时也看到了新生一代儿童的社会适应力在减弱。对孩子的珍宝在庙港是古已有之；但由于经济的压力，家庭中孩子又不只一个，兼之孩子的生存技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未来幸福，由此而重视对孩子的社会适应力的培养，效果也是好的。在今天，不仅经济有了好转，而且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自己未来生活又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孩子的职业生存技能状况已与自己联系甚少，无需远虑，只求在养育子女中享受天伦之乐，因而无法不对孩子宠爱有加，而忽视了对孩子做人的教育。如果说13、14岁的孩子还偎依在父母身边，由父母统管一切的现象屡见不鲜，不足为怪；那么，一个17、18岁的青年尚无法完全自理生活的现象不成为个别，这种状况是值得令人担忧的。

然而"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少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化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有枉有虚名"。[10]于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庙港的今天发展得力于昨天的教育发展；庙港的明天必须依靠今天的教育；教育自身的现代化必须走在整个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前。

五

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首要问题的教育，任重而道远。未来这几年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已成为现实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根据庙港社会的综合实力及其庙港教育的现实起点，根据整个国家现代化对教育的要求，根据庙港人的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其目标可以定位在：

A.总目标:

以社会现代化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为目标，全面推进庙港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的改革，贯通早期、初等、中等、成人教育网络结构，构建庙港终生教育新体系，使庙港未来人才成为具有高学识、高能力，并富有自我调整、适应环境，具有竞争能力和理想目标，能够参与和进行民主科学决策的立体型人才，使教育真正成为庙港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坚实基础。

B.具体目标及其实施措施:

在本世纪末达到亚洲"四小龙"80 年代末的平均教育水平，在下世纪前半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

1、确立两个服务的观念——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抓住一个重点——为社会现代化培养所需要的 T 型（立体型）人才。他们可以是能够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干部，可以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工农业经营者和企业家，可以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营销人员，可以是精通业务的各类管理人员；可以是开发新产品专业技术人员和对产品结构调整有较强适应能力的智能型一线生产者。

建立一个信仰——终生学习。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展的潜质，要对庙港每一个孩子的终生负责，坚持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为他们的终生教育提供条件和奠定良好的基础。

把住一个精髓——培养人的创造精神，着力于开发人的各方面潜能，促进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阐扬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促使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得到自在和谐发展，实现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和谐统一。

消除一项陋见——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着力培养学生不仅具备深厚的热爱家乡之心，而且是关心整个社会进步及至关心全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全人类谋取幸福的"国际人"。

2、教育水平的现代化

应用5年的时间高标准高质量完成12年义务教育。全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8年，每千人口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达到10人，高中文化程度达150人，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8%左右。形成终生学习制度，劳动者持继续教育证书上岗:

(1) a.幼儿园（学前三年教育）入园率达90%以上;

b.小学四率达100%，初中三率达95%以上;

c.高中段入学率达90%，合格率为95%，毕业率达90%。

(2) 学校德育工作实效优良，青少年基本无刑事犯罪。

(3) 为社会和高一级学校输送健康的优质公民和优质学生。

(4) 庙港公民有就业后再学习的权利和责任，每3年每个公民有培训学习一周以上的机会和要求；鼓励在岗干部和公民参加外语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参加各个层级的学历考试。

3、教育体系的现代化

有计划地通过实验探索适应庙港地区的乡土教材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在短期内推进外语课进入小学课堂，微机成为学校教育主要辅助手段，优化学校教育工作体系，以确保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4、办学条件的现代化

参照江苏省教委1994年颁发的办学条件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强化政府决策行为，进一步加大力度，搞好教育装备的投入，在近5年内再进行一次学校布局的大调整和设施的大充实。

(1) 中心小学移地重建。其规模设计至少能具备5～7规教学能力;

(2) 中心幼儿园的园类建设达到苏州市一类指标;

(3) 成人教育中心进行搬迁，并努力建成庙港成人教育的总

基地；500 人以上企业都要在企业内设置职工学校；

（4）建设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健身中心，以形成学校教育辅助体系。

5、师资队伍的现代化

（1）学历水平

幼儿园、小学部分现任教师中师学历达标为 80%，大专学历是 5%左右；现应该通过外聘和内修相结合的办法，每年向外引进 2～5 名大专生，每年有 15 名教师参加大专自修函授学习，吸收新教师起码学历为中师，到 2000 年有 5%的教师参加研修本科课程。中学教师基本学历为大专，到 2000 年有 50%参加研修达双专科和本科课程水平，少数达研究生水平。成人教育中心的师资与中学教师一样达到相应的水平。

（2）实际教学能力

既要重视教师的学历文凭，又不唯教师的学历文凭，而重视教师的教学实际能力。积极发挥教师教育科研的热情和潜能，通过科研理论杂志书刊订购补贴的办法，激励教师在岗边学习边研究；通过科研理论的讲座和研讨，来提高教师的学识；通过科研参与法来提高教师实际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公开课及其业务基本功大比武和各项业务考评检查的办法来提高教师的实际工作能力，使庙港教师的教育实际能力走在吴江市最前沿。

（3）教师任职能力要求

建立师资队伍流动管理模型，打破层级，实行教师持教师资格证上岗，积极吸纳外籍和本地退休教师的工作热能，并赋予相应的待遇。

（4）教师的工资待遇

确保教师工资待遇高于当地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使教师职业一直成为庙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6、教育管理现代化

进一步探索运用现代化先进教育教学管理手段，以提高教育效益，并使工作更具科学化、规范化，更具民主性和公正性。

进一步探索学校、社区、家庭相协同的大教育体系，努力发挥各部分的整体协调功能，实现教育效益最大功能的发挥。

进一步探索从幼教至成教终生教育一条龙的纵向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建构，促使教育成为人们生活和自我发展的一种自觉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一根重要支柱。

以追求一流办学质量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促使学生在德、智、体、能诸方面均得到良好的发展。

而这项工作的开展还得首先从启发动员广大群众开始，让大家深刻意识到教育与自己及其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自觉把接受教育与继续教育纳入到法制意识中去。如果我们能真正地把接受教育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那么庙港的整个社会现代化也将为期不远了；它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亮整个社会发展的锦绣前程。

（吴江市教育局　钱一舟）

注：

(1)《江村经济》，第 26 页。

(2)《江村经济》，第 26 页。

(3)《江村经济》，第 28 页。

(4) 李佑仁：《纽约的第二次丝赛会耕里丝代表致上海丝会诗震各丝号书》。

(5)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53 页。

(6) 同上。

(7)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55 页。

(8)《江苏教育大事记》，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92 页。

(9)【美】J.S.柯尔曼：《教育与政治发展》。

(10) 袁振国：《教育改革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48 页。

附录一

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

费孝通教授从事人类社会学研究一辈子，在应用这门科学于研究现代社会方面成绩卓著，堪为先河。六十年来他跟踪考察家乡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变化的历史过程，不仅揭示社会生活和经济演化的规律，而且致力于参政议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榜样，亦是家乡农民的贴心人。为了纪念他访问"江村"60周年，我们走访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整理出他前后19次访问开弦弓村的活动概况，附录于此，供读者参阅。

一 访

1935年夏天，费孝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他听从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作一年实地调查。秋天，他偕妻去了广西大瑶山区。12月16日傍晚，不幸的事发生了，他们在茂林修竹的崎岖山间迷路，费孝通误入兽阱，腰部、左脚骨受伤；其妻奔呼救援时不慎跌落深涧急流中身亡。翌晨，费孝通忍痛爬行才遇有一位瑶胞设法援救了他。经过治疗，到1936年暑假他回到家乡休息，准备出国。他的姐姐费达生此时在家乡负责推广蚕桑改良和缫丝新技术。早在1929年她帮助开弦弓村农民创办机械缫丝厂，当年就增加农民收入，后来该厂的白厂丝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盛名。费孝通对此虽早有所闻但不甚了解。费达生关心费孝通对国内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便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去参观访问。这一建议使费孝通产

生了考察江南农村经济的兴趣。从此与开弦弓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利用出国前两个月的时间，在开弦弓村串门访户，走田头，去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成了妇孺皆熟的朋友。在他姐姐的帮助下，费孝通还接触到稔知这一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类情况的人士，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在去英国的轮船上，费孝通把这些资料整理成调查报告初稿。这份初稿随他进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后来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写成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并于1938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39年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出版，后来又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重印多次，被列为人类社会学名著之一。现代人类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赞誉"这篇论著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半个多世纪来中外人类社会学学者无不受到这一论著的启发和影响。开弦弓村也随之闻名于世。

二 访

1956年，费孝通的英伦同窗、悉尼大学的格迪斯教授随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同意专程考察解放后的江村情况，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费孝通离开那次难忘的江村访问已经20年了，他多么想抽空去看看那儿的现状。1957年春天，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了解农村合作化情况。这就促使费孝通到开弦弓村作第二次访问。他在村里住了20天，听取县、区、乡、村干部的汇报，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家庭、人民生活和思想觉悟、文化教育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访问中他见到了许多老乡邻，也接触到一群活跃的年轻人，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接待。随同这次访问的有他的姐姐费达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农村经济调查组的同志和《新观察》杂志的记者。访问结束，费孝通应《新观察》杂志之约，发表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两篇文章，热情讴歌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针对当时农民吃饭不成问题，但缺钱改善生活的情况，提出农村应当发展副业和适宜农村的工业以致富农民的主张，并认为中央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需要积累，要依靠劳动者自觉的省吃俭用。

三　访

1980 年春天，费孝通接到英国人类学会决定明年冬季将授予他赫胥黎纪念奖章的通知。这是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费孝通为自己将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感到喜悦。1981 年 6 月他的导师雷蒙德教授来信，建议他将开弦弓村自 1938 年以来的变化作为领受赫胥黎纪念奖章时的演讲内容。费孝通欣然采纳，因为他离开 1957 年二访江村已 23 年了，现在江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情形怎样了？正是他牵挂的事。为此，他于国庆节偕其姐姐费达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承毅、王康、林友苏等几位同志赴开弦弓村访问。他们乘坐在迎接他们的小轮船上，从震泽至开弦弓村，12 华里路化了一个多小时，都感到交通不便。费孝通对庙港乡党委书记徐胜祥同志说："若要富，先铺路。交通不便，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乡党委领导立即表示要筑公路的愿望。（后经费孝通向江苏省政府有关领导建议，在省市交通部门的关心支持下，1982 年底开弦弓村通了汽车。）这次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费孝通一行在开弦弓村只耽了四天。他们向干部群众询问农业、多种经营、乡村工业、土地、人口、文化教育、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和生活方面的情况。费孝通感到农民不仅已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非常高兴。他们参观了

1968年重建的村缫丝厂，查看了产品的质量等级。费孝通边看边说:"乡村工业一定要讲究质量。"还自豪地告诉乡里的人，开弦弓村的白厂丝三十年代时在国际上就有名气了。费孝通看到工厂里设备落后，规模较小，就对乡里领导同志讲，要提高技术，加强管理。(后来由费孝通出面向苏州丝绸工学院求援，1982年11月他的姐姐费达生时年79岁，带领丝绸工学院杨志超教授等专业人员到开弦弓村缫丝厂对干部职工进行培训。乡里还派16名高中毕业生到丝绸工学院培养，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了缫丝厂的领导。经过十多年奋斗，该厂现在已发展成为江苏金蜂集团公司。)

开弦弓村经济的兴衰变化，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决定要在这里建立"农村社会调查基地"。1981年11月18日，费孝通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作了《三访江村》的演讲。他实事求是又满怀激情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人类学的学者们阐述了"江村"45年来，主要是解放32年来，特别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政策三年来社区经济的发展情况。他在会上宣告"江村"是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基地，他还许愿在1986年即他访问"江村"50周年时，出版一本《江村经济》续篇，让"江村"成为各国社会学同仁了解中国农村半个世纪以来变化历程的窗口。是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省党校、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在开弦弓村作第一期全面调查。"农村社会调查基地"正式建立。从此，开弦弓村成了中外社会学学者青睐和向往的地方。

四　访

1982年1月6日和14日，费孝通满怀取得人类学最高荣誉的喜悦心情和对"江村"进行继续研究的使命感，第四次来到开弦

弓村，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的工业结构、分配和乡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问题。在一次关于乡村工业的座谈会上，发言的人都按当时习惯称乡村工业为“社队工业”。费孝通说，“乡村工业的叫法好，这个名称早就有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乡村工业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是农民自己需要的，是有基础的。”在此期间，他为开弦弓丝织厂奠基铲了第一锹土，还兴致勃勃挥毫书就三首古诗词分赠给庙港公社、开弦弓村、荷花湾村。其中一首白居易的《忆江南》信手拈来一挥而就，“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充分表达了他的心情。他还看望了正在开弦弓村调查研究的全体同志。费孝通结束此行回到北京后，于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以《我国农民已经闯出了新路子》为题作了发言，用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热情赞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农村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五　访

1982年10月24日费孝通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领导一起到开弦弓村作第五次访问。在前两次的访问中费孝通看到随着农村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及行政归辖的改变，原来差不多情形的小集镇，如陆家港、更楼港、庙港发生了兴衰变化。他联想到农村经济发展必然推动小城镇的复苏。于是他带着“社会调查必须更上一层楼”的问题来到吴江，深入江村了解工业结构、劳动力配置、文化教育、农民生活等情况。还对震泽、平望、盛泽、松陵4个大镇的城镇建设情况进行了探索性考察，他意识到乡镇工业的兴起，小城镇建设必须加强规划。访问中费孝通在农民蒋云娥家里兴致勃勃地牵磨，到打谷场与村里的干部群众交谈收成情况，殷切希望大家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新江村。

六 访

吴江历来以小城镇多闻名苏南。除古老的七大镇三小镇外，还有六七十年代农村人民公社时形成、80 年代崛起的 13 个新型集镇。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古镇要保持优势求新发展，新镇不甘落后要争上游。家乡小城镇的兴衰变化和地位作用吸引着费孝通。1983 年 5 月 2 日，为了进一步探索小城镇问题，他带领调查组的沈关宝、李友梅等同志来开弦弓村作第六次访问。同时，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对松陵、盛泽、震泽、平望、同里、铜罗等十多个镇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细调查，归纳出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第一种以震泽镇为代表，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第二种以盛泽镇为代表，是丝绸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第三种以松陵镇为代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第四种以同里镇为代表，在过去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正在改造成为一个体现水乡景色的游览区、重点文化保护区；第五种以平望镇为代表，近年来已成为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是吴江县内最大的交通枢纽。在调查中，他发现小城镇一度由盛而衰的症结是当时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左"的政策；而小城镇的复苏繁荣根本原因是乡镇工业经济的带动。在调查中他觉得小城镇的集体商业经济尚未搞活，流通渠道有待疏通。他认为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查期间曾步临太湖，读唐诗有感欣然作诗题赠吴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过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栖栖不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1983 年 9 月 21 日费孝通出席"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并以《小城镇 大问题》为题在会上发言，他多次提到庙港、开弦

弓村、震泽等地的调查资料，分析小城镇衰落和复苏的原因。

七 访

1983 年 10 月 3 日至 8 日，费孝通第七次访问开弦弓村。除了参观村丝织厂和庙港缫丝厂外，还到震泽、梅堰进行调查，并邀请正在庙港与乡、村办企业搞横向联营的苏州光明丝织厂和苏州益明化工厂的负责人座谈城乡工业合作关系问题；还参加吴江县松陵镇小城镇研究会成立大会并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听取家乡小城镇研究和改革试点工作的情况。

是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6 日，费孝通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由北京和南京有关专家组成的小城镇调查组在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四市的部分县镇参观访问，并就 9 月份那次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进行"会诊"。调查结束后，在苏州开了总结会。费孝通在会上发言，指出农村工业经济的繁荣是小城镇复兴的原因。他以常、锡、通、苏四市有关县镇的工业产值的比重都接近或超过当地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苏、锡、常三市的县镇可达 70%以上为据，证明这个地区小城镇复兴的共同特点。他还就乡镇工业与大中城市的企业联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商品流通、家庭副业、集镇建设规划、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后来整理成《小城镇　再探索》一文。

八 访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费孝通在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朱通华陪同下于 21 日至 23 日在开弦弓村作第八次访问。他把乡镇工业和城乡联结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这次调查研究重点，他认为这是小城镇研究的新开拓，尽管还在探索阶段，但由此可

开掘出乡镇企业对城市社会经济改革的作用、乡镇企业与城市社会价值体系的关系等深一层的课题来，这对于研究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复兴的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是极有意义的。访问期间，他参观了开弦弓村丝织厂和蜜饯厂，了解销售情况；在村里看望老朋友，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还听了县委书记俞兴德关于近年来全县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此外，还访问了梅堰，参观了那里的乡办企业。

10月23日，费孝通在松陵镇红旗影剧院向县机关干部和全县乡镇长作了报告。他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讲述了参加党中央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前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后的体会和在农村参观访问时看到农民富裕起来的感受。分析了建国35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就。还满腔热情地希望家乡人民克服小富即满、保守求稳的传统积习，要适应新形势，善于捕捉信息，增强市场头脑，努力加快经济发展。

离开吴江后，费孝通去镇江、扬州、南京三市访问，之后写了《小城镇　新开拓》一文，在《瞭望》杂志上连载。

九　访

1985年7月9日，75岁的费孝通为了撰写《江村五十周年》，不顾江南盛夏高温，第九次回家乡调查研究。他带着探索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深入考察乡镇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前景，历时两周，先后访问了开弦弓村和庙港、北厍、梅堰、桃源、黎里、平望、震泽等乡镇。

7月12日费孝通到庙港，正巧乡党委在召开村党支部书记会议，他非常高兴地看望大家并作了即席讲话。他鼓励大家要热爱家乡，努力建设好家乡。他说，爱国首先要爱家乡，只有大家把家乡的建设搞好了，国家的建设才有好的基础。当前就要抓住

时机，发展乡村工业，使社会主义富起来。他认为乡镇搞工业，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7月13日费孝通到开弦弓村，邀请土改时的村干部和现任的村干部分别开了两个座谈会，详细地询问了农民生活和经济负担情况。费孝通在吴江期间，还为湖滨乡、松陵镇、县机关的干部作了报告，畅谈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他从改革开放形势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乡镇企业潜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并告诫乡镇企业不要单纯追求产值数字。他认为发展速度要建立在坚实的效益基础上，发展不能靠铺摊子、争贷款的办法。乡镇企业应当像蝌蚪变青蛙那样，去掉自己的尾巴，克服粗放低效的缺点，加强科学管理，逐步向现代企业发展。他强调效率和质量是乡镇企业的生命。他十分赞赏开始搞乡镇企业时那种"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但他更希望乡镇企业干部在现代商品经济活动中要学会科学管理，同时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忽略国内市场，要当好"二传手"，既要同老外搞补偿贸易，又要向国内次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发展。他在报告中提醒乡镇干部注意防止土地抛荒，要重视稳定农业。他肯定吴江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做法。他认为乡镇工业脱胎于农业，乡镇工业发展了就应当反哺农业，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协调发展。他还对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和小城镇建设防止过快膨胀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7月22日费孝通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凤尾菇深加工研讨会"，这种凤尾菇菌种是费孝通从澳大利亚亲自带回来的。他对此十分关心，在会上发表了指导性意见。

随同费孝通来访的有朱通华、沈关宝、李友梅、刘豪兴、王兴等11人，他们一起参观了吴江县35年成果展览会，游览了太湖，费孝通赋诗二首:

一

太湖三万六千顷，
稚翁满舱笑语盈。
自从陶朱片舟去，
世代兴衰说到今。

二

湖风吹轩人梦来，
七十老翁志未衰。
振笔犹欲书心愿，
莫道湖边起暮蔼。

这次访问结束后，费孝通写了《故里行》一文，文中写道："显然，农村体制改革已要求更上一层楼。这也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我觉得现在回到农村里去进行调查是及时的。农村是乡镇工业基地，乡镇工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形成苏南地区的全面繁荣，要跟踪观察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放松农村本身的调查研究，这可说是我九访江村总的体会。"

十 访

1985 年 10 月，为纪念访问江村 50 周年作准备工作，费孝通在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通华、吴江县委副书记于孟达等人的陪同下，第十次访问了江村。在这次访问前 5 个月，费孝通在北京为新建的庙港乡政府招待所题写了匾额"万顷阁"，此次来访，他即住在"万顷阁"里。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10 月 12 日至 18 日），费孝通除访问开弦弓村外，还到庙港、梅堰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召开各种座谈会，走村访户，与乡村的干部群众广泛进行了交谈。在开弦弓村，他看到不少新楼房，很是高兴，在老村长周富林家里同他全家人一起座谈。费孝通及其姐姐费达生还在于孟达同志的陪同

下，参观了吴江档案馆和该馆的档案史料陈列室。

十一访

1986 年 5 月 16 日，费孝通第十一次访问了江村。

上午，在朱通华、于孟达等人的陪同下，费孝通和应邀来访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巴乃特到达开弦弓村访问。开始分头活动，费孝通稍事休息后，听取了开弦弓村的调查汇报；日、美学者由朱通华、于孟达等陪同参观了乡村工厂，尔后，会合走访农户家庭。中午，费孝通与外国客人一起访问了重访江村时的房东周文昌家，并在周家共进午餐。下午三时许，离开庙港，去桃源乡对该乡湖笔厂、丝织厂、服装厂进行访问调查。

费孝通在十一访江村的下月，即 6 月，随胡耀邦同志赴西欧访问，他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作了题为《江村五十年》的演讲。演讲中回顾了江村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他说，“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上述的江村在过去的 50 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变化的前奏。”

十二访

1987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费孝通访问了无锡、常熟、吴江、吴县四县。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了解这一地区工农关系的新发展和新问题。

5 月 31 日，费孝通第十二次来到江村。他在与乡村干部座谈时，听取了开弦弓村近况和 1986 年庙港乡三业发展情况的汇报，然后对乡村企业的前景，国营工业、集体（乡镇）工业、家庭工业如何分工以及家庭工业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分析性的讲解。

6 月 1 日，费孝通应邀在吴江县机关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关于

乡镇企业发展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乡镇工业第二步发展有两条出路;一、搞技术改造,在上水平、上技术、上规模方面做文章;二、搞好产品销售,可以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以优质服务和利用地域性的时间差、地区差把产品推销出去。”

陪同费孝通访问的有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通华、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还有调查组的李友梅等人。

1987年底,费孝通根据对苏南四县的访问,写成了《农业发展的新台阶》一文。该文的开头写道:“……到目前,有些乡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已经有一部分地区通过增加投入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扩大农田经营规模,促进农业专业化,使得务农的农民在收入上赶上甚至超过乡村工业的职工,从而稳定了粮食生产,使农业向现代化的目标前进一步。这是当前农业改革的一个新台阶,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

十三访

费孝通为了及时观察发展着的形势,这几年他每年都要到苏南访问两次。继十二访后,于同年9月4日,第十三次访问了江村。是日下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杨继先、处长索世辉和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等人陪同下,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后,去该村15组访问了陈耀祥、徐林宝两家农户。还分别与该村的干部合影留念。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为这次访问拍摄了电影。

9月1日至5日,以日本上智大学社会学教授鹤见和子为团长的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一行8人在吴江作考察访问。在此期间,费孝通与日本代表团会晤并进行了小城镇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

费孝通这次调查活动,限于时间,不能像过去那样到各镇去

访问，于是他邀请曾访问过的一些镇长在吴县聚谈一天，向他们进一步了解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应邀参加的有苏州市属四县两市的14位镇长。之后，他写了《镇长们的苦恼》一文，后收入《行行重行行》一书。在该文中，费孝通指出："这几年来苏南的小城镇真有点像雨后春笋，长得快，又长得鲜嫩动人。""苏南小城镇的新面貌，固然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不大为人所体悉的是这里渗透着多少镇长们的苦心和烦恼"。"在场的镇长们当前感到最头痛的6件事，用他们的话说是：烧煤、喝水、用电、看病、上学和最近突出的菜篮子。""从我个人来说，这次与镇长们谈话最触及思想的是他们提出了重点文物保护的问题"。他特别提到了古镇同里的保护、开发问题。

十四访

1990年初，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

这个方案交出后，费孝通原本打算去一趟江苏南通，为已由张智楚同志编就的《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补加一篇《南通行》。行程已定，临行前接到通知，江泽民同志要他和民盟负责同志去一趟，讨论有关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问题。谈话结束后，费孝通他们表示民盟愿为这个设想承担红娘的角色，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把这个设想带到地方上去进行意向性的探讨，以使各方易于取得共识。于是，他们改变了原定行程，4月初开始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之行。

4月14日至15日，费孝通第十四次到家乡访问，先后考察了开弦弓村、吴江东方丝绸市场和吴江新民丝织厂。在庙港时，他听取了开弦弓村和庙港缫丝厂的工作汇报，并参观了庙港缫丝厂的自动缫丝车间。在此之前费孝通为该厂建厂60周年，题了

"严、细、实、创"四个字，对该厂寄以厚望。

费孝通根据这次长江三角洲之行的情况，于1990年7月9日，在兴城油田疗养院完成了《长江三角洲之行》一文，其中写道："……这次在我家乡吴江县的几个镇和开弦弓村看了看，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些。我原以为进入商品经济不久的农村，头一次遇到产业调整，会不会受到冲击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没有想到，这里的干部群众，经受了这次考验，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我了解到现在吴江全县已经做到农、工、副三业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实行种植、养殖、加工、出口相结合，逐步形成五条龙，从栽桑养蚕到缫丝织绸、印染整理再到服装加工一条龙；养兔产毛到加工兔毛纱和兔毛衫一条龙；种植湖草到加工凉席、榻榻米一条龙；养猪、养羊到加工皮革制品一条龙；蔬菜种植、加工一条龙。与此相对应，还成立了五个农工贸相结合的企业集团和创汇集团。外贸收入在全省已经保持了8年第一，去年外贸收购额达6.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3.7亿元。全县还办了25个合资企业，引进外资2400万美元。今年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费孝通从家乡的经济结构和外贸优势的思考中生发出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外贸格局构想："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在长江三角洲，建立起一个新外贸格局，从货郎担式的零敲碎打，上升为赶集式的上交会，然后更上一层楼，以浦东为基础，加上一个'坐商'式的服务层次，也就是在上海建一个大陆上的香港，包括江浙两省腹地工农业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开发区。"

十五访

1991年，距费孝通1981年三访江村正好10年。这10年里，费孝通看着家乡农村的房屋从草房变瓦房，一层变多层，联门接户变成了别墅式的小楼房；看着农村里兴办起一座座小工

厂，厂房变宽敞、设备变先进；看着农村里冒出一批批头脑敏捷、视野宽阔的青年农民企业家。这一切正是他早年梦寐以求的变化。费孝通为他今生今世能亲眼看到他的家乡在短短10年里发生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感到高兴和激动。是年4月18日，他第15次访问了江村。下午，他在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等人的陪同下，听取了开弦弓村的汇报，接着到庙港乡政府听取关于庙港一年多来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

在吴江期间（4月14日至21日），费孝通在县委书记张卫国陪同下先后访问北厍、盛泽、庙港等地。

回到北京后，费孝通给《瞭望》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吴江行》的文章，回溯了故乡10年的变化。他在文中写道："总的来说，吴江这10年正在从温饱型经济进入小康型经济。"在分析吴江小康水平是怎样得来时，他认为，吴江经济有它自己的特点：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创汇力强；吴江"走出了一条由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发展道路。"他在文中列举吴江的桑田面积、蚕茧、白厂丝、丝织品产量和出口额，赞叹吴江"不愧是丝绸之府。"文中还介绍了吴江东方丝绸市场，认为吴江这几年丝绸业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该市场的建立。"该市场是当地农民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机制。同时也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商品经济规律的诱导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生产和流通的相互依存性，从而促进了贸工农的结合。"他在文中十分赞赏吴江坚持"左右开弓，两个市场"的方针，同时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搞活流通和加强"横向联系"的做法。"像吴江这样的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除了内发的因素外，外联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实践证明，横向联营这种形式宛如给乡镇企业安上一根发条，上速度、上规模、上水平，得益匪浅。""企业间密切的横向联系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网络。也就是说长江三角洲事实上业已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经济开发区，

如果得到国家承认，给予相应的发展政策，这个经济开发区就可以发展得更顺利，更迅速。这样，三角洲地区在今后 10 年里，生产力再翻一番，带动全国实现小康经济就有了保证。这次吴江之行更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

十六访

1993 年 10 月 14 日，费孝通和参加由他主持的“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代表一行 47 人，在苏州市委副书记周治华的陪同下，来吴江实地考察“江村”风貌，这是费孝通第 16 次访问江村。

在开弦弓村，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庙港镇党委和开弦弓村党总支负责同志分别向来访者介绍了市、镇、村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然后客人们观看了费孝通访问江村图片资料，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村容，走访了农户。

在访问中，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巨大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由于家乡父老乡亲坚决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靠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使家乡发展得如此快、如此好。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乡今后的经济会更繁荣，人民生活会更富裕。

费孝通和客人们告别开弦弓村后，还去盛泽考察了吴江新民丝织总厂。

十七访

1994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费孝通第十七次访问了江村。

费孝通于 10 月 12 日到达吴江，他此次来主要是了解家乡的新变化和配合拍摄专题片《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和中国农村现代化》。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市长张钰良会见费孝通，并向他汇报了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

13 日，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走访了农户。在村民姚凤金家里，与姚凤金及其孙媳妇赵凤美一起聊家常察民情；他在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周文昌家里，高兴地与周家老小共进午餐。他又到小学的教室里，看望了小朋友们。是日，费孝通还考察了庙港镇缫丝厂。

14 日，费孝通与其姐姐费达生一起同当年在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里工作过的老工人进行座谈。是日，他还到盛泽镇考察了东方丝绸市场、新民丝织总厂、新华丝织厂和工艺织造厂。他听了盛泽镇委书记鲍玉荣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希望盛泽镇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板镇。

费孝通这次对吴江的访问至 10 月 15 日结束。在松陵期间，他参观了孩提时的母校——雷祖殿小学，即现在的吴江市实验小学，找到了当年的井和树，重温了童年生活。费孝通十分高兴地赋诗一首："早岁书声犹在耳，古井清泉应未干。花开花落八十四，到此方知苦与甘。"

十八访

1995 年 5 月 15 日，费孝通回到吴江。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沈荣法、张钰良、汝留根等热情接待并向费孝通汇报了进一步繁荣吴江经济的"五大战略"和正在制订全市实现基本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情况。费孝通听了非常高兴，并祝愿家乡取得更大的的成绩。

在吴江，费孝通闻知有 20 家台湾的工业公司来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的事，他颇为高兴。16 日下午费孝通欣然应邀出席双方的签约仪式，并即席讲话。他十分赞赏家乡能引入高科技产业，对台湾企业家组团来吴江投资表示欢迎。他希望未来的吴江精密元器件工业城建成可与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相媲美的工业城。

17 日下午，费孝通在吴江宾馆接见《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人员，并高兴地同大家合影留念和座谈有关问题。18 日上午费孝通到庙港访问了开弦弓村。他先在镇党委书记庞启剑等人陪同下，参观了太湖旅游度假区，再到开弦弓村，参观江苏金蜂集团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费孝通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江村新貌，在新建的小学和农贸市场处，他惊异地感叹道："这里原是一片桑地，现在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在村口小店门前听说店主是邱记珍，是他熟悉的老朋友，费孝通就进店看望，不料邱记珍不在，费孝通若有所失，连声说道："真不巧！ 真不巧！"他向邱记珍的女婿了解小店经营、家庭生活和邱记珍的身体等等情况。

下午费孝通离开江村来到震泽镇，与这里的党政主要领导座谈关于震泽的经济发展问题。他的讲话经整理后发表在《社会》杂志 1995 年第 8 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震泽镇经济发展中的隐忧。他认为震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迟缓，位置往后挪，原因是震泽传统的商业服务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没有保持和发挥原有的优势。他指出服务意识是震泽商业的精髓，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去研究，要重塑服务意识。他希望震泽镇的领导在选择振兴震泽致富群众的方案时，再放开一点思路，一方面深入研究传统优势，以免失掉经济运行的重心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震泽的特色副业发展起来，成为区域资源组合和商品集散的基地，政府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促进商品流通。文中还提到第三产业发展的分层次问题和镇政府的职能转变问题。

十八访江村后，这一年费孝通又两次来到家乡。一次是 9 月 21 日至 24 日，民盟中央在吴江召开参政议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他和来自 29 个民盟省、市、区委的领导和参政议政作出成绩的代表以及民盟中央机关的同志近百人，在会议期间考察了吴江两

个文明建设的情况。另一次是11月5日，费孝通和雷洁琼、程思远、钱伟长、万国权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及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起，参加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赴苏南考察团，在吴江考察了松陵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盛泽丝绸星火密集区，还参观了市容市貌。

十九访

1996年4月4日，费孝通第19次访问了开弦弓村，他听了庙港镇和开弦弓村领导关于太湖开发的情况介绍，对开弦弓村出现的喜人景象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农户徐林宝家，费孝通详细地询问了主人家中的收入情况，又问他家的房屋是何年盖起来的，勉励其继续努力，在致富路上为家乡作贡献。

访问江村后，费孝通还先后视察了八都、七都、青云三个新兴集镇。八都是国内农业系统首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企业集团——中国华鑫集团所在地。这里的农业产业化成就费孝通早有所闻，这次访问听了吴江市领导介绍，实地参观了华鑫集团的系列化产品，他对华鑫集团的创业过程频加赞赏，十分满意这里的干部群众做好了水上文章，饲养中华鳖造福社会，致富农民。

在七都镇，费孝通先后视察了江苏双塔集团、中国亨通集团、苏州金装集团。每到一处，他看得都十分认真，听得非常仔细，并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对近几年来七都镇工业高起点、上规模、升档次、出效率和群众生活水平大改善的显著成绩，表示赞赏。

青云镇是江苏省小城镇建设的试点单位之一。费孝通听了镇领导有关建设规划的汇报和察看了该镇新区后，指出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他在肯定青云镇取得一定的经验时，建议应鼓励农民带资进镇兴办各

种企业，参与小城镇建设，要群策群力，青云镇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这次视察过程中，费孝通分别听取了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和市长张钰良的汇报，对吴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费孝通十分关心近几年来吴江的丝绸在全国领先的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的问题，他希望吴江在“九五”新一轮的竞争上要开拓新的领域，挖掘新的潜力。费孝通对吴江的水资源保护与太湖整治问题尤为关心。他说水资源是吴江的优势之源，他希望吴江能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在水上做文章，治标治本开发利用。他听了吴江市领导关于加大太湖开发力度，利用东太湖围养鱼、蟹，不仅致富农民，而且解决了水污染问题的情况介绍后，连连点头称好。

4月7日上午，费孝通又一次在吴江宾馆接见《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人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费孝通为家乡涌现出一批关心农村经济的年轻人感到欣慰，欣然为《江村—江镇》一书题写了书名。这天费孝通还接见了民盟吴江市支部成员。主委秦星坡向费孝通汇报了民盟吴江市支部成立一年来的工作。费孝通表示赞同并希望民盟吴江市支部的工作要有号召力，要认真提高盟员质量，不搞数量，要注重年轻化。费孝通还向吴江全体盟员提出，要研究“太湖整治利用”这一课题。他说，吴江近几年发展较快，但不能忘记“天堂”的小桥流水，不能把水面的作用丢掉，水面一污染就会把祖宗留下来的老本都丢了。在费孝通的心里，始终装着家乡人民的长远利益。

吴江市商业局　陈志强

吴江市政　协　庄树强

附录二

海外学者江村访问记事

1956 年 5 月 12 日～16 日，澳大利亚学者 W·R·葛迪斯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来华，到开弦弓村访问考察经济、文化、生产以及群众的生活风俗习惯。回国后于 1963 年出版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结论是“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 20 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有了更大的安全感。”

1981 年 9 月 20 日～24 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董事、美国农业发展委员会亚洲组主席、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人类社会学教授南希·冈萨列斯（女）应中国科协邀请，先访安徽凤阳，又来开弦弓村考察。访问结束后在苏州与费孝通会见，称赞开弦弓人“手很巧”，“发展了工业”。

1983 年 12 月 11 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常驻北京记者谢格蒙德·金泽贝格及其夫人在吴江桃源访问期间（一个月）来开弦弓村，采访了解费孝通教授历次访问江村和有关党的政策贯彻情况。

1984 年 3 月 3 日，美国社会学、人类学代表团一行 10 人，由上海社会学会会长李庆云和沈关宝等人陪同来开弦弓村进行访问。代表团团长是麻萨诸塞大学社会学和人口研究所社会学教授罗西，主要成员有霍普金斯大学（澳伯尼）社会学系社会学教授林南、人类学系人类学教授马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教授帕里升、人类学系人类学教授萨林斯，杜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史密斯，以及加州大学语言学教授威廉王（王士元）等。

1984年6月16日，美国克拉克大学教授、社会历史学家哈丽雯（女）应费孝通教授邀请来开弦弓村访问。

198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吴白一行10人访问开弦弓村。

1984年9月9日，津巴布韦大学高级讲师、人类学博士恰特女士来开弦弓村考察。

1985年3月17日，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鹤见和子教授（女）、成蹊大学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宇野重昭教授、成蹊大学法学部安源茂教授来开弦弓村走访了农民家庭。

1985年8月30日～3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美籍华人黄宗智及其夫人、日本东京都上智大学教师顾琳（美籍），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吕作燮教授陪同下来开弦弓村和庙港作社会调查，考察太湖流域农村经济情况。

1985年8月31日～9月1日，曾于1984年9月9日来访过的津巴布韦大学教授（当时是高级讲师）恰特女士重访江村。

1985年11月21日，香港浸会学院高级讲师黄枝连，应上海大学文学院邀请，并在院党委书记李庆云和吴江县委副书记于孟达陪同下，来开弦弓村参观访问。

1986年2月20日，西德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柯兰君教授及其丈夫（大学教授）、儿子来开弦弓村访问，参观了乡村工厂，访问了周友法、周文昌两户农家。

1986年5月7日下午，美国夏威夷大学地理系美籍华人章生道教授，来开弦弓村考察养蚕和桑园，了解经济情况。

1986年5月12日，应邀在上海文学院讲学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高级讲师刘创楚，在返港之前来开弦弓村参观访问。

1986年5月16日，日本东京大学中根千枝教授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巴乃特教授，应费孝通教授之邀并由费陪同来开弦弓村访问，参观了乡村工厂，走访了农户，并在费孝通重访江村时的房

东周文昌家共进午餐。

1986 年 5 月 27 日，朝鲜桑树栽培和养蚕技术考察组组长沈形奎（朝鲜农业委员会养蚕局局长）、组员胜应明（平安道养蚕农场经理）、时锡焕（养蚕研究所室长），由苏州市乡管局局长鲍一鸣、吴江县副县长钱明陪同，来开弦弓村考察农民家庭养蚕情况，并参观了缫丝厂。

1986 年 9 月 13 日，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一行 8 人到开弦弓村访问。其成员是：上智大学教授鹤见和子（女）、成蹊大学教授宇野重昭、安源茂、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山本英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毛里和子（女）、综合开发机构（NIRA）研究员河崎和明、国际文化馆常务理事加藤韩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汤山上升子（女）。代表团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通华、吴江县委副书记于孟达以及庙港乡领导陪同。上午听取开弦弓村的情况介绍，参观村丝织厂，分两组坐船浏览全村风貌，并分别走访周玉生、周兴传家庭。中午在周文昌、周新根家就餐。饭后又访问了周友法和姚三毛两家农户，参观了乡办缫丝厂，并去庙港镇观看镇容镇貌。

1986 年 10 月 26 日，日本《读卖新闻》上海地区采访团铃木俊男一行 2 人应上海《文汇报》社邀请，并在报社编辑部陈副主任陪同下来开弦弓村进行采访，访问了周兴传、徐阿毛、谈龙泉三家农户，参观了村丝织厂和乡缫丝厂。

1987 年 1 月 17 日，日本一桥大学毕业生藤内敏郎自费旅游到开弦弓村，正逢春节，在农民家中作客采访。

1987 年 3 月 28 日，美国德保大学社会学系黄丽丽等 18 名学生，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外办主任朱雨亭、教师王勋等陪同到开弦弓村进行访问。

1987 年 3 月 31 日，日本社会学家第二次访华组松户庸子（女）、松园苑子（女）、若林教子（女）三人，由上海大学文学

院教师王勋和吴江县委副书记于孟达陪同访问开弦弓村。

1987年6月18日～19日，美国乔治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农业大学高级进修生格雷戈里·维克来开弦弓村，走访了13家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调查。

1987年7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部人类学教授孔迈隆及其夫人慕名访问开弦弓，听取了村主任的介绍，走访了谈龙泉家庭，并参观了村办丝织厂。

1987年8月26日，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副教授松本健男、浜崎富和京都大学教授荒木干雄一行3人到开弦弓村参观养蚕缫丝。

1987年9月2日，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一行8人到开弦弓村访问，其中团长鹤见和子、团员宇野重昭、安源茂已是第三次到开弦弓村。陪同前来的有江苏省委政研室主任朱通华、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等人。代表团首先听取村干部的介绍，尔后访问了蒋松泉、谈龙泉、周友法、周文昌、赵金海、姚三毛六家农户。下午又走访了民字浜陈洪法、潘和尚二家竹器专业户。

1987年9月20日～21日，应我国邀请在长江三峡工程担任顾问的美国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工学院教授司高德先生，由费孝通教授介绍来开弦弓村访问考察，参观了村办丝织厂、中学和乡办缫丝厂，走访了谈龙泉、徐林宝二户农家。

1987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记者吉米（菲律宾人）到开弦弓村访问。

1988年1月4日，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滨岛敦俊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日本留学生藤田女士到开弦弓村访问，并浏览了太湖风光。

1988年2月25日，法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法国社会学会前会长米歇尔·科赛先生在访问吴江期间到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

查，听取了乡、村情况介绍，参观了乡缫丝厂、村丝织厂，访问了农户。

1988年9月26日，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巴博德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勒绨，在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等人陪同下到开弦弓村访问，参观了乡缫丝厂、村丝织厂，访问了谈龙泉、周文昌二家农户，游览了太湖。

1988年10月16日～17日，经费孝通教授介绍和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文化人类学教授裴蒂·丽莎，在沈关宝、刘豪兴两位老师和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于孟达主任等人陪同下，专程来开弦弓村访问。第一天参观了乡村工厂、个体工厂和农户；第二天在庙港"万顷阁"与乡、村干部进行座谈。

1989年2月27日，苏州大学教授陪同三名西德留学生到开弦弓访问，走访了农户，参观了丝织厂。

1989年3月8日，美国西世界学院汉语学习班主任柏佩兰女士，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系主任沈关宝陪同下到开弦弓村访问，此行目的是选择教学基地。

1991年3月，英国伦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斯福博士，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沈关宝陪同首次访问开弦弓村。

1991年10月31日，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部长长谷川善计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沈关宝等人陪同下访问开弦弓村，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参观了乡缫丝厂和村办丝织厂，并走访了周文昌家。

1992年12月26日，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助教授加藤弘之、东京农业大学农业系讲师大岛一二和东京农业大学大学院博士后竟政一行3人，应南京大学邀请，并在南大国际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范从来等人陪同下来到开弦弓村，对吴江农业经济改革带动全面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考察。他们听取了该村经济发展情

况的介绍，参观了村办厂和农户。

1993年10月14日，“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行47人（其中美国和台湾、香港代表21人）来吴江实地考察“江村”风貌。该研讨会是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由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主持。

1994年9月10日，日本经济政策学会常务理事、亚细亚大学经济学部加藤寿延教授访问开弦弓村，并游览了太湖。

1995年10月31日～11月1日，日本吉备大学访问团一行5人应上海大学文学院邀请，并在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沈关宝陪同下到开弦弓村和庙港镇进行访问活动。代表团由团长山口荣、副团长柳原佳子（均是吉备大学社会学部教授）带领，听取了村、镇的概况介绍，参观了金蜂集团公司、村办企业，走访了农户，并乘船观赏了太湖风光。

1995年11月27日，日本大阪府　市市役所农业问题专家荒崎博先生专程访问开弦弓村。在村会议室听取介绍后，又去参观农田、桑园、水渠及缫丝厂，拜访了农户。中午即在农民家就餐。下午到庙港镇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并游览了太湖。

1996年3月29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伦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王斯福教授，应费孝通教授邀请第二次访问开弦弓村。随同访问的有王斯福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开弦弓村调研的常向群、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陆绯绯等人。王斯福教授一行在吴江市、镇、村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开弦弓村的“江村研究陈列室”，访问了不同类型的几家农户。

（庙港镇机关档案室）

江村1992年印象记

一

5月中旬，我们来到了江村。江村，这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在唐诗里就有不少诗篇提到了江村。杜甫诗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孟浩然诗曰："人随河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但我们来到的江村，不是泛指的江边的村子，也不是世外桃源，而是著名的社会学调查基地——江苏省吴江市庙港乡开弦弓村。江村是费孝通教授所起的学名。开弦弓村有三条河，其中一条主要河流"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开弦弓村便由此得名。[1]"

费孝通教授一访江村是1936年的事了，二访江村在1957年，三访江村也是1981年了。到现在为止，费教授已经十五访江村，其中我跟随两次。

江村风景宜人，我们在暮春初夏之际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从震泽到庙港的这条公路，两边的水杉树长得郁郁葱葱，四周是无边的绿色桑树和金色的麦田，空气又是那么新鲜。风从太湖上吹来，八百里太湖的广阔胸怀似乎都在这里敞开了。我知道从这里向北十余里就到庙港，在太湖堤上可看到茫茫的太湖和白帆，看到湖中的东山半岛，乘船过去很近，不必在陆上绕一个大圈子。

江村的中心还是沿原来的三条河流展开的，有四座桥和几间30年代的老房子，甚至有些小店铺似乎也是在旧址上重开的。河水还是那么清沏，从西向东流着。江村最明显的标志是房子，整片的新房子，大多数农民都住上楼房了，而且，这几年内不少都贴上马赛克的墙面砖和用铝合金门窗了。宽大的房子楼下一般

是不住人的，还是老传统，留着养蚕用。人的变化则更大，年青人衣着时髦，思想活跃。而且村里还有了几十名外地女工。本村的能人不仅办工厂搞副业，而且有的直接到盛泽东方丝绸市场里去闯天下。这些表面的变化是一望而知的，但是这些变化的基础在哪里呢？当然是经济结构，应该说，江村的经济在1992年更加发展，有一个更加不同于30年代、50年代、甚至80年代的结构了。

二

开弦弓村现有19个村民小组，612户人家，2427人，1435个劳力，粮田面积203.1亩，桑地面积855.08亩。"人口和土地"问题虽然仍有，但目前稳定下来了，计划生育也搞得很好。该村自从1936年以来体制变动较大，和老的开弦弓相比，非得做一番详细考查不可。目前村子的面积比1936年时扩大了，包括了荷花湾一块。荷花湾是狭长的一块地，朝南延伸得很长。该村主要田地向南北展开。

开弦弓村的农副业生产历来有较好的基础，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吴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两田分开"。把口粮田（包括饲料田）和责任田分开。口粮田由各家包干；责任田相对集中，可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大多由农业大户承包种粮；剩余的劳动力可适当分散到工业和副业上去。据称，农业产值在开弦弓村内约占农工副总产值的13%。但是不管情形如何变化，农民对自己的口粮田总是抓住不放，村里对粮食帐总是要详细算一算。

1987年江村进行了责任田调整。上面派了工作组来帮忙。江村大部分圩田还是靠水路通达，因此适宜进行机械化耕作的主要是沿公路的516.4亩田，仅占全村土地面积1/4。而这些田又分布于八个村民小组，即过去的八个生产队中。江村人自调整

土地过程中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口粮田、责任田分开后，由一户承包责任田，形成种田大户；另一种是由几户承包责任田；第三种是每户一块田，所缺面积在外圩补足；第四种是由乡里办种子场。调整土地时，还搞了拖拉机路、环村的一米宽的水泥路和水泥渠道。

事情做起来不能没有矛盾和困难，群众的反响也不一样。当时就有句顺口溜："青年人拍手叫好，老年人满面欢笑，当家人担心收入减少"。青年人反正不愿意种田，老年人种不动田，但肩负重任的中年当家人一点也不敢马虎。何况，土地一调，具体问题马上就会来。有的怕丢了肥田拿瘦田，丢了近田拿远田，丢了碗响田（即门前田）拿外圩田，以后摇船动橹，运灰挑担不方便。有的村民小组因为工业征用土地过多，责任田过少，如八组只剩五亩责任田。有的组责任田征购任务过重，如十六组每亩责任田要负担 1129.8 斤征购粮，没有人敢种了。但江村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了适当调整。

在确保口粮和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江村进行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江村人计划把 250 亩粮田改为桑田，人均桑田 0.365 亩。他们压缩了油菜面积，但至少保证 300 亩才能保证自己的食油需求。粮田面积也压缩了，同样，至少要保证口粮、种子粮、饲料粮的需求。当时全村 2380 人按每人 600 斤口粮计算，口粮总数为 142.8 万斤。但粮食征购任务会因改桑田后减少 14.7 万斤，留 43.1 万斤上交任务。种子粮按每亩 60 斤计算，留种 13.7 万斤。饲料粮也有大致计算，即全村肉猪 1200 头，母猪 150 头，苗猪 300 头，家禽 12000 只，就需要 76.5 万斤粮。这样村里合计就需要粮食 276.1 万斤。村里计划三麦面积扩大到 1534 亩，双季稻压缩到 500 亩，单季稻扩大到 1434.5 亩。如三麦亩产 500 斤，双季稻前季亩产 700 斤，后季亩产 600 斤，单季稻亩产 950 斤，全年粮食总产可达 285 万斤。因为农民在 60 年代困难时期

饿怕了，所以凡事都得在粮食上算一算，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科学的。

江村现在有中型拖拉机二台，联合收割机一台，插秧机三台，播种机一台，开沟机十台，弥雾机二十台，共投资九万元。1991年又投资十五万元，建设永久性水泥渠道3500米。这里有县、乡两级财政的支持。1990年以来，村里健全了肥料农药组、机械作业组、排灌作业组，常年有三十人，实现全村统一供肥、药、种子，统一布局机耕、排灌、防治病虫害。

当然，这种农业机械化还只是试点。江村四分之三的土地还是靠农民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干。在1991年经受特大洪涝灾害后，江村仍然获得丰收。夏熟三麦亩产584斤，油菜亩产340斤，水稻亩产1127斤，都比1990年略有增加。总产达306.53万斤，共增产7.67万斤。农民粮食够吃，上交任务也能完成，但要靠粮食赚多少钱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每亩平均增产几十斤粮，一年整个村里可增加四五万元，可给一家盖一幢楼房了。但是钱是分散开的，不见多少。江村二千余口，假定一亩每年可获纯利150元，也没有多少。赚钱还得从副业上工业上来想办法。

三

江村有850余亩桑田，搞农业规模经营时，该村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村里35—50岁的妇女劳动力去从事蚕桑生产。

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对蚕丝业作了细致的描写，葛迪斯也记录了江村蚕业的过程。我们刚到江村时，立刻被大片的桑林吸引了。我们在工作之余漫步于桑林之间采桑果吃，自是一种享受，而被农民叫去看蚕宝宝，更是一种被尊重的自豪，他们把我们当做亲戚了，因为这里探亲看蚕宝宝是一种风俗呢。看来，要深入了解江村，还得请教一些有经验的农民。

村副业站倪站长是很普通的农民，但是头脑很清楚，他把养蚕过程给我们讲得头头是道。他说，村里每年到震泽多种经营站买蚕种，每张蚕种约 1／3 信封大。1990 年春天要领 896 张蚕种。一年可养四次蚕。以春蚕来说，5 月 2 日发种。村里人把种买回来后，红纸放在蚕种下面，上面放棉纸，铺平。然后就放入坑床加温。这是一种自制小土炕，村里七八十户人家都有，室外生火，让暖气进床。坑床一生火，第一天温度可达 77℃，第二天是 83℃。到 5 月 4 日蚁蚕就出来了，会吃嫩桑叶了。5 月 12—14 日蚁蚕变中蚕时，就不在坑床内了，已经取到大圆匾里，一张蚕种一般可变八匾蚕。到 5 月 16 至 20 日间，老蚕开始上山，即上纸方格簇或草龙，一张蚕种已变成 25 匾老蚕。6 月 1 日开始结茧。6 月 7 日开始采茧。一张蚕种可结 88.16 市斤茧。这里讲的是春茧。春天的桑叶多，叶子又无虫害，茧子质量高，蚕蛹也可以吃。但夏茧、早秋、晚秋三季茧质量就要差些。夏蚕是从 6 月 21 日到 7 月 1 日；早秋蚕是从 8 月 5 日到 8 月 25 日；晚秋蚕是从 9 月 8 日到 10 月 8 日。

老倪还给我们讲解了桑树的培育过程。每年 5 月采桑果，让肉烂掉留籽。6 月 10 日播种入土。桑苗长到 50—70 公分高时，即到当年 11、12 月间可移栽。来年春天清明前后半个月嫁接，用选好的桑条剪下嫁接，再等到冬天才可将桑苗移入大田。移栽时剪去 1 米长条，留 10 公分长。到下年桑苗绽出 3—4 芽。再到下一春天又伐去长条。这样，到第三年夏秋天就可采叶。每亩桑树可产 1 千斤叶。以后产量逐年提高。第 4—5 年桑树平均亩产达 3 千斤叶以上，五年后达 5 千斤以上。桑树寿命很长，可达百年。开弦弓村还有解放前种的桑树，但对老桑树特别要注意施肥、喷农药、除草等。

江村 1991 年全年饲养蚕种 2698.42 张，总产茧 1838.7 担，售茧金额达 97.69 万元，人均毛收入达 400 余元。江村的副业还

有养猪、羊、兔、鱼，种桔、瓜，以及运输、劳务、家庭缝编业等，1991 年副业总收入约为 380 万元。江村人搞副业有传统。我们从费老的《江村经济》一书中，看到 30 年代就有养羊、捉鱼的照片。

如果按江村每个劳动力耕种 6.6 亩土地计算，全村 2 千余亩粮田共需要劳动力 336 人。实际上，目前江村有 1/4 土地已搞机械化试点，节省了部分劳动力。有关资料说，副业劳动力大致 320 名。因为养蚕忙时忙、空时空。忙时全家动手，蚁蚕一天喂三次桑时，中蚕一天六次，大蚕一天十二次。农民有时一天要在十六小时内不断地用桑叶喂蚕，桑叶一缺，蚕就不易长大。如果按副业站长的计算，一张蚕种变为 88.16 斤茧，要 30 个劳动日，何况村里还有果园 67 亩、水产养殖面积 800 亩，及农民个人找的副业。因此 320 名副业劳动力只是大致计算。这样，村里还多余 700 多名劳动力，必须另找出路。

四

按照费孝通教授社区工业的概念，江村目前有五家厂，其中包括乡办缫丝厂、和新民丝织厂联营的江村丝织厂以及村直属的开弦弓丝织厂、白酒厂与罐头食品厂。在《三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说："1968 年开弦弓村开始重建缫丝厂，但是设备和技术由于条件太差还赶不上抗战前的合作丝厂。1975 年乡村工业受到重视后才扩充设备和技术。1978 年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二百多工人的小型现代工厂，而且在出丝率上正在赶上日本的先进水平。1979 年开弦弓村开办了两个豆腐坊和一个丝织厂。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的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缫丝厂已经升级为乡办厂，但是此厂是从江村内部发展起来的，至今还用了 1936 年合作丝厂的商标，而且所在地还是

江村，所以我们的分析还得将此厂包括在内。1991 年开弦弓村村办企业（不含乡办缫丝厂）总体情形是：产值 1010 万元，利润 44 万元，工资 86 万元，税金 6.98 万元，提留 58 万元，管理费 0.73 万元。1968 年开始几个村合办的缫丝厂划归乡管。村里工业得自想办法。开始只搞了六台织机，虽然是县里批的额子，可是还得找六吨钢材来换。我认识的老李，当时是苏州市一个厂里的供销科长，帮过江村的忙。工厂的起步不容易，工人和干部都很辛苦和努力。但当时内部问题比较简单，因此这个厂发展得很快。1986 年总产值是 341.6 万元，到 1991 年是 551.64 万元了。但利润有盈有亏。工人的工资则总是不能少的。

1991 年 7 月，开弦弓丝厂与盛泽某大厂联营，新增加投入 105 万元，总投资 205 万元，形成 120 台织机的丝织厂，当年已经有 100 台丝织机运转。但事与愿违，当年亏损 55.74 万元。为什么联营后反而效益不好呢？诸说不一。有的说，此大厂有大厂沙文主义，而开弦弓厂无民族自立精神，事事仰仗，反而不行；有的说，管理上也是吃大锅饭，职工积极性不高，同一台机，同一品种，产量和质量相差很大。又说联营协议上分资比例就不对，开弦弓村的比例太多，对方厂比例少就不负责任，而且总厂厂长又不签字等。当然也有人说，对外来厂长也要一分为二。人家是正规办法，当地人不适应，而错误是停产更新设备，投资大，难于支撑，借款多，产出低，搞得亏本不实惠。我们刚到厂里，厂长是新提拔的。村书记和社长天天来此厂帮助工作，并首先抓住了市场。他们开发的花瑶新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温州的个体户腰缠万贯，亲自坐了货车来拉货，当场付现钱，也不能全部满足。庙港乡在此厂开了全乡的大会，宣传他们的经验。此厂的情形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不仅以前离厂的工人回来了，而且还招了几十位河南女工。村书记自豪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是靠自己了！"

开弦弓丝厂隔壁办了一个江村丝织厂，我去看了一下。这是1987年村里与吴江新民丝织总厂联营的。新民厂厂长是费老二访江村时的熟人，有这层老关系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民厂要将分厂办到江村来，江村丝织厂总投资115万元，有40台织机。新民厂投资7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0.7%，开弦弓村投资45万元，占投资总额39.3%。双方协议定得很清楚，此厂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正厂长由新民厂委派，并为法人代表，主持全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新民厂开始派出14个人，现在逐渐减少到5人。开弦弓村也派3人参与工厂管理，厂里共有121人，本村人占60%，外村职工占40%。

正厂长姓包是盛泽插队知青出身，原来是新民厂的准备车间主任，他平时住在厂里，两个人一间房间，要星期六晚上才能回盛泽过星期天。他管理工厂还是新民厂里大集体的一套办法。我们问起厂里历年产值、销售、效益、税收情况，他立即开给我们。此厂1989、1990、1991三年的产值分别是165.08万元、153.3万元、262.99万元；销售额分别为110万元、228.26万元、167万元；效益分别为24.08万元、57.8万元、64万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400元、1540元、1870元；税收则分别为3.7万元、9.3万元、4.8万元。

包厂长很爽快。他接着说，江村丝织厂协议上讲是1992年结束，但看费老面子是推不掉的。这个厂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村里不管。我当厂长要把新民厂的百万投资看牢，不能亏。但十几万元/吨的白厂丝难搞，议价吃不消。这个厂小，生产不成规模，在市场上竞争有难度。他又分析开弦弓丝厂，说他们虽然前一时期走了弯路，但现在设备比我们好，生产规模也大。我厂主要靠技术优势，一失去就不行了。过几天我碰巧遇到新民总厂的厂长，他是来和村里谈工作的。他还带了新民厂的纪委书记来，反对村里的摊派。以上反映的情况是从县大集体厂到村办厂

管理体制和利益上来看的。

五

最后我们到乡办的缫丝厂。此厂就在开弦弓村的中心，又在公路边上，一大片房子装饰得很漂亮，还有花园、宾馆。这个厂可以算是全国历史最长的乡村企业了。1923 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开弦弓村为试点，开展了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的土丝改良活动。全村改良丝产量逐年提高，售价较一般土丝高 1／3。但 1928 年，丝价疲软，改良土丝又是出自木制丝车，条纹不均，断头较多，终无法与厂丝竞争而滞销。1929 年开始，郑辟疆、费达生先生以及村人陈杏荪、周保山等筹建丝厂，即所谓"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一时报名者踊跃，集资 753 股，每股 20 元，还贷款 4700 元。当年 8 月即建厂开工，初期每月产丝 12 担，一等丝 10 担，每担 1534 元。年终决算获利 10807 元，入股者所得红利为其所交股金之两倍。工厂发展到 1935 年，机器已更新为日本新型立缫机，丝产量超过前几年平均年产量的 1／3。而且，归还了银行贷款，收回了固定资金，还盈利数万元。费孝通教授在 30 年代的《江村经济》一书中称之为"中国农村工业中大的改革方案的先驱"，名符其实。

从 1935 年到现在工厂几起几落，历经沧桑。1937 年日寇下乡骚扰，以此厂房为驻地，村民愤而自毁厂房。1954 年村又设烘茧站，1967 年又办小丝厂，替外贸厂来料加工；发展到 1979 年，此厂在设备、职工培训和工艺上进了一步。当时又得到了费达生老先生的支持。时至 1991 年，此厂固定资产已有 630 万元，自有流动资金 500 万元，全厂职工人数 720 人，工厂面积 18500 平方米，1991 年生产生丝 122 吨，产值 2141 万元，生丝质量评比全省第一，已经向欧洲出口。

缫丝厂的陈厂长一副春风得意样。他和我们座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说，某县五个缫丝厂，只有一个不亏本。他们还都有无息贷款及优惠的税收政策。原因是闭塞，信息不通，不善管理，纪律也松。吴江丝绸也要开始第三轮技术改造了。现在劳动力很紧张，用喷水织机100台可以抵过几百台、近千台老式织机。我们厂今年要有5000万元产值，800万元利税。1992年生产的170吨白厂丝，一部分给国家，其中给新民丝织厂40吨，出口到加拿大50吨，自己留80吨。我们在庙港镇上还有丝织厂，有118台织机，50台织真丝。已经和香港订好合同，以销定产，生产茄克面料出口到西德。合资搞一个中外企业，外商出300万美元，我出40万美元。真丝出口要受配额限制。我想办法搞化纤绸出口，不组织别人的产品出口，换汇搞平衡，来个三角转。

陈厂长又说，下一步要搞真丝T恤衫，年耗50吨白厂丝，投入100万美金。还要进一步发展，乡里成立丝绸总公司，成为一条龙。深圳也要去设办事处。我厂管理靠合理分工，各级订责任状。开拓、人才、公关、信息是我正厂长管的。下面三个副厂长搞管理。我们搞人才竞争要超过国营企业。以前蚕茧大战时，浙江人来看我们的原料，也承认自己不行。因为浙江是个体户多，乡一级是吃大锅饭，收多少茧子都归国家，乡里没有好处。现在学了我们，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也好起来了。

他最后强调，他是1982年来此厂做厂长的。十年间工厂从32万元固定资产，发展到现在两个厂1300万元固定资产。而且每年又给乡计划外财政二三百万元。他兼乡农工商副总经理，又兼乡外贸公司经理、收茧站站长、绸厂的厂长等。最后他说，缫丝厂对村里还是有帮助。仅第十五村民小组就有37个职工在厂里工作，此村的村民小组在运输上每年还有15万元的工、下力费收入。

我们也去看了一下缫丝厂的生产工艺。有洗料、煮茧、剥

缫、自动缫丝、复摇、整理等各道工序。尽管工人的工作条件比前些年已经大为改善，但还是很辛苦。我们进去一会，就感到车间里闷热得很。此厂管理在上述不同工艺的区别上，车间和班组分开核算。此厂的原料茧卖给车间，车间把生产的厂丝根据质量好坏卖给厂部，然后再根据茧子作价、成本核算、厂丝质量等，确定职工的工资。在外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此厂有一套自己的运转机制，甚为有效。此厂 1991 年终利润为 683.33 万元，工资总额为 215 万元，税金为 55.07 万元，管理费为 10.9 万元。而整个庙港乡工业利润不过 1010.79 万元，所以此厂是占了个大头，其地位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乡村企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除了上面的政策开放外，主要原因还是费达生在 1930 年讲的那几条，即"办厂于乡时，成本低廉；乡村经济有弹性，易于维持；原料收自社员，统一而又优良，以及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等优点[2]"。但其中的新原因和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六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又说，要想富，农工副。问题又回到前面来，我们才理解了村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楼房。据统计，新建房 359 幢，占全村总户数的 65%。30 年代的老平房还有，有的还住人，有的是作厨房等用，另外建有楼房了。楼房之间有差别，有的外装修很好，有的里里外外都现代化了。有的农民家里楼上装有抽水马桶，可是不习惯用，晚上临睡前屋里还是放一个大马桶。有的农民老太太的卧室里，还像是费孝通教授自称的他祖母房中的样子。结婚是更加讲究了。费老三访江村时，估计农民结婚 2000 元就够了，现在新结婚包括添置彩电、音响、家具、卧具和衣服等一般要用到两万元左右。我们一到江村就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去看新房，喝薰青豆茶。以前农民平均每户每年买

十元钱茶叶，现在要买一二百元的新茶。有时茶要到苏州城里去买。烧水的灶头有传统的砖砌灶，也有煤气灶。

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1978 年个人平均年收入还只有 114 元，1980 年就接近 300 元，1991 年已经是 1462 元了，光比 1990 年就增加 330 元。这种水平的村在吴江县 559 个村中属中上水平。

虽然每个人情形不同，有的靠做生意，比如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承包一个门面，有的靠跑运输，但大多数农民还是靠工业。庙港缫丝厂 1991 年终人均分配 2941 元，而开弦弓村其他四家厂的人均分配如下：开弦弓绸厂为 932 元，江村丝织厂为 1964 元，江村酒厂经销部 1073 元，江村食品厂为 1552 元。难怪我一进村就有人来托情想进乡缫丝厂，也难怪过去村办绸厂人要跑了，也难怪江村丝织厂的包厂长充满自豪，也难怪今年经销部的人愁眉苦脸，这一切都是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啊！

村书记和厂长的报酬也有一笔账。这些都是经过乡里统一审批后决定的。1991 年开弦弓村年终分配各厂长的情形如下：缫丝厂厂长为 6814 元，开弦弓村绸厂厂长为 2330 元，江村丝织厂厂长为 6000 元，经销部经理为 3078 元，食品厂厂长为 2888 元。开弦弓村书记为 5862 元，比去年增加 2593 元。这个数目在庙港算中上水平，村书记普遍是 3000 多元水平，个别有 1985 元，但有个别的高达 12145 元，这是渔业大队书记，该大队整个经济收入特别高。村书记的基本报酬为 1200 元，浮动报酬 1000 元，再得多少是要看考分的，奖金也是如此。办法是根据工业、农业、副业产值、效益、净利润和上交蚕茧粮油等数量多少而定。开弦弓村书记的 5862 元就是根据这样的标准评出来的。而村经济合作社主任、会计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分别得到 4507 元和 4481 元。应当说，分配由上面来审批的办法还是对的，至少是一种约束。现在分配不均、贫富不均的矛盾已经突出，如果

再不适当地注意，将会产生激烈的社会矛盾。

我们再从平均月收入水平作一考察，也许便于和我们城里拿月工资的人比较。根据有关资料，江村当地农业劳动力平均月收入水平100元。在江村两个厂里工人月收入也不同。如缫丝厂工人最高月平均收入为360元，最低为160元，厂领导最高为550元，技术人员平均收入为480元。又如开弦弓绸厂工人最高月平均收入为250元，最低为100元，厂领导最高月平均收入为220元，采购、推销人员平均月收入为220元，技术人员平均收入为300元。注意后一个厂才有采购、推销人员的工资账，为什么前者没有呢？因为前者是一条龙控制下的体制，没有给采购、推销人员多少活动余地。后者技术人员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厂长。

农民的思想问题似乎少一些。但我有一次和一位搞运输的52岁的农民工闲谈，他也有牢骚。他说，"苦命，七年了。以前在小队里开船，打水，看圩岸。1985年开船，开始买半只船二人合开，以后有一只十五吨大水泥船。船开到浙江，两个省的航管处都要收费，有时还要罚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到处罚款？我开船运黄砂、水泥、石子，要请帮工，一天十几块钱支付不起，以后不开了。"开弦弓村农民历来有搞运输的传统，还养羊、兔等。目前又有做家具的新路子。在村里自己和别人一起做组合家具，开大吊机船五个小时运到苏州去卖，一般一套家具可比店里便宜四五百元，所以还有市场。这类人比较自由，但只要是农民还得种田、交农业税。

七

开弦弓村领导对自身是严格要求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开会一再强调，厂长们要对企业、村民和上级党组织负责。"如果我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巧取豪夺，去谋私利，那是绝不允许的"。

村党支部迎着困难上，尽心尽责，为振兴全村的经济而努力

拚搏。1992 年他们的目标是全年粮食总产 300 万斤以上，农业总收入 110 万元；蚕茧总产 1900 担，争取 2000 担，副业总收入 400 万元；工业总产值 1800 万元，争取 2000 万元，效益 300 万元，争取 350 万元，利润 80 万元，争取 100 万元。

庙港乡有 21 个行政村，稻田 19937 亩，桑地 8969 亩，年生产优质茧超过 1000 吨。工业近年来有所发展，镇貌也大为改变。狭窄的石板路已改为大马路，平房也为楼房代替。昔日贺老下榻的"万顷阁"，曾是庙港镇上最好的房子，现在相对乡政府新大楼也逊色了。1991 年，乡办企业产值 9859 万元，利润 1010 万元，工资 592 万元，税金 122 万元。全乡拥有 60 多家企业。上面提到的庙港缫丝厂，它是全乡最重要的企业。说它是开弦弓村的社区企业，当然有道理。无论从早期开办，还是从 1968 年重办来说，都是村里开始办的。目前此厂已是名符其实的乡办厂。庙港乡还有乡丝绸厂、制冷设备厂等比较重要。

庙港乡的领导人精明能干，和我们谈了一上午。他说："庙港 1991 年工农业产值 18819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13903 万元，效益即包括工资、税金、提留、去掉成本的净利润可达到 1209 万元。我 1989 年到庙港时，工农业总产值 8285.51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6344 万元。我的办法是对干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压缩村干部，村干部七八个太多，副业干部可兼蚕桑技术员。不能当厂长的就不能当村书记。干部长期外行的，下面就不服管，也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乡里对下面也要不定期地进行审计。有的承包企业挖集体财产，多报库积，拼凑利润，提高干部收入，争面子和荣誉。虚利分配的现象一定要克服。今年全乡企业基本上没有亏损。"

他还说："我们针对庙港小农经济思想较重，历史上比较富裕，缺乏紧迫感等问题起草了一些文件。狠抓'导向、鼓励、壮胆、加压、挑担"这十个字。以前 30%的速度就不错，现在要大

干。我们召开干部会，统一思想，最主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铺路、修桥、建市场、造学校等方面，每年办十件实事。建造江村小学花了20万元。我带头出200元，然后向群众集资就比较容易。同时抓廉政建设，机关内不发东西，也不收礼。有人办事不到我家里来，我在家里从来不接待客人。自己还住平房，下雨潮湿。对外要多交朋友。庙港工业三大块：纺织一块，蚕子100%留下来缫丝，然后60%白厂丝上交国家任务，40%自留；化工一块，化工厂和苏州益民化工厂联营；家电一块，主要生产冰箱、空调器的配件。目前丝绸这方面冲击很大，主要是缺乏劳力，同时职工工资提高，效益下降。今年还投入2000万元，其中自留资金600万元，群众集资400万元。

对开弦弓村经济辐射力最强的是盛泽镇。此镇被誉为"华夏第一镇"，是吴江最大的镇，它的丝绸业在历史上某些时期超过苏州。江村有两个厂和盛泽镇的两个大厂发生联营关系，前面已述。比较成功的是与新民厂联营的江村丝织厂。新民厂创建于1958年，是一个从手拉脚踏机发展到首先使用喷水、喷气织机，又是江苏省重点丝绸出口的工厂之一。1991年工业总产值15247万元，利税1244万元。此厂的辐射力不仅是吴江县境内，还在蛇口设立中外合资深圳华丽丝织服装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年生产30万件、套真丝服装。从江村到深圳，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个圈子可比马林诺斯笔下澳大利亚附近的Kula圈子要大多了。

我们到吴江之时，正值县改市之际，到处红旗飘扬，一派节日气氛，象征着吴江将有一个大发展。吴江23个乡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加大力度，农工贸齐进。199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100.76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27.77亿元，国民收入生产额26.3亿元，财政收入达1.73亿元。

八

在《江村经济》一书的附录:《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结束语中,50年代的葛迪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帝国制度下,官僚统治集团对县一级直接控制。1911年以后又提出了一批新的,在多数情况下更加腐败、更加不可靠的官僚。今天中央政府仍然对县一级进行直接监督,并且也更多地掌握村庄本身。但农民更多地参加到政治组织和管理干部的队伍中去,尽管这些组织有一些错误,但确是为改善农民福利而贡献力量的,因此不易腐化。"他又说,"要认清未来是困难的。这次研究的价值只有在20年后,再作进一步调查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现在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本文只是记录我的一些印象。

在江村的日子,生活是很愉快的。我们在工厂墙报上读到陪我们参观的盛小姐的一首诗:"桑的海洋,丝绸之路在这里延伸/载着希望/通向遥远的地方/唱吧,辛勤的立缫姑娘/用丝绸织成帆帷/沿着丝绸之路/东方丝绸的无穷魅力/花都巴黎绚丽的时装/使人体会到美的永恒/洋溢着现代生活的气息/带回来的是如诗幻想!"这是青年人胸中的诗。我们在工厂里还看到几十个外地来的女工,他们生活得很艰苦,很朴素,像我中学时代的女同学,但还是那么乐观,这是生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毕竟是成年人了,晚上时常去幽静的东湖荡畔散步,又陷入一种似乎成年人的忧伤。我们对这个变化得太快的商品世界不能适应。《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在银色月光下远望繁星、湖水、桑林、农田,中国未来会向何处发展呢?涌起一种崇高感,同时又沉静下来。江村这个窗口给我们提出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呢?

(中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惠海鸣)

注：

（1）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3页。

（2）费达生：《吴江开弦弓村生丝制造之今昔观》，《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转引自《丝绸》杂志，1989年第3期第35页。

后　记

吴江市政协有幸承领《江村—江镇》课题，并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共同帮助和督促该课题的实施和完成。这为课题组成员——政协社科界中的有识之士，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工作条件。

这项课题反映的是庙港60年发展的脚步。显然，它的意义是越出庙港的。因为，当前举世都在密切注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步伐。

在费孝通教授闻名中外的《江村经济》之后，课题组敢于对江村及江镇进行研究，是于1993年3月开始的。其实应该说，探究这一课题他们是向往已久了。尤其是费老的"三访江村"和中国社会学得以重建，家乡的每一点进步，费老每一项研究成果的发表，不断地增强了课题组成员的信念：社会科学是能够指导我们的家乡建设，它对我们的家乡进步将会起着深刻而重要的作用。于是，在费老的关怀下，在各级领导和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支持下，课题组的同志们集结在一起，共同撞进了这一块于他们来说，既陌生又亲切的社会学研究领地，做着许多专业社会学工作者所梦想的工作。

同年5月，费老回家乡作调查期间，课题组向他呈送了课题计划书，并征求他的意见。费老肯定了课题组的工作方向，提议把对江村乃至江镇研究视角扩展到整个吴江小城镇研究，把它放到区域环境中去考察研究。费老在近三年的返乡调查中每一次都抽暇接见课题组成员，谈他当年进行江村调查的体会，谈这几年来他在不同区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表现的不同模式进行

广泛调查的见闻及其见解，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谈学术及其学人的思想境界，谈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课题结项时，课题组又向费老呈上他们的汇报。费老用了两天的余暇时间审阅他们的材料，甚至还把其中的一些错字、漏字改了出来，像是一个认真而慈蔼的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当课题组成员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费老时，费老的第一句话竟是连声称好，并笑着鼓励他们说："当年我作《江村经济》的时候，只有25岁，是独立作战。你们现在都30多岁了，条件比我好，应该可以比我做得好。要敢于挑战，不要自卑，不要钻牛角尖，也不要有学术方面的派别门户之见，只要实事求是，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根据费老建议在庙港建立的"江村研究中心"，把《江村一江镇》作为它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对此，吴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十分重视。市委书记沈荣法主编的《改革开放与吴江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把"江村→江镇"课题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吴江市取得的五大成果中理论成果的一个例证。为了落实本书的出版经费，市长张钰良亲自作了批示。副市长周玉龙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一课题的进展。课题组主要成员所在单位：市委政策研究室、市人大办、市经济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市人事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吴江报社、市商业局、市港监处、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市文化馆、东南大学社科系等为课题的完成提供了方便和条件。

曾经陪同费老从三访开始进行江村调查至今的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给予课题组不断的鼓励和关怀，特意为他们介绍费老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立志富民的理想和近年来小城镇研究的进展情况，使课题组同志倍受教育和鼓舞。

这项课题得以完成，要特别感谢胡福民、吴铎、沈立人、朱通华、宋林飞、童星、赵学漱、丁沅、班华、王振宇、吴康宁、徐采石等专家、学者。华东师大吴铎教授多次拨冗义务为课题组

提供咨询服务。江苏省社科院沈立人研究员，以吴江儿女的赤子之心，带着腿伤专程赶来吴江作了国内外现代化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就课题工作做具体指导。上述专家学者中，虽然有许多从未谋过面，只是从一些学术书刊上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然而，当他们听说了这一研究的宗旨后，一个个伸出了热情的手，一个电话，或者贸然上门求教，课题组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所需要的帮助。

我们和课题组还要感谢庙港的党政领导。他们从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发展庙港出发，全力支持、关心这一工作。专门成立了课题工作协作组，在庙港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史建荣、邱龙根、叶茂华、陈圣江、崔明方、李耀灿、孙荣明、王泉林、徐水英、汤锦明、崔夏萍、尹根生、谈雪荣、邱全明、邱明芳、朱瑞章、沈分明、沈春荣、姚三毛、沈荣奎、王士铮、沈稻英、王梦龙、沈菊良、丛建秋、计阿兴、朱虎金、吴伟华、李海青、盛建新、吴元兴、沈金康、张明远、朱学康、潘金荣、周金娜、吴福宝、王士泉、王玉英、沈琏琥、朱廷康等同志都为这项课题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此外，吴江市科协虞悦明、吴江市新生化纤厂周德华两同志也为这项课题的顺利进展作出了贡献。

当然，具体工作的开展并不那么容易。课题组的成员，虽然是在这片土地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生活阅历并不等同于实证材料；而且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不仅要现在的，还要过去的，要60年变化的每个脚印，要这60年变化的历史原因。为了核准一个数据，他们不知要查访多少人，翻阅多少资料。为了寻找当年的一个事实，也不知踏过了多少门槛；况且，每个人手头都还有繁重的本职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大家忙里偷闲、闲中着紧，读费老的原著，读社会学的理论著作，对照事实材料进行反复思考，调查又调查，思考又思考，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稿又稿。

三年辛苦，三年磨砺，使课题组的同志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面对前辈费老及一些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殷切嘱望，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责任。

在费老"江村调查"60年之际，我们将这一课题成果送呈出版，并附录"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等史料，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费老在《江村经济》中确立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研究社会问题的精神和方法，同一切有识之士一起，加强调查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工作中不妥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96年6月